

中华大方略全书

盛世危言

智慧宝鉴

清 郑观应

列强虎狼入寇
盛世危在顷刻
富国难就步武

洞开中国门户
亡羊补牢为期
振兴唯有强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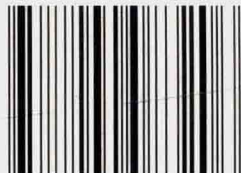
ZHONGHUADAFANGJUEQUANSHU

责任编辑：马东源
封面设计：华傲祥工作室

英雄所见略同



ISBN 7-204-08320-2



9 787204 0832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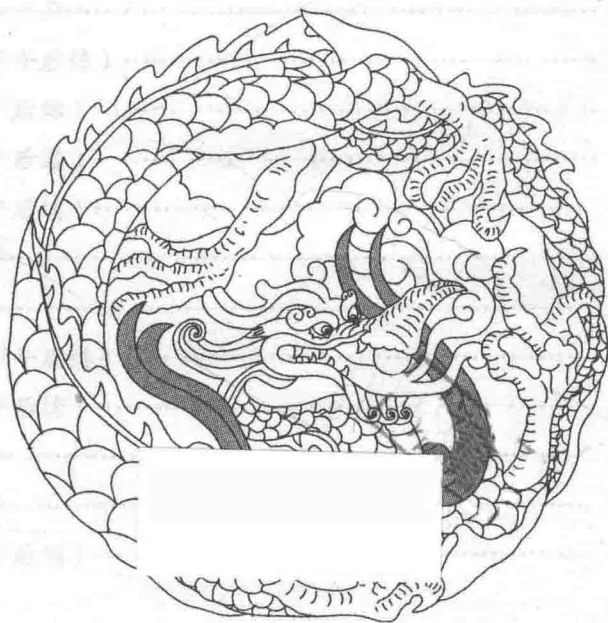
ISBN 7-204-08320-2/I-1748

定价：1480.00元（全48册）

中华大方略全书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通论

- 道器 (1)
- 议院上 (3)
- 议院下 (甲午后续) (5)
- 公举 (甲午后续) (7)
- 原君 (甲午后续) (9)
- 自强 (甲午后续) (11)
- 公法 (12)
- 交涉上 (13)
- 交涉下 (甲午后续) (16)
- 条约 (甲午后续) (18)
- 教养 (20)
- 建都 (22)
- 入籍 (甲午后续) (24)

卷二 礼政

- 学校上 (25)

学校下	(27)
西学	(29)
女教	(32)
考试上	(34)
考试下	(37)
藏书	(38)
日报上	(40)
日报下	(42)
典礼上	(44)
典礼下	(46)
传教	(48)
训俗	(50)
医术	(52)
(7)	()
(10)	()
(11)	()
卷三 吏政	
吏治上	(55)
吏治下	(58)
通使	(60)
游历	(63)
书吏	(65)
阍宦	(67)
廉俸	(68)
限仕	(69)
汰冗	(71)
律法	(74)
狱囚	(77)

罚赎	(79)
禁烟上	(81)
禁烟下	(84)
盗工 (甲午后续)	(87)
革弊	(88)

卷四 户政

税则	(90)
厘捐 (甲午后续)	(94)
银行上	(98)
银行下 (附钞票)	(100)
圜法	(103)
铸银	(105)
盐务	(108)
捐纳 (甲午后续)	(110)
停漕	(112)
国债	(114)
度支 (甲午后续)	(116)
户口 (甲午后续)	(118)

卷五 户政

商务一	(119)
商务二	(121)
商务三	(124)
商务四	(127)

商务五	(129)
商战上	(131)
商战下	(134)
赛会	(135)
保险	(139)

卷六 兵政

练将	(141)
练兵上	(143)
练兵下	(147)
水师	(150)
海防上	(155)
海防中	(157)
海防下	(159)
边防一	(161)
边防二	(163)

卷七 兵政

边防三	(165)
边防四	(166)
边防五	(167)
边防六 (甲午后续)	(169)
边防七 (甲午后续)	(171)
边防八 (甲午后续)	(174)
边防九 (甲午后续)	(177)

江防	(180)
炮台	(182)
火器	(183)
弭兵	(189)

卷八 工政

技艺	(191)
纺织	(194)
农事	(197)
垦荒	(199)
旱涝	(201)
治河	(203)
招工	(208)
恤贫	(210)

卷一 通论

道器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乘，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

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观《易·系》下传第二章，包牺、神农、尧、舜诸帝，以及后世圣人制器尚象，莫非斯道之流行，器固不能离乎道。又《阴符经》谓：“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则道又寓于器中矣。盖太极未判，形体未坏者，即乾坤成列，絪縕元气，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即形体已坏，无以见易，是朴散而为器，不得谓之道矣。然道之见端，不能不散而为器。凡天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所谓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天下无离性之道，亦天下无离阴阳之器。凡有性必有情，有体必有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即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即情也。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者，道之体；感而遂通，有情有信者，道之用。欲澄其体，妙其用，错综变化，必不外乎易道。故庄子《南华经·天地外篇》云：“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观观，而万物之应备。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即形而上焉者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即形而下焉者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兼者合而一之义，分而两则道器离矣。其所论精当，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矣。溯自三代以上，君师合一，政教并行；三代以降，君师判位，政教殊途，不讲精一执中之旨。名曰教师孔、孟，政法唐、虞，实则徒托空言，未能躬行实践，岂但失《周官·考工》之政而已哉！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机，形上形下之旨，无分畛域，永息兵戈，庶几一道同风之盛，不难复见于今日。余拭目而俟之矣。

议院上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箴之。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之上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举员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举而不公，亦可废其例，停其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人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規制，大概亦同。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

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靡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齟齬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人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未必能尽知人之明；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斯民之隐；而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筐。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颞预。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颞预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颞预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议院下（甲午后续）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华。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凡有病于民者，如公禀政府改革，无不俯顺輿情，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

英国《马恩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其民迫求在上者改革易法，不许，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矣。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崙制其死命。普相

赐德鹰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坡崙，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任意见论政事，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为一，以逐拿坡崙。日耳曼、奥斯马加、俄罗斯、波瀾、希腊、法兰西、西班牙诸国人，皆苦人君治国，专恃权势，若不改旧章，不得不潜自立会，藉以整顿国家，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会党即自然解散，匿迹销声。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而在欧东，如俄罗斯一国，仍以权势治民，故有尼希利会党。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贤者亦复乐列名于会中。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势振兴必远胜于曩日云云。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其余则大半无异心，故能去其积习，不专恃权势，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上下自胥安矣。

考之欧洲各国上下议院，近年新订公举章程。法兰西上议院员，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转举者四分之三；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人所公举。比利时上议院员，由每年纳赋合华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下议院员，同上议院。奥斯马加上议院员，有君所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皆可公举。恒加利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每年纳赋合华银三两二钱者，皆可公举。普鲁士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亦有君所命者；下议院员，年二十五岁以上之民，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之员数。日耳曼联邦上议院员，各小邦政府所举；下议院员，比户可举。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命者，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员所举；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之民所举。英吉利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已纳赋赈贫者，比户可举。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岁以上，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希腊仅有一议院，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葡萄牙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下议院员，凡民一年中人款在华银八十八两以上者，皆可举。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皆得举。俄罗斯无议院，大权皆操之于君。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君与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瑞士上议院员，各省

会所举；下议院员，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瑞威仅有一议院，其议员分作两班，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皆可举。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一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皆可举。塞尔维亚上议院员，王命之；下议院员，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纳赋人所举。罗美尼亚上议院员，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下议院员，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举。

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猗欤休哉！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公举(甲午后续)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使士为佳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贍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己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貽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意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赠，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愜，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能能否胜

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

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器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浅深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哺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今国家既下诏求贤，凡位列宰辅及部院名公，封疆大帅，既遇此难得之道，自必踊跃欢欣，各举所知，以仰答求贤若渴之意。然荐贤者，平日既未于海内奇杰留意物色，则此时举以应诏，自难必果系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踴躍四顾，中选者颇难其人，不得已而始以亲旧中之稍有节操，或以著书立说自炫者取以塞责。其于体国经野之谋，披乱反正之略，茫乎未有得也，曾何裨于实用乎？尤甚者，则以奔竞为能，以干求为事，或奔走王公之门，或夤缘津要之路；且有巧显者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辟幸进之门，广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问矣？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君(甲午后续)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原其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借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国会中人，即下议院之人，法民创立，行新政，除积弊，勃然振兴，各国闻风而起，新法不准行，乃愈压而民愈乱，因变君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救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裂，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问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

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聩，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无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

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乎！孰使之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贤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万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倦倦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苻；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愒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何？则曰：无难也。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故知君人者，欲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

自强(甲午后续)

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而天下治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玩法，而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兴，秦二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古云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可与专制政治互相发明。惟纯常子《自强论》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

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义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革；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圜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饬下督抚，由督抚饬下司道，由司道饬下府县，府县召书吏以一纸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耳目，此外寂无举动矣。甚或前任所为，后任裁撤。虽创之费巨，成之日久，皆所勿恤。此由于中国从无立君政治耳。夫立君政治，除俄、土二国外专制政体，在今日称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俄早议有宪法，但未行耳，文明诸国无不从同。惟君主与民主之国，宪法微有不同。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或谓恐失君权。不知君主之国，如英、德议院，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可置不行。昔英儒矮利斯托路氏云：“政府之强大，古则尚力，今则尚德，反是则势涣国衰。”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沪上葡萄牙国总领事华君告余曰：“中国欲拒外侮，务在合群。我国穷民少，全得此益。”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篇中拟立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之遗规也。

公法

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中国为五洲冠冕，开辟最先。唐、虞、三代相承，为封建之天下；秦并六国，改为郡县，历汉、唐以迄今，莫之或易。其间可得而变易者，宗子之封藩，疆域之分合也。其虽变而莫之或易者，概不得专礼乐征伐之权也。然均有相维相系之势，而统属于天子则一也。统属于天子一，故内外之辨，夷夏之防，亦不能不一。其名曰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知此乃可与言公法。

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可相维系者何？合性法、例法言之谓。夫语言文字、政教风俗固难强同，而是非好恶之公不甚相远，故有通使之法，有通商之法，有合盟、合会之法。俗有殊尚，非法不联。不能相统属者何？专主性法言之谓。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尔雅·释训》云：法，常也，可常守也。《释名》曰：法，逼也，逼之使有所限也。列邦雄长，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有常法以范围之，其何以大小相维，永敦辑睦？彼遵此例以待我，亦望我守此例以待彼也。且以天下之公好恶为衡，而事之曲直登诸日报，载之史鉴，以褒贬为荣辱，亦拥护公法之干城。故曰：公法者，万国一大和约也。

今泰西各国兵日强，技日巧，争雄海陆，将环地球九万里，莫不有火轮、舟车。我中国海禁大开，讲信修睦，使命往来，历有年所。又开同文馆，习西学，译公法，博考而切究之，如此详且备矣。然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闻鸦片在孟加拉每箱征银六十磅，中国税银十磅，中国出口茶税每箱仅征银百元之七五，不足一成，至英人入口所征不下四、五成。即茶与鸦片较之，其公道为何如？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今英、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而公法家犹

大书特书曰：“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国与中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又加注而申明之曰：“谓得共享公法之利益。”嘻，甚矣欺也！

然则如何而可？曰：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修改，以图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饷则例，本由各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宜明告各国曰：某约不便吾民，某税不合吾例，约期满时，应即停止重议。其不专为通商者，则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两两比较，同者彼此通行，异者各行其是，无庸越俎代谋。其介在异同之间者，则参稽互考，折衷至当。勒为通商条例，会立盟约，世世恪守，有渝此盟，各国同声其罪。视其悔祸之迟速，援赔偿兵费例，罚缓以分劳各国。若必怙恶不悛，然后共灭其国，存其祀，疆理其地，择贤者以嗣统焉。庶公法可以盛行，而和局亦可持久矣。

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藉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太强者，如古之罗马，近之拿破崙第一，虽有成有败，而当其盛时，力足以囊括宇宙，震慑群雄，横肆鲸吞，显违公法，谁敢执其咎？太弱者，如今之琉球、印度、越南、缅甸，千年旧国，一旦见灭于强邻，诸大国咸抱不平，谁肯以局外代援公法，致启兵端？不特是也，法为德蹶，俄人遽改黑海之盟，法无如之何也。土被俄残，柏林不改瓜分之约，各国无如之何也。然则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者也。且公法所论，本亦游移两可。其条例有云：倘立约之一国，明犯约内一款，其所行者与和约之义大相悖谬，则约虽未废已有可废之势。然废与不废，惟在受屈者主之。倘不欲失和，其约仍在两国，当照常遵守，至所犯之事，或置而不论，或相谅革免，或执义讨索赔偿，均无不可。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噫！

交涉上

中外通商日久，交涉之案层见迭出，卒鲜有办理公平，能折彼族之心，而伸吾民之气者，何也？以不得办理之法，未用度外之才也。

夫洋务交涉之事甚繁，约其大纲，君民两大端而已。如杀伤、斗殴、焚毁、抢劫、占产、拐贩、债务、辛工以及碰船、碰车诸案，

皆事之小者，关华民生计者也；侵越疆界，偷漏税款，违例便己，辟埠通商，以及传教建堂，游历杀伤诸案，皆事之大者，关国家安危者也。西人舟车所至，每以语言互异，律法不同，利己损人，任情蔑理。入国不问禁例，入乡不知土俗，在租界外创办之事，亦不禀准当道而后行。惯以恫喝之词，势迫力成，否则勒赔巨款。是以猜嫌易启，动至激成巨案。我中国顾全大局，忌开边衅，官长多从迁就，士民谁敢抗衡？如吴淞铁路电线，四川彝陵轮船等案，虽然无理，尚赔巨款。洋船撞毁华船，反咎以不谙趋避，或诬其桅灯不明，改重就轻，含糊了结。马车碾伤华人，反谓不知让道，祸由自取；扭赴公堂，亦仅薄罚。又如华人受雇洋行及充洋船水手，往往借端扣减工资，甚或殴辱毙命。西人之狡黠者，更串通地棍拐贩乡愚，冤惨尤无天日。他若华商负欠洋商，一经控告，追封产业，扰及亲朋。西人负欠华债，虽饶私蓄，循例报穷，便自逍遥事外。外国税华货，进口务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务取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税，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北突南奔，绝无所费。我招商局“和众”轮船，曩年开抵美国金山，关官执意重征船钞，冀不复来美之商船至华，所征税额较诸英、法商船，无畸轻畸重，亦系一律征收。美国何得歧视。凡寓居新、旧金山之华工、华商，有回国后不准重到之例。查从前美国甚恶黑人，时时群议驱逐。自南北花旗之战，美廷立例：准黑人入籍，与操保举总统、议绅、地方官之权，遂无议驱逐者。然则华人之不容于美者，乃以不入美籍之故欤？英国、丹国均与美有准客民入籍之约。我国如与各国重订和约之时，亦宜仿行，以顾国体，保护商民。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夫轮船飞驰于港汊，马车冲突于通衢，无事而带持军器，用人而刻扣工帐，空盘倒资，袒庇教民，包揽关捐，掠贩人口，凡此种种妄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所不容，只以中、西刑法不同，彼族反能趋避。遇有杀伤交涉事件，华官以华法治华人，抵命之外，更断偿银；西官以西法治西人，罚锾之数且从轻减。如华官稍持公论，执公法条约以争，西官即回护故纵，并薄罚而不加上海及各处租界之地，华人不能买。如要买，须出外国人之名。华人所住房屋，工部局估值，租银每百两岁捐十两，洋人所住房屋，每百两岁捐银八两。且准其在内地买地造屋，契虽写“永远出租”字样，仍与卖无异。所以有福州乌石山、九江庐山盗卖官地之案。日本国例不然，非土人或入籍者，不准买其本国之地。中国宜仿行之。此尤事之大不平者也。

近有俄都书院生马尔丹著论云：“中英出入口货，约值四千万磅，英国获利可知。然驻华英商犹时时播弄是非，屡请英廷力胁中国。幸执政者洞悉情形，顾全大局，凡遇不平之事，概行批驳，并禁止领事、武官非奉本国或公使之谕，不得擅调兵船”云云。前英人额尔金奉使驻华，亦尝函致其妻云：“抵华后，日见英民在华地恣意横行，实出情理之外，皆因华民过于驯顺，不敢抗拒，又过

于愚蒙，不知控诉，以致时遭凌辱”云云。不知华民纵极驯顺，岂难抗拒西人？实因彼动挟全力以争，故我每曲法相就。华民之忍辱，由于畏官长；官长之曲法，由于畏朝廷也。若公使能持平识大体，不肯偏袒己民，则我民伸诉有门，又谁肯横受其辱乎？曾文正言：“方今中国好言势者，专事羈縻，幸免开衅。然习于畏葸，难期振作。好言理者，又激于忠义，鹵莽从事。然操纵无术，决裂堪虞。皆非万全之策也。”旨哉斯言！诚老成谋国之笃论也。故洋务交涉非不可办，特患向之办交涉者，非畏葸即鹵莽。畏洋人而希图省事，即为多事之阶；愤洋人而务求取胜，反为取败之渐。间有熟读条约，稍谙公法者，又辄欲舞文弄墨，仗笔舌之小巧，以折其猛鸷凭陵之气，多见其徒劳而鲜功矣。且也鄙夷洋人，谓为非我族类，几欲不与之同日月，而于其制器精巧，作事实践，亦一概抹煞。是为愤时，愤时者不可以办交涉。重视洋人，炫其所长，平日誉之不容口，临事不加揣度，更欲借终南为捷径。是为趋时，趋时者不可以办交涉。

然则洋务交涉之事，竟无善法以处之耶？曰：何为其然也！是宜先储善办交涉之才，次定专办交涉之法。取才之法，必察其人品诣端正，大节无亏吸鸦片、好赌博、重财惜命者不宜用，熟史书，谙政体，洞悉中外律例，而又经出洋，周知彼国文字、政教、风俗，著论确有见地，存心公正，无抑中扬西之习，并无我中彼西之见者，则根柢既真，措施自当。南、北洋特辟一洋务馆以收储之。然后集群策群力，兼延西国著名状师，遍考中西律例及条约公法诸书，据理持平，定为《中西交涉则例》一书。盖中西律例迥然不同：中国有斩罪，有仗罪，西国无此例；西国有罚缓罪，罚作苦工罪，中国亦无此例。西例听讼有公堂费，不论原告、被告，案定后责由曲者出费，直者不需分文，中国亦无此例也。中国办理命案，误伤从轻，故杀从重；乃西人于故杀，亦有从轻者。如往岁英牢头哈金击伤中国侍者，状师照轻打人例，罚缓释放。夫击人至死，尚谓轻罪，试问以何者为重？而讼师受贿即为开脱，揆诸情理，岂得为平？此皆办理者不知西律，未能与争耳。是以西律诸书亟宜考订，择其通行者照会各国，商同外部，彼此盖印颁行，勒为通商交涉则例。凡有交涉案件，须委深通西律之员审办。合于律例者，立即办结，不必羈延，上下推诿，致滋口实，转启罚赔开埠之端；其不合乎律例者，彼公使、领事纵百计恃强要挟，官可罢，头可断，铁案终不可移。彼虽狡悍，其奈我何？且以西例治西人，则彼无可规避；以西例治华人，则我亦免偏枯。每届年终，将交涉各案如何起衅，如何定讞，删繁就简，勒为全编，分送各国使臣及彼外部公览；兼发各省刑司，互相考证，庶枉直是非无能遁饰，洋人无故纵，中国亦少冤民矣！虽

然，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近各省偶有要案，疆吏据理而争，彼辄嗾其公使与总署为难，甚或百端恫喝。故必当轴者洞知外事，上下一心，操纵刚柔，曲中窾要，始克收政道刑齐之实效耳。

溯日本初与泰西通商，西人以其刑罚严酷，凡有词讼，仍由驻日西官质讯科断。强邻压主，与中国同受其欺。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痛革积习，更定刑章，仿行西例，遂改由日官审判，彼此均无枉纵，而邦交亦由此日亲，竟于光绪二十五年收回租界。噫！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二十三行省不如日本三岛，可耻孰甚！苟能毅然改图，一切与之更始，于治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大政破除成见，舍旧谋新，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执公法以制西人之狡，定则例以持讼狱之平，力矫不慎不公之弊，以服其心。有时争所必争，执以西国之法，不敢稍宽；让所应让，给以格外之恩，不必过泥。临时勿使我受其愚，事后勿使彼蓄其怨。庶大权不致旁落，而强邻弗敢覬觐。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我以为怀柔，彼以为尊奉也；我以为优容，彼以为畏缩也。交涉之事日益多，办交涉之法日益拙，能办交涉之人日益少，忍辱含垢，民气日靡，丛雀渊鱼，国势日弱。闻俄人移界之法：将耕牛耕费给予界外华民，诱令迁居俄界。俾界外成为荒地，即将界石逐步迁移。华官恐争论开衅，佯作不知，遂启彼族吞噬之心。而乡愚无知，不识时势，惑于会匪之言，动与教士为难，更授彼族要求之柄。是以年来夺我港口，握我利权，欺我商民，非但英、美新旧金山不准华人重到，即其属岛檀香山、飞猎宾，闻亦如是。且犹不止此，我属国安南、暹罗均抽华人身税。呜呼！堂堂中国受辱如此，倘再不知发愤自强，窃恐交涉之案更不能平，流祸将有不忍言者矣！

交涉下（甲午后续）

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之缺，实为洋务之枢纽，未可泛视，宜委道员与总领事品级相当、又素有声望、谙悉中西律例者，方可胜任。

查租界四至，因当年未划沟立界为限，致为外人侵占不少。如上海之新闸、老闸、虹口等处地方，曾闻本地人云：昔年租界无如此之远，至前年始定界限，已被侵占不少矣。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国例，一经勘定，即划沟为限，方可杜侵占滋事之虞。然与泰西通商数十年来，华人遇事隐忍，而洋人则遇事欺凌。非但上篇所论上海华人房捐，较洋人多二成；中国内地，洋人可租九百九十九年；

而租界之地，华人反不能买等事而已。尤有不平之事数端，今列于后：上海杨树浦、新闸及泥成外等处，不入租界之地，亦归英工部局照其向章办理。地方官竟置之不辩，且遇有是处讼事，反听领事判断。不平者一。洋人马车行只纳一总捐，而华人马车必须逐一纳捐领牌。如与洋人马车同行，不准赶在洋人马车之先，违则拘罚。不平者二。西人打猎，例有时候，违例者罚之。去冬有乡人不知西例，猎有山鸡、水鸭携至上海出售，被巡捕拘获，押至公堂，罚银四十元。有被累至倾家荡产者。不平者三。西例猎地有税，猎狗、猎枪皆有税，中国一无所税，随处可猎。故寓华之西人往往好猎，虽华人禁猎之地，彼亦往猎，无所顾忌。纵然肇事，地方官只谓其不知俗例了事，无所谓罚也。不平者四。又冬间西人游戏于郊外，有一艺，西名曰啤把亨，华名曰跑纸。其散纸于田中，随者百十成群，骑马追之，田中所种棉花皆为践踏。地方官畏事不理，乡人苦之，无从控诉，徒有赔补之名，无赔补之实。不平者五。西例巡捕出票拿人，须随时稟请领事签字。如例不应拿，而巡捕与原告请之甚坚，领事须令巡捕当堂发誓，必无弊窦，乃允签名出票。今会审公堂不能援照西例，所出空白拘人票百数十张，交华捕与包探，任其随时填注拿人。故闻有藉此拘人，私刑拷打之弊，勒索不遂，然后押至捕房，转解公堂。往往小民无辜受累，含冤怀怨而不敢言。不平者六。香港、南洋各埠均选华商为董事、为议员，惟中国租界设工部局，董事七人皆系西籍，不使华商与闻其事。所出规条，无不华人吃亏。不平者七。上海租界工部局房捐，华人十居六七，其所筑公家花园、跑马场，俱不准华人入内。不平者八。沿江一带草埔，近亦不许华商往来。不平者九。乡民田地被工部局开马路，用去数分者，未能一律给价。不平者十。有此十不平及上篇所论交涉之案，易地而思，当无不愤恨，是为肇祸之基。幸我国绅士不敢多事，间有爱民之官与其理论，彼则恫喝政府，责其不善调停，迫令撤任，反谓中国士大夫虚骄气重。故历来交涉之事，初时互相推诿，继以势挟，即任所求。是我国情形已为彼窥透，即与中国两次立约，皆得之于兵戎，而非得之于玉帛。年来交涉之案，动以兵船恫喝，要求非分，职此故耳。今因日本一役，更为彼族所轻视。当轴者必能洞明时局，知屈伸进退之机，有负重致远之量。凡事筹之于先，使人由之而不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国家阴受其福。一己之祸在所勿计，况千秋自有公论也。

从来各国交涉之案，莫不视国势之强弱为损益。我国亟宜变法，破格用人，幸勿拘文牵义，顾虑繁多，驯至一筹莫展也。英国数十年来政治最得民心，且各国外部公使，及各处商务局有心世道之正

人君子不少，何不闻与译署大臣会议，妥订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不偏不倚，遇事持平办理，庶毋尔虞我诈。而胥吏、差役、巡捕、包探皆无从舞弊，自能交欢于无间，弭衅于未萌矣！所有中外教士，东西商贾，均得安居乐业矣！若动以势力服人，非理陵铄，势必至逼迫愈甚，而华民之私愤愈深，恐他日群起而攻，酿成巨祸。斯时玉石不分，贤愚莫辨，祸起仓卒，地方官亦救御无及。语云：“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中西士夫不乏忧深虑远之君子，曷弗详思而善处之也耶？

条约(甲午后续)

各国初订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授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请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畏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兢兢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

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恃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抵制之税，防他国之税腹吾民之利。如他国重征我国土产入口之税，则土产无所销，而产于天者失其利，成于人者失其业，则我国亦必以重税报之，使不致独擅利权。

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为之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腴我而肥彼也。今各国薄待我中国者，如人则抽税，货则重征之类，可援例争之。或谓强国之于入口税，议加、议禁，他国不敢置喙，而不知非也。日弱于法，何以加法货入口之税；墨弱于美，何以加美货入口之税；欧洲小国多禁鸦片入口者，非强于英也。盖税则者，国之内政，议加、议禁，固可以自主焉。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歔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本国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歔憾、励精图治，亦末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

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为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人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麦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极重。中国人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鸦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

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飭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罣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

教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然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

所由兆基于藁莽之世也。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穡、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宫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

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古未远，遗风尚在，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犹能自教自养也。暴秦崛起，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则弱。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美国之民无不读书，宜其富强如是之速。阿洲之民未闻读书，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废、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恤调之，无一夫不得其所。此教养有道，而英、德、法、美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芜，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谚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倘仍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息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今日之计，宜变制艺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学校多，人材愈出，士、农、工、商无不胜人。工艺厂多，收养穷民，授以一艺，则国无游民，自然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藏富于民，抽捐亦易。奈何当道厚外薄内，既失保护，又无教养，只知赋敛，且贱视工商，鄙视武夫。纵见西人教养善法，心悦诚服，亦不肯悉心仿办，必改头换面，以为因地制宜。其实吝惜小费，或经办从中渔利，以致所授不全，所学不精也。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

建都

有客问于杞忧生曰：自海疆有事以来，议战者有人，议和者有人，议守者有人，独不闻有议迁都者，何也？

杞忧生曰：我朝定鼎燕京，而长白一山，地居艮维。扶舆钟毓之灵，笃生圣哲，龙兴胜地，距京师千里，据上游而馭六合，天下全势如在掌中，所以奠亿万年有道之基，而世世守之者也。安土重迁，谁敢轻议及此？藉曰有之，亦必枢密嘉谋，草野恶得而妄参耶！

客曰：世变靡常，今昔异势。燕京自辽、金、元、明以迄国朝，建都旧地，西、南、北面三垂高山，东面距海，膏腴土壤，形势天然，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而中国自开海禁，尽撤藩篱。法国侵占越南，与云南之蒙自、开化，广西之镇安、左江，处处毗连。英国据五印度，由暹罗、缅甸以入滇，由前藏旁连青海，以入蜀、入陇。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其南鄙包络黑龙江、蒙古、

新疆以至西藏，袤延三万里，皆与中国接壤。此外海国番舶出没于东南七省，自奉天金州、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沿海设防亦一万四千余里。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急于水者缓于陆。今则水陆交迫，防不胜防。而燕京距海仅三百里，中国都会距海最近者，莫若京师。前代虽有海防，未闻海战。今日轮舟、电线绝迹飞行，即此一端已相判天壤。况俄人鲸吞蚕食，战兵数万，距吉林才隔一山，战船泊于东洋，互为声援者又数十号；近复与日本同谋，结约吞并朝鲜，逼处凭陵，有日辟百里之势，与各国意主通商者，迥不相侔。万一卷甲长驱，径趋东省，势或不敌，必且震动神京，而宿卫雄师，又不必皆能出奇制胜；庚申之变，且北狩以避其锋，兹则卧榻之旁，先已有人鼾睡。前车是鉴，覆辙岂可循哉！

杞忧生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敌国外患，何代蔑有？惟当内修政事，外固封圻，亟择蒙古王公中之智略者，秣马厉兵于关外要口，严为戒备，以纾北顾之忧。而于直隶、山东、河南、山、陕等省，简派知兵重臣练兵屯营，与京师声势联络，以为犄角之势。敌人虽强，亦不敢扣关而牧马矣！若遽望风怯敌，而惟迁都是谋，历观往古以来，畏敌偷安，未有能复振者。无已，则以亲王监国，留守燕京，而用成王营洛、盘庚迁殷、唐建东都、元立上京故事，另辟一地以维根本大计。或以为行宫，如前代之有南京、北京、东京、西京之设，遇有外警即入内地巡幸，敌人不注意于北京，则动辄要挟恫喝之事鲜矣。欲求今日之地势，可以居中驭外、雄长天下者，其惟关中乎？英人戈登于法人之役献策傅相，曾主迁陕。楚南王子寿比部曾主迁晋？关中形胜，沃野千里，沟渠四达，耕、渔、畜牧，可以广事屯田。又有河东花马盐池以为民利。天府陆海，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诸国舟楫不通，即陆路之铁路、火车亦未能遽到。重重关键，以守则固，自可深闭而固拒，长驾而远馭，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自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虽时会使然，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方今四郊多垒，而天下人心固结，未有闻海氛而动摇者。朝廷正宜示以镇静，多购坚船利炮，令四海倍道勤王。俟他日无事之时，别筹专款，宅镐卜洛，建设陪都，为进战退守之至计。果能君臣同德，上下一心，立政任人，励精图治，坚忍十数年，无难转弱为强，易贫而富，不战而自服，不守而自安，不言和而海外诸邦无不怀德畏威，同风向化，迁都何为哉？

客闻之，唯唯而退。

人籍(甲午后续)

地球九万里，日月所照，畛域无分，凡有道之君，莫不体上天公溥无私之意以为心，乐得人民而抚有之。所谓王者有分土，无分民也。我朝怀柔远人，无论入籍与否，均有宾至如归之乐。

查各国皆准华人入籍，有准其随时入籍者，有要常居其属地若干年方可入籍者，有须生长其地乃准入籍者。美国定例，亦有准各国人入籍之条，自埃利士人入籍日多，遂订新例，不准华人入籍。

英国国籍最重，外国、本国各有分别。父母为英国之人，其子生于他国者，仍可隶入本籍；即其母为他国之人，而父为英国之人，仍可隶入英籍。惟英人之赴他邦，大有分别。倘为军流犯罪出外，则所生之子，不能仍作英人。其余出外为商、为官，皆在收回之例。然外产虽可收回，只作平人看视，不能在本国作官及为议员，且更不能承本国人所有基业，亦不能以基业授本国之人，但可自创成家，将基业传其亲子。其欲与英人一律沾恩者，当于回国时为国家办公三年，或当兵，或作工，三年期满，方准真为英人，与本国所生者无异。

上古风气未开，各国闭关自守。罗马国例，每见外来之人，视若眼中之刺，以为外邦之人非窥伺国家，即来牟利，于是多方嫉妒，必下逐客之令而后快。元泰定二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二十五年，英人犹仇视外人，不令留踪境内。迨至元元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始垂禁令，不准将外人嫉害，且有延请外人在本国教习工艺者。如外国优待本国之人，而本国人亦推情相待。虽然英国近时政令较前宽大，惟于外生之人，虽父母隶籍于英，而其子归来，终与长英邦者有间。此例相沿已久，未能易辙改弦。

独荷兰国则广被怀柔，一洗各邦陋习。凡本为他国之人来入本籍，或本籍之人生子在外，其子重回本国，可以承产，可以作官，并无歧视之意。

今四处通商，无远弗届，各国怀柔之道迥非昔比，独我华人流寓外国，为人所欺。其故初因不愿入籍，我水师又不足以卫商；继苦于不能入籍，而通商条约又未论及入籍之人。

或谓中国刑律太严，必无外人人中国籍，况其所获利益更胜于中国之人，亟宜设法维持，庶免为丛驱爵。现在已准外人在苏、杭内地纺织，继必借端要求，准其买地开矿、设厂、耕植，由渐而进，握我利权，非但于地丁钱粮有损，犹恐民生计绌，势致主客不和，

变故愈多。否则借此挹注，固结民心，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关系尤非浅鲜。

鄙见：外国人须入中国籍者，方准其在内地买地建屋，庶免滋事。如不入籍，除租界外，概不准在内地置产。闻日本例如此。或有借游内地为名，或藉传教为说，买地置产，购货屯货，建造一切者，所置之业既在内地，即与人我籍之民相同，准其落户，惟必须归我地方官管辖，不得再远藉领事为词。如不愿入籍受辖治者，则可任其自去，不得购置产业。传教者自教堂住屋外，亦不得借名教堂，广置产业牟利，兼并民地，致损碍于中国地方丁赋。此系我国家本有自主之权，当详载和约，布告天下，庶彼族无从置喙，而各国有道之君亦咸当体上天覆载无私之心，一视同仁，准人入籍也可。

卷二 礼政

学校上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观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坐废，莫辨之无，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学校废而书院兴，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世务，而为国用。乃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肄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书院虽多，亦奚为哉！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迹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先入小学堂，教以浅近文理，地

图、算法、史事、格致之属。小学成后，选入中学堂。所学名类甚多，名曰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皆须全习，惟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

日本之教科名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本教育敕语，旁参五经、四书及泰西伦理。学生中学校毕业，则发给凭照。自此以后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各听其便。习文事者，入高等专门学校习专门之学。凡可称高等专门学校者，如高等师范、高等商业、高等工业、医学专门、东京美术^{即绘画、雕刻、嵌铜、铸冶之技}、东京外国语、东京音乐皆是此外尚有女子高等师范，为女子专门学校。若欲入分科大学，先入高等学校修豫备科。科分三部：第一部为法科、文科，第二部为理^{即格致}、农、工，第三部为医学。门径既识，然后入大学校中分科专习。科分六门，却法、文、理、农、工、医六者，但较豫备科为专精耳。分科毕业，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其愿再学者，入大学院以精究奥义。大学院毕业领照，则如进士、翰林矣。凡习武备者，自幼年学校毕业入入营，但学为弁半年。若从中学毕业选拔入营，则须先学为兵半年，再学为弁半年，然后同升入士官学校，名为候补士官生。命名士官，盖取三代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之遗意。教以战术^{兼战史}、兵器^{即军械}、地形^{兼测绘}、筑城^{即工程}、军制、卫生、马学^{卫生与军医殊，马术与骑术殊}等事。一年毕业为试用士官，再入营练习士官之事半年，国家即用为各军少尉，位如中国千总。自少尉以上，曰中尉、大尉，如守备、都司。官至少尉后，可在本营叙劳升转^{若无兵出身，非战时不得为士官，至特务曹长而止。特务曹长位如中国把总}。其自少尉、中尉之中入陆军大学校，以储参谋之资。自大尉而上，曰少佐、中佐、大佐，略如游击、参将、副将。再上曰少将、中将、大将，则位如提、镇、总统矣。凡愿习水师者，先入海军兵学校，三年毕业为候补少尉，在舰练习一年，此一年中须远航一次。其隽秀者升入海军大学校。查海、陆大学校，其体制与文事大学校颇殊。

泰西各国学制不同，入学之岁亦不同，然其用意事事相同。故大、中、小学年限，无论文武，大率三、四、五年不等。等级渐深者，子目亦渐多。学生多则班数亦多，然每班不过数十人。此班学满即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小学堂于来学之生徒，察其贫者免取脩脯，稍贍者半之，中学堂^{即普通学}之脩脯亦廉。此外国学校教士官人之大略也。

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仿日本设文

部大臣，并分司责任一蒙学、一普通、一专门、一编译、一会计、一典试、一巡查。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飭疆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巨资，相助者报部奖励。各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各州县、省会学堂生徒之课艺，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专习一艺，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且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以工艺一事，非但有益商务，且有益人心。院中课习制造、机器、织布、造线、缝纫、攻玉，以及考察药性与化学等类，教分五等事详篇末。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

学校下

孔子论学道之功，循序而进，譬诸升堂入室。余谓读书之功，亦循序而进，譬诸自地登楼。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其课徒也，曰五经，曰古文。五经将以通圣人之道，古文将以开童子之智，斯固然矣。特是五经中有童子能解之篇，有童子不能解之篇。其述往事而无议论之文，童子所能解；其讲性理道德之学，童子所不能解。今乃取其难解，略其易解，以为圣人之道义尽在于此，童子虽不能解，必令读之，犹大言曰：士子读书，所以通圣人之道；欲通圣人之道，须通圣人经；欲通圣人经，非童而习之不为功。是以黄口小童，入塾数月，先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继而读《中庸》，读《论》、《孟》。四书读竣，又习五经。然膏继晷，朝夕从事于斯。彼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义理无所讲究也，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向迳，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

凡人之灵有悟性、有记性。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试观五尺之童，有人讲一笑谈故事，彼即入于耳，会

于心，牢记不忘，津津乐道。若课以数行《学》、《庸》，彼罔然不知所解，口吟终日，尚难背诵。为之师者又从而殴之。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就囹圄，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

夫《大学》之道，至于平天下，《中庸》之德，至于无声臭，《论语》讲仁义道德之事，《孟子》言尽心养气之功，吾恐老儒经生亦难悉其底蕴。今以老儒经生所难解者，而教数龄之学童，知其必不能解也；而犹然授之，非天下至愚者不为也。况今之为师者，当讲解时不过将各家注释翻诵一遍，苟且塞责而已。设有颖慧子弟问先生，何谓明德，何谓至诚，何谓用力于仁，何谓浩然之气，将舌桥口呿，甚或恼羞为怒，斥子弟不敬而深责之，俾不敢复言。若此，非贼人子弟乎？非锢蔽智慧乎？

然则如何而可？曰：初学蒙童，每日授以方字，逐字讲解意义。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俟识二千余字，即选《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学堂日记》、《感应篇图说》、《阴鹭文图证》等书，先取目前有形之物，日用寻常之事，或俗语浅文，或韵言歌诀，使其易于索解，易于记诵者，编为三百课，配以石印绘图。每晚为讲一课，随令还讲，即加句读，作为次日之生书。次晚背诵无讹，再上第二课。每早仍添识新字，以满六千字而止由《说文》中挑出六千字，分别繁、要、简三种，均刻木板，用坚硬之洋纸刷印，切成方字，每生各给字一匣，务必读识二千余字，方准读书。此第一年功课也。次年，仍兼温字义，取《家语》、《国策》、子史等书文义浅近者，及地舆、算法孔教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门，今之学校纵不能全授，而礼仪、体操、算法，是人生日用必不可少者。盖不知礼无以立，不知体操无以卫生，不知算法无以谋生，各国人物、风俗诙谐故事，编成三百课，仍随解随读，兼温旧课。此第二年功课也。再次年，择《国策》、《史记》、《汉书》等文理稍深，篇幅较长者，仍选三百课，随讲随读，兼温字义。此第三年功课也。

合计三年后，有六千字义烂熟胸中，有九百课由浅入深之书本，而谓不能融会义理乎？后授之以四书五经，有不声入心通乎？其开笔联句之法，或函牍，或故事，或新闻，先由一二句至三四句，扩充至数十句、数百句。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即谓之作文。岂若世俗做破、承、起讲，方谓开笔耶？然做破、承、起讲，实亦基础于此矣。夫如是，教者不劳，而读者有味，愈读而愈有精神，愈有意味。何不仿而行之？

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学分十课：一曰经学，以中国十三经之大义，择其浅近而切于伦常

日用者训之，以培其德行也；二曰读中国书，凡华人不能不通华文，上而章句，中而论说辩难，下而浅近往来书牍，虽文理有浅深，而学徒皆不可以不通也；三曰算学，以西算为主；四曰地舆，以中国地理为主，旁及各国之地舆；五曰史学，以中国史学及外国近百年之史学为主，其外国古史；稍明大概足矣；六曰生物、植物学；七曰格致学；八曰画图学；九曰体操；十曰习中国字。小学堂为本国通用之学而设，故不及外国文字功课。其欲子弟大成者，则有中学堂与溥通学在。

西学

今之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贤者蹈海而沉渊，不贤者腆颜而苟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欲救时弊，自当对症以发药。譬诸君父有危疾，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中国独京师有天文台，讲求者甚少。查西国无县不有天文台、地理会，讲求者甚多。日本亦有天文台二十处，地理会设已多年。法国之地理会岁铸金牌数枚，以赠各国测地之士。英京伦敦旧有地理会，纵论古今沿革，探讨舆地源流，入是会者，尤多学问渊博之士。近复辟会聚议，遣人分往各部，探地者刻已陆续回英。其赴亚非利加者共有一百五十人，以乘味斯敦为首，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伦敦起程，南往亚非利加。其领袖者道卒，有一弱冠少年起而代领，相率前进，至罢倍凹地方访寻金、银各矿，知前人传说不尽可信，而所过之处亦有前人所未至者，均笔之于书。泰西考核地理，不惮幽凿险，以资印证，宜其精辟罕俦也。亚墨利加洲之中境，近闻新立一格致会，其领袖者名夏而纳，素精舆地之学，足迹所涉，遍跨数洲。其经费半由该处某富商捐助，半由法国公家核给。乃选人四出探察物产，详别道里，如其物能自取携者，则挈以归，否则画图贴说，储诸夹袋，亦足以资考订，而勒之成书，章程极为尽善。我国亦当仿而行之，以资多识。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并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则无本之学也。

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惊异族；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识师授优劣，课艺高下，往往为人蒙蔽。所以学生所习每况愈下，历日虽久，仍不如人。西报云：日本幼孩已得教训，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男女皆分塾督教，穷究诸学，博考各国疆域甚详。其房屋亦高大爽洁，并令学徒通晓保养身体脏腑方法。虽英之伦敦，法之巴黎新学校，亦无以复加云。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门，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巧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夷区，钩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地圆之说创自《管子》。不仅此也，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楼船，双轮激水，行驰如飞，则轮船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炼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磁石引针，琥珀拾芥。此电学之出于我也。

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

征诸事，非虚测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余见同乡幼童读书数年，非但不知地理、算学、应对礼节，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识权衡斗量数目，惟专攻八股而已。且见读书久者，其背如驼，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之法，亦无礼、乐、射、御、书、算六艺之学故也。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近人江慎修融贯中西测算，兼能制造奇器，尝制木牛以耕，造木驴代步，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创之。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或者曰：如子之言，其将废时文，而以西学考试耶？必以西学为足以培植人材，是时文不足用也。然何以数百年来，科举之制未尝变易，而人材辈出？近时如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诸公，皆以词科出身，掌握兵权，平定发、捻、回、苗，功烈垂诸竹帛，声名播于寰区。此数公者，何尝从西学中一为考究耶？况今京师则有同文馆，各省则有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以西学培植人材，可谓盛矣！然卒未闻有杰出之士，非常之才，有裨于国计民生者出乎其间。然则西学之效，果何在欤？

余曰：不然。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则时文重而西学轻也。上之所重，下必有甚焉者矣；上之所轻，下必有不屑为者矣。若夫胡、曾诸巨公，皆少年登第，抛弃八股敲门砖，

重研精于经济之学，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是科第以人材重，非人材从八股出也。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况向时发逆、回、苗，皆乌合之众，非比日本、泰西训练节制之师。使移胡、曾诸公于今日，亦必讲求西法，乃足御外侮耳。至如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认真学习，不如科甲之重，轻视武员，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寒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人充学生。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生，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呜呼！亚洲之事亟矣，强邻窥伺，祸患方萌，安可拘守成法哉？

女教

古重胎教，盖谓人生自孩提以至胜衣，大都瞻依慈母，跬步不离。此家有贤母，其子若女必多造就。然后日之贤母，即当年之名媛。中国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单文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闾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中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于古人所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者，有其名无其实。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学成准在女塾教授生徒，有学仕学者，有人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红、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如果精通，亦可给凭行道。而收生一端，关系尤重。俄国特设教女收生院，凡胎前产后一切要症，必须明白透澈，体恤入微，既讲求妇科，即内、外各科亦可兼习也。

中国之人生齿繁昌，心思灵巧，女范虽肃，女学多疏。诚能广

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纱，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国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至，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独此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严词厉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断筋摧，其心乃快。以为如此而后，他日适人可矜可贵；苟肤圆六寸，则戚里咸以为羞。此种浇风，城市倍于乡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覩沉灾。西人论女子裹足，男子宫刑，乃极弊之政，为合地球五大洲之所无，宜为彼族嗤笑。革之者真为圣君贤相矣！稚年罹剥肤之凶，毕世婴刖足之罪。气质虚弱者因以伤生，虽父母爱怜，而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矣！即幸全性命，而终日需人扶掖，并白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盗贼之灾，则步履艰难，坐以待毙。戕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海淫之尤。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所望有转移风化之责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扁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一转移间利兴弊去，二百兆裙钗皆能佐夫教子。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

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搯，不穿耳。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应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况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夫裹足为贱者之服，

岂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予所以言之喋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

我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徒，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以为无关紧要，事竟中止！第使当时禁不过急，持之以恒，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

考试上

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考试之法，虽王子国戚，亦等齐民。如欲为将帅者，必先入武备院、韬略馆读书，兼习天球、地舆、测星诸学。期满，由现任水陆提督偕各大臣亲到学院，与掌教鉴定，考取一等者，即编入行伍，授以把总、千总之职，次第而升，以资历练。文件自理，枪炮自发，虽至贱至粗之事，亦不惮辛劳而尝试之。及功成名就，致仕闲居，犹不废立说著书以传后世。即矿师、医士，必须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尤须明律例，考取文凭方准用世。

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而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夫以八股为正途，视别学为异端，其不重可知矣。人材焉能日出哉！如是，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屡诏中外大臣保举人才。然所谓大臣者，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绝，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友？

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习者，私亲密友而已，亲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应诏，亦惟举一二有交之显宦，或庸懦无能之辈，以塞责而已。何曾保一岩穴隐遁之真才哉！以中国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市井潜藏，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终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害之耳。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请分立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经史以观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例案以观吏治。原拟：一曰考证经史，疏通疑义，以观学识。二曰策论时事，昌言无讳，以征抱负。三曰审问疑难例案，以观吏治。四曰兼试文章诗赋，以验才华。首科既毕，凡海疆各省主试者，宜就地会同各西学大书院山长如天津之水师学堂、博文书院、福州船政学堂、江南水陆军学堂、广东水师学堂诸山长，订期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算、化、光、电、矿、重诸学。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考生各卷皆由山长分别取中，呈主试者鉴定，论其艺不论其文，精其选不定其额。令于制艺外，习一有用之学，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凡深明政治律例者，名为政学举人；精通艺术者，名为艺学举人。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得以考列上等者，名为文学举人。政学、艺学，用以富国强兵，较文学尤重，有若泰西牧师，然使其专以著述，宣扬孔孟之教导，以训民化俗。如此变通推广，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并令内外臣工博访周咨，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堪任将相者，立行表荐。聘岩穴之隐逸，举幕府之宾僚，参行古征辟荐举之法。得其人则荐主同膺懋赏，或怀私滥保，则举主坐罪。斯不敢徇情面，植党援，应故事矣。武生向以骑射技勇见长，而世之习武者，武经一卷尚属茫然，一旦临敌出师，何恃不恐？咸、同间荡平丑类，建立大功，并无武科中人。所习非用，其明征已。如不能学西法选材于武备学堂，亦当力求新法。今战守之事，借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今之考试，有奔走数百里至数千里者，其费甚巨，且耽差学政，主考总裁，所费国帑不知凡几。不如仿泰西考试之法，由掌教会同地方官考取，亦三年一考。府试中学堂，考列上等者为秀才，贡之于省。省试大书院，考列上等者为举人，贡之于京师。京都大书院考列上等者为进士。京书院所学，虽与省书院相仿，惟大书院掌教仍稟请奏派总裁会考，否则，主考总裁亦须奏派精于制造之机器师，熟识驾驶、能施火器、是船政学堂出身之水师提督，会同督抚考取，庶得真才。惟所费国帑更巨，不若各省船政局、武备学堂，会同地方官，岁订一期，由各生自行赴考，以省糜费。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勿计文字优劣，只要其胸有韬略，对合机宜。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船深知水道者变骑射为马枪火炮，变举石为驾驶战船、司理机器等法。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讲求火器，命中及远，精于驾驶机器者必多。人材自然日出矣。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必要其绘图贴说，精其事者与

之考究，方知真伪。原拟：一试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试算学、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詣。三试测量枪炮，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一经拔擢，凡武秀才考有大书院执照者，可称举人。精制造者，则令人制造局；精驾驶战船、司理机器者，令人兵船历练，给予俸禄。若无大书院执照，其年在三十以内，文理通顺者，仍令人武备院、水师学堂、艺术院，再行肄业，期满考列上等者，给予执照，俱名为举人。由武备院、水师学堂出身者，名为武学举人；由艺术院出身者，名为艺学举人。所有武学举人、艺学举人，分途资遣各营、各船、各厂，优给俸禄，历练三年。其学力与历练俱深无历练者，虽学富五车，不论何事骤膺大位，错失必多，故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赴都会考。取中者名为进士，给予职衔，不论资格，量材授事。且特降明谕，俾以后文武并重，不得歧视，庶多士向风，可得干城之选矣。

虽然，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既求实学，当列科考，如唐时之制度，各专一艺。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选聘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选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以三年为期。其膏火经费仿上海龙门书院章程，官为筹备。按月出题课试，所出之题务须有裨时务，如铁路，轮船，矿务，邮政，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钱法、钞法、测量、测候、地理、地舆、博物院、赛珍会、息兵会、派员游历、使臣出洋，与夫各国风土人情，文学武备，皆可出题。令诸生详究利弊，择其文之佳者登诸日报，以广流传。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查各国京师俱有大学堂，各精一艺、各专一业者，非比我国同文馆教习，只通算学、天文、地理、各国语言文字而已。或谓同文馆如外国小、中学塾，非大学堂也。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据日报云：现计其能当管驾轮船、机器、武备各员者，每业约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设西学堂，所有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军有事，人材不足耳，准其一体乡试、会试。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国家成法也。且我朝有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翰林，异试异榜，与正科诸士同赐出身，授例立科，必无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

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以昭激

劝。昔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学习，意美法良，特稚齿髫年，血气未定，沾染习气，乖僻性成，甚至有从教忘亲、不愿回国者，因就学诸生于中学毫无所得故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貽讥中外。日本肄业英、美、德、俄之学生，至今尚络绎不绝。欲救其弊，须选以上所论之武学、艺学举人出洋历练，及深通中西言语文字之秀士，年二十岁内外者，出洋肄业。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厚给资装，分途资遣。庶事理通达，而各有成材，身列胶庠，而咸知自爱，功崇业广，体立用行。曾文正作育之苦心，不致因噎而废食，诸生之数奇不第者，亦得别出一途以自效。归后愿就职者听，愿就科举者亦听。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

考试下

或谓中国仕宦首重科举，乡、会试取决于时文，京朝官絮长于小楷。自明至今五百余年，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其由他途来者，不能得高官，膺重权。上篇论文、武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仍糜费而无实效。如能变通成法，广科目以萃人材，则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考试之法将若何？

窃谓中国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者为中学，设于省会、京师者为大学。文学酌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笈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武学酌分其目为两科：一曰陆军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军科，凡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学中教习。详订课程，三年则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然后分别任使，进用之阶，文武一律，无所轻重。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无论贫富皆可

读书习艺。即不入小学肄业者，逢小学甄别之期，亦须赴试，必先由小学考取有名，三年后始准与试。入学之始，必令于文、武各科自择一科，专其心志，一其趋向。至于登进之阶级，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三年一试，由朝廷命该省督抚、水陆提督，会同大书院掌教校阅，广其额，精其选，一返从前空疏无补之积习。如此变通办理，约而计之有数善焉。

从前各州县学官仅拥虚名，几同疣赘。若由各省督抚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宫、书院可以居住，无须另筹经费，另行建筑，一转移间，通国即可举行。一善也。

各分各科，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兴起，为国家有用之材。二善也。

学中甄别，以三年为程。士之学问浅深，平时同业诸生共闻共见，期满考试，或优或绌，参考三年之学业，可得其详。其取人既不凭一日之短长，怀才者有必得之权，废学者无侥幸之望，考核明而人才出矣。三善也。

西法各种，西人借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四善也。

一科有一科之用，任使务尽其所长；一人有一人之能，驱策必久于其任。将见士气振作，人才奋兴。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五善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及至外患循生，内忧叠起，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以一人之身而终身三变，精乎？不精乎？幼学壮行之谓何？而国家犹勉策弩骀，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

藏书

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数。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

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作人养士之心，至为优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皮，寒士末由窥见，及寇乱流经，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薛史，博览群书，堪为世用者。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惟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疆吏亦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则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后知藏书之为益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育读者之为功大也。

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本国有新刊之书，例以二分送院收贮。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阅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就长案上静看，不许朗诵。阅毕签名书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该值堂年终查核，知何书最行。另有赁书楼，有股份者每年出书银四元，可常往看，各处新报俱全，只准借书两本，限两礼拜归还。如无股份者赁阅，每日计银两先付。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执事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通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利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地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独藏书二百七十九万九千册。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巨观，博学之津梁也。

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鄞县范氏之天一阁，杭州汪氏之振绮堂，钱塘吴氏之瓶花斋，吴门黄氏之滂熹园，石冢严氏之芳莱堂，鄞镇鲍氏之知不足斋，昭文张氏之爱日精庐，南浔刘氏之暝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佚。近日则吴兴陆氏之皕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阁，请于大府，奏于朝廷，供一郡人士观览。其大公无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让！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飭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

收贮，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比利时国届开国五十年之期，臣民咸献金上寿，王受而置诸外府，曰：“此众人之资，将为众人求益。”仿议院议之。下院拟以此款开设格致院一区，广购图书器皿，用供国人探讨格致之学。英君主寿诞，臣民亦献金筑一大博物院，无物不备，为其君主寿，留名千古，与民同受其福，何乐如之！宜各国皆当仿行也，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果能认真经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或钩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达化穷神，造中外所无之利器。于以范围天地，笼罩华夷，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极巍焕信景铄，皆于读书、稽古二事基之矣。

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复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苟强分畛域，墨守规为，固陋昏蒙，甘受人制，则印度、琉球、越南、缅甸之续耳。前车已覆，来轸方遒，有识之君子将何择焉！

日报上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取、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灼，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意，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乃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

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亲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先声。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惟禁报馆妄言，以肃观听。英、美、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礼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晤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之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财贿，而名驰中外矣。

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索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借公事以报私仇，藉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迹同秽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惩治。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嗜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常变经权，操纵

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衷。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蔚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覬覦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

日报下

上篇论中国沿海各省，宜次第仿行日报，以通民隐，达民情。今观中、西名士所言，而叹日报之有关朝野，不独沿海各省亟行仿行。《新政论议》云：“宏日报以广言路。”是日报者，即古乡校之遗意，今西国议院之滥觞，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故西国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愜，民志无不伸也。

若夫官家之嘲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股分之低昂，店铺之开歇，田宅之鬻售，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抢选，人材之兴举，民情之向背，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都邑之公项，司事之诚伪，医道之善法，药物之灵异，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之优劣，陪员之轮值，水旱之灾祥，生死之报章，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画，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汛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奇，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虽极之高

人之片词只字，愚妄之荡检败行，足以寓劝惩，使人鼓舞而兴感者，无不罗布发明，俾阅者快焉、劝焉。征信质疑，莫善于此。

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伪，一秉真肫。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英国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足教官吏，而不敢违背。若夫医学、化学、天学即象纬历算、海学行舟测量之法、电学、艺学、矿学，以及治兵课士、军装战舰，皆必另设一报。不惟详言其事，而且细绘其图，此又利世利民，而欲与天下人共趋于上理者也。

夫日报逐日阅之，殊不费时，随事求之，必有新获。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噤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凡为主笔，必须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援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至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如主笔借此勒索，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不论大小官绅，当控诸地方官审办，并准两造公举中外陪员听讯。如果属实，则照西律，分别轻重，治以禁锢之罪，重则在禁作苦工而已。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夫如是，《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

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非用压力不行，故动以兵船相要挟。当道于彼族律例风俗，强半未谙，应争而不争，应让而不让，卒为所算，悉数难终。乃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意在激怒其民，以与中国为难耳。如中日之战，日本西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乃反诬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惩前毖后，或日报，或礼拜报，宜亟用西文，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

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若我行我法，人言不恤，则沧海横流，伊于何底，非我侪所敢知矣。

典礼上

礼之兴也，其在中古乎？当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涿鹿之间，方耀武功，未遑文教。及尧、舜继统，垂衣裳而天下治，于是乎礼文备具中天之世，号为文明。逮至周末文胜，威仪三百，礼仪三千。礼文之详备，莫过于周，是故夫子曰“周尚文”，而又有“郁郁乎”之叹也。然礼与其繁也宁简。至于今日，繁已极矣！返璞还醇，其在兹乎！溯自元黄剖判以来，始而衣皮饮血，其简陋无仪礼可知。及制衣裳，造宫室，作礼乐，而威仪品节，次第毕备。自来踵事者必增华，变本者必加厉。万物之数，其始由简而日趋于繁，繁至于极无可加，则又一变而日趋于简，简亦必至于极而后乃复为繁。其气机之旋转，犹夫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若循环之无端，莫能穷之也。

夫五帝不相师，三王不相袭，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变而为春秋列国；列国又变为七国；七国并于秦，又变为郡县一统。凡周先王之衣冠、典制、文物、仪器，莫不荡然无存。盖周为文之极繁，繁极而至秦，乃一大变。中间复更数大变，以至于今，则日趋于简，日还乎质之时也。何则？吾盖尝微窥乎历代变革之故而知之矣。袞冕也一变，而为通天冠矣；上衣下裳也一变，而为通袍矣；佩玉、佩觿种种之修饰也一变，而若存若亡矣；广裾也一变，而为箭袖矣；束发也一变，而为修发矣。衣冠如此，礼节可知。礼节者，随衣冠制度而相为损益变通者也。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殷尚质，周尚文。”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又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合数语以体察之，盖可知夫子之右质而左文也。夫质者，朴也，有崇尚太璞之意；文者，彰也，有粉饰虚华之意。公孙子阳坐据西蜀天府之国，而不能当汉兵一战者，亦以烦礼多仪失之也。刘景升当汉末之乱，方且招名士，标厨俊，騷騷乎讲求虚礼，曾何救于荆州之覆乎？善矣！夫子之美仲雍也曰：“雍也简，可使南面。”然则吾谓夫子之贵

质，非虚语也。

夫自秦、汉以来，一代各有一代之典礼，由博返约，一言可断，即吾所谓由繁而趋于简也。今中国之制度礼节，盖已简于前代矣，抑犹未也，虽日趋于简，而犹未简至于极，则迁流正复无已。譬如立版走丸，丸不坠至于地，则流转正无一息之停，惟细心人乃能体会之耳。三代以上，揖让而已；今则有登降跪拜，且极至于九叩之烦文矣。三代以上，三公常坐而论道；今则由坐而立班列侍者，且变为长跽敷陈矣。然此犹曰尊君父之礼也。至于卑幼之于长上，属僚之于上官，小民之于官长，僮仆之于主人，皆动輒跪拜，罕复答礼。夫不论其中藏诚敬之实意，而徒责其外貌卑抑之虚文，是相率而以伪接也。故上以此求，即下以此应，或面呈巧令，转背即肆讹谤；或外作足恭，腹诽甚于轻侮，则亦何益之有哉？

今如泰西各国通行之礼节，盖亦简矣。臣下之见君上，不过三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皆立见，无所谓一坐一跪也。古之时诸侯朝天子亦然，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是也。此即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也。至其僚属相见，友朋相晤，长幼官民之相接，皆不过一免冠一握手而已。说者谓中烦而外简，中礼难学，而外礼易为，是亦不然。设纯尚虚文，而罕实意以将之，譬如作傀儡戏，其跪拜揖让，盍尝不彬彬可观？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一无真意存其间，何以异是？若夫西礼，虽脱略乎形迹，有类乎倨放，然去其虚文之伪，则必流露其真诚。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殊不知心意一有怠傲，则声音笑貌立著，其非不可以虚文掩饰也。此吾所谓真难而伪易也。夫堂廉之交接，上下之会同，亲友之结纳，畴不欲其相待以诚？乃不求其中心之自然，而徒责其外貌之当然。自然者无有不简，所以然者之根也；所以然者亦无有不简，当然之本也。止求其当然，则枝叶盛而渐离本根，浸假而至于世风日漓，诈伪相寻，皆肇于此，非细故也。更如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亦恒喜耀其外观，有一不臻华美者，则歉然嗒然，自尤而人非之；至于精意之存亡，真诚之有无，乃相与置诸勿论。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亦可深长思矣。呜呼！此我中国上下四万万人群相见以伪，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与其悦典礼之繁，共成一伪，何如从典礼之简，犹得一真。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是可为今日主典礼者当头之棒喝也已！

典礼下

《传》曰：“礼，所以安国家，宣社稷。”《记》曰：“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古人之于礼也，其重如此。古者礼从宜，事从俗，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先王之治民也，因其政不异其宜，齐其教不易其俗，是以有古礼，有今礼，有世俗所谓之礼。吉、凶、军、宾、嘉、燕、享、朝、会、盟，皆国家之大礼也。古人于行礼之时，或有愆仪失节者，皆知其为咎征之先现，祸机之将发。如临食而叹，闻乐而忧，执玉之俯仰高卑，趋走之视流行速，皆是也。自后世礼教失传，礼意浸衰，徒见之于虚文外貌，而礼之本原不可得而知矣。呜呼！此礼之变也，非礼之常也。夫毋不敬之谓礼。今之胁肩谄笑，喜怒逢迎，以为智效一官，能效一职者，问犹敢有责难交傲，陈善闭邪于主上、上司者耶？今之顺旨面谀，请托干谒，以图办一公事、讨一优差者，问犹得有殚心竭虑，尽瘁鞠躬，以措办得宜者耶？夫訾訾之声音颜色，已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犹曰士相见也，礼在则然；赫赫之喝道鸣驺，已辟人于咫尺之间，而犹曰官淑问也，礼在则然。故自有此烦文，是以卑躬屈节以为礼，而抗直之士断不收；自有此末节，是以有厚贿重赂而谓礼，而刚介之夫断不取。国家社稷之危，危在此；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此！

夫礼者，理也。行乎礼之真者，国之兴也不难；行乎礼之伪者，国之亡也亦易。高丽之属中国也，有虚名而无实利。中国为高丽而与日本战者，徒为虚名。虚名者，即今之所谓礼也。是故明乎礼之真者，不慕虚名而忘实利，不残民命以作战功。晋不争继文之霸业而争狄土；秦不争东周之王号而争蜀疆；俄于近日不西争土耳其而东争高丽，皆此意也。所望我国崇实事，去浮文，除礼之伪而得礼之真。譬如为子者温清定省，其于父母也，问安无缺，而乃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滥交匪类，反贻父母之忧；何如勤工作，谨交游，而以至亲无文为孝也。如为臣者跪拜趋承，其于君上也，仪注无失，而乃授之以事，则有旷职之讥，托之以财，则有欺蒙之弊；何如供厥职，慎厥操，而以至敬无词为忠也。忠、孝，礼之大端，其余可以推类矣。

泰西之官亦有品位之不同，大都任事者权尊，位高者望重，此亦与中国不相殊异。惟其出入起居，一切规模，往往乔野无文，简朴不饰，旁人见之，不知其为官也。迨各事其事，各在其位，则出

一令也，无不应之如响；创一举也，无不从之如流。至其衣冠服御，或者亦有区别，我辈异邦人不能深知而详辨，然较之中国，则华实之间大相径庭。故泰西各官，其于民间之情形，民事之底蕴，皆莫不了然若观火，而无廉远堂高之虑。虽以一国之主，皆得与齐民相晤谈，初无赫声濯灵，难于一见，此其风气直与古人无异。自昔我中国何尝不如此，三代以上君与民近，天子犹一方之吏，茅茨之阶不以为陋，沾体涂足之伦，时接于目。其为君者，或遁于荒野，或学于儒臣，如商王武丁，谅阴不言，梦赉良弼，求传说于版筑之间，而举之相位。说者谓其求贤之诚，感格苍昊，而不知其实由高宗通荒之时，早知传说之贤，特恐来自田间，举登于位，朝臣或有所疑，故托为应梦旁求之事耳。迨至秦、汉而后，此等异闻，犹或有之，然君之体则渐尊矣。至于官，则犹未若今日之倨贵也。夫人主一身，岂能综理庶务，势不得不委任臣下；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亲，亦不得不分任其责于属僚。内而宰相、部臣，外而督抚大员，皆其位尊而权重者也。惟其位尊，故其威仪礼节皆与人不同；惟其权重，故其下亦莫不尊之敬之，而体势之崇高，仪度之尊严，与人迥异。自是而大员之一出一入，仪制繁盛，随从众多，伺候其门者咸伛偻足恭，有不敢仰视者。一轿马也，绿呢绚烂，异者少则四人，多则八人。顶马跟马，前后拥护，肃静回避，除道清尘今当道前后拥护，手举清道旗、肃静牌者，皆衣衫襤褸，形同乞丐，无论停足何处，即解衣扞虱，非但不能壮观瞻，反为西人诃笑。其体统有如此者。一舟车也，或乘轮船，或坐兵舰。舟中则不敢搭客，不敢装货，开轮系缆必升炮，隆隆然络绎不绝。骡车套车，极其高大，前扈后从。其尊崇有如此者。夫体统尊崇至于如此，则凡民间有冤抑苦情，欲赴诉于前者，谁不有所畏缩？求其下情得以上达也，乌可得哉？且不独大员为然也，即州县各官，亦莫不自张其威。一州一县彼独称尊，除见上司时不敢不致敬尽礼外，若在衙署，或下乡催科、踏勘相验等事，亦复扈从如云，威仪煊赫。以州县亲民之官，且不能俯察下怀，躬问疾苦，则封疆大员，更无论矣。即如各镇分司、巡检，亦且夜郎自大，不肯纡尊降贵。中国之官，体制如此，则其异于西国者远矣。西国虽以将相大员握重权、掌兵柄，指挥如意，措置裕如，而其出入之间，坐不过马车轮船，而轮船除水师提督等官自有坐船外，往往附坐公司商家之船。即挈眷同行，亦与诸客杂坐，随行之人亦不甚众，护从之辈益复寥寥。即有德政及人，或当临行之时纷纷饯送者，亦初无中国之所谓万民衣伞，及一切匾额、衔牌之类，但以杯酒为酬，并致祝词而已。

前篇所论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恒喜耀其外观，尤未详官场之迎送、馈赠、供给诸事，为害非浅。夫衙门、营

伍、公所之中，如阅公文，审狱犯，勘田亩，修刑政，勤操演，严监察，无一日得暇。今乃因迎送而各事俱废矣。查例：凡邻省督抚及本省上司过境，擅动驿马，分投探报，降二级；远迎远送，降一级；乘便营求，革职提问。是宜申明禁绝，庶不致以迎送误公矣。至如寿礼陋规杂款，例有明禁，今乃公分公宴，炭敬冰敬，以及赞敬干修，不一而足。当官之所入几何，乃甘借债应酬，致人疑其营求；而上司亦实有因其厚礼，委以美缺优差者。惟一律禁止，庶不致以馈赠而招疑谤矣。又如大员过境，办公馆，送筵席，与夫种种供应，地方官无从开支，非苛派民间，势必赔累。然律载：藉供应科敛百姓者，州县革职提问；安设公馆，呈送下程者同；督抚上司勒索及不拒绝者，亦革职提问。定律何等森严！此禁止供给，州县可免赔累矣。凡此皆澄叙官方之要，较诸课吏馆、停捐纳，收效非尤速乎？

传教

嗟乎！中西和局之动多翻复者，其必阶于内地传教乎！何则？昔年各国立约，载在盟书者，通商、传教两端而已。通商为各洲通例，实关富强大局，而于贸易之法，不能讲求尽善，则其利必为外人所夺。苟能发愤为雄，如日本重订税则，振兴商务，仿西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内地夺我民之利，何虑人心不服？惟传教士必入内地，内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事。及至患成，彼以我中国不谙西例，酌议稍迟，动以兵力相胁。如曲从其请，则民之受屈愈多，衔恨愈甚，而教堂之案迭起矣。

案泰西基督之教，流派分而为三：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斯马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一曰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分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及瑙威、瑞士等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希腊为西人文字之祖，亦衍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皆本于向传之《新》、《旧约》两书。《新约》载耶稣降生为上帝子，以福罪之说劝人为善。是时泰西纷乱如战国，立教者深具苦心。而千百年来党同伐异，仇乱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以至变本加厉，实非教主始念所及。十字架之役，俄土之战，其尤著者也。迨后道

术修明，已异于古。故今耶稣教之在欧、美两洲者，英、美两主实称教中监督，为一会之领袖，尊为国教，未可厚非。盖人生于世，不能逸居无教。如有僻在遐方，礼教未行，犷獠未变者，耶稣教士遍至其地而化导之，地球各国现已一律相安。

自传入中国内地，未尝习见习闻，动辄齟齬。英、美、法等国，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然而庇之愈甚，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何则？传教先贵乎化导，化导在身心，不在乎势力也。在教中诸人，诚信教旨，恪遵教规，安分守业者，本不乏人。特莠民借入教为护符，每有作奸犯科，为种种不法事，其病在教士以招致人多为一己声名起见，遂至泾渭莫分，品类淆混。每有教士听教民一面之词，不能灼知其奸伪，专为护持彼教计，因此偏袒，以至紊我王章。在教士存心本亦公正，若能洞烛其奸，自不容其所为，且为彼教十条诫所见斥，应按籍除名。所惜者，地方有司鲜知此例，惟虑开边衅，先存畏惧之心，并不知西国律法，折服无从仿日本定新律颁行，设教部，凡各省各种教士均归管辖。如不端，准其裁撤，否则不准传教，往往迁就定讞。平民受屈，申理末由，众怒滋深，群思报复。又有藐视教民，断案不能平允，因此教士出为诉说，酿成其祸。是故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平心而论，彼教士及华官，苟有自知之明，应同此愧悔，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

曾闻耶稣教士，有教案伤人不愿惩办，为体上帝好生之心者，惜难多得其人。夫教士以身卫道，虽死亦所甘心，即无端受辱，如耶稣所云“披左颊，转右颊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力为较量？然余亦未之见也。至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案稍缓，彼即横生枝节。有司既经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伏辜，重索赔偿之恤款。朝廷怀柔交至，优待有加；百姓闻见各殊，寻仇无已。于是儿童、妇女未能辨其种类，闻声相恶；加以匪徒煽惑，变故迭乘，果谁贻伊戚欤？

虽然，教士来华各循其教书之旨，传教济人，出自公心，费用捐自民间，非支国帑。如传教别存邪僻私见，各国先不能容，又怎能流行一千八百余年而愈盛？明季利马窦东来，徐光启舍宅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实为华人人教之鼻祖，而《明史》称其清介，亦未因人教而受贬也。所惜者，传教于华人出于勉强者多，每与时人多所辨驳，与孔教较量多所毁斥，以自见其高大，以至忿争启衅，是亦不可以已乎！夫信从者，在乎心不在乎迹，苟有不信不从，置之可也。耶稣之书不云乎：苟有不接受尔者去之，日拂去足尘可也。保罗传教至一处，以人不之信，谓其时未至，转往他所。进华之教

士如是以行，又何齟齬之有？今在亚洲教民既多，权势亦大。其设义塾，施医药，育婴孩，著论说，无分畛域，一视同仁，救人之心不可谓不切。独是以救人之婆心，因容纳中国之莠民入教，遂启争端，动成大案，此诚天下有心人所共惋惜者也。

今欲民教相安，必须广求良法。与其补苴在后，不如筹度在先。先令华民入教者，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奸恶之人，方准收入。而又编清册以备查究，揭实情以释疑惑，明大义以肃观听，别各教以免蔓延。嗣后我国有司，凡遇教案秉公查办，勿延宕，勿推诿，勿畏葸，勿袒护。不必问其为民为教，必先辨其孰曲孰直，一以公平之心处之，斯远人无所藉口。其维持调护，实出苦心。再或会同驻京公使，剴切妥议，须保传教出入内地各友，必确守教规，始准为神甫。有干预公事，挟权诈者，立请之公使，飭遣回国，以免贻害。如华官断案不公，亦即由各公使商请总署，严查参革，藉昭平允，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有案则依西例，延律师到堂，约期互辩。大率以无故干犯教堂，有司官按例惩办，责成赔修。若与百姓为仇者，但照案情轻重处理，不得托词赔修，以相诘难。此实欲保护教堂、劝善防恶之心，使民教无诈无虞，不生嫌怨，非论教之是非也。不然，竟效日本近年办理，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无须西人。彼本自有此教规，则教士踵迹即不绝而亦稀少。我孔孟之道，精微广大，如回、佛、老诸家，亦在包容之列，何必断断争辩，独拒教乎？

况入教之民，犹是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劝民为善，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若纵民为奸恶，倚教势以祸人，非摩西立诫之旨，教士传教之心，抑亦为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尝见敦品之教士，其心能克己爱人，颇近我儒家者流，亦有颇知读我孔孟之书者。吾人幸勿动相轻藐，妄肆诋谟，反为外人讥笑其量之不广，致无端肇事，转贻君国之忧，则尤当鉴戒者也。

训俗

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非生而恶也，空长乡间，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俯仰无资，饥寒所驱，铤而走险矣。承平之日，上下断断然口惧以桁杨刀锯，而陷于死亡者，累累然相续也。其或上失其道，则揭竿斩木，弄兵潢池之中。幸而将帅得人，士卒

选练，萃群策群力，不分首从，草薶而禽猕之。而此伏尸流血、绝脛断脛者，皆国家不教之愚民也，反之仁爱之天心，忍乎不忍？

古者悬书读法，以士乡礼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者，皆有实心实政以诱掖斯民，所由俗美化行，而乱萌潜杜。秦、汉以还，以文法治天下，欲尽愚黔首，以惟所欲为，古意荡然一无存者！是故士、农、工、商，教失宗旨，风俗日偷。我有民而不能自教，彼佛、老二氏乃得恃其天堂、地狱、修斋、忏悔之说，乘隙而入之。其本意固亦劝人为善也，而愚民靡然归之若流水。二千年来之君若相，亦自以国家之教化，未足以遍及斯民，姑听客所为。自有明万历以后，彼天主耶稣教亦得以势胁利诱，肆其簧鼓而瞞我之虚。从其教者日益众，盖仰其保护，向为搢绅所欺者，自此可以寻仇报复。呜呼！中国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为丛驱雀，听外人取而教之，恐祸患之乘，更有非意料所及者。然则有民而不能自教，其病之中于内者，推原祸本，则粤、捻诸乱所由生。此前事之不可不惩也。昔年发逆、外夷之祸，皆起自东南。今广东赌博之盛，盗贼之多，甲于天下。若无教化，甚为杞忧。其忧之伏于外者，环顾中区，则东西洋诸国所同覬，此后患之不可不惩也。夫内讧外侮之源，由于民心不固；民心不固，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由于教化不敷。士无真实之学，农乏耕植之能，工鲜精巧之艺，商昧懋迁之机。当道无奖励之方，而有剥削之政。无怪民生日偷，国势日蹙矣。

我朝列圣相承，追踪三古，特颁《圣谕广训》，令官吏岁时宣讲，以劝化愚民。今上复颁顺治时钦定《劝善要言》一书，用扶世而翼教，所以为斯民计者，周且挚矣。惟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阁，则考察未及，经费未筹之所致也。似宜责成教官三八宣讲，而府、县就近稽查。仍筹经费，听讲者款以饗餼。劝化若干，记以簿籍，岁由学政综核其成。有成效者，擢知县。此城邑宣讲之法也。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者，由教官遴选公平之生监、绅耆，亦筹经费置立公所，按期宣讲，听讲者授以餐。劝化若干，籍而记之，以申于教官，转详学政，移咨吏部，三年有效，量予出身。此乡镇宣讲之法也。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务求有当于人心。行之二十年，而天下风俗有不焕然丕变者，吾不信也。我国朔望讲乡约、讲圣谕于矮屋之下，或庙宇檐前，何如西人按七日一聚会于大庙堂中，列椅而坐，肃然静听。讲经者皆饱学宿儒，非华人之讲乡约者，仅识十六条圣训而已。我国无知者多，宜飭各省教谕认真宣讲圣训。并中外利弊情形，俾知警省，毋逞一朝之忿，以致丧身辱国。尤望官绅集资，聘口给之士，于各州县按期宣讲，或学宫，或庙宇。昔吾乡佛山镇那祀堂宣讲果报，能化利盗之心，不再行劫；能回逆德之念，孝顺翁姑。可见移风易俗，端在教化。此外游戏之有益于身者，如体操、跑马、赛艇之类，皆可随时练习。惟斗蟀、斗鸡之近赌，迎神赛会之糜费，则宜一律禁止。

至于海外贸易工作之商民，不下数千百万，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赌杀凶殴之案，层见叠出。其性情良懦者，则入天主耶稣之教，藉此以为护符，当道漫不瞻顾。蚩蚩者氓，莫非天朝之赤子，忽然竟置之度外，岂仁人怙冒之心？今海外通商各埠既设领事以抚驭华民矣，似宜就地筹捐，建立书院，以教聪颖子弟。仍广筹经费，置公所，按时宣讲《圣谕广训》、《劝善要言》，或由领事延聘达人，或由领事自莅，每逢朔望及礼拜日期，逐条宣讲。听讲者亦记以籍，授以餐。岁申出使大臣，稽其功过，勤者优奖，违者扣除，并于摺内声叙。

至中外宣讲之人，固须品学端粹，亦必辩才无碍，始足动人听闻。有一华人入西教充牧师，在教堂宣讲，听者甚众。嗣因与其师不合，出堂下乡，宣讲孔孟之教，听者益众。可知言语之才，所关为至巨也。高见远识之君子，慎勿以斯言为迂而忽之！

医术

医之道，通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讲明切究，以导一世于和平，登斯民于仁寿者也。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藉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古法徒存，无能变通。此所以谚有“不药为中医”之说也。夫人当疾痛惨怛萃于其身，凡有血气之伦，孰不求生而恶死？乃世无和、缓，竟以性命死生之重，付托于轻率庸妄之夫。一方试病，妙谓青囊，三指杀人，怨深白刃。言念及此，忍以医术一门列为方技，而小道视之欤！

考《周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疾医掌医万民之病，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考医之法，古制綦严，所以重民命也。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详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近世之漫无把握。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各国医学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由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

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查西国医生，皆由医学堂出身，非医学极优考取一等，不准给予文凭。即药院中制造膏、丹、丸、散及药水者，亦须由医学堂出身方准，不然该院药水无人买也。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中国之官吏能如是之认真考验乎？此不若西医者一也。

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检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老人院，癫狂、聋哑等院，遇有死者，许医局剖析肢体，穷究病症及生化化之原，以教后学，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考中国上古，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割皮解肌，漱洗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如此其神也！《列子》言：扁鹊之治鲁公扈、赵齐嬰也，饮以毒酒，顷刻遂死，乃剖胸探心，互为易置，投以神药，既寤如初。《抱朴子》言：张仲景之为医，尝穿胸而纳赤饼。《后汉书》言：华佗精于方药，病结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剖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漱洗，除去痰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痊愈，一月之间平复矣。他若仓公解颅而理脑，徐子才剖跟而得蛤。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实为西医剖割之祖。如论脏腑部位，即知有剖腹验看之事，特其学失传耳。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若西医者二也。

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而脑有气筋无数，散布于五官、百骸。何处脑气筋坏，即何处有病。衰迈之人脑气不足，遂有麻木昏聩之病；幼小之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而心之为用，专司乎血。心脉一跃，血行一度。验心脉之迟疾，知病体之轻重。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血犹水也，脉络犹百川也。潮血来回无不震动，即无不有脉。夫血发源于心，运行百体，嘘吸生气，由肺复返于心，日夜周流运行不息。若按脉推求，决无是理。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总管而出，散布于百体四肢，岂可以两手寸许之管强分寸关尺，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且剖验两手脉位，其管大如鸡翎之管，循臂而上，渐上渐大，上至颈项，即于颈中脉管通连，直达至心而止，并不与他脏相属。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且直通一管，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则可；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可。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此不若西医者三也。

治病之法，中医则曰木克土，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克金，治肺者，先泻心；水克火，治心者，先降肾。或曰三焦皆空虚之处，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而尤以保脑筋、养肠胃为主。用药之法，中国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国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且无论汤、丸、膏、散，皆属医生自配，较之买

自药铺，品味搀杂，炮制不精，自行煎熬，不谙火候者，功用固殊矣！此不若西医者四也。

西医论略病症纷繁，内外诸症不下二千种。审察疗治，医者之职，大要不外体质、功用二端。盖人之皮肉、筋骨合而成形，实之以脏腑，贯之以血脉，所谓体质也。一物有一物之用，无虚设，无假借，所谓功用也。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体认，方能施治。其外症有刺割也，扎绑也，敷治也，洗涤也。事必躬亲，非心灵手敏，而器具又极精良，不能尝试。如自开钳、血管钳、曲铰剪、直铰剪，刀则曰钩、曰割，针则曰探、曰坑，以及手钳、银丹筒，皆精巧利用，故于外症尤著奇功。其内症更持机器于腕中，以辨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且有医家报章，何人、何病、何法医痊必登诸报，以告后世。若遇疑难大症，亦皆登报以告高明。或七日一纸，或期月一纸。业此者购归观玩，互相质证，以尽所长。日本素学中医，今亦参用西法，活人无算，其明证已。此不及西医者五也。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谓宜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内证主以中法，外证参以西医。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先将《灵枢》、《素问》、《内经》、《难经》熟读，博览仲景、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参以西国之图器，剖割之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有能治疑难大症，卓著神效者，报明医院，颁发银牌、匾额，递加虚衔顶带，以旌其功；并将治法、病由登之医学日报，年终汇集刊刻书。庶庸妄者不致滥竽，高明者有以自立。医之一道，可与良材功矣！

卷三 吏政

吏治上

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中枢之与督抚，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操用人行政之大权者也。夫国家设官，本以为民。其与民最亲，而贤否得失之间，动关国家之治乱者，尤在州县。何则？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内而六部，外而两司、道府诸官，皆考察此州县者耳。伊古以来，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亦未有牧令非人，而疆臣、政府可以坐致太平者。独奈何进身之始，科甲、保举、捐纳既已不一其途，而吏部铨选之章，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及选补得缺，则需次日久，负债累累，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乡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复生，断者已不可复续矣。

间有廉能之吏，一意兴利除弊，教养斯民，而知府之意见不同也，司道之威严可畏也，上官倚之，同寅笑之，众庶疑之，必溃其成而后已。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脍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箝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噫！上下之间相蒙相通至于如此，而犹日日言自治，是犹南辕而北其辙也，其必无成也决矣。

况上之任人也不专，用人也既不尽其才，又不问其能否。陆路之将可改水师，水师之将可调陆路；刑部之员可调工部，兵部之员可调吏部。强以所不能，而不专任其所以能，岂果有兼人之资，无事不精，故能随事胜任耶？正虑其所谓无不能者，乃竟无一能耳。徒伴食貽讥，一任颠倒是胥吏之手，为可叹也。溯唐、虞之世，设官分职，

各有专司，不相兼统，如契为司徒，皋陶为司寇，伯夷作秩宗，夔典乐之类，皆以其所优为者任之。未闻以敷教之事强皋陶，以刑名之事强伯夷，以典礼之事强夔也。是以百职庶司，皆能各称其职。

今泰西各国用人行政亦如是，其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陆路人员不能调水师。学古入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迁，终于此部之首领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迁移，故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愈久而识更精深。富强之原，实基于此。查户部之外有农部，专考树艺之经；工部之外有商部，专讲贸易之道；兵部之外有邮政部，专管驿递之往来。外部即我之译署，内部即我之吏部，独无礼部之设，亦无铨选之条，百僚升降权归议院。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无本省回避之例。盖既洞悉其风土人情，自易收驾轻就熟之效。汉、宋用土人多名臣。且汉制，乡有三老掌教化，有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有游徼循禁盗贼，与今日泰西政治相仿。所谓盛世小官多，衰世大官多也。今州县若佃田者，然其地肥饶，上司不使久擅其利；其地瘠薄，则亟亟求去。故贤者莫能有所施設，而不肖者惟饱其私囊。官与民彙不相习，势涣情离，一旦有急，各不相顾，何能自立？故拟变回避而用土著，变铨选而用公举，变部议而设议院。

听讼之事，派以陪审，而肆威作福之弊祛；列以见证，而妄指诬陷之弊绝。所谓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者，昔闻其语，今见其事。而且俸糈优厚，人无内顾之忧；职任精专，事有难宽之责。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孜孜然日求有益于民，有益于国。否则，议院排之，国君斥之，不能一日居其位。此泰西诸国所以不言吏治，而吏治自蒸蒸日上者，彼此之情通，声名之念重，而壅蔽之患除也。

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官司益我，否塞益甚，堂廉益远，积弊益深。欲一扫而空之，诚非开设议院不可。即势殊地限，久而难变，亦当裁汰冗员，酌增廉俸，以渐通其隔阂，而渐化其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强之本计也。夫天下虽大，其州县不过千余，所属牧令不过千余人。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以慎选之，以严核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固，国势日强，而何畏乎英、俄？何忧乎船炮？何患乎各国之协以谋我哉？故曰：国以民为本。而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生乱之原，莫急于病民之政。所谓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此之谓也。

英国授职之官，无论充兵官、议员、刑员，以及内政、外政衙门大小臣工，皆须在众人前向天发誓，谓以后当忠心为国，笃爱朝

廷，身许驰驱，为国家效力。发誓后方能任事。今泰西各国及合众国皆用此例。西俗：国家凡有兵祸，或匪人谋叛，或敌国来攻，朝廷志在安民，兴师戡暴，必令兵官誓众，以安民心。其或官民谋逆，则令彼处地方官民皆对天矢誓。其内作者立时可睹，见于颜色。朝廷即知为某也忠，某也奸，某也曲，某也直，有诸中而形诸外，自无所逃遁。然亦有刚愎不仁，强项不驯，不知敬畏帝天，虽有别谋，亦复当众同誓，以为口头言语，无足重轻。此等人为众所不齿，乃桀骜之尤者也。

王爵棠星使云：法国政治以大统小，以内控外，体制与中夏略同。州、郡、邑、乡分设专官以理民事，而其权操之于上，咸遵一律，罔或违异。每一千端则设一官，若中国之州县。凡膺是职者，必考授律例师，凡民间琐案，悉由其剖断。苟有稍涉疑似，未臻平允者，则代为申详，上宪据法研鞫，俾成信谳。各乡镇则另设甘门一员，如中国巡检之类。凡其所设各署，俱有专职，从不兼摄数事。大抵理地方民情者，统称刑讼衙门。而官有崇卑，如州、县、乡、镇等官，其小者也，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有事控于地方官，悬案不断或剖断不公，俱可复控诸所辖上司，遍历二十七所而后止。然此尚系琐细案件也。若值重大之事，其上另有专断之官，其职分约同中国按察使。各府中均设是署一所，凡有冤抑，听其赴诉，每年四期，每三月一集，开堂会鞫。并许被控者自选秉公耆老十有二人，届时质证剖理，惟毋得徇私偏袒。然后鞫者听两造之辞，以辨直枉，舍寡从众，期无诬屈，以为惩劝。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负，则有钱债衙门。其官由州县百姓公举，三年一任，期满再举。但推选虽由民庶，而俞允仍归国主。凡乡民因索逋涉讼者，其数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即由州县上司判决；若一千五百福兰以上之案，乃控于钱债衙门，为之比追。每府皆有驻防水陆兵丁，苟有犯案，统归所主办理。至于巴黎所有衙署，不可胜数，凡国中官吏所断一切词讼，均必上闻。其有悬拟未决者，亦皆关白，以定是非。其中办事人员，均系著名律师。除上下议院外，有参赞机密大臣，有执国政大臣，有总理度支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主军旅者，有榷税饷者，有专理户婚、田土事者，有专理商贾事者，有治盗贼、斗殴事者，有治列邦事者，有管属国、地方事者。观其分职建官，颇能尊卑相御，内外相维，无畸重畸轻之患。其为部十二：曰内部，总理庶政，兼摄群司，职同中国之首辅，本国事件咸听裁决。曰户部，专司出纳，国中一切财赋税饷，皆其主持。曰商部，管通商事务。曰农部，管民间一切种植。曰工部，凡军械、火药、修治、建筑，皆其经理。曰文部，掌管学校。曰兵部，主治军旅，凡调遣一切，皆其主政。

曰海部，修战舰、治水师。曰藩部，管理各处属地。曰刑部，主持律例，兼理教案。曰创例院，筹议军饷，增改律法，皆其专政。以上皆以勋爵大员为之。国有大政，国主与此数人谋之，有机要事，皆得参谋议。同治十一年，国会别设军机一职，由上下议院公举二十八人，伯理玺天德亦简派十五人。凡下诏谕、上笺奏，皆由此四十三人管理。据其报册，每年建官计文员约二十万人，可谓繁矣。欧洲各国度支，往往出多人寡，皆因设官繁密，事不兼摄之故，而又给禄丰盈，食浮于人，以致经费常患不足。然秩虽崇，而事克举，国中大小臣工，无不守法尚廉，不懈厥职。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即贵至执政大臣，抑且以民之可否为去留。又其榷征税饷，具有常度，涓滴必归公款，不得朘民为生。其所谓庠臣者，不过综厥大纲而已。其所谓理财者，不过司出纳，掌簿录而已。而所谓因循蒙蔽，侵冒剥蚀，干没克扣之弊，彼反无之。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

按泰西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各部长归宰相自择其人。如宰相一换，而各部长虽才德素优，与宰相不情投意合者，亦必解组赋闲。我国家时艰孔亟，万难苟且姑安，急欲补救，量为变通。惟恐为不洞识时务，或未经历练者所误，而反归咎于变法之人，故前篇有拟请朝廷简派亲王、贝勒游历一说。今时不可缓，亟宜简派亲信之王公大臣能通西国言语文字者更妙随带翻译，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考究各国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如有才德兼优之老臣宿将，当奏请朝廷，重聘回国，以其所长，分派各部佐理。查美国尚无侵占我国之地，似宜聘美国退位之总统若干年当我国之首相，并与首相选文部、兵部、外部、工部、商部、农部、刑部各一人，分派各部佐理，庶免用非所长，为外人所欺。中国积弊，大抵所学非所用，现在专门之学未兴，人才未出，臬司不知律，簿司不识算，日行公事全恃幕友、书吏，往往为人所愚。亟宜设课吏馆，内而翰林及候选司员，外而候补府县佐杂，皆须由课吏馆考取执照，方能委署补缺。凡系中外交涉之官，无论大小，须晓西人言语文字。非但不为属吏所欺蒙，亦当为外人敬服。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

吏治下

上篇论州县为亲民之官，而贤否得失，关乎国家治乱。然督抚为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统属之贤否，全在督抚公正廉明，平日留心察视，不为人所蒙蔽，然后能甄别确当。一有偏私，则所贤、

所否者皆不当矣。一省之司道，佐督抚以出治者也，而用人理财，尤为藩司之专责。藩司之贤否得失，督抚居其半。若督抚大公无我，严加举劾，朝廷察其好恶以定黜陟，人皆有自爱之心，敢不称其职守乎？首府者，又督抚、两司所寄为耳目，而以进退州县，其责亦綦重矣。自有以人地相宜之条量移州县，而后各省为人择地者十之八九，为地择人者十无二三。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驽庸竞进，以事贪婪，孰能尽心于民事哉！而以民事为事者，又每拙于逢迎。故黜陟不公，则奔竞不息，源浊而流清，未之或有也。守牧有表率之责，大省不过十数州郡，以督、抚、司、道之长才，鉴别十数员知府、直州之贤否何难？大郡不过十数州县，小郡亦不过数州县，以本管知府就近察数州县之贤否何难？

愚以为甄别府、厅、州、县，必须分别等差。平素具有灼见真知，临时乃能因材施教，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为一等；廉明诚静，有守有为，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劳绩，可理冲繁之地者为一等；复将通省府、厅、州、县，查明肥瘠难易，一一分别注明，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者，选以优缺，俾知瘠区不可规避，美缺不待钻营，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竞奋。吏治转移，或在于此。要之，州县为亲民之官，与州县切近而实临其上者，是为知府。州县之功过，知府得以详之，司、道、督、抚而察其可否，以定其优劣。上之视知府重，则知府自视亦不轻，使州县有所敬畏，而不敢不为好官。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至于关差、厘局每一缺出，百计营谋，幸进之徒往往有三五年不更替者。否则交卸彼局，而又接管此局。托词事关重大，非资熟手不能胜任，其实无地方之责，不过收支银钱耳，一谨愿之吏已足为之。乃有徇情市恩，不畏物议，巧者获利，拙者向隅，以致关税、厘金日形短绌，已则饱填欲壑，惟利是图。若以治地方，宰百姓，安望其为廉吏乎？黜贪崇廉，任贤而斥不肖，是又在督抚破除情面，一秉至公也。或云：朝廷下诏求贤，十数年来各督抚所举皆门生故吏，及业经简在帝心之臣，无一山林隐逸之士，负奇才而励品行，尚气节者，终不得上进。无廉耻而善于钻营者，竟得保举超升，惟知削下媚上，不问民生休戚，以讳言有事为解事，以苟且了事为能事，因循玩愒，相习成风。广东贿赂公行，赌劫之风甚炽。被劫者多不报案，因破案者百不得一，徒耗禀费、差费、勘验夫马费耳。官之为民，亦可知已。间有洞识时务，才德兼优者，率皆秉性忠正，不善逢迎，虽欲兴利除弊，往往事多掣肘，不克举行。亦有学西法而图自强者，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集思广益，多为洋人所愚，安得不为各国所欺侮乎？

善夫威公使之言曰：“今之督抚如昔日林文忠、曾文正延揽人材，讲求时务，力顾大局者，罕睹其人，类皆暮气太重，拘守成例，非病于才力不足、粉饰因循，即病于瞻徇情面，假公济私。在识见浅陋，不识时务之流，偏听节费以博虚名，虽前任遗政将来大有益于国家，惟阅时未久，尚未见效，乃不顾糜费，率行裁撤，以致功败垂成。继其任者意见各执，重议规复，非独缓不济急，而虚糜反多。有好大喜功、任性妄为者，虽言时务，仅识皮毛，既不知简贤任能，亦不知量材器使，惟采文字虚声，或重师弟年谊。无论能否胜任，一人而兼数事，故其所为皆亏本多而获利少，制造不及外来之精，物价不如外来之廉，而旁观月旦，已属庸中之佼佼矣。甚至以朝廷之爵位，作自己之私情，迎合权奸，毫无气节，意在植私党、饱囊橐，初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论者金谓近日宦途风气，每以省事为老成，而甘于因循弛堕；苟勤于厥职，不惮烦劳，类招多事之嫌，执其一节之失，而并没其他事之长，坐令勇于任事者，不若尸位之辈。转足苟安而无恙也。悲夫！人材之绌，岂非由于不能造就人材之过哉！造就人材之权，上在元首，下在枢廷。查泰西各国，凡新任宰相视事之始，必自择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诸朝廷，以为心腹，庶几议事和衷，办事无棘手也。故何律师《新政论议》谓复古之要有七，首择百揆以协同寅。并吏、礼二部而为一，名曰内部，宜添商部、学部、外部，合户、兵、刑、工而为八部。以一人之宰相，而八部之长，使宰相自择其人。夫政者各有专司，不能越俎。政既为某部之政，则官必为某部之官，故升降黜陟必由该部定议，方能允当。繁文末节，治体无关于有谓之事而加之意，先于无谓之事而省其烦，故拜跪趋踰必概行除免，而杰士始来。故并吏、礼两部而为一，所以专责成而大得士也。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故加立商部。学部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故加立学部。农事不讲，则种植畜牧不旺，故加立农部。

今强邻日逼，时事多艰，正宜澄叙官方，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亟当力为整顿，剔弊除奸，为百姓求贤父母，培养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亦罔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不称其职，知府揭之于上司；司道不称其职，督抚立上弹章；督抚不称其职，朝廷立予罢斥。整纲饬纪，除恶择贤，则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难扫除净尽矣。故正本清源，必自慎用督抚始。

通使

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诚以出使之选，与将相并重，折冲樽俎，赞美皇华，胥于是乎赖。一不得人，则辱君命，损国威，所关非细故也。今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立约，和谊

日敦，设无使臣联络声气，则彼此之情终虞隔阂，虽有和约，何足恃？虽有公法，何足凭哉？使臣者，国家之耳目也，所驻之国，必知该国之情形。凡陆兵之数，水师之数，库款之所入所出，交涉之何亲何疏，商工船械如何精细讲求。故泰西公例，凡通商各国，必有公使以总其纲，有领事以分其任；又虑威权之不振，简兵船往来游历，以资镇抚，而备缓急；事或未协，彼此悉心公议，或请各国官绅裁断，以期必协而后已。其慎重也如此。

迩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佣工者，年多一年，不可胜计中国之人经营出洋者，为天下之至众，故钦差领事等官，比天下各国更宜加隆。顾中国未设钦差以前，外邦政府尚知爱护华民，多方招致；既设钦差领事之后，外邦设法竟抽华民身税，极力驱除。或疑中国到彼争食，今其见逐，情理使然。夫争食者，岂止华民，何以不逐他国，而独逐中国？是其薄华民者，乃所以薄钦差；薄钦差，乃所以薄中国。薄钦差者何？为其不知西国之例，而动多可嗤也。薄中国者何？为其不行富强之法，而徒夸其大也。中国外部及出使各官，必须全用深通西学、深明西例之士，则庶乎其得矣。洋人每肆欺凌，无由伸理，乃仿西例，于各国设公使，于华民寄居之埠设领事。遇事往来照会，按公法以审其是非，援和约以判其曲直，保吾民，御外侮，维和局，伸国权，使臣之所系，不綦重欤夫通使者，中古邦交之道也。春秋时，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探听各国军务消息人员，某国现用何样新式轮船、铁舰、炮台、枪炮？炮台形势如何？兵官才能如何？或探访不全，必能得其大概，虽糜费亦有所不惜。所派侦探之员，概须武员知兵事者，或随同公使前去，或另派游历，总之无处不有。平日洞知各国强弱盛衰之故，如有战事，则措施自中机宜矣！用能事大字小，各协其宜。今泰西数十国，叩关互市，聚族来居，此诚中国非常之变局。于此而犹不亟讲外交之道，遴公使之才，乌乎可哉！华民之出洋者，就南洋之西班牙、荷兰、英、美各属考之，岁输税银自一二元至百数十元不等。暹罗本我旧属，乃亦仿西法，岁征我民身税，否则拘作苦工。虽有公使、领事，其如鞭长莫及何！

曩者法、越多事，彭刚直檄委潜赴越南、金边、暹罗、新加坡等处，侦探敌情，返粤后上书当道。略谓：法兰西侵占越南，其国危亡，已同朝露。然越南亡而暹罗、缅甸未即亡也。现在缅甸王暴虐，昆弟失和，英萌废立之心，缅不自安，转倚法援，为英所忌，恐愈速其亡。向闻暹、缅二国素称恭顺，附近各岛如英、法、和、西等国之属土，华民流寓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亟宜简派公使驻扎南洋，所有南洋各国，如越南、缅甸、暹罗、小吕宋，及英、法各国属土之华民，悉归统辖。即选各埠殷商，或已举为甲必丹中外信服者为领事，联络声气，力求自强。仍仿西人在华训练民团，以资保护，令各埠商民捐资购置一二兵船，公使乘之出巡各埠，庶信息灵通，邦交益固。声威既壮，藩属不敢有外向之心。以兵卫民，即以

民养兵，一举两得，无逾于此。

或疑各埠华人多借洋人以自重，董事亦各树党援，不肯受约束于华官，持节南行，动多掣肘，可奈何？此则兵力之不逮，而权势所由不行也。非有水师兵舰出洋巡缉，不能折外人陵侮之心；非有老成练达、精明强干之才，难以胜公使、领事之任。夫各国广招华工，美国独限制华工前往。外人之虐待，应如何设法保全？与国之苛条，应如何峻词拒驳，斯非使臣之责歟？

使臣简在帝心，朝廷用人自有权衡，固非危言所敢论。至若每届使臣持节奏调人员，如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官，尤当格外慎选使臣、参赞、领事，识其国言语文字、律例，遇事可以立谈，情意必然相孚。盖参赞为使臣之副，凡交涉大事，彼之请于我者，或从或违，我之求于彼者，或可或否，皆赖参赞与使臣商定而行。使参赞毫无才猷，则使臣可者亦可之，使臣否者亦否之，亦安用此参赞为？故必熟悉情形，洞明利弊，始能匡使臣之不逮，而措置不至失宜。翻译、随员，则又使臣之喉舌、手足也。凡事之大者，由使臣亲裁，小者必令其代理，或办署中案件，或与洋人周旋。至辩论公事，惟翻译是赖，曲直所关，轻重皆须得体。苟喉舌、手足运掉不灵，必于全身有碍矣。若夫领事一官，关系尤重。华民百万，良莠不齐，小而钱债纷争，大而命盗案件，使臣之不暇顾者，调停审断，皆于领事是资。领事贤，则商民既安，邦交亦日睦；不肖，则矜情任性，不但流寓华民失其庇护，而且外人轻藐，口舌滋多，彼此往来必多扞格，难免不因此失和。所谓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尤当格外慎选者，此也。

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滥徇情面，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就所取中明分甲乙，以定参赞、随员、领事之等差，不足乃旁加辟举，有余则储候续调。倘出洋多次，办事勤劳，允符人望者，即可由翻译、随员荐升领事，参赞备历各国，荐升公使。如有始勤终惰，或沾染洋习，措置乖方者，上则由公使特参，下则许同僚公揭，咨明总署，覆核得实，奏请除名。夫予以可进之阶，则群才思奋；课以难宽之罚，则不肖怀刑。庶外可为四国之羽仪，内可塞终南之捷径矣。自使臣以下各官，无论出洋久暂，务将所办各事，以及地方风土人情、国政、商务、工艺、土产，随笔登记，回国进呈，择要刊刻，以示天下。庶知彼知己，决胜无形。此三代询事考言之成法也。戊子岁，曾遣京曹分往各邦游历，惜非王公大臣，又不晓该国语言文字，虽略知中外利弊，著述等身，不能坐言起行，亦与翻译西书者无异耳。

抑更有进焉者。泰西各国，无论国之大小，公使皆以等第分班次。头等可随时入见，君主请茶会面商要事，不致隔膜。二等先期约定，止能接见外部，君主茶会势分不及。今土耳其、希腊、日本各小国，皆遣头等公使，分驻各邦，而中土堂堂大国，行走班次乃反居其后，于体统有关碍，于交涉亦动多掣肘。拟请嗣后驻扎英、俄两国使臣，均以头等派充，增费无多，而收效甚远，国体亦因之而尊矣。且出使官员，亦宜酌增公费，使之足用。昔总署所定出洋各员薪水，数本不多，今复经屡次核减，则各员必有以简陋贻讥外国者，惜小失大，甚无谓也。一切车马服饰，皆不可过事寒俭，以壮观瞻，而尊国体。所驻之国，其官吏有应接见者，固宜交相拜访，询悉情形；其不应接见者，断不可率意往来，俾知使臣之尊贵，国制之严明。如是，则华洋之人见而敬服，专对有才，贤于十万师远矣。至如胆识兼优，声望夙著，当净则净，当从则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回积议如转环，化巨祸为细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汉之苏子卿、傅介子，唐之颜真卿，宋之富弼，炳炳诸贤，至今不朽。英风亮节，今岂无人？有志之士，所为奋然而兴也。

游历

今之谈富强者，动曰军火宜备也，铁路宜开也，制造与工艺宜兴，矿产与商务宜振也。庸詎知居今之时，处今之势，所以致富之本，自强之基者，莫如上下一心。方今朝廷创办一事，聚讼盈庭，非无深达时务之臣，而每建一言，辄多格于群议，诚如总署所谓同心少，异议多者。洋务之兴垂六十载矣，求其知彼知己，不随不激，能为国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几人哉？夫民心不一，则国势日衰。而交涉之难调，由于意向之不定；意向之不定，由于主议之无人。欲求主议得人，非王公大臣游历外洋不可。

夫游历之法，昉于中国古时輶轩使者，遍历四方，问俗采风，详察民间疾苦。此实游历之权舆。孔子一车两马，历聘诸侯，遂成素王之业。战国时仪、秦之辈，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烂之舌，声动侯王。当其周游各国，而山川之险易，政事之纯疵，兵力之孰弱、孰强，人情之何爱、何忌，无不揣摩简练，熟烂胸中，因得以审其机而投其间。虽纵横排阖，圣哲羞称，而其颠倒是非，运天下于掌上者，非假游历，亦何由自成其才也？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

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人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关山，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豫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考二百年前，俄亦积弱之国。自其先君彼得见欧洲各国互长争雄，恐内治不修，外患将日亟，乃效赵武灵微服过秦之术，遍游诸国，访问利弊，延揽人才。归国后变通治法，振作工商，不二十年虎视一方，吞并弱小诸国，土地日大，兵备日强，卓然为欧西首国。游历之效如此。

比年我中国亦知其益，故有派员游历之举。但闻每员薪水月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之繁，应酬之巨，安得敷用？亦只深居简出，翻译几种书籍，以期尽职而已，未能日向各处探访，时与土人咨询也。且承命而往者，皆微员末秩，回国以后即使确有所见，亦安能大展其才？中国体制所关，经费有限，纵不能如西例尽人皆可出游，莫如选择王公大臣、贝子、贝勒及其子弟，通古今，识大体，晓西文不晓西文即先令其学习，年力富强而未当国者，派往各国考求利弊，探访情形。丰其资装，宽其岁月，与我国使臣相助为理。夫今日之少年，皆他年老成谋国之良佐也。一旦躬膺重任，建议兴事，皆有真知灼见，自决从违，不致畏葸无能，亦不致拘牵债事矣。

抑更有说者。自设海军以来，所备大小兵轮不下数十余艘，平日除会操、载送官员外，一无事事。何如派往各国游历，藉以保华民，张国势，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岛屿之萦回，沙线之浅深，潮汛之长落，地势之要害，咽喉防务之布置疏密。并定以游历限期，或半年而瓜代，或一年而瓜代。既回国后，由当道面询外洋情形，并观其日记，实有心得，即照军营立功例奏奖。果如此讲求研练，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

书吏

天下人之所断断而争者，名利而已矣。名重于利者，奉公而守法；利重于名者，舞弊而营私。今各署书吏既无名之可言，则不得不专趋于利，徒欲以法惧之，盖亦难矣。故朱子襄曰：欲作廉吏，勿靠书吏。必先熟律，方不为其蒙蔽。胡文忠办理鄂省军务所设厘局，悉屏书吏而任官绅，寄以腹心臂指，用赖以足，兵赖以强。伊昔名贤，未有不畏书吏而慎防书吏者。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内而六部衙门，外而督、抚、司、道，下而府、厅、州、县，以及盐务、税关皆有缺主。每缺或万余金，或数千金不等，营私卖缺，与本官无须见面，署中惟觅一办事者，潜通声气，朋比为奸。同一律也，有律中之例；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案。其间影射百端，瞬息千变。犹是一事，有贿者从，无贿者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惟为所欲为，莫之能制。即使上司觉察，按法严惩，亦只能革署中办事之奸胥，不能斥外间把持之缺主。而官之接任视事，多则四五年，少则一二年，其于治内之利弊，俗尚之美恶，或未及周知，即已更调而去。若书吏则世代相传，专门学习，兵、农、刑、礼各有专司。官有升迁，吏无更换，况既授以事权，又复限以资格，虽有才艺，荐达无由，而月得工食纸张之费，为数甚微，若洁己奉公，亦实无以自给。

考泰西有大小律师，无书吏之弊。律师者，曾在大书院读律例，取列一等，国家给以凭照，准其为民诉冤，代官诘问。凡正副臬司，必由律师出身。审案时两造皆延律师驳诘。公选廉正绅士陪听，首曰公民，余曰议长。如案中人与绅士有一不合，尽可指名更调。律师互相论驳，以词穷者负。官得其情，遂告公民曰：“此案本官已审得应犯某律，尔等秉公定之。”公民退议，各书其罪申覆，所见皆同即为判断；否则再审，以尽其辞。凡陪审、人证，皆先誓不左袒而后入，两造俱服，则有司申送上院定讞。所有案词，岁刊成书，引以为例，嗣后皆可据以为断。

今中国欲筹变通之法，请将律例专设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须察其品行，然后准充书吏，锡以虚衔，厚其薪资。倘有颞顽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则期满之日，本官加结保举，然后录用；若服官后有贪赃不法者，保举者坐罪。各予以出身之路，庶咸知自爱，不敢弄弊舞弊。书吏之权既轻，本

官之职乃举，似亦正本清源之道也。今书吏五年期满，例有考试，列一等者用府经、县丞，二等者用从九、未入，以文通字佳者为优，鲜不倩枪顶替入场，所取既非真才，服官更难期清正矣。

恭读仁宗睿皇帝谕曰：“君临天下，敕政治民，仔肩至重，奚能独任？我朝特设内阁总理枢机，六卿分职，各司其属，即古之四岳九官，辅弼匡襄之职也。朕德薄才疏，寅承大统，惟求天下义安，兆民蒙福，孜孜图治，不敢暇逸。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去害，是甘于旅进旅退，忘职思其居之义。诸臣自为计则可矣，何以报皇考数十年之恩遇乎？自大学士、尚书、侍郎及百司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令是从。今吏部京兆相争一事，任书吏之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各堂官受其愚弄，冥然罔觉。所争之情节与所为之弊窦，毫无干涉，良可慨叹！一部如此，推而至于五部，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肆，国事尚可问乎？经朕训谕之后，尚不知悛改，是激朕之怒，必欲朕受薄待大臣之名。朕宁受此名，曷敢废法？必挽回乃止。其无悔。钦此！”仰见我仁宗立法剔弊，谆谆告诫之至意，宜如何敬谨遵守？

乃今日各部书吏，其舞弊较外间尤甚，其弄权较外间尤专。如欲设法挽回，除考试选充外，并宜夺其权。夺之奈何？曰：此其道在乎使司员熟悉律例。盖司员不熟公事，书吏遂得上下其手，因缘为奸。诚使严定章程，凡司员到部候补时，皆令轮班入值，熟读例案。一俟有缺，由堂官面考，择其律例精通、档案熟习、有为有守者，尽先即补，然后一司之员必熟一司之例。遇书吏呈办案件，严加覆核，合则呈诸堂官，不合则是书吏故意播弄，即行斥革，不准再充，则鬼蜮伎俩必无所施矣。下自州县，上至督抚，旁及海关、房科，胥差皆以重资承充，与本地劣绅、痞棍串通作弊，恐吓乡愚，勒索无辜，被累者竟致无门可诉。其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吾粤劫风甚炽，多有不敢报案者。因报案亦不能破，徒为胥差勒索累费、验费故也。况司员既熟例案，一旦外迁亦能洞悉情形，不至为书吏蒙蔽。至于外官督、抚、司、道、府、厅、州、县衙门，既予以甄别之条，官又熟于律例，如此内外合力办理，自可杜无穷之弊也。愿与当世贤豪借箸筹之，取怨于若辈弗遑恤矣。

阉宦

今中国有一极弊之政，为合地球所共无者。其法虽传之往古，然其所以用法之意，则非若后世之所为。师其法而不原其立法之始，意积久而愈失，弊变本而加厉。于是百患丛生，寸效无闻，为宇内所同笑，则中国之阉宦是也。

阉宦肇于古五刑中淫刑用宫，其人既绝生育，屏室家，将无以为养，故收而纳诸宫廷，备扫除之役。然则入宫之举，实为恤刑余而开其生路，非概取不犯淫刑之人，而残其人道，以供我给事也。故春秋之世，竖刁、开方、寺人披辈偶见记载。可知阉人犹不夥，而败国、乱法、作奸致祸已往往闻矣。暴秦灭六国而一统，用赵高为中车令，遂杀扶苏，弑望夷，而墟秦社。汉则家法坏自高祖，病不见大臣，独枕一宦者卧。厥后子孙效法，至呼宦者为阿父。桓、灵之际，遂有十常侍之乱。操贼奸凶亦起于阉腾余孽，尤可叹惜而痛恨者也。六朝重女乐、声伎，宦官不甚假权，故寂然无闻。唐自元宗信任高力士，遂启祸窠，至子孙不免于阉人之手。有宋家法稍严，初亦静谧。至徽宗宠高俅，王童贯，而北宋亡矣。明太祖深恫前辙，不许宦者衣绸帛，不许宦者干朝政，宫中至立铁碑以垂训。乃子孙不能绳祖武，始刘瑾，继王振，数传而至魏忠贤，屠剑天下忠臣义士，若刳犬豕，致罹天厌，猝覆其邦。虽思宗之英武，不能挽朱明之末运。此后世所为流涕三叹。而推原祸水，实由数阉人剥其元气耳。

国朝惩明鉴，重以圣祖仁皇帝之英明神武，遂尽削中官之权，不得干预外事，章服不得逾四品，立法超迈前古矣。而近时法戒稍宽，除例准贫民多子之家自幼净身报名内务府外，往往有中途自阉，投入宦名下，希图富贵。剥天地之元气，绝祖宗之系统，诚非细故。夫刑余之人，实为不祥。仅供廷苑扫除，已乖太和之气，况趋走御前，伺近禁蹕！此五大洲各国所无也。即日本近在东邻，同文二千余祀，其国政教往往效法中华，而独于阉宦一事，则绝不趋步。其宫廷禁门以内，皆用女官承职，例取世家子年十六以上，入宫承值，有月禄之给。年二十以上则出而嫁之。禁门以外则用侍卫、羽林，类皆良家子承充，职同下士。故历久无宦寺之祸，此其立法之善，未容以外邦而轻视之也。他如安南、暹罗、缅甸，亚洲各小国，虽皆有宦官，然其人不多，其名不著，权不属而祸不彰。至若高丽之

宦者，亦犹日本之宫女，而数复廖廖。

窃以为上天之大德曰好生，人情之所重曰后嗣。今既全革肉刑，奈何无罪之人，反听其绝人道，灭天纪，受蚕室之苦，为刀锯之余！是犹草木未甲而坼之，昆虫方蛰而杀之，毋乃为盛世之累耶？纵彼自愿净身，非官司程迫，然应此役者多畿辅之民，类于十一二岁时，愚顽父母贪他日之富贵，不惜一子，忍情为之。童子何知，而谓其心所甘欤！若夫中年自行净身者，虽似出于中忱之所愿，然此辈多非良善。或以淫毒残形，或以盗贼漏网，或犯命案而希图免死，或有仇衅而隐思报复，故忍痛奏刀。其心之险毒凶狠已不可问，而可任其入厕掖廷，引为心膂耶？

是故古今异势，治乱异法，古虽有之，今亦宜绝。况古为未绝肉刑而设，今肉刑悉绝，而独留此惨酷之端，取四海五洲之笑，亦何必墨守而不变更哉？倘能举数千年痼疾弊政一旦廓清，如幽都之忽赌日月，如早苗之忽逢时雨，天下苍生咸頽首而上圣神之颂，我家万年有道之基，亦弥征其绵延无疆矣！

廉俸

《管子》有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之人，未有饥寒切体，内顾增忧，而能致其身为国家用者。

西国定制，人非本籍不能为官，选举之权操于议院。一县之中，有知县，有律司，有管库，有考帐，有查街，有捕头，执事人役除优给俸钱外，复有公费以给应酬，事无陋规，物无官价。即巡捕、下役每月工资亦数十金，余可概见。倘有玩忽章程，贻误政事，徇情受贿，越理取财，一经讦发，从严查办。其人多羞忿，伏罪自裁，否亦为国人所不齿。故贪污坐赃之风，不禁自绝。惟其有司养廉之款，则较中国为倍优，国家课吏之条，亦较中国为倍肃，是以俸薪外一介不取，而簠簋不饬之患，寂尔无闻。

我朝建官设禄，正俸之外，加以恩俸，常支而外，复给养廉，体恤臣工，无微不至。无如俗尚奢靡，物价腾踊，京外各官之廉俸人不敷出，数本无多，而又以丁耗划为军漕，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无几。其能洁己奉公，见利思义者，贤人也。否则，上焉者或借夤缘馈赠节礼堂规，克减军饷，侵蚀钱粮为津贴；下焉者或藉窝家坐赃娼赌私规，诈索乡民，欺蒙长官为得计。探其原，实由支用不给，极其弊，遂至流毒无穷。恐非古圣王重禄劝士，庶人在官者

禄足代耕之本意矣。

今欲整饬吏治，軫念民艰，当自京外各官加廉俸始。《新政论议》云：宜下令国中，自今以往，在内为相臣者年俸三万两，所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在外为总督者年俸二万两，提督、将军年俸各一万五千两，所属递趋递降，各以是为差。至兵丁、水手月俸八两至十两，月终颂俸，分毫不得扣减。衙门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费用，由公项给发。历官十年而归田者，恩俸视其所食禄，给若干成数，以其任二十年、三十年者递加之。终于王事者，功大则以其恩俸之数酌给其孙终身，功小则给其子之成人而止。文员、武员有受民间一钱、一物，或擅支国库一毫、一厘者，立行革职，永不再用，恩俸尽削。如此，而贿赂之风未有不绝者也。或嫌此议不无过重。我纵不与，彼亦必取，与其私取而败公，曷若公与而杜私？重禄所以劝士，古之大、小臣工身名俱泰，无他，此法行耳。

所有文武廉俸，必照旧额倍给，并分别酌给办公之费，使无支绌之虞。若复有罔上营私，受贿枉法者，按法重绳之。一切陋规悉为裁撤，或相沿已久、碍难骤革者，全数充公。如此，则民困纾而官方肃矣。或疑国用未足，一旦遽增巨款，费无所筹。则莫如裁汰冗官，将其额禄并归必不可少之员，则廉俸裕而操守自端，积习除而国帑自足。尸位既少，循吏必多；循吏既多，民生必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何虑官谤之或速，经费之不敷哉？若更能通堂廉之分际，祛隔膜之偷风，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唐虞三代之风，不难复见于今日矣！

限仕

《礼》，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示优礼老臣也。古之人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强仕，六十而老，七十而悬车，三代以还之通例也。四十曰壮，学问既成，阅历既深，故可以出而任事。七十曰耄，精力就衰，艰巨难胜，恐有时因而误事，故奉身以退，避贤路、戒素餐也。汉世二疏，止足告归，形诸歌咏，传为美谈，此足为士夫法式者也。后世此风稍不逮古，洊至恋栈者多，悬车者少。

伏查乾隆二十二年，定部员五十五岁宜详加甄别；三十三年又改定六十五岁，但实力行之，毋少瞻徇。夫甄别者，即恐其衰耄不能任事而罢之，故有予告之条，有原品休致之例，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也。高庙之治隆媲唐、虞，道固若是欤！中兴以来，保举之途杂而渐滥，捐例既开，仕进之门路愈多而且歧，比至今日，有积薪之势焉。虽内外臣工屡有疏通之奏，而究无疏通之良法，未力行疏通之实政，则疏通之实效，亦终不可睹也。

然则良法维何？仍不外乎斟酌限年之典，恪遵祖宗详甄别、戒

瞻徇之圣训，而以实力奉行之，斯可已。四十始仕，三代下殆未可拘。顾亭林尝有二十应试，三十服官之议。是说也，酌中无弊，颇可参行。今之仕进本不仅应试一途，窃以为应试之年可以二十为准，则服官之岁要当以三十为定衡。其保举、捐纳两途，亦当酌定於三十、四十之中，以三十五为服官之准。其列保之岁与夫捐纳之年，亦必以二十为限。保捐之后，加以十余年阅历，而后任之以事，庶可有功。至致仕之年，当钦遵高宗定法，以六十五岁为度。其不及限者，当于任满之日甄别去留。国朝定制：甄别岁行，比及三年，则又有内而京察，外而大计。所以慎名器、戒窃位者，既已至详至严，特患奉行故事，未能认真办理耳。今请详致仕之条，除世爵、宗亲不计外，其有成大勋、据高位者，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朝廷赐金赏荫，准为予告老臣。或给全俸家居，岁时奉朝请，备顾问。若有军国大事，亦可酌量垂问，准其与闻参议，余事概不必劳其身，所以示国家养老尊贤之意也。下此则六部、卿、寺及内阁部属等官，及岁限则罢之。外而疆臣、司、道及府、厅、州、县各亲民之官，责任烦剧，尤不宜以衰暮之年为乾没之计。夜行不休，古人深戒，亦当定从严限。督抚以年七十为度，赐金趣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吏，则当以六十五为限。及限不告退者，则请罢之，准其原品家居，或退为乡三老之类，稍给津贴，以示体恤。其文理优长者，或聘长书院，或提调书局，投闲置散，斯无不宜。夫士人少而家修，壮而廷献，既无致君泽民之伟抱宏才，则非朝廷必不可少之臣工，即非地方必不可去之官吏。抚心自问，窃位苟禄，徒为子孙之计；印官衙署，非养老院堂也，乃如之人，固安之乎？然而竟有颯然安之，而举世莫相非，亲友不相劝者，则由于仕途之滥，庸吏之多，恒产之乏也。

夫古昔之官，或起自田间，或升自学校，或举自货殖。其人皆有故乡游钓之所，生产之计，罢官而归，林泉养望，不失为耆民硕望也。今也不然，幸进多门，以仕代贾，出本无山，归则壁立，积弊至以官为家，群相尤效，而仕途始不堪问矣！矧国朝用人，首重资格，绝少破格超迁之举，故宦成显达，强半在老大之时。彼以积劳有年，甫得循资登进，宁有不自视其位甚重者！重之，则欲退之心减，欲进之心盛矣。又其人初居下位，奔走艰辛，迟之又久，一旦得膺高爵，亲故阿谀，百僚趋奉，苞苴日进于门，声色竞起于后，宁有不自顾甚乐而辗转贪恋其权势者！贪之，斯患得之念重，而患失之念愈重矣。此所以二疏之高风，竟成千古绝调也。

虽然，其人之自为计，则诚工矣、得矣。若夫国家之仰望臣邻百职，固欲与此贤士大夫共治域中者也，今乃以救缓之荣，为斯人

娱老之具。任官惟贤之谓何？则莫如定年限，严甄别。官人既自味廉耻，国家要不得不全其廉耻，及年而罢，满任而归，示与屏黜不同。非予之以难堪，斯受之者无愧色。虽门堪罗雀，迟暮可伤，要亦无足惜耳。

若夫武员，无论水师、陆军，其将领年过五十者，概须退职归田。军士年届五十者，亦罢遣不用。此泰西之通例，实军政之要图，我所急宜整顿者。

更有出使一途，向来赋皇华之选者，颇多景逼桑榆，纵令精神尚形矍铄，然数万里重洋之风涛，瘴雨蛮烟之水土，残年风烛岂能堪之？故往往有归即乞休者。况长征三载，甫得洞明洋务，而日暮途远，亦难再矢驰驱，国家仍不能得其大用，则何如加慎于选派之初也？

汰冗

今日度支告绌，库藏空虚，欲减糜费而归撙节，必自汰冗员始。夫内外各员，其所谓枝官备位闲曹冷署者，屈指数之，实繁有徒。国家设官分职，原所以治民保国，使各有所职，而百事俱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自捐纳一开，而冗员愈众，候补拥挤，大员调剂维艰，势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廩禄之人，即多一股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偮国是之人。夫今之冗员，非犹古之散秩已也。所谓汰者，非必举高爵厚禄而尽行裁改也，亦使幸位之流，素餐之辈，无所托足耳。不然，徒耗俸糈，无所短长，朝廷安赖此人以累民病国哉！

冯氏曰：今冗员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什百。请得而备言之：

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仅三百余万石耳，曩年行漕运之时，所有漕米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皆可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三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而自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漕标除盐城、海州东海二营应酌留镇标外，余皆可裁，岁省廉俸、兵饷、工食约银数十万两。粮道一官，不过岁一临仓，贵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

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又验仓收米者，亦数十百人。如天庾正供招商承办，则海运委员均可裁撤，省费尤巨。

一、河务。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驯谨者，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其实，非抢险不使一钱。窃以为不如归并地方，俾专责成。河兵饱食而嬉，办工仍调民夫，毫无所用。运河既免挑浚，所设闸官、闸夫纵不全撤，亦可裁减大半。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所办责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监督税课更少，不如尽裁关差，归并地方官兼理。各海关道事颇清简，亦可裁撤，而以深识中外文字，长于核算道府班为正税务司，与洋人税务司分司其事，既可省费，又免漏卮。

一、盐务。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意。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出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主簿、巡检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一员为运使属官，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官，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亦皆可省。考总督、巡抚昉自前明，因事设官，事定则罢，中叶始为定额。国朝因之，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惟督抚权位相埒，和衷固不乏人，而同城者议论意见每多不协。同一事也，或此是而彼非；同一人也，或此好而彼恶。两姑之间难为妇，属吏亦几无所适从。应请将湖北、广东、福建、云南四巡抚裁并，而各以总督兼之，以一事权。盖大省则督兼抚，小省则抚兼督，岁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算。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设一员，所司之事，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各员，必宜量裁者也。

京官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应行裁减者。如东宫不设，安用官属？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今设员八十，不为不多，然半皆仗马寒蝉，曾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以内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许其言事，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

始非拾遗、补阙、询事、考言之一助也。他若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当大减。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事为两得。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至于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官亦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设督抚，官愈大则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

儒学一官，大县设教谕，小县设训导足矣，何必正、副兼设？府学诸生仍归诸县，府学教授可裁也。

迩来自厘局一开，所有捐班候补人员，悉举而纳之其中。故刘峴帅甫莅两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无实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领薪水，通计每年省费约三十余万金。今之局务可裁者尚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而论，皆理财之类，应归藩司所管。今则采办有局，支应有局，转运、牙厘又有局。即云藩司事繁责重，不暇兼顾，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至于保甲、清讼、巡防，本臬司之专责，郡县相与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县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门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班馆等事，每次至少十余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须分任于众人，不过捐员日众，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闲员。虽然，为闲员计则得矣，其如库款日绌何？要宜力加整顿，可裁则裁，可并则并，非特可省经费，并杜幸进之阶。

至于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禄。堂官则每署四员，而兼差者尤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极其繁琐。至于鬻爵，竟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

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通改授。知县以下分设功曹、刑曹、户曹，而亦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裁老弱之兵以加饷，汰闲冗之员以

加俸，何莫非节用之大端乎哉？

夫国家之蠹，中饱而已矣！冗员愈众，侵蚀愈多。一盐务计养闲员数百，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甚至持一荐书，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数十金。以一省计之，所费已属不资；以二十一行省计，所费愈觉无穷。应令各督抚查有此等人员，毋徇情面，一概屏黜。凡各省台、局事务减少者，归并兼办，挂名及差遣者，悉应裁撤，以除酬应虚糜之费。其京外各衙门丁书，亦宜一概逐去。役人专供奔走，不得与闻公事。如是则中饱之风自绝。且大官多，则取之于民也愈厚。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葺蕪者，节费尚其小焉者也！

刑政

律法

夫西国之法，犹能法古人明慎之心，苟能参酌而行之，实可以恤刑狱而致太平。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衰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使不返本寻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盛世之休风耶？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泰西有《律学大同》一书，为欧、美二州各国素所遵行，近数十年来又概从轻减，所以各有不同。日本维新后，刑律大旨改宗于法，而参以英、德。凡重刑九：曰死刑，以铤杀之；曰无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无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重惩役，入狱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惩役，但服役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曰重禁狱，不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禁狱，收禁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轻刑二：曰重禁棚，收入狱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谓也；曰轻禁棚，但收禁十一日以上，而不做工之谓也。加刑六：曰削去权柄；曰削去官位；曰停止权柄；曰禁止治产；曰监视收禁，以后再以人管束之之谓也；曰充公入官。此外尚有罚刑，自数十元至数元不等。惟我国尚守成法，有重无轻，故西人谓各国刑罚之惨，无有过于中国者。如不改革，与外国一律，则终不得列于教化之邦，为守礼之国，不能入万国公法，凡寓华西人不允归我国管理云。

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讼之为字，从言从

公，谓言于公庭，使众共闻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则问时要无打法。善夫何沃生律正之言云：两造之中，必有曲直。曲者宜罚，多此一打，是谓滥刑；直者求伸，被此一打，是谓枉法。使曲者不畏打，而故逞其凶，不挠之状，其情有似乎直；使直者畏打，而甘受其屈，战粟之状，其情有似乎曲。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则冤抑愈加；讼所以剖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则是非转昧。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则决乎不可。今夫言由心发者，情也；言多遁饰者，伪也。问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则谓之直可也；问官以公明断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则谓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无罪，用刑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不招，是谓刑非其罪。此理易明，人所同晓。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问官也。夫不信问官，岂独中国为然，即外国亦然。乃中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图塞责，而自此冤狱多矣。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而于是真情出矣。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问可对青天，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不询于众也，况健讼之流涛张为幻，狱成之后，虽问官亦不无自疑。则何如询谋佥同，輿情允洽之为愈也？

今宜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每遇重案，轮班赴署。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以及律师之辩驳。审毕，审官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视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以定从违。《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即西国公举议员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即西国陪员议判之意也。若夫人非险狠，则公堂对质每多啜嚅；人若奸顽，则虽三尺当前，犹能诡辨。使无律师以代申委曲，则审官每为所愚。中国之问官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娴，而所用之刑名幕友，又于律学不轻传授。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稍有依违，则官司之前程难保；若无贿赂，则在讼之受屈必多律之深文，例之繁重，皆胥吏所以便于上下其手也。非破其趋避之巧及舞弄之奸不可！案情百变，申详之成格牢不可破，以罪就律例，非按律例以定罪犯也。故谓律必改简明，例必废成格。则何如明张其词，按律辩论之为得也？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代为剖白，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至若刑者类夫秋之肃，犹赏者类夫春之温。故刑者，治天下之所不能无，然而中国繁

刑严法，未免失之于酷。特以刑莫重于死，缢首与斩首均死也，而肢体之全缺判焉。刑莫辱于搯，挥鞭与施杖均搯也，而受辱之轩轾攸分矣。故知弼教端在明刑。今欲明刑，须除苛法。试将刑之制约而计之，缢首致死，系狱苦工，监作官奴，罚缓赎罪，鞭捶示辱，充发出境。之数者，足以治轻重之罪而有余矣，毋或滥也。

至于通商交涉之件，则宜全依西例。今海禁大开，外国之人无处不至，凡属口岸无不通商，交涉之案无日无之。若仍执中国律例，则中外异法，必致齟齬。不如改用外国刑律，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且日本东瀛一小国耳，参用西律宪法，西人亦归审理，非其明验耶！又文武官有交涉者，须通晓英文，游历外国而归，方得重用。凡外国人俱准游历内地。其独重英文，是志在推广商务；其许入内地，则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何中国犹远不及日本哉？往者中国不肯改用西法，嫌其宽待狱囚耳。乃遇交涉之案，为外人则照外国之例而从宽，为华人反依中国之例而从猛。是华人之生于中国，反不及洋人之来自外邦也。然中外一体，为政无事偏私，但执公平，则无思不服。是故以德报怨，圣人不予；伤己徇物，贤哲所讥。况生于其地者，又有土著之利权，非外来者所能夺也。泰西国内都会，必由刑部派臬司以司鞠事。中国亦宜于中外通商之地，专设刑司以主中外上控之案。此其人必须深明中外律例，经考超等而多所历练者，方膺是选。其审案俾以陪员主判。如外国人有久居中国，行事和平者，可与中国人一律，得选为陪员。遇交涉之案，令其厕名主判，则外国人心必无不服。怀柔之道，其在斯乎！

归安沈粹生云：泰西狱甚合古法，不令下跪，欲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也。反是，则形格势禁，嚅嗫颠倒矣。不用刑讯，欲意论轻重，慎测浅深也。反是，则捶楚之下，冤抑实多矣。处以陪审，则记与众共之道也，而肆威夺货之弊祛。列以见证，则无简不听之意也，而妄指诬陷之弊除。然有未尽善者：律师代陈，无理者皆得矫饰中国讼棍亦然，虽是非难泯，亦竟有律师善辩，脱漏法网者中国讼棍、书吏之巧饰得漏网者更多。审案有费，无力者怯于控诉，虽曲者代纳，亦有曲者赤贫，仍责诸理直。且所定刑章失之太宽，易启作乱犯上之渐。法国乱首尔朗之罪，尽人皆知，以身充议员，迁延不问。败将伯沁之狱，历审日久，议论纷纭，仍从轻减。布国轮路受贿之案，以牵涉议员，不予追究。尤可异者，美国讼师奇笃手弑其总统，获系狱中，不加琅珰，挟刃逞凶，伤及狱卒。英国匪徒墨格林枪击其君主，虽未成伤，竟以巧言解脱，置之不问。岂因有别故？抑其君无道，咸欲弑之乎？然水懦民玩，致生乱阶。泰西一乡官辖境，狱

中之犯常及千人，少亦数百人。虽云细故，皆予禁锢，亦法律宽纵，有以致之欤？或谓中国不宜尽行西律，西律亦有未尽善者。当请外国上等有名大律师，中国老成有声望之申、韩幕友，再延深通律例之华人翻译，将彼此中西刑律会同参订，至公至当，为中西通商各口律例，分华、洋文刊布各埠。凡在通商口岸，所有交涉案件，皆准此编判断，无事刑求，以归一律。庶我民不至独受其亏，西人不得独蒙其利；并可徐图西旅归我有司管辖，以渐复我中国自有之权。此虽看似缓着，而实关系要害，宜汲汲图维也！

国朝初起东方，制刑宽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及世祖抚有中原，命大臣定律。当时议纂诸臣学识浅陋，未能仰体皇仁，因仍故明惨法。遂至斩决之上有凌迟，斩决之次有绞。凌迟极刑，非唐、虞、三代所有，岂宜行于盛世？绞之苦闻甚于斩，则名轻而实加重矣。闻西国决犯有击脑、闭气诸法。击脑者，用枪正对其脑，弹击可以立毙。闭气者，闭之小室，令新养气不得入，可以渐毙。皆远异斩、绞之惨。今宜除凌迟律，犯此者改为斩决。除绞律，犯此者改用西国击脑、闭气法决之。并除父母、兄弟、妻子连坐律，以仰体列圣仁慈之隐，继其未及改定之志。则三代后未有之仁政，自我朝开之，亿万年不拔之基在是矣。至今法审犯，必取其招供为凭，致问官动用非刑逼招，痛昏之下，何求不得？若已确知其情，又焉用招？宜除取招供例，无论轻重案件，但令问官详查细审，求情定罪。除笞、杖、枷及责掌、责嘴之件外，其余一切刑具，及各衙门自制私刑，着悉行烧毁，示永不复用。内外掌刑官，及非掌刑官，敢有私藏旧刑具，或私制新刑具者，斩立决。此亦除惨之一大端也！

狱囚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痛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享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流入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牵。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军、流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痠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

近闻各直省州县，多设有自新所，以处轻犯，法诚善矣。倘更能参用西法以推广之，使军、流以下皆得自新自赎，则保全必多，办理亦易。全政体而广积阴功，当亦仁人所深许也。

以西例较之中国，虽法有轻重，律有宽严，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今日刑书之阙考。西国罪犯工作亦有数等：有狱中之工，有狱外之工。狱外之工，男则制造百货，女则纺织、刺绣等事。凡一犯入狱，皆须习学一业。素有业者，即于狱中执其本业。所获工资，半给犯人私用，半归狱中公用。其有禁拘暗室，独作无用之苦工者，则罪情重大，务以劳苦之而已。狱外之工，如建炮台、筑监狱、开荒地，皆可由狱官监督而为之。如汉时城旦、鬼薪之类，古意之未尽亡也，实本于《周礼》。而推究其原，《周礼》以圜土聚教罢民。圜土，狱城也，有罪者人之，令其工作，俟其能改而舍之。夫莠民犯法，半迫饥寒，拘禁而生理益穷，释放而依然赤手，欲须臾缓死，必故态复萌。若不预为代筹，罪满仍无生路。故西人之治狱也，谋杀、叛逆则缢杀之，余多罚鍰。无力罚缴，则系于狱，与凡已定军、流等犯，依律所限年份，稽其工作，如捆屨、织席等事。其有素习工艺者，使各理旧业；顽蠢罪重者，则充一切卑贱劳苦之役，如除秽、砌路、修桥、筑垒之类。皆酌给辛工，派董经理，所食每日足敷糊口，留其所余，于罚满发放日，按名计数发给，俾得谋生。始治以应得之罪，给予以迁善之资。谁无天良，能不激励？至于牢狱拘禁之所，葺其房屋，勤其扫除，不使湿蒸破漏，以免受病而便作工。更设有浴室、病馆，使医士掌之，地方清洁，饮食适口，其曲体人情若此。

或谓中国罪犯险诈，监狱辽阔，严为防范，尚虑脱逃，安能仿行西法乎？不知泰西犯人在内执业，仍高其墉垣，严其约束；即在外为工者，亦伍耦有数，出入有节，稽查督责，健役相随。但于法外施仁，原不因仁废法，正无庸鳃鳃过虑也。

更有一法，可以上下交益者，如令罪犯修治道途是已。今中国道途崎岖破碎，多未兴修。就近者言之，则一邑有一邑应修之路，一郡有一郡应修之路。就远者言之，则津京一带为南北孔道通衢，官宦、绅商、士庶必由之路，乃或凸或凹，或窄或斜，平日两马一车已极迟缓，一遇霖雨，则道途泞滑，时有倾覆之虞。诚谕令地方官各按所辖地段，遣令流、徒各犯兴修，酌给微资，代为收存，俟罪满之时发给，俾日后得以作本谋生。则必不致恣意妄为，复罹法网，而从此周道坦坦，履险如夷矣。惟修路宜仿西法，西人修路下皆平铺石块为基，或立或侧，或阔或狭，再以碎石及泥土平敷其上，用人、马、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压之愈重，则路愈坚平。其路中高旁低，可免积水，广阔以五尺为率，而城市繁庶之处，则有阔至二三丈、四五丈者。要皆平整坚固，所用之石以文理细密、质刚性韧者为佳。中国可用砂石、花岗石、青石，质虽不硬而性粘，其屑末著水与灰同功，用以铺路，亦为合用。所铺之石厚至六寸或一尺，极重之车，悉可通行无阻。

今果仿其法而行之，不惟无反无侧，正直荡平，并使各处狱囚练其筋力，调其气血，励其精神，不致常处覆盆，易生疾病，岂非一举而两得者耶！

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凡被人控告无钱清还者，虽贵如总统，亦可将其存欠帐目呈官报穷，摊数了结。如其所报帐目不符，查确有钱银寄顿别处实据者，即治以棍骗人财之罪。若不报穷，论欠数之多寡，定监期之短长。大抵至多监禁一年而已。其伙食银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狱。倘逾期一日不送，狱官即将监禁者释放。或有不愿食监中之伙食者，准其在外自办，早晚送入。

凡犯钱债案者，皆同居一处，与犯别罪之人不得同处。其屋宇宽敞，楼窗高朗。每人铁床一张，毡褥、被单、棉枕，无不洁净齐整，按七日一换。任人互相过谈，看书、写字、作文，惟不许高声大叫耳。正副司狱必每日到处一巡，如有地方不洁等物，当飭洗刷，若有病即飭送官医调理。病人各居一室。按月官、绅士数人，随同正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有巡丁勒索等情，准其告诉绅士，交狱官审办也。

我国如重商务，钱债与别案，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

罚赎

《吕刑》一篇，论者以为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为此权宜之术，以敛民财。今读其书，千载下犹见其哀矜惻怛之意。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所以示万世之治法也，存《吕刑》于训、诰、典、谟之后，独非诏后王哉！蒙窃谓虽行之百世而无害也。秦、汉以还，议刑名者或增、或减，代有更革。金作赎刑，其废也盖已久矣。太史公当被官刑，以家贫不能自赎。是汉世犹有此风。后此斯少见矣。圣清因明律而损益之，实不外《唐律》十二篇之准则。五刑有赎，仁至义尽之规也，而罚鍰之法，乃未闻敷诸奏议，见诸施行者，或恐纵富人之恶，长贿赂之奸，而屈抑小民贫乏者之冤狱故也。

今西人杂处中华，刑法此重彼轻，罚鍰此无彼有，宽刻相形，轻重悬绝，未免易生下民咨怨之心，而交涉案件，亦每失其平准。《老子》曰：“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盱衡中外，似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也。况踵其法而行之，有清讼源之道焉；进一解以参之，又得澄叙官方之道焉。

夫天生烝民，资财以生，故相依若性命。词讼之兴，发端于财者十有八九，若详定罚缓一章，于五刑准赎而外，讼而虚者议罚若干。其半入官帑，半归讼直之人。则始也以财肇讼，终反以讼伤财。稍知顾忌者，有敢轻蹈法网，健讼不休者乎？即梗顽之辈，既有议罚之条，或亦重命惜财，而弗敢轻肆其刁诈。且越礼藐法、欺压良善者，多在巨室富豪，今罚减曲者之富，以济直者之贫，则均平之道得也。矧人之爱货财，往往重于惜名命，刑辱之不耻，笞撻之不畏，而独至令其解贪囊、舍阿堵，则较之剜肉断脰，弥深痛惜追悔。是罚款之严，尤甚于桁杨刀锯之猛也。而顾必谓其有抑冤长恶之患，蒙殊不信其然也。

或者难曰：吏治之坏，于今斯极。罚缓之法诚妙，恐适以饱贪黷之私囊，富者更易邀幸免。不知朝廷立法，百官奉行，枉法贪贿，亦自有三尺法在。是又贵能察吏耳。若吏不奉法，即无罚缓明条，富厚者亦何尝不屡以贿免也？今请更进一解焉，讼曲罚缓，讼直分缓固矣。若官吏上下其手，以直为曲、枉实为虚者，则准令含冤受罚者，得以赴控上官，遣良吏能员详查复审，询诸公论，断以舆评。若申明原审官贪贿枉法，即用其屈罚人者，而什百其倍以罚之，除给还屈罚款外，余尽入官。其富户行贿者，则亦照其贿赂之数而什百倍罚之，悉数入官。有司之爱钱重于惜名命，亦何莫非富人类也！斥逐之不羞，除名之不惧者，至一旦迫发其私囊，将欲遗子孙、购姬妾、起园亭、为娱老资者，俄顷化为乌有，其痛恨悔惜之情，将有不可胜言，或因而有沟渎自裁者。是大计参劾之严，断不敌破吝惩贪之术妙也。摘录镜存子《治标庸言》曰：“际此国用窘迫，岂无输忱报效者？如光绪三年，前署两广总督刘坤一于兼署粤海关监督后，自陈居官岁久，请以廉俸所余，捐交银十五万两。奉旨：‘刘坤一捐输巨款，为储养人才之用，定能公而忘私，力顾大局，殊堪嘉尚。’光绪九年，前大学士文煜明白回奏：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奉旨：‘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又曾带勇之记名提督刘维楨，于三数年间报效海防军饷，及鄂省购设机器、制造、枪炮局厂等经费银四十万两。近年顺直灾，亦有司、道、府、县捐银万两者，不一其人。以各直省现任暨优游在籍者，咸如刘坤一、刘维楨，则众擎易举，千百万巨款不待呼助，争相报效，理固宜然”。夫孰敢轻置此网哉？故曰进一解焉，又默寓澄叙官方之微意也。然则罚缓是矣。

罚缓之条目将何如？则拟请伤下廷官、大理、三法司，会同妥议，参以《周官》束矢、钧金之例。除人命必抵外，刊布定章，示罚于无讼之始，谕罚于方讼之初。澈定之后，曲者、虚者，户婚之罚几何，田土之罚几何，斗殴之罚几何，诈骗之罚几何，奸情之罚几何，拐窃之罚几何，债务之罚几何，一切不应为而为杂犯之罚又几何无资可罚者，即照篇中前论充当苦工。准事犯之轻重，制罚款之差等。毋或偏，毋或贷，上控复审，仍虚、曲者倍罚之。

州县之罚案，月造报册，上之藩臬两司。臬司专主勘核案情，藩司则每季按册征提罚款存库。另款存储，以为教养民生、兴举各善政经费。取之于民者，仍还于吾民，国家与官吏莫之或私。且教养诸善政具举后，受罚者亦与蒙其美利焉！斯补偏救弊之方，即大公无我之治也。何病之有？

至如败军失律之将领，贪墨被劾之大僚，与寻常罪犯有别，是又宜斟酌轻重，分别惩办者。我国家自有权衡，非草茅所敢妄拟也。

禁烟上

天祸中国，使士不能食旧德，农不能服先畴，工不能守矩矱，商不能勤懋迁，其洋烟乎？自嘉庆季年以迄于今，每岁有增而无减。顾烟之为害深矣，禁烟之议亦夥矣。始也操之过急，继又失之过宽，遂使痼疾缠绵，充塞宇宙，败坏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日也。

当议和定约之时，若能坚持前议，商埠可开，兵费可增，而鸦片必不许入境，当亦唯命是从。何则？彼时出产无多，运售中国者，岁不过二千余石，彼固易于改图也。吸食尚少，各省仿种者未致蔓延，我亦易于查禁也。此机一失，吸食日众，贩运日多，遂为进口大宗之巨款。查洋烟先到香港，转达各口，岁计约大土五万箱，小土四万箱。其金花土及在新加坡等处华人所销者，不在数内，岁约十万箱以为常。每箱价约五百余两，除关税捐款外，洋商约得四百两左右，统计每岁出口银四千万两。今直省相率仿种，甚至川、黔全境皆是，岁约十二万箱，箱重百二十斤，合计烟土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折算，实每人日食四钱七分零，当得四千四百万人。而佣工小贩之依此为生者约十之一。其余自种自吸者，或相倍蓰。年年坐困于此，犯法伤生，废时失业者，不下千百万人。于是中国之智士，莫不痛悔从前之失计，而思有以禁绝之。

尝考日本与英国立约，鸦片土不得入境，例止三斤以配药之需。如违约，关口拿获全数充公，或竟抛弃于海。有闯关者，每斤鸦片罚洋十五元。我国亦宜设法严禁吸食，并仿日本条约，请各国劝英国一律行之。况英国好义之士，亦深以流毒中国违背公法为耻，立会议禁英国禁烟会董事亚力山打，自伦敦来游印度、中国，查探洋烟是否有害华人，曾偕广学会董李提摩太、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到招商局与余一谈，问有无良策。余即将所拟禁烟论告之，谒我公臣，陈说利害。而英之政府终迟疑不决者，盖数十年来恃此以致富强，而本国煤铁矿产之饶，渐非昔比，印度兵饷

赖此支持。苟我能借箸代筹，使无大损，则彼亦何乐而不为也？然即禁洋土之来，而不能禁内地之种，亦非正本清源之法也。

夫每岁四千余万金之漏卮，千万余口之鴆毒，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迄今痼疾日深，疗救猝难奏效；症候多变，换方亦少成功。闻印度岁出鸦片烟，英国官为之经理，招商贩运，以时消息之。我中国不禁则已，苟欲禁矣，即宜破除成见，不分内外，一体严禁。

欲内禁必先外禁，不妨招商集股创设公司。吴瀚涛大令曾偕马观察奉檄赴印度，与英督商办此事，再三辩论，始允将印度所出之鸦片，尽归我华商公司承办，逐年递减，以五十载为限，即行截止。惜总署批驳，谓招商承办，明设公司，殊于国体有碍，而此议遂停。天下有心人均为之叹息。独不思广东筹防捐，炮台捐，闹姓赌捐，皆系招商承办者乎？果能与印督商办，并可责其担保，如有偷捐，从重罚赔，省内地无数缉私经费，五十年后，烟不禁而自绝矣。便孰便于此者！

至民间吸食，亦宜逐渐严禁，以绝萌芽。内禁之法有二：

一曰定期限。由各处地方官出示晓谕吸烟之人，限四个月内一律报明，报后以一年为限，一体戒绝。如逾限未成，官则削职，士则褫衿，吏则革役，商则罚鍰，兵则除名，一切下等之人则治其罪。既经严办，仍予半年展限，改过自新。倘再届期不改，立发边远充军，以儆效尤而除积弊。风行雷厉，孰复甘蹈刑章哉？然而立法虽善，奉行尤在得人。否则，适启官府之苛求，吏役之需索，捕快地棍之讹诈，鱼肉乡愚，欺压良懦，而于禁烟之事，仍无实效可观耳。此急以取之之法也。

二曰编籍贯。通飭天下，将食烟人户逐一查明，无论官、商、军、民，编成烟籍，谓之烟民，照差役例，不准应试，不准当兵，不准捐纳职衔，不准充当绅士，平民不准与婚。其有秀才、举人、进士词林及现任官，已吸烟者限三年戒清，由族长或同乡官具禀地方官，注销烟籍之名。如逾限尚未戒清，立即革职，不稍宽假。如此明示区别，严定科条，一挂烟籍，即不得侪伍平民。庶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妻勉其夫，既吸者将痛改前非，未吸者亦不敢再沾陋习。是乃攻心之法，王道之功，较之势迫刑驱，徒滋纷扰者，大不同矣。此缓以治之之法也。

然而草偃必风行，上行则下效。要必政府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部寺；京朝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外省；疆臣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僚属；将帅左右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弁兵；现任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候补；幕府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师儒；

职官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士庶；胥役无吸食之人，然后可禁平民。故欲禁烟，必自上始。若为上者及烟，而欲禁群下之不吸，虽朝申一令焉曰禁烟馆，暮申一令焉曰禁土栈，而民将嗤嗤然笑之以鼻也。呜呼！如是而曰禁，何惑乎终不能禁？

泰西烟酒之税最重，至有值百抽六十者。夫以中国人民四百兆论，即有不嗜烟酒者，牵扯合算，每人日费烟酒三文，一日需钱二百二十万缗，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即需钱四万三千二百万缗。倘援古人什一之法，以征其税，通盘筹算，一岁可得四千余万缗。且所加之数，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以每斤每两节节摊匀，渐渐加贵，在吸食者不觉，而国家得此饷源，当亦不无裨益。然此犹不过就中国之烟酒言也。若外洋进口之烟酒，亦宜加重其税，如纸烟、雪茄烟、麦酒、葡萄酒之类，当通商立约时，以为西人食物，例不征税，嗣因西人之寓华者众，而洋酒之进口日多，于是稍加捐税。查今通商则内载：进口洋酒装玻璃瓶，大者每百瓶输税银一两，小者每百瓶输银五钱，其装桶则每百斤输银五钱。至外国烟，则并无进口税。然查洋酒之贵者，每百瓶价值洋三四百元不等，而收税止银一两，于值百抽五之例，未免相去太远。若烟则非特西人嗜吸，即华人与彼族往来，亦不免沾染习气，以外国烟携带轻便，而吸者渐多。今中国政府若遇修约之期，据理直争，使二物亦照值百抽五完纳，一岁税项，当亦颇巨。

顾或谓加中国之税，其权在我；加外国之税，其权在彼。洋人以钱财为性命，此说恐不能行。则尚有一妙法在。如鸦片为进口大宗，今已厘税并征，每箱收银一百十两，核与英国常税值百抽二十之数相等，似无可再加。然可照香港、西贡、新嘉坡例，俟其熬膏后再议抽厘，设官膏局于通商口岸，招商承充，认定缴数，准其将生土熬成熟膏，分运各处销售。凡嗜鸦片者，只准买熟膏吸食，不许购生土自煎，违者律以私铸之罪。如是，则洋土可全数归公，私土并无处可买，而中国各省所出之土药，亦照此法办理，则岁赢银钱，何止数百万！

闻官膏之例，西贡最严，虽为数一二钱，亦必给以凭印纸据。每日按户稽查，必使所吸烟数与凭印纸据相符，方得无事。否则有罚。凡入境商贾，有私带烟膏者，不但充公，并议罚鍰。闻近日新旧金山、香港、南洋各埠，亦有是例。每岁输饷多者百余万，少者亦数十万。今中国若行此法，以生土熬成熟膏，犹以洋货变成华货，权自我操，利不外散，虽英廷不得挠我自主。况鸦片系害民之物，虽横征暴敛，亦不为苛，与治乱民用重典之意相同，又谁得议其后哉？

禁烟下

《易》曰：“履霜坚冰至。”戒其渐也。盖当事机初萌，挽回原易；及乎积重难返，则虽有圣哲，亦将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天下事大抵然矣。禁烟之策，固今日所宜行，然而立法尤贵得人，无人不得行法，言之似易，而行之实难。欲筹简易之方，则不必议禁于今兹，而徐图禁之于日后。且使漏卮不致外溢，西贾不能居奇，莫如广种罌粟之一法也。

顾或犹不能无疑者，谓种者既多，吸者必广，举世皆入陷阱，他日安有禁绝之时？其害一。中国人口繁庶，若准种罌粟，小民必相率效尤，弃嘉禾而植毒草，不特粮食日贵，一遇荒歉，何以堪之？其害二。洋药流毒，几遍天下，然犹曰来自外洋也；今弛禁自种，其价渐低，人人喜吸，使声明文物之国，转为烟熏雾塞之区，大伤国体。其害三。印度之烟土其味厚，中国自造质味既薄，搀杂尤多，以伪乱真，何能与洋药相敌？其害四。今人喜吸洋土，然内地少而海疆多，自种既多，反使洋药不能到之地，土药起而乘之，是不啻添薪而助焰也。其害五。印度种烟，有种植法，有刮浆法，有砖制法，中国既不谙其法，必不及其佳，徒增一害人之物，何能塞洋药之源乎？其害六。洋药税厘并征，日有起色，每岁收数至八百余万；土药盛行，洋药锐减，收数必疲，于国课不无窒碍。其害七。此数害者，骤而听之，似皆可虞；切而按之，则皆不明时势者也。

夫洋药之所由不能禁者，半以英人阻挠耳。今自种罌粟以杜来源，英人岂能责问？且洋药味厚，土药味薄，厚则瘾重，薄则瘾轻，重则难禁，轻则易戒，此自然之理也。他日土药日多，洋药日少，英人自顾获利无几，徒招与国讥评，必将与中国会商禁烟，以博高名而洗前耻。日前禁贩黑奴，英人不惮费千万金钱以成义举，何独于禁烟之事而疑之？其不必虑者一也。

种田粪壅多费人工，一夫之力不逾二亩，而一亩罌粟可抵十亩稻粱。农民可以余资转购粮食，如西贡、暹罗一岁三熟，今闽、粤等处多贩运其米。苟铁路已成，轮船、火车水陆飞挽，乞余邻境，速于置邮，但使小民有买米之钱，何虑地球无买米之处？其不必虑者二也。

土药价值虽廉，较他物犹昂十倍，吸不吸自关天性，岂以贵贱而分？况吸之与种，其有伤国体均也，何如姑纵之，而他日尚有可

禁之望也。其不必虑者三也。

天下有用之物，恐其搀杂以致害人。若烟固害人之物也，惟恐其不搀伪，愈伪则其毒愈轻，愈轻则其瘾愈薄，其价愈贱。人贪省费，积弊渐以挽回。其不必虑者四也。

自云土、川土、西土、关东土，及鄂、皖、江、浙之土盛行，藉分洋药之种；而清江、汉口以上，更赖土浆御诸门外。否则，洋药毒如水银，无孔不入，内地元气剥削尽矣。所憾者未得印度秘制之法耳。将来大弛禁令，广种而精制之，不出十年，利权可以尽复。其不必虑者五矣。

印度种烟制浆之书，栽花结实，取胶拔本，莫不有法。本年所收之浆，必待隔年出售，气味乃厚。如派人学制，复储一年，则物美价廉，争先乐购，畴复办洋土哉？欲塞洋药之源，莫善于此。其不必虑者六矣。

至如第七害，固非害也。洋药之税厘入于中国者日旺，即中国之金银流于外洋者日多。若恋区区税厘，而忍听斯民之腴削，是犹鬻产于人，而扣其中资小费，谓然自鸣得意，有不贻识者讪笑乎？况乎洋药照约征税，土浆亦可加征，何必胶柱刻舟，鳃鳃过计？其不必虑者七矣。

总而论之，以为罌粟不当种者，皆务祖英人者也，皆欲贫中国者也。各关税务司，或谓阴为中国，阴助西人，故税厘并征之第一年，入口洋药之数短至四千箱左右。赫德皇皇然条呈总署，请加抽土药厘金，数年以来，土药加增，洋药复有起色，其孳孳为利，并无竭诚中国之心，亦略可见矣。于此有三策焉：无论洋药、土药，严定期限，一律申禁，中外之吸食者，绳以重法，一体戒除，策之上也。广种土药，以杜洋药之来源，目前既塞漏卮，日后徐申厉禁，策之中也。既不能禁洋药之来，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吸者、种者，洋药、土药，一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惟图多收税厘，稍济然眉之急用，是为下策。所谓止沸扬汤，抱薪救火者耳。公忠体国之君子，其将何去而何从乎？

戒烟方药颇多，惟不费钱而又简捷者，乃李云山所传之方。据云：假如烟瘾三钱，分三次而食者，则未食烟之前，先食盐汤一茶盅，约食盐二钱，不宜太多，每日减烟二分。以三钱烟瘾计之，四十五天可戒绝矣。

尝考土耳其受神豆汤之祝，较中国受鸦片之祸尤烈。当百年前，南极南冰洋产一种小黑豆，名曰冰豆，土人煎取其汁以代茶，其味嗅之颇腥，饮之却甘。犹太人游历至其地，撷而给病者服之，病立

愈，然愈后即成癮，几于不可一日无。服之愈久，其体愈弱。国家知其有损，严行禁止，惟药肆中准存些少，必俟购者觅有保人方许出售。犹太人知其地已禁，改而运往他国，亦率闭关不纳。及运至土耳其，适国中瘟疫盛行，服此者皆立效，好事者因锡以嘉名曰神豆，其价遂因而翔贵。民间无论男女，嗜此者几至十分之二。迨数十年后，虽无病者亦甘之如饴。偶向街市游行，必腰佩神豆一小罐，居家客座中，必列神豆几瓶，豆汤几碗，煮豆器一分，一若不如是不足以示豪富也者。客至，有不饮主人家所备豆汤，而取自佩者饮之。市廛设有豆汤局、神豆馆，各种豆瓶汤罐，每枚有价值银饼数十元者，杂嵌金银珠宝象牙，甚为美丽。斯时人民之被神豆所害者，多至十之五六。神豆每两值一元，豆汤每两贵至一元而二三元，由是富贵者忽焉贫贱，贫贱者至于流亡。国家虽每年增入神豆税数万金，而所得究不偿所失。久之而上自官僚，下逮兵勇，亦无不嗜此。每至阅伍之期，时刻不齐，队伍不整。有明理者面斥犹太人不仁，犹太人曰：“凡人谋生，总以获利为重。贵国人如不嗜此豆，则我等自然无法运售矣。”明理人不能答。直至数十年之后，有贤王名亮连者即位，始谕令朝臣会议禁饮豆汤之法。有言禁止彼国贩卖者，有言本国应自往收买者，而绝无一人言及禁止。盖当时不惟王家子弟嗜此，即秉钧各大臣，亦无不饮之成癖，故朝臣多畏而不敢言也。王意已决，乃不待议成，即手书严例八条，誓必禁绝。各处建造戒豆院，限六阅月一律告成。官治戒豆药材，雇用男女婢仆，制备床榻、器具、饮食、水火，下令各地方禀报饮神豆汤人数，无论官民，有妄报及知而隐匿不报者斩。自入院戒除后，各处神豆局及器皿铺一律禁止。再有出售者，经官查出，货物入官，人则严行治罪。戒豆之人入院调治一个半月，放出后，仍不自愧而饮豆汤者，经官收入，再为疗治。愈后官则革职，永不叙用，民则发往边境做苦工，妇女下狱，半年再犯，则一律斩首。此令一下，一年之后，通国男女之饮神豆汤者，绝无一人，而犹太人之贩运神豆者，可不禁而自绝矣。夫土耳其曾以鸦片害人，而在己先受害于神豆，犹幸其主能力图整顿，国中大患得以顷刻洗除。奈何我堂堂大一统之中华，而禁令难申，竟出土耳其之下哉！

盗工(甲午后续)

三代而下，刑厝之风一见于汉孝文之朝，再见于唐太宗之世。除肉刑，纵死囚，仁政近古，犹有下车泣罪之遗。乃后世或訾议之，不知仁民爱物，皆自神武不杀之一念中来，非尽属好名之举也。又何必沾沾焉遵亡秦苛暴之律令，方可大畏民志哉？历览古今罹大辟者，惟盗为多。周、秦以还，盗之为患不可胜数，小则肘腋掘藏，大且乱民窃国。张角、黄巢，其尤显著者也。夫盗而至于肇乱，则不能不芟夷之，歼戮之，以昭一世炯戒。独是此作奸犯科之徒，本皆吾苍生赤子也。有饥寒之盗，有驱迫之盗，有黠警之盗，有胁从之盗。妻号儿啼，谁则甘之？刑驱势迫，谁则安之？黠警之徒，失所则梗教化，因才可效驰驱。胁从之类，受匪诱则为匪，经德化则复为良。《传》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良非无术以处此也。考《尚书》有“金作赎刑”，此既详于《罚鍰》篇矣。又曰：“省灾肆赦，怙终贼刑。”盖民能迁善，亦未尝不可宥之三也。秦时有以徒役罚罪人者。九江王英布，故骊山之黠徒也。汉时有城旦、鬼薪之类，皆以处夫有罪不可赦，而又无金自赎者，则罚作苦工以代之。各国鞫囚或驱以修桥、整路，或令各执一艺。俄则将罪犯载于边境，开疆辟土以实边防。有益于公而不戕其命，两益之善政也。

今日海禁大开，华民赴南洋及出洋工作者不可胜数，虽英、美近有禁止华工之例，然如南亚墨利加一大洲，则有墨西哥、巴拉马、秘鲁、古巴、巴西各民主之国，在需人垦荒辟土，招工之举有加无已。粤东及南洋各埠，业贩卖猪仔者，仍复市利其间，驱诱善良，远适异域。前者物故，后者继往，官禁虽厉，诱贩自如，为害良民，诚非浅鲜。与其禁之不绝，何如转移而变通之？官为经理，舍良民而滴匪徒，则善者可保生全，而恶者可加惩创也。

今拟请举同治五年所立英、法招工二十四款，光绪三年所立日斯巴尼亚招工十六款，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申议，明定妥细章程。自后凡各国，不问有约无约之邦，但有招工之役，可先由公使咨会总署其无约之国，亦可请有约之大国公使代达。总署分咨各省，各该省行下各道、府、厅、州、县，将所有谳定各盗案之犯，除下手刃杀事主之一人必须抵偿外，余皆解赴各海口，交外洋招工总理之人点验，装赴外洋。酌定做工年限，每名取回工价银若干两，交还该盗犯家属以为赡养。是则法外施仁，该盗当无不感激甘心者也。夫以中国不

胜诛之盗，充外洋群欲招之工，群盗得其生，中国去其害，而贩卖良善懦弱之风，亦不禁而自戢。斯一举而三善备焉。此古圣王分背三苗，诛除四凶，投诸四夷以御魑魅之成法也。《传》曰：“唯仁人放流之”，“不与同中国”。亦即此义也欤！

革弊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与弊如影之随形。惟善用者，则弊亦利；不善用者，虽利亦弊。所谓为政贵得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者，此也。慨自礼教衰微，人心陷溺，上下、内外、大小一切往来，惟利是尚。有事至公庭，未有不索贿赂、行苞苴者。诚如冯氏《抗议》曰：今天下利而已矣！百弊丛生，皆由于此。

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庠序，宜守卧碑。乃幸得一衿，即尔作横乡曲，鱼肉良善，抗粮不究，结党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与差役朋比为奸。差役恃为护符，张其牙爪，联作腹心。有利则瓜分，藉以讹诈乡愚。聚赌抽头，视为常事。浸假而为举人焉，浸假而为进士焉，所作所为，亦复如是。名分愈高，声势愈大，贪吻亦愈张。动恃其律例之熟，笔锋之利，颠倒是非。士为四民之表率，今若是，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革之之道奈何？则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杀之而已矣。非过苛也，当纪纲废弛，非用重典不足以申国法。杀一以儆百，士风庶几稍肃乎！其次则褫其衣领，永不许登士籍。

一、官员之弊。今之大小官员，其出仕也，岂为朝廷乎？为一己耳。每得一官，惟量阙分之肥瘠，计班资之崇卑，每岁可获利若干。抚字则拙，催科则勤，明目张胆以号于人曰：“好官不过多得钱耳！”甚至与丁书、胥役互相狼狈，倚为耳目，托为股肱、心膂。为上者且如此，为下之势更肆矣，民其聊生乎！何法以处之？亦惟轻者斥，重者戮而已矣。

一、吏胥之弊。贱等于奴隶，而权驾乎公卿，流品甚杂，心术最坏，良由积习使然，莫之能返也。江苏州县、漕书，阍人得持其短长，所设关书徒以供侵蚀。其阙可纳资为之，传之子孙。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权势之盛，莫盛于今日。衣冠中无耻之徒，且与之往来要结。每有事，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推而上之，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犹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权直出宰辅大臣之上。

究其所谓不可者，为索取部费地耳。上下其手，得失系乎一字。利之所在，其弊如此。今计每部不下数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疾驰旁午，犴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计吏、兵、户、工四部，岁不下千数百万。

其次则曰差役之弊。差役素无工食，专倚民讼以为生。一县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数百人。有十总，有六十总。魁其党者曰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此外所有图甲、庄书，皆适以迫呼扰民。今计外省衙门人数之众，莫可究诘，婪赃更多，不啻千万。究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杀者一而养之者百，则惟有永易其人。内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与闻政事；外官可并其事于幕，名之曰幕职，可以为入仕之途，重其责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贪墨败名。夫吏之得以弄权，其弊皆由于则例之繁，得以任其比附，惟吏挟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循至于天下大乱。胡文忠谓：大清之律可以恪守，大清之例不能胜读。盖早慨乎言之。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而流弊之极至如此。其条目繁多，细如牛毛，徒足为吏胥舞弊之具。选人万不得已，一切以欺应之。国家设例本以防欺，今乃适以导欺，甚且逼之使出于欺，岂不异哉？今欲革其弊，莫如悉索旧例，付之一炬，但取明白简易者数万言足矣！旧例既废，重颁新例。凡事以简驭之。一事两可者，长官断之以理足矣。必约束以无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慎孰甚焉！

一、杜漕粮浮收之弊。今之《赋役全书》款项繁多，名目猥琐，分合杂糅，莫悉其每亩征税之数。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主于大目通晓。吏即欲舞弊，已自无权。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揭之大堂，俾众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征信录》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有不符，许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绝风清者，未之有也！

一、杜赋税不均之弊。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欲正经界，须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吴田一亩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谓南方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今拟先绘图，然后明定亩数。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按亩均收，自泯偏颇，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贻累矣。

一、徭役差费之弊。内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历经督抚奏疏言之矣。海疆各省差役之贳骇人听闻，不论有理无理，原告被

告，做禀有费，代书有费，入禀有费，差役有费，甚至被劫者投禀被押，候批准勘验而后释放，复索勘验夫马费。既受拘押之若，又耗许多费用，鲜有破案人赃并获者。故广东被劫之家，多不禀追，劫盗之风益炽。闻广州府各县劫案，岁有数百起，殊可慨也。查欧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无费，惟大案有公堂费，归输者出，如输者无力，归胜者垫。无中国衙门费用之多，鲜有因讼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者。宜参酌除之。

一曰州县亏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贡物勒索之弊宜蠲也。天下之害，大抵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以至于蠹国而病民。凡事一经官吏之手，无不浮开价值，横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虽洋关办事之认真，亦有弊。各商谓轮船码头验货，洋人杆子手与秤手通同作弊。如有请验之货，有贿即放行，无贿必为留难阻滞。洋关之听差与报关行，亦通同作弊。报关者短报斤两，少付水脚，轮船行欲吊卷查看，皆为听差所搁，或埋没也。西报谓中国弊政颇多，莫甚于八股取士，闾人作宦，女子裹足，为各国所无，至今未除，甚以为奇。即一极琐屑事，亦必欺罔贿赂，无所不至，则大者、远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问乎！宜亟变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则幸甚矣！

卷四 户政

税则

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于五两。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迨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厘捐最旺时，岁收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五百万，取于商者甚微，益于国者甚大，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增子税之条。查初办厘捐时，洋人之货亦在各子口征课，尚无异说。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半税单为凭，无论运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征。其无半税单者，逢关过卡照例纳税抽厘。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论厘捐之轻重，纳报费

之多少，托其出名认为己货如洋人亏空，凡代华商报关之货不能控追，及代华人出名在租界所买之地，亦弄假成真矣，洋商坐收其利。有代华商领子口半税单者，有洋商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无厘捐；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手则无厘捐，在华人手则纳厘捐，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独谤张为幻，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利权，于国体亦大有碍也。查香港、澳门无征收厘捐之例，商贾多乐出其途。

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所借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或虑西人不允，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准其随时自行更变，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况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说甚明。其二节云：“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理折之也。

尝考泰西各国税额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其税必轻，或免税，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其税必重，以其糜费于无用之地，欲民间恶而绝之。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鴉片之类，不准入口。至于税则随各国自定，而他国不能置议，欲增则增之，欲禁则禁之，以其货为内政而不妨由己订也，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亦有全不征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段：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搪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烛、烟丝、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各物进口皆准免税。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日本税关皆用土人，凡船用家用烟、酒等物，照例纳税。往时出口税重，进口税轻，出口货少，进口货多，今则反是。凡所需外来之物，皆仿西法自行制造，且免税或减税出口，使商务日旺，进款日多。我国无业者众，更宜设法仿行。又查日本来往货物，必须尽由海关码头上栈，验税后方可放行，不准另设码头。内地凡租界、巡捕房，亦归日本人经理，其猎狗、猎枪、猎地仿外国例，皆有税纳云。

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珠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虽加数倍亦不为过查旱烟、水烟、皮丝、净丝、黄条、青条，各种岁销数十万箱，亦可谓巨矣，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进口则加重，庶己货可以畅行，而来货自形壅滞，然恐一时难于办到，则加重入口税，减轻出口税，似宜并行者也。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

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

税恒从轻查出口茶虽至粗者每百斤价值十两，亦须纳正半税关秤银三两七钱五分，连所抽厘捐，是值十抽五矣！进口货至贵者，例不过每百抽五，有失利权，大损国体，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国君须保百姓利权，不为外人所夺，庶免生计日绌。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也。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

当日海禁初开，华人不谙商务，一切船只之进出，货物之稽征，皆委洋人经理，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前上海英领事麦华陀云：今之赫总税司虽不负中朝之任使，第信之过深，于征税之余，复令经画沿海之灯塔、炮台，赛会事宜亦责其派人总理。在赫德感深知遇，原无挟持之隐、侵蚀之私，而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材可兼人，事难兼任，以赫德勾当杂事则可，以总税司分承他务则不可。何则？赫德不能不死，替人岂必尽如赫德？维持国计者，必切深远之虑，斯立长久之规，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榷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扞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启、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多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或谓华人诚实者少，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窦。不知税则既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观瞻所系，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虽有奸胥，安能舞弊？

应请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余阅吴兴积踵步生《通商综核表·序》云：约章所载，进口免税各物初因品物不多，无关税额，又皆彼中日用，无预华人，不予征科，以示曲体远人之至意。

诂向之专供旅用者，今则视为利途，非无司关者稍与争持，而总税务司动加驳斥，商利关税交受其侵。又若同一纸也、墨也、金银器也、毡毯也、衣服也、蜜饯也、烟叶烟丝也，皆出口有税，进口则免。中外互市，贵取其平，免则均免，税则均税。苟取旧章而更定之，酌一进出皆税之则，坚持定论，彼必无词。况我国免税各物，大半为日本税则所不免。何西人于日本则甘于输将，于中国则

每形崛强？折而服之固有词矣！

按西例：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以期畅销土货，重征进口货税，以遏来源，保我黎民，毋侵害农工。未有舍己芸人、抑内护外者也。

又阅泾县吴剑华《续罪言》，其税务司一条云：按海关之制，既有老关以收商课，又有新关以收洋税。税课总归海关，而洋税则另用外人掌之。名曰税务司，积各海关之税务司而辖之以一总税务司，亦用外人，滥觞已久，无有悟其非者。吁！何其悖也！

夫创始之时，实以洋人货价非华人所谙，故不得不藉外人之力以助其成。今日大非然矣！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司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自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齟齬。而所用洋人扞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观华商。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价。于是华商怏怏而控之关道，关道皇皇而问之税司，税司茫茫而委之扞手，率从初议，使纳重税。关道瞠视之无如何也。于是转贿嘱洋商为护符，而华商之货皆洋商之货矣。华商既贿托洋商，则货本较重，不增价则本亏，价增而华商之货日滞，洋商之货畅销矣！

且广东各口往来港、澳等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俟税关人役下舱查验。如系西人船主，则无庸候验。何薄于土人而厚于外人如此？而要皆一税务司阶之厉之。

方今天下洋务日兴，不乏深明税则、畅晓条规之人，苟使任关道者留心人才，时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员而荐举之，以为税务司之副，责其学习数年，有效则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然税务司乃总税务司所辖也，不先去其总，则必多方挠阻，而关道终无事权，各税务司必存私心，此议卒不能行。

彼日本小国耳，昔海关榷税亦用外人，今则悉举而代之以本国官矣。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如日本，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奸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查中外各国请外人为税务司监收国税者，只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而已。印度税捐以鸦片为最，昔为英商承办，太阿倒持，祸致失国。日本初聘西人协理，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我中国尚属如故。

考各口洋关，正税务司三十人，署税务司十余人，代理税务司二人，副税务司又十余人，尚有征税、船钞、教习三项，分内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华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西文且在洋关当司事者不少，何无一操守廉洁者，可升为税务司乎！或谓华人难免舞弊。西人岂得尽善，不观镇江关洋人美生之事

乎？如谓华人不尽如西人，何不于其中慎选而用之？又谓选择甚难。然则西人独不须选择，将尽人而皆贤耶？

剑华所论，实获我心。余细考华人之舞弊者，大抵西人俸重足以开销，华人俸薄不敷缴用。且闻泰西各国无关卡，有纳税印花出卖，运货纳税者计银若干，即贴若干印花，关卡委员无中饱病商等弊。爰附录于后，以备当道采择。

厘捐(甲午后续)

厘卡之设，由于发逆之乱，军饷不继，征及毫芒，原属朝廷不得已之举。故议曰：“军务救平，即行裁撤。”屈计发、捻肃清，垂三十余年，屡经奉旨裁并。无如疆臣总以安置冗员为事，初则藉口于善后，继则借名于海防。广东有海防捐、筹防捐、台炮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捐、筹防捐上海因有筹防捐，凡华商报关者，须照洋关税纳半，所以华商之货概托洋人代报，免抽筹防捐，所谓为丛驱爵耳。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虽损于民而犹利于国。无如厘抽十文，国家不过得其二三，余则半饱私囊，半归浮费，国家何贪此区区之利，而纵若辈殃民乎？

近来内地局卡林立，往往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或谓商贾走私，见某处有卡，则思偷漏，闻某处有捐，则将绕越，此防而彼窜，东堵而西行，以致走漏日多，收捐日绌，故不得不多设卡以防之也。然而既设卡以防走漏，不得因防走漏而复加捐。今乃过一卡有一卡之费，经一卡抽一卡之厘，此何为乎？

欲纾商困，则宜示限制。凡商贾过冲要之卡，既完厘后即给以凭单，所经分卡一体查验放行，不得重捐。倘前卡未及完厘，准在后卡补足，以示体恤。将无关紧要之卡一律裁撤，既可便民，亦可省费焉。所以论者谓病民之端，莫甚于厘卡。然而落地之有捐犹微也，莫患乎不肖委员从中勒索；照章之科罚犹浅也，莫甚于司事、巡役故意为难。此皆积弊之宜除者也。

迩来趋巧商人，多有陋规之献，委员得其费，则任意放行，否则必多方挑剔，司事、巡丁更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商船之过卡者，每月赠以银钱若干，则查舱时便潦草从事，所载货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厘者；其有不先纳贿者，则视之如寇仇，待之如奴婢，措留刁索，无恶不为。

杨然青云：间尝参究厘金盈虚损益情形，而知其故有五。厘局

委员大则太守、小则县令，不致贪黷，致玷官箴。詎知候补人员皆视厘局为利藪，钻营者有之，奔竞者有之，甚至贿赂公行，苞苴迭进，差一到手，便以为此乃生财之地，机会不可失也。于是以多报少，百计弥缝，而司事、差役又层层克扣，其实数上解者，大约不过十之三四耳。于库款曾何裨乎？其故一。

西人传教以来，民教动至齟齬，匪徒又从而煽惑之，往往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事定后则须赔款，或数千金，或数万金，至芜湖一案，多至十一万金。以有限之财，补无穷之累，虽抽厘日盛，其如耗费之过巨何？其故二。

商务旺则厘金多，商务衰则厘金少，此自然之理也。今中国商务尽为洋人所夺。查光绪十三年，进口货计一垓零二兆二亿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十四年，计一垓二京四兆七亿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三两。十五年，计一垓一京零八亿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两。十六年，计一垓二京七兆零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两。观乎此，可知洋货日盛一日。夫西人货物多入中国一分，即中国商务多为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增，库款不能日裕者，职是故也。其故三。

自讲求制造以来，需铁甚巨，需煤更繁。即以日本、英吉利、奥斯的亚三国而计，前年售煤至中国计二十六万八千吨，值银二百余万元。余如军械等类为数更多。夫以库款之所入止有此数，而耗之者正无穷，虽欲不绌也得乎？其故四。

郑州决口而后，河患频仍，前后费帑不下数千万金，而又继之以灾荒，如山、陕之大旱，江、浙之淫雨，朝廷蠲免钱粮，拨款赈济，为数颇非小可。且大荒之后十室九空，物力既衰，厘金必减，是亦库款致绌之一端也。其故五。

有此五故，此所以厘金虽抽，终无裨于库款。何如酌量裁并，反可惠彼商民。

寓沪各商贾，金谓害商病民者有十。

土产之物逢卡纳税，运之远方，甚有税款视成本反巨者，土物不能远流。其害一。

凡货以速为贵，以鲜为美。凡遇关、卡，必须俟其逐件盘查，然后放行，过一乡越一城，逢卡三四处者，则盘查之候已将一日，不惟时不速，而且货经其三掀四覆，已鲜色全无矣，又将焉售？其害二。

丝、茶上市，则派扞手多人，如遇行人之有铺盖箱笼者，必伤之停车，翻箱倒篋，行同劫盗。其搜捕情形，有令人不堪者，致行旅为之裹足。其害三。

分卡棋布星罗，凡有肩挑负贩之流，断断焉必纳税。如有绕越，

则必指为逃捐，重索苛罚，甚有弃业而他徙者。其害四。

土货无捐，洋货有捐，有土酒盛于洋玻璃瓶者，即指玻璃瓶为洋货，拟罚。其害五。

又自行携带手巾一二条，为卡丁所执，指为货样先行出卖，预为走私地步，亦拟罚。其害六。

有渡船搭客，报关之货斤两不符，不但该货被罚，更要全船充公。所以粤东佛山昔年有罢市之事。其害七。

有随带高丽参一二枝，或零星自用之物，皆以为私，或插赃诬害，执以苛罚。其害八。

菱湖各丝行与捐局议定，凡丝止税出不税入，盖乡人携丝至镇，卖不卖未定，断无先捐之理。有卡中司事，见乡人载丝赴镇，因其老实，指为漏税，罚银数元。以后视为利孔，老丝客有不允捐纳者，该卡司事持竹片向丝客乱驱，几致身无完肤，事载今年闰月初七日《沪报》。其害九。

有客自远方返里，携带行李辘重，不知捐例，因被执罚，然倾箱倒篋为匪类所窥，中途被劫。其害十。

其余无故留难，得贿放纵，因苛罚而致商贾罢市者，不胜枚举。虽饮食日用之微，西人带入中国尚不纳分毫之税，况民间琐屑之物，顾可一一抽厘乎？

尝闻某处厘卡，凡食物及箕帚无不加捐，虽一二件亦必措阻，不捐即强携以去。有内地设落地捐局，民间抱布入市，每匹抽厘八文，向章五匹起捐，少则不捐，今则一匹亦捐。有设海防捐者，一巾、一扇、一鞋、一袜亦捐，民皆苦之。试思大商巨贾资本重盈，稍稍捐取尚不致大害，独此肩挑小贩，资本能有几何？亦任意苛求，毫无顾忌，或携其物，或取其钱。

是以鄂抚谭敬帅出示免抽杂厘，并定章程数条：一为鲜鱼、鲜虾担，一为鸡、鸭担，一为鸡蛋、鸭蛋担，一为青菜、葱韭担，一为柴薪、稻草担，一为果品、食物担，一为抱布匹求售者。凡估值五串以内，皆准免捐，实为法良意美。拟请各处厘卡均照此行，无论何种琐屑之物，凡值五串以内，一概不准抽厘，则小民受惠良多，而于库款仍无损。盖琐屑物件捐与不捐，原与国课无关轻重也。

更闻不肖司巡，更巧立各色名目剥削商民，如饭食等名色不一而足，无非为营私之计。即与辩论，彼且藉口于定章如是，并非格外索取。是使商民于正项厘捐外，又多几许私派，谓商力能不日艰乎？嗟彼商民，何以堪此！为今之计，尤须严除积弊。除弊之法，首在选诚正委员。示之以赏罚，严之以考成。委员得其人，自能严以取下，而司事、巡丁亦不敢作弊。其有愿充巡丁、司事者，须纳银为质，并觅妥实保人，倘有不法事情，除罚去质银，惟保人是问外，

即行斥革，严加治罪，庶几罚一儆百，或不至鱼肉乡民也？

总之，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莫若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并归洋关。鄙见：于土货出产之处，加抽落地捐，及至出口时，再抽一洋关税后，则任其所之，绝不再征，以免洋人取巧东洋人改造土货出口，西洋人用三联票出口，均为可免厘金之故。

至各处盐务，即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谓之盐赋，如田地之有赋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则节省耗费甚巨。

或仿外国行印花税之法，其印花本有两种：一、活用印花粘贴各项单契之上；一、以印花暗纹造入纸内，即为各单契之用。其征税亦有按纸及按值两法。事虽琐屑而利益于民颇多。譬如商家合同及地契、租契、揭单、汇票、公司股票等项，一经输纳印花，即作奉准在案，倘有事故到官，必为按律判断。如无印花者，为私告官不理，所以不需勉强，而自愿输纳。惟印税所取，务宜从轻。英国一本土之税已岁收至一千数百万磅，中国地广人繁，所收当不亚此数。闻总理衙门曾向数大国录取章程，已极详备，胡不飭总税务司先从通商口岸试行，兴利除弊，以纾吾民之积困乎？

子潜氏曰：厘金之弊，罄竹难书。按厘捐之设，原为不得已之举。当夫粤、捻倡乱，需款孔殷，国家用以济饷，能使削平大憝，重奠河山者，未始不藉商民之力也。原议军事救平即行停止，不谓承平已三十年，而局卡林立，未见撤裁。加以各省办理不善，倚势肆法，任意抽收，以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负贩肩挑，苛索不免，物价日昂，民生日蹙。

其实资军饷者十之二三，饱私囊者十之七八，是以候补人员百计钻营，视为利藪，而大宪亦藉以此项差使调剂属员，几若有其举之莫敢废焉矣。况多设一局，即有一局之开销，多立一卡，即有一卡之费用，上至总办、委员，下至司事、巡丁，一切薪水、工食，其果取诸厘乎？抑不取诸厘乎？此中耗费，不问可知。

迩来叠奉谕旨，将局卡删并。在封疆大吏，岂不欲仰体皇仁，恤商艰而纾物力？无如军饷所出，若将局卡悉行裁撤，则各省善后经费何从措置？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也。惟是厘捐一日不撤，商困一日不苏。

欲救此弊，莫如以厘金并入关税，一次抽收。查通商定例：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每值百两皆抽银五两，为进出口正税。土货转运别口，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别口，在三十六个月内给发免单，逾期照完正税。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

货，皆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为内地半税。乃查泰西各国税额，大抵以值百抽二十、四十为多。亦有值百抽百者，更有两国有衅，多至值百抽二百者，皆视其事之损益以定税之轻重，从未有值百抽五者。今设一例，华商、洋商一律以值百抽二十为断。凡洋货进口，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土货出口，纳税于第一子口，悉照新章纳，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而遂将厘卡概行裁撤，是举从前积弊一扫而清之也。在国家可省无穷之耗，在商民可免到处之征，实于公私两便。

所虑者，洋商或从中阻挠耳。然洋货纳税后转运别口，在三十六个月外必复完正税。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又有内地半税，今以一次完纳，虽若稍重，而仍可加诸售价内，以取偿于华民。且关税交纳后，运入内地无守候验货之劳，无逐卡停留之苦，行运既速，成本亦轻，各国洋商亦未必不从也。

银行上

天下之财莫善于流通，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见有余，己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己而不利人，其实亦不利于己。《易》有之曰：“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可知利于己而不能利于人，与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均非美利也。自华洋互市以来，中国金钱日流于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补救之。而无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遗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而维大局。兹略举其利民利国之大要言之。

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中国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各海关官银号岁计入息约共数十万两，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

辛资，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有此种种便益，是民生国计所交相倚赖者也。

况银行获利之丰，更有可得而言者。中国银行、钱庄资本不过数万，开拓场面，联络声气，能者可岁获余利二三万金。银行资本既雄，流通中外，其获利之可知者一也。殷商、富户银行存项，例定一年期者息五厘，半年期者息四厘，三月期者息三厘，时有往来者息二厘，若转放各处则七厘、一分不等，不到期即取回者无息，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外国存款甚多，不过三四厘息，遇有要需，均可互相补救，其获利之可知者三也。银行钞票通行市面，百数十万视若现银，不费来源之息，而得无本之利，其获利之可知者四也。提单票来自远方，见票一二月利息，连汇水统收，其未到期还银者，回头息只付一半，其获利之可知者五也。汇票押款过期一日，仍作一月计算，其获利之可知者六也。银行所置之铁门石栈堆放所押货物，计出栈租、火险，其费视他业甚廉，其获利之可知者七也。况银行生意较别项尤为稳当，只有汇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钱庄借银，必用殷实庄票，限期不过数天，押款必须的实，照市价七折至五折为限；不论何处汇票，先收银而后付票，事事踏实，处处认真，其获利之可知者八也。便于人者如此其多，获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

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系官绅商贾乐善为怀，特设为贫民存款，代为支放，月给利息起见，或设于各商埠，或设于各村乡。若水手银行则设于各兵船，或陆路屯防之所。因负贩之辈利逐蝇头，信手得钱，恐易挥霍中国贫民如男女佣工积蓄之资存于小铺，生息多为亏逃。其荷戈执戟者，买醉赌钱，罄囊尤易。令将手中所蓄存之银行，积少成多，可为防贫之计，便民之法周矣。今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之汇丰银行，亦仿其美意，增立新章，代贫民收储银洋，由一元至百元皆可代为收存。每人积至五千元为限，每元岁给息三厘半，随时可以提用，诚便民良法。惟一月之中存银者，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则归入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大数，不在零存之数。息银则以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最少之数为准。譬如月头存入百元，越数日支取六十元，则止存四十元，月底或又存三十元、二十元，虽并存有八十元，或九十元，而计息仍照四十元结算。此则银行之于中取利也。然此原不足为银行病也。盖人向银行存款，至少非千金、百金不可，若百元以上，其细已甚。银行意主便民，收此奇零之款，存银之人或今日存

人，明日支出，彼亦不得不为代劳，是不啻众人之总帐房。苟不予以沾润，谁乐为之？虽然，此举虽善，所利者中人之家耳。今有人于一日之中偶获四五元，十数元，而需用不过一二元，其余银圆可安放，若置之床头，则恐随手浪费；即藏诸箱笥，犹恐突遭胥篋，不翼而飞。更有长作寓公，并无家室者，有此大帐房，得一元则存一元，余两元则存两元，该银行予以存折，随时可支，虽朝存夕取，不以为厌。即存折遗失，拾得者亦无所用之。盖存银之时必签名总簿，日常支取，亦必签名。所签与总簿字迹相符者乃付，不然则否。故存折虽失，亦自无妨，并可与银行商立补折。立法之善，蔑以加矣。

其银行所出钞票，每张一元至五百元，到处通行。商银行所出者，必须经官验看，核其存库银钱若干，始准出票若干如用出现银钞票一千元，须有现银二百元备为零星换银者取用，非国钞可比。俄国钞票有值银九亿万卢布之多，与各国寻常银票不同。其国库空虚，借此腾挪，不能持票收银，随时兑换，市价亦有涨跌云。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强为区别，是诚何心？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非欤？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

银行下（附钞票）

说者谓中国自兵燹后，帑藏空虚，加以水旱灾荒无岁不有，欲创设官银行，款将何出？纵竭力筹集，而中国人情向多疑阻，迨来集股亏折，闻者咸有戒心。始疑其不成，继疑其不稳，终疑其不能长久。惑之者半，沮之者半，而事终不成矣。且华人之富者，喜置房产，而不喜经营，存储之银决不肯轻易出借，亦不肯轻易借人之银。其贫者虽欲借银，而无货物、产业作抵。银行虽设，必不如西国获利之丰。

是说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今不设银行则已，苟设银行，其利益甚大，而筹款亦无难也。何则？数百万之成本，在民间集之不易，在国家筹之，即亦无难。应请先设官银行于京师，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拨作银行成本，约得库平银九百万两查各海

关岁收洋税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其外省分行即将该省洋关税餉、地丁钱粮归其代收候解，其中入息不少，仍由藩司督理，以专责成。此官银行之法也。设票十万，每股百金，不分官民，悉听入股，各督抚札飭府县，劝谕富商，集办尤易准其行钞票，官银行亦许通融，并不勒索。此商银行之法也。至于一切条规，悉仿西法。

查西国银行创自英人约翰拉乌，后人相率踵行，获利日溥，所出汇单虽数万里之遥，克期无误。如有折阅，一切存款、钞票，例必如数赔偿。所出钞票动至数百万，每岁行中存本之多寡，必与钞票出入之数相抵，由官查核，不至钞溢于银，方能取信于人，持诸久远。中国如设银行、行钞票，亦当先定妥善章程，用顶厚洁白纸为质，以铜板镌刻精细龙文，上列满、汉文字以及“皇清宝钞”字样。钞既造成，盖用部印，并盖银行铃记，以示信于民。民间以钞易银，可随时随地向银行支取，绝不留难，俾知存钞无异于存银，且携银反不如携钞。盖钞票有一两银一张，有十两银一张，有五十两银一张，有百两银一张者，进出一律，有轻赍之便，无耗折之虞。如妥议钞章，尽杜流弊，奏请朝廷颁示天下，官民通行，合十八省计之，不难销流数千万两，得此巨款，腾挪生息，利莫大焉！惟开办之始，尤宜晓谕商民人等，凡厘捐、关税、捐款、地丁一切报效、输纳之款，及职官廉俸、兵丁口粮一切支放之款，进出一律俱以银钞各半为程，开诚布公，昭示大信，则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每岁由官查核，钞票行市者若干，本银存行者若干，必使钞本相均，否则再行纠本，查清之后刊登日报，俾众周知。

惟银行用人实为第一难事，亦宜仿照西例。官总其成，防其弊，而不分其权。一切应办事宜，由股商中慎选一精明干练、操守廉洁之人，综计出入；另举在股董事十人，襄赞其成。重其事权，丰其廩饩，激以奖劝，警以刑诛，庶利多而弊少耳。所虑者，银行既设，各处皆设分行，其中帐房需人，司事需人，书契需人，招徕商客又需人，大行数百人，小行数十人，用人既多，钻谋必众。附股有荐举，亲友有恳求，达官显宦有嘱托，远近踵至，良莠不齐，偶有疏虞，即生弊窦。薪水或支用过度，钞票或作伪混行。甚至荐托愈多，无从位置，推而却之，恐碍情面，乃提送干修，少则数金，多至数十金，年复一年，漏卮无底。是皆有损于银行，而貽无穷之弊者也。宜仿西法，凡银行所用之人，皆由公举，不得私荐，责成官绅及诸股董，各就所知，保荐才能廉洁之士。荐而作弊，举主坐之，倘有亏蚀，荐主罚赔。以众人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则弊绝风清，当亦庶乎其可也。

然而，押款不实，其弊犹可虞也。盖设立银行大半恃放息为利，

中国钱庄放息以六七厘为率，多则一分，尚多亏负。今银行取息不能更重于钱庄，格外轻微又恐亏耗，况放息如徇情面，则所出之款项溢于所押之货值，银行已阴受其亏，偶有数户卷逃，被累辄至巨万矣。乌乎可？欲救其弊，亦必以西法为归。西国银行与人交易必有押款，抵押之法，以估价为度，如货物值十成者，所押不过六七成，多至八成而止。合同各执，载明限期，如过限期不还，即将所押之物拍卖偿抵，倘拍卖之价不足所押之价，仍向欠户追还。其实在无力贫民亦有报穷之举，乃始归之折阅。

是以银行虽有亏累，为数无多。所在官司亦认真护持追究，不似中国官吏动以钱债细故，膜外置之也。其所放之款，月稍必结，以视中国之曲徇私情，彼此往来漫无限制，终至被累不堪者，判如霄壤矣。似宜令出使大臣将各国银行详细章程遍行翻译，然后准情酌理，择善而从，以官护商，以商辅官，用商务之章程，屏官场之习气，内外合力，期在必成，上下同心，联为一体，则通之四海，行之百年，度支无匱竭之忧，亿兆有转输之利，而国家万世之业，亦且有苞桑之固、磐石之安矣。

虽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欲设银行，仍必自建立商部始。盖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务通例颁行天下，保护商人，使商务日新月异，而后银行可开，钞票可设，上下通用，自然大获利益。且同一钞票，中国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无弊者，无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虽君上之威，无济于事；民情信之，虽商贾之票，亦可通行。中国前行之钞，立法未尝不善，其后吏胥因缘为奸，卒不取信于民者，无商部以统率之也。故欲用钞票，须先设银行；欲设银行，须先立商部。泰西国帑皆存诸银行以为根柢，而出钞票以为凭券，金人分钞十等，至大十贯，至小极于百文，太嫌琐屑。今银行所出番票，自五元起至百数止，其数适中。若中国则尚可加重，拟分三等：曰千两、曰五百两为大钞，曰百两、曰五十两为中钞，曰十两、曰五两为小钞。如用银圆及制钱，数亦如之。既定等差，再求式样。查美国钞式有二：小者长一寸五分，阔二寸五分，大者长二寸，阔五寸。用钢板铸精细花纹，机器印刷，每纸必经数器乃成，以防弊也。中国既拟为三等，则式样、大小即可视数之多寡而定，大抵长以四寸为始，递加至八寸止，阔各如其长之十七。用机器造成洁白厚纸，内用暗码，则伪造之弊，不禁自绝矣，其利皆归诸国。中国官项悉存诸库，徒供官吏侵挪，而西号之汇兑、商家之期票，反得彼此往来，以沾什一之利。市侩专权，最为可痛。今既自设银行，收回利权，当先存国本，然后再集商股，乃足取信于民。至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家，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查西国定例，倘国家欲举一大事，而力有未逮，则听民间纠集股份，国家让以利

益，且为保利若干，亏则官为赔补，多则官取赢余，故虽数百万金，咄嗟可办。中国能设商部，当仿此法，奏明国家，保定官利，每年由官给发，则人人倚信，而集股自易矣。

圓法

夫贱不可以敌贵，轻不可以敌重，自然之理，不待智者而决也。故人贵我贱，人重我轻，则我为人制；我贵人贱，我重人轻，则人为我制；人贵我亦贵，人重我亦重，则我虽不能制人，而尚可以自立。

今铜与银较，固银贵而铜贱，银重而铜轻。然银与金较，则银贱而金贵，银轻而金重矣。环顾地球各国，以金为市十之七八，金银互市十之二三，专用银者，中国、印度、墨西哥而已。银不敌金，无烦再计。况中国之银，平之轻重不一，除关平、库平外，各省均自立名色，漕平、市平、规平之类，种种不同，而铸银锭成色亦不一，以致彼收此驳，不能通行非但秤色、银色各异，即大钱、斗、斛、量尺，亦各有不同。宜公定通行之法，毋畸轻畸重，为市俗舞弊。银本不可以敌金，矧又参差如此，利焉得而不溢？国焉得而不贫？

考泰西圆法之变，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国见英用金有效，改用金币，继其后者不止一国。七十三年，比利时、荷兰二国银圆暂行停铸，瑞威、瑞典、丹麦四国踵行金币。德国亦废银圆。七十四年，法、比、意大利、瑞士四国限铸银圆之数因四国于六十八年立约同用一种钱币，西人名此四国曰腊丁国，会其文字皆根腊丁也。七十五至七十六年。法兰西、荷兰、瑞士三国暂行停铸银圆。七十七年，荷兰用行金币。七十八年，法、比、意、瑞四国只铸小银圆，西班牙暂行停铸银圆。七十九年，奥时马加、恒加利两国暂行停铸银圆。八十五至九十一年，埃及行用金币，缘马尼亚、土泥斯、奥斯马加、恒加利五国行用金币。九十三年，俄国铸金卢布一百兆圆。光绪二十至廿三年，智利、考斯他立楷南美洲民主之国、日本三国行用金币。可见用金之国日多，用银之国日少，无怪银价之日贱也。产银之国销路日狭，倘非亟思变法，势难自立，恐他日尽天下用银之国易为用金而后已。

我中国专以银为币，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查光绪乙亥、丙子以前，英金一镑但易银三四两有奇；辛卯、壬辰之间，乃增至四五两；近则一镑易银七八两，视前二十年加倍蓰矣。不但借洋债吃亏，而海关收税吃亏更大。说者谓光绪二十五年，海关册报洋货进口除

洋药外，共值银二百二十九兆，照值百抽五例，应收税银十一兆半，今只收六兆半。土货出口值银一百九十六兆，另土货销内地者值银一百兆两，共三百兆，照值百抽五例，应收税银十五兆，今只收税银十兆。是洋货两项照金镑计值百抽五例合计，可以多收之数将近十兆矣。

昔中国闭关自守，天下一家，金银之价虽有涨落，而此盈彼绌，要皆楚弓楚得。今海禁大开，中西共此利权，因时制宜，亟当仿照各国行用金镑，并不准用外国银圆，以重国体，而塞漏卮。若不择善而从，预为筹画，一旦巨款亏耗，元气暗伤，较之兵戎之祸，有过无不及焉。兹将英人论日本拟改圜法章程附列于后，以冀袞袞诸公采择施行。

日本拟纳用金圜之说，已逾五年于兹矣。近闻日本寄来新报，谓此事或将交本期议院核夺云云。按司藏大臣松芳，本掌度支员中之最精圜法者也。日本纸币曾大跌价，嗣经松芳力为维持，始得与银圆同值。今松芳极主改圜法之议，内阁各大臣与之意见相同，所有司藏局总支应委员，拟列章程经《每日新报》录登，由日本《美尔西字报》照译如左：

一、以九成成色之金重二分二厘二丝二毫二忽定为日本圜率，谓之一圆。二、新铸金圆每圆须合二十圆一种，重四钱四分四厘四毫四丝。其花纹志日本与中国交战之事。三、鼓铸各种金圆，除以上一种外，应一概停止。所有已通行之金圆，应收回重铸。四、现行之金圆，应照一金圆合二银圆之价兑换。五、商家请铸之一圆银洋，应即停止。六、政府如有须添铸银圆之处，可铸一圆之银洋，惟须限以数目。七、现通行之银圆为律定之钱圜，应准其照金子定价抵用，不立限制。八、纸币易金、易银均从其便。九、日本银行应设法收回现行之金圆。十、日本银行应设法将库中所存之银尽行换金。十一、定新圜法施行之前，须先贮存新铸金圆合一万万圆。十二、现行之钱圜及纸币等章程，须体各前款立意删增。

以上圜法，日本《美尔报》谓之主金，第此非仅用金，实为金、银比例定价而并用之。虽为主金银之党所喜，然照日本所定之比例一合三十二之说，又非主金银党所愿也。日本初行金银圆时，其比例之价系一合十六，是以现将铸之金圆每圆即合二银圆，亦即新金洋之分两比旧金洋减轻一半也。

查日本银圆约合英金二先零之谱。按诸传闻，日本有铸一金圆合五银圆之说，是一金圆适合英金一海塞甫伦英国金圆，合十先零。惟照前章，凡准鼓铸者仅一金圆合二十银圆一种，即合英金二塞甫伦，

亦即合美国十圆之金圆也。

再现行之金圆一概收回重铸之议，日本用金甚属有限，施行此款尚无十分关碍。至银圆准照一合三十二之定价抵金兑用，不设限制，及政府虽停止鼓铸银圆，将来银圆如不敷流通，仍可鼓铸。

各款尚有为难之处，恐须俟日本与各国新定之约施行后方能开办。缘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日本与各国所订东京约内，载有“西人或日本人有用西国金银洋圆者，除各洋圆铸价外，应得照其实价兑换日本洋圆”等语。此约想松芳必不致忽略也。又查金圆未施行以前，库中须贮一万万圆一款，日本库中现在贮有八千万圆，加之中国应偿赔偿，所余未缴之金尚多，此款亦不难施行。

又查日本拟改圆法，其故有二：一、日本欲与西国并驾齐驱，而各国俱行金圆。二、日本欲向西国借款以开国中利源，并用西人资本藉兴各种工艺，惟西人资本用之东方已属走险，裹足不前，加之银价复有贱跌之患，无怪其不欲险上加险。若用之通行金圆之国，或犹西人所愿为者也。日人之意，日本若订借金款仍以金还，其中难处或能解除。

虽然纳用金圆固颇多，特恐有碍工艺振兴耳。其中利弊，圆法委员亦已臆料及此，《神户西字报》言之甚简，兹照录左：

一、货物由用银洋之国进口者其价必减。二、债主得利。三、国用必减。四、货价贱跌。五、债户及还定税之人必受其亏。六、商务、工艺为之减色。七、钱款利息减成。八、农夫必受其害。九、税饷及政府各种入款必减少。十、付辛工之人必为难。十一、工必减少。十二、由用金之国来货必减。

凡国中金银并用比例定价，而他国金银市价时复互相上落者，必有难免之弊。其弊维何？曰格夏雷母之定论也。按此论，银价若跌，不足以抵一合三十二之数，则日本受金之亏；银价若涨，有过所定比例之数，则日本又受银之亏矣。此弊固已拟有除之之道，曰禁出口，如法国银号办法。再禁铸银圆，如印度办法，藉涨银价，然此实非主金之谓也。

铸银

洋银之入中国，自乾隆间始，式样各异，制度不同，初亦不甚通行。立约通商以来，行流始广，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其故何也？盖洋钱大

者重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通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频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有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勒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

西人以其畅行中国，不敷市廛之用，每年续铸运入，约计数百万以上，获利之券操自外人。尝考中国洋钱，多来自墨西哥墨西哥有铸币局十一处，岁出二千五百万银圆到中国、越南及南洋各岛。墨西哥为北亚墨利加民主之国，在美国之下，巴拉马诸小国之上，以钱面作鹰文，故曰鹰洋。又以英人贩运居多，亦曰英洋又有本洋者，则来自西班牙属土小吕宋，近日愈少愈贵，不复来矣。每圆计重七钱三分，运入中国，极贵时可抵规银八钱，即江苏平常市价，总在七钱三、四、五、六分之间沪市卖空买空，昔年每元已涨过八钱。中国人因此亏耗者，不知凡几。其利之厚了然可睹。中国如不自行鼓铸，则其害正自无穷也。

按洋钱之质皆非足色，各国所造大半俱系九成，或有不足九成者，运之来华则皆照银兑用，并不实核分两，只照市价长落，此中无形之折耗，为何如也？其害一。且银色既低，又免进口之税，以此钱购我货物不下千百万，时价虽有长落，成色毫无添补。其害二。以货售我，大都取宝银而归。彼旋得宝银，即旋铸洋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其害三。每元或抬价一二分，三四分，甚至六七分，暗中剥削，为数无穷。其害四。

今如自造，其利亦有数端：铸之即多，则洋钱来源自稀，足夺西人利权。其利一。用之既广，保财源亦崇国体。其利二。银圆既非足色，鼓铸即有赢余，一切开销皆可取给于此，而无耗折之虞。其利三。分量之高低一律，价值之贵贱从同，便商民而维市面。其利四。既有此四利，而又可除彼四害，亦何惮而不行乎？

夫中国钱币，古分金、银、铜三品，其行于世也，谓之国宝。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岂应换用他国之宝？名不正、言不顺，以宾夺主，损国病民闻外国多用本国自铸银钱，别国银钱不准通用。中国法网宽疏，故数十年来因仍不改耳。

美国铸银钱之法，由熔化而鼓铸，范围、淘洗、印花、鑿印，计大者每分时可成八十枚，小者每分时可成一百二十枚。积十五分为一刻，则大者成一千二百枚，小者成一千八百枚。鼓铸如是之速。况银钱成色不过九成，以中国足银铸之，每元必有数分之利，即每十元必有数钱之利，由此类推，其利息之厚，为何如也？香港、东

洋日铸大银钱万元之机器，如分铸五角或一角或五分者，每日可铸五万枚，应用机器共三十余种，运抵上海约值银二万余两。即以日成之款计之，每日约获利银三分，除工费、利息、保险一切约耗银一百二十元外，尚净余银一百七十元，利亦可谓厚矣！

或谓自行铸造，经费过多。不知每元所加银水其利已厚，且外洋铸银尚有铜质搀和，以此项余利移作制造之费，已绰有余裕。是所昂之价，即所溢之利也。但西人好利而守信，又有化学师监造，故成色一律西例：凡铸银圆必归一处，朝廷颁示国内，无论官商，发粮纳餉，一体通行。如化学师当众熔化铸造之银，有成色不符定章，重数不足者，例必严办。今各省所铸龙圆成色不一，外国银行尚未允通用，皆因未能悉照西法办理。华人嗜利而寡信，并无化学师监造，故流弊百端。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飭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可为太息！

窃意中国铸银，须仿宝泉局事例，严定章程，由户部设一总局，惟核收而不铸造，分飭各省督抚拣派廉洁、精于会计之大员，专司鼓铸银钱之事。奏定花纹，铸列年号，成色必有定准，毋许任意低昂，犯者重惩不贷。铸成后由督抚亲验，随意抽提千百元，送户部总局核验。其核验之法，须用化学机器。盖金银质软，用以铸钱不能不略搀铜质，然承铸官吏难保不日久弊生；况日日鼓铸，累万盈千，苟不验明，何以杜伪？故户部宜设铁柜一具，凡各省呈缴样钱，严加封锁，填明年、月、日、时，以备核验。验明一律，然后监铸官从优保奖，准令颁行，可缴钱粮，可作捐款。凡上之取于下者不加平、不补色，悉照本质分两，不得私加洋厘名目，则流通必畅，而利源不致外流矣。如中江钱业之造空盘，暗贴西商之利，其害更甚。往往欲将市上洋银一气收尽，抬价居奇，以致坐贾行商莫不暗贴重利，以补彼封闭银行之费。倘银由中国自铸，其弊必不至此。且必须限定七钱三分，与洋钱丝毫不异，其余半元、二角、一角、五分，亦须与彼从同，方可通行抵制。或更搭铸金钱，均无不可。总期分两轻重不亏，成色划一不二，易于鉴别，便于兑换。官法严于上，民信孚于下，则市肆流通可翘足待。更参用泰西之法，他国金银各钱入口，皆作九成，不得与自造者一律通行，此万国之公例也。泰西各国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马克，德、奥用福祿林，英用喜林，美国用打拉，外国银钱不许通用。

中国若仿行此法，则自造之银日见畅行，外来之洋不禁自绝。转移大局，莫要于斯。直隶藩库之钱粮银课，以二两为率，银色甚佳，人皆便之；江西之方宝亦然，他省均不能及。可见事有专责，则弊无由生。兴利有则，防弊有法，是在督率承办之得人耳。

盐务

《管子》煮海为盐，知盐为民生日用所必需。齐擅其利，遂霸山东。后世盐归官榷，盐课为国家入息之大宗，久与正赋同隶司农之册。迩来盐课日衰，耗费日巨，设官愈众，商困益深，巡缉加严，私贩益盛。良由司榷务者不知改弦更张之法，徒多胶柱鼓瑟之才，此盐法之所以不可救药也。今天下皆官盐，而实则天下皆私盐。名曰缉私，恐缉私之人即贩私之人也。泉私、邻私、船私可缉也，官私不可缉也。故缉私之难，虽历代明君贤相经营擘画，终无善法。

查泉徒私运有大小之分。小贩强半滨海而处，每藉煎晒为业，捆载出运不过数百十斤，弁勇缉拿指为土泉者也。其大帮动以数十百艘，出没靡常。督缉从严则散，稍懈则又集，船上器械枪炮俱备，一遇官兵如临大敌。今日之缉私弁勇，捕土泉则有余，御泉匪则不足。其往来梭巡，跟踪躡缉，不过拿一二土泉，起几包盐斤，聊以塞责而已。若泉匪之任意游行，形同叛逆，则熟视之若无睹焉。即飭守汛各水师协同剿捕，恐亦未能操必得之权。

治之之法，当密购线索，探知其私运约在何时，行往何地，预调大队水师如期四集，务擒所谓头目者，立行正法，再进兵搜其巢穴。如是略可安静，额销之引庶几渐复，国课或从此裕；然亦不过数年之间耳，非长策也。

天下产盐之地九，而课额以淮盐为最多，淮南岁额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余引，课银五百八十余万两，几居天下大半，故必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今淮盐不复，川盐价贱于淮盐，其引地既为川私所广占，于是湖北之荆、宜等属三府一州，湖南之澧州及岳、常各属，川私充斥。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仅纳银六分八厘一毫，淮盐一百三十五斤，即应纳一两三四钱，比川课加重十余倍。是淮盐销得一分，几足抵川盐二十分，川盐侵越一分，即淮盐绌销一分。然则禁川复淮之议早行一年，即多得十数倍之课，司计者不能坐受其弊矣。

当此军饷紧急之秋，坐令淮纲有着之课盈千累万尽归中饱，岂不惜哉！似宜坚扼宜昌府属之平善坝以杜川私，凡楚地二州五府引地一概收回，岁可增淮课二百万。鄂省所悬十五万引，将来照章募商认运，可得报效银三百万两，是一转移间，其利无穷矣。鄂省近除川私外，又有岱私，由宁波运来，借外国旗号闯关而进，莫敢过问，因其无税，而价较川私尤贱。

然则盐之为课，国家虽设官经理，而官私之偷漏愈多，禁之不止，其故安在？以只知一偏而忘所以利民也。淮盐虽贱而路遥，闽盐一斤值钱八文，淮盐出处亦不满十文。乃盐入江西，辗转相贩，贵至斤值七八十文。国课于一斤盐中所得无几，其所以昂贵者，盐商之息钱，盐船之运钱，盐贩之脚钱也。诚能设法造轮船、通火车，用以运盐，则盐至江西稳而且速，余费皆省，江西盐价必减大半。私贩自无所利，不禁自绝。私贩惟以官之本轻利重，于中猎取赢余，若官盐以改运而减价，则民皆买官盐而不买私盐。私贩无利可图，亦将别谋生理。不然私贩便民，民方以私盐味胜而价廉。世之贪小利而不顾大局者，反袒私贩而仇官禁，势必私盐与官盐并行。差役且受私贿而不报长官，国课亏于胡底？

夫盐产于海，民食之，而国收其税；谷生于地，民食之，而官征其粮，其理一也。粮可就田以征，以谷之所出不外于田也。盐不能就灶而收，以濒海数千里随时随处可以为盐。故刘晏就灶榷盐之法，可暂行而不可奉为常法者也；李雯就场定额之说，势亦有所扞格。

或曰官既严禁之无益，不若令盐务诸员招集盐商，详议章程，凡民间私煮之盐，悉令收买，惟不准民间私相买卖，而为私贩者，亦不至流为盗贼。此一说也，行之必未能见效。

或谓盐课一项自来多弊，昔陶文毅公有鉴于此，奏裁盐院，节商家之费，使利源涓滴归公。陆公建瀛亦于淮南踵行之，课额不缺，号善理财。顾至今仍未能概行禁绝，官盐因之不旺。不如悉罢诸局，而听民贩卖，国家但当妥议新章，于出盐之地，每场、每井每岁酌收银若干，而听其所之，自无偷漏之弊。其法虽可行，而未善也。

或谓不如悉去官私之名，但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谓之盐赋，犹田地之有赋，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若州县不暇，则略留一二盐官，以佐其成，其余盐官悉行裁汰。如是办理，既无私盐，又安用缉私？凡捕役、兵勇、巡船尽可裁去，既裕国，又便民。此节用之要图也，特恐巡缉既废，私将多于官矣。

或谓盐摊之于丁，丁摊之于地，官煮之而官运之，人不能不食盐，每人日食盐几何，皆有定数，但令每人岁完盐课若干，计口而授，绝不取民间分文，则私盐自无所售矣。

此数说者，或仿正赋而税盐田，或就场定税，不问所之，较为平允。

查印度就场征课之法，已著成效。考其盐法源流有三：一曰曝晒海水为盐；二曰凿掘盐井，或取盐泥煎晒；三曰进口洋盐。曩时印度盐课章程，与今日中国盐政大致相同，盐成，在场地先行呈缴课银，嗣复运往他境，再纳厘金。厘金之轻重，以所运之路远近为

差。惟各省抽税章程不一，私运偷税者日益盛行，不得已多设巡丁，严行查禁，而国家岁需因之大增。嗣经多方改革，目下各省抽税章程始归划一。昔时征收盐课，分责各省官员，今则统归政府自行管理，所有分省征收之法，已久废而不用，应完税项一经缴清，即可随意转运他境。售价高低，亦听商家之便。惟盐课即在场地呈缴。如民人有拟制盐者，应向盐务专官领取准单，并呈明设灶何地。其领单制盐之人既无定额，所设盐灶之地亦无限制，只盐地不得过于宽阔，恐致散漫无章，不便稽查，转滋流弊。私盐则应严行禁止。至领单制盐采用何法，听商家自便，惟盐成应存官栈，或储于盐垣之内。应完之税未清。概不准运出，一经缴清，则全国可以转运，永无再完他税之虞。

印度除商家领单制盐外，尚有官家自行制盐一法。即以所费薪金及建造房屋等项合计算明，再加以应完税项，定立盐价。不期获利，其立意专为免领单商家议拾价而垄断也。譬如印度南省名曰马特拉斯，其盐务系为官商并行。五年前每百斤价合制钱一百七十六文，税不计。嗣以有议增价者，官家即减价，每百斤一百六十文。现印度盐课定章，每八十二磅应纳税二罗布半，计合中国一担纳税关平银一两八钱。各省事同一例，即海关进口税亦照办理。缅甸盐法不一，类多沿海安置铁锅熬煮，国家不按其产若干盐，即按锅之大小，定税之轻重，转运他境，亦毋庸再完他税。其所定锅税，约与进口盐税同。

我中国能借证印度之成效，辟陶文毅之前议，而复中国就场征课之旧法，使宿弊廓清，利源益广，何虑课日衰，费日巨，官商交困乎？

捐纳（甲午后续）

捐纳一途，昉于汉之纳粟得官，本衰世之政，而行之于今，几视为终南捷径。窃以为此必须改革者也。

何则？官所以维持公道，若私心不绝，则必公道不明。捐纳者仕版未登，债台先筑，势必剥民偿欠，蠹国肥家。其或称饶富、号素封者，而以钱买官，亦复同于垄断；纵使清廉自矢，亦不能取信于人。夫鬻爵卖官，乃弊政之尤，此盖古昔权臣乘便营私，借是以窃朝纲而收物望，所谓拜爵公朝，受恩私室也。今之捐纳，几同市道，明相授受，固无虑此。且捐班中正多奇士，明白世事或胜于科甲之人。今欲一旦骤行废之，天下怀才求仕者，得毋因此而缺望？

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人人皆可以为官；天下之士，人人皆可以从政。惟必先废乎此，乃能兴乎彼耳。

且夫捐纳之中，亦有数等。抱理烦治剧之长，而屡试不售，怀御侮折冲之略，而资格不符；捐纳不行，则其人何以表见？矧与其奔竞权门，夤缘窃爵，孰若输资国帑，得遂明扬？此捐纳之实情也。今吾将于数等之中，为取才之方，而公之以选举。若存捐纳之一途，则才将以无所鼓励而自废。以废才而授之政，非所以重名器也。官者，出与民间办一切公事者也，其人而有能，则人必乐其为官。是官无求于人，而人有求于官。夫至人求而后为官，名器之重则真重矣，其能副乎民望可知也，其能善于从政可知也。以是治民，民必蒙其福。盖其人地与民相近，情与民相亲，必能视民事为己事，而于职自无废弛，民自日征其悦服矣。官民一气，而世或不治者，未之有也。而非先废捐纳不可。

夫取才者，视其法之真伪。以真法取才，则真才出，而伪才去矣；以伪法取才，则伪才进，而真才亡矣。今当振奋之初，事求实效，必自官场始。而官尚清廉，必自废捐纳始。官之大患曰贪，捐纳者输资于国，而欲取偿于民，求其不贪，安可得乎？夫国家不患有谋利之人，而特患其谋利之不善。盖利赖不兴，则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则国势必衰。则何不令捐官之人转为商贾？作商得财，人皆仰之；作官得财，人皆鄙之。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自辨矣。

中国民殷物阜，世之席丰履厚者，最喜于邀爵秩以为荣。捐纳若设，则国家亦有所资。捐纳者当给以虚衔，而不畀以实官，是或一道也。至于毫商大贾、巨室富家，或乐善好施，或急公奉上，亦宜宠之以簪纓，荣之以衣顶，以励庸流，用知劝勉，亦为情理兼尽，惟不可使之身临民事。

夫捐纳之弊，其害已至于不可问。即使旅进旅退，无所短长，而捐纳之例存，则为官失治平之本领；捐纳之例废，则从政得称职之真才。张弛之机，实系乎此。

盖捐纳既停，则凡人一技之长、一艺之擅，皆可以为官，而有志于技艺者，无不见其专长独擅；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而留心者愈众。孰得而掩其所善，没其所能？如是，又何俟乎捐纳也哉？且天下之才，有以鼓励之则无限量，吾将以无限量者收才，才皆入吾夹袋之中，是无才非吾才矣。盖捐纳留，则才隘而私；捐纳废，则才广而公，必然之势也。

民既不捐官而为商，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如利藪可兴、办有成效者，国家给以称颂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国家许其报穷免究。如此而商务不振者，未之有也。今华商之善贾，

虽西人亦自愧弗如。捐纳一废，则善攻心计之流，皆转而斗智投时之举，而国家之阴受其利者多矣。

且夫人之所重，惟利与名，使为贾者不得为官，则人或以商务为浊流，而鄙夷不屑；乃为官者正不嫌其为贾，则人将以商务为正路，而黽勉以图。商贾中如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况官由众举而来，磊落光明，比捐纳者之婢膝奴颜，声价百倍矣。

故捐纳行，虽欲求好官，决不能得；捐纳废，虽不欲求官，而官将辞之不得矣。且也捐纳废而后好官出，好官出而后公道明，公道明而后民志畅，民志畅而后国运昌。我国家宜知所务矣。

停漕

三代以上有贡道，而无漕运。《禹贡》纳秬、纳秸、纳粟米，不出五百里外。春秋之世，未闻转侯国之粟以贍王畿。秦攻匈奴，飞鸟挽粟，率三十钟致一石。武帝灭朝鲜，转运甚远，率十余钟致一石。此漕务因军务而起也，初未闻官俸、民食概仰给于遐方也。古之良法，一州之米即以供一州之食，求转输于数千里之外，迂矣！唐初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藉以养兵。元行海运，无甚劳费。明永乐九年，会通河成，遂废海而用河，劳民伤财，几竭天下之全力。

国朝仍沿明制，二百四十余年，帑项之耗耗于漕与河者，不可数计。其设官也，有漕督，有中军副将以下各弁，有漕标兵，有各省督粮道，有仓场总督，有坐粮厅，有巡漕御史，有卫守备四十人，千总六十人，运丁数万，运河官、闸官四十一人，闸夫数千。其给漕费也，运丁各授屯田使耕，每船给田千亩，少亦数百亩。其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拆造，皆给例价。头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粮，运丁有行粮诸费。凡运米百石，例给耗米五石，银十两，以不敷用，州县给以免费，积渐至七八百两，民力竭矣。各衙有千总领运，漕督又岁委帮押官，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丞倅为总运。沿途有地方官催趲，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自瓜州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员越多费越广，一总运费二万金，一重运费二千金，一空运，一催趲，费皆逾千金。至淮安盘粮，则有漕督之弁兵；通州上仓，则有仓督之经纪；加以黄河口额设官驳船，山东、直隶、通州、武清皆有之，合算不下三千艘；以及浚河、建闸、筑坝。通盘筹算，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

入京仓。此漕运所以为无底之壑也。

究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定于天，亦定于地也。米至京仓，岂能尽归实用哉？查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转买杂粮。约南米一石仅合银一两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尚多赴领，其余领票转卖于米铺，石亦一两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调，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万姓无数之脂膏，聚吏胥无数之蠹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险阻艰难，仅而得达京仓，每石之值约需四十两，或二十两，或十八两不等。而及其归宿，乃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饱。相沿不改，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推原其故，朝廷深思远虑，以为岁无南漕二百万石流通，则一切杂粮必牵掣而骤贵，兵民必有受其饥者，故不惜繁费而为此。然自轮船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中有米局，官中有米局，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

应请通飭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费一概带征，并归藩库起解。至旗丁、京官应领俸米，或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按照市价，则每石折银亦不过二两有奇。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间阎节赍送之资，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海运之经费，漕督、粮道以下之员弁、兵丁，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剔除。是国家开销，岁省奚啻千万？而反多数百万盈羨，官兵两项所领实银，且较增于从前领票转卖之值。公私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亦何惮而不为哉！

即使虑及岁饥乏食，则每年提出盈余银数十万两，在津兑买南米，存储通仓，新陈互易，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其事亦轻而易举。如虑海疆有事，外人得以持其短长，恐将来官商两病，殆有甚焉。盖名为官米，则敌船可以捕拿；名为商米，虽仇国亦不能阻截。公法具在，有例可援。况米石可不在接济之列，是可不必多方顾虑也。

夫运漕之法，惟期事速费省。今漕河既塞，铁路未兴，惟恃海运以济京师。或以海氛不靖，运道不无阻绝之忧，议以陆运为代。然劳费百倍，且所雇粮车，时有沿途载逃之患，非计之得也。或曰：海运行之数十年有效，盍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耗折百端。虽简于河运，而所费仍复不资，约需二千数百万两，两湖、江、安尤巨。虽所耗在民者多，而国家所损，亦不下千万。乃其归宿，石米易银一两。何苦令万家膏血，掷之虚牝耶！

当今筹款万难之际，理财者何惜一举手之劳，改为折成库银，汇交户部耶？惟折银价值，宜随时划一，不得加多勒索，以致困民，

方为尽善。惟当轴者所为颯颯焉顾虑者，岂以漕务人员、夫役无所仰食，难免滋事，故不敢发此难端欤？不知此实无足虑也。将来铁路既成，道途开辟，如开矿、垦土、筑路，地利迭兴，需人甚众，又何虑难以安置耶？且拔大疔者，不顾小痛。以或然之虑，废经国之方，岂智也哉！况漕运废，则淮安农田不致因蓄水济运之故，乏水插秧，有不荒于天而荒于人之叹。淮安农田五月初栽秧，取水悉资运河，故江、安粮船例于二月过淮，四月过竣。如迟至六月过竣，漕督飭属闭闸蓄水，济漕上驶，淮地插秧无水，顿成荒年。

今河道北徙，漕运不复，海运亦非善策。惟折色纳官，实为利国便民。吴门冯官允桂芬，亦有南漕改折之议，谓京师为万商渊藪，发价采购，虽川、滇、闽、粤之产，尚可咄嗟立办，故南漕诚能改运为折，将见近畿杂粮、江南米麦懋迁之商，必由海运连樯击毂而至矣。尝闻英京伦敦户口之众多于北京，其所需面粉、牛肉，大都来自外埠，不虑或缺。盖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查咸丰十一年奏奉谕旨，裁撤河督、河道并文武各官一百五十余员，汰除老弱弁兵。今河运未复已四十余年，与昔年南河各缺虚糜饷需情事相同，而库藏支绌倍难于昔。其为应裁，已无疑义矣。

国债

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其国虽为别人所得，仍须照还。故各国兴大役、出大军，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动辄数千百万。或每年给息，或按年拔本。君民上下，缓急相济，有无相通，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

当法、越有事之时，粤东筹办海防，需饷孔亟。余曾条陈当道，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按年清利。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数目无折扣，成色无高低。借款至百万之家，有司宜优如礼待，善为保护，不得借端勒捐，以示体恤，则民间必踊跃乐从。

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欲将国债全数归清，而英之富民咸谓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不乐收领，再三稟请，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法之国债每年交息银六千万两，可谓巨矣。而民间尚肯贷之者，则以政府尚信，足以取信于民，而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较之他处为稳也。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法几为德灭矣。若宗社为墟，国债将谁索乎？不知万国公法，国之债贷于民，还债之项出于地，债与地合而为一，其地为谁有，则其债应谁偿，此民之所谳知，所以无虑也。

夫财犹水也，惟患其壅塞，不患其流通。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

之券也；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苟能示以大公，持以大信，试借民债以给度支，成一时济变之良规，即以葆万世无疆之盛业。较前日之开捐例以授爵，借洋债以损国，设厘卡以病民，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万一贷之己民，而缺仍有不足，始可酌以微息，转贷邻封。考英、法、德、美诸国，借贷行息三厘，多不过四五厘而止。若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欠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授于他人，国势浸形微弱。中国幅员之广，矿产之饶，远胜泰西，人所共悉。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无须重息，可贷多金。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非经手侵渔，即洋行扣折耳。闻中国借券之股份，中外人争购之，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

闻我驻英某大臣曰：“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借巨资。他处银行万不能及。洋人尝言：如中国借银百万，必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本利分作若干结，按结支付，限年还清。银行应允借款，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该银行如果自有巨款，此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殷实。中国既与该行议定，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至万。买股者或买一张，或买百张，多寡不等。迨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券票跌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涨则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盖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拈阄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收回本钱复入股份，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若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益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年月，一次全还。一曰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若干，第二结、第三结归还若干，俾得早为料理。彼放债者亦乐闻。某国借债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利息大而券票强，甚不愿出资借人，妄作耗财无益之事。尤恶借债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万一亡国破家，则借款将成画饼，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权应一时之用。金磅高下既受巨亏，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仍由银行担承后，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坐收利权。中国廿一行省，殷实商民

为数不少，但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西法出给股票，每股百金，定期归还，按年行息，收放出入诚信无欺，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即万不得已而再借洋债，亦须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以免辗转扣折，亏累无穷。但飭驻英使臣径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行息不过四五厘。

中国屡借巨资，素守信义，欧西各国共见共闻，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则彼民之有资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踊跃集资。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利可图矣，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利可恃矣，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亦中外具有同情也。且也贷债既多，则中外之交欢愈固，而国本愈坚，几有休戚相关之势，亦情理之出于自然者也。若借资以筑铁路，可径向外国名厂如德之克鹿伯、法之科鲁苏、英之塞斐尔，与之订约。凡铁道所需轮机、轨辙照市作价，俟工竣后按年拔还，则称货之款可减，转折之耗亦省矣。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而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绝大漏卮。而泰西各国有关之士，且啜啜然窃笑于其后也。则不知彼此之情者，决不能筹交涉、收利权焉。

国债借自英、俄、法，不如借自美利坚。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借镑数不如借银数。尽英、俄、法属地与中国毗连，时有交涉之事，恐一有齟齬，为彼挟制要求。若借自美国，则无此虑。借百数十亿，利息须四厘至六七厘。如借数百亿，利息不过三厘。癸未年春，闻前美国公使云：有美国富商肯借银三百兆，利息三厘，且系借银数，准分三四十载清还。中国何不允商，藉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又得此巨款，可以百废俱兴。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仿俄、日借才异域，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迟恐时势变迁不及。借镑数不如借银数，因镑价已昂，似有跌无涨之势，不如借银还银，免再蹈前辙镑价吃亏也。

度支（甲午后续）

度支者，国家预算出入之数也。泰西各国每岁出入，度支皆有定额，不能逾限。如明岁出款若干，进款若干，两抵之外尚欠若干，户部即于今岁预为之备。若有军务急需，则辟院集议另筹。所有进出各款，岁终刊列清帐，布告天下，以示大公。故外国税重，百姓

不怨。且朝廷所征，大都烟酒及贵重之物，得自富家，无损小民。

惟中国尚无度支清帐颁示国中。闻本年五月户部奏称，常年进项七千余万。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出。今筹办海防，购船置炮，须款甚巨，非借洋款不足以应急需。当仿泰西国例，议定一国岁用度支之数。先举其大纲，次列其条目，畴为必需，畴为可省，畴属无益，畴尚缺乏，滥者节之，乏者增之，必需者补之，无益者削之，合京省内外而通计，则常经之出数可得也。次则核查行省二十一部，每岁田赋所入者几何，地丁所入者几何，洋关税所入者几何，常关税所入者几何，厘捐所入者几何，盐政所入者几何，沙田捐、房屋捐、海防捐、筹防台炮捐所入者几何，油捐、茶税、丝税及一切行帖、典帖、契尾杂款所入者又几何。每省分立一清册，核定入款，详列其条目，刊布天下钱存子云：“向例由各省官办飞金、铜、铅、木植、丝、布、纸、蜡、颜料等类，先仿查有无相沿商民津贴，分别改仿商办。比较历届开支之多寡，兼知各省物力之艰难，又派交各监督、盐政、织造办运常例备赏之件，宜加查核，有无节年库储，量为减数。此为节省各项杂支。至整顿各关常税、木税，惟有悉照洋关办法，须将各路货物名目，亦均分别登载价值，每届岁首由各省达部，于税课盈绌、贸易通滞，系以总分叙论，列以任卸衔名，汇刊总册，发坊广售。掩饰无计，积弊或除”。使官绅百姓家喻而户晓，了然于国家之所取于民者，固有一定之数。

举所谓加摊、火耗、部费、平余一切浮费而悉空之，明定为制钱之数，或定为自铸银钱之数。而后商民不用加纳，胥吏不得上下其手，官司不得中饱其囊橐，部书无由驳沮其报销矣！则常经之入数亦可得也。

凡一出一入，编立清册，综核比较，为赋财出入表。出有逾节之，不可任其渐亏也；入有余则储之，不可供其虚耗也。此合国内各省为通盘理财之法也。

更令各官岁呈简明清册一本，实记一关之出入盈虚，关册汇齐，乃会合而详核之。要知中国之财流出外洋者若干，外洋之财入我中国者若干，两两核较，而其出入之大数可得知也。出入惟均，则姑任之。出浮于入者，则必详究其所以失之故，当兴何项商务以补救之。入加于出者，亦必详究其所以得之故，当若何悬赏以鼓励之。此合中外各国为通盘理财之法也。

观泰西各国之筹国用，盖无论土地之大小，人民之众寡，未有不如此者。此特言其大略耳。此而不知，何足以言理财？亦何可冀阜财乎哉？然而财活物也，未定所生之数，必先定所用之数。定之奈何？欲明养廉之原，请先自定官禄始。官禄丰，足以养其妻孥，而后贪酷之风可革也。欲官不朘削民财，必先自定君用始。君用俭，内府无所中饱，而后深宫不萌侈泰之私，上下一德，内外同风，而小民之急公奉上，弥心悦而诚服矣。安见中国有财匮之足患哉！

户口(甲午后续)

圣贤论政，首重民数，曰有人此有土，又曰得众则得国。诚以民为邦本。邦者，民之所积也，故抚民而不知其数，则一切政事无从藉手。譬如一家之中，为父兄者，子弟之多寡尚不能了然于胸，安问优劣？然则居今日而谈变法，其必自清查户口始乎？夫知县、知府之官，顾名思义，官为知县应知一县之事，官为知府应知一府之事。租税营业，事虽至曠，莫非出于户口，则户口之数更应知之。乃问今之府县，其所辖之境户口多少，类皆瞠目而不知。非不悬保甲之牌，非不造鱼鳞之册，乃户非其户，丁非其丁，生者不增，死者不减，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来，上下胥视为具文，牌册有名而无实。

查东西各国均以户口为重，有生死婚姻注册官，无丁税、徭役^{汉武时有人税}，贫者子多溺毙。况此时衣食价昂，如抽丁税，人民必减。东西各国不抽人税，所抽者客民，恐夺其土人工业耳。有征进款多者，亦有抽丁练兵者，由地方有司或飭警察署即巡捕房总巡，逐户稽查，编立号数。日本章程，首将烟户编号，次及资产有无，衣食丰歉。自城镇以至乡村，其户主家族、姓名、阶级、职业、生计、年貌、行状、男女老幼、生死出入，与夫同居、寄寓、乡贯、往来，莫不部分而籍记之，随时阅视。而于家无恒产，以及娼馆、旅店，巡视加密。若博徒、刑余、私窠子等类，则尤平常加意察其举动。所以无赖之徒，既不得朋比为奸，又苦于避匿无地，改过自新比比皆是。遂能以三岛之地，雄视五洲。顾其章程亦与中国初无大异，何于彼则效，于此则否乎？无他，彼践其实，责成巡捕逐日稽查；此存其名，但凭文告，终年不问耳。

中国自丁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非若前代之丁口有赋，隐漏有罚，因此而户口之数，视为无足重轻。大吏之考核，牧令之报最，胥不在此。其申报督抚，咨达户部者，不过虚应故事耳。

今宜设生死注册官，并仿照日本警察之法，招募壮丁以为巡捕。城镇各设警察署。一二百户之乡村各设巡捕房，畸零村户，就近编附。地方官会同警察署，将辖境之内男女若干，出仕者几何，充兵者几何，为农者几何，为工者几何，为商者几何，谁为家主，谁为佣人，谁为土著，谁为寄寓，年貌老幼，逐一详记。其有产无产，有业无业，亦载册中。每月日有生死婚嫁、产业卖买、远路往返、人口增减，责令屋主告知所司，登记于册。其渔舟埠船，则用部勒

之法，编号给牌；客栈旅馆，则用循环之簿，详细注明。至于乞丐，另为编册，酌给庙宇或公所，责令丐甲查点。日间任其行乞，夜必一律归宿。如不归宿，即行驱逐；丐甲不察，有事连坐。以上分为稽核，而总其成于警察署。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或按月，或按季递申疆吏，而达之政府。岁时由政府或疆吏轻车简从，亲自抽查，以期于事核实，于民不扰。抽查无定期，亦无定处，庶不敢如保甲牌、鱼鳞册之随意编造。如是则若网在网，有条不紊，然后征兵、劝学诸政，可以次第施行。天下虽大，不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当此群雄环伺中国，沿海口岸及边徼之地与各国属土犬牙相错者，时虑为人侵_ī。若能自治其民，则百废可兴，庶政可举，而一切皆自户口清厘始。愿为当轴者借箸筹之。

卷五 户政

商务一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郑玄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甸而主偏陲。笑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微服赴邻邦，考究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泰西各国，凡拥厚资之商贾，辄目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亦邀国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课税必权其轻重。昔罗马尼亚有贾于俄者，富甲一国，俄王与结昆弟，有女遣嫁，遣使往贺。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孰谓闾閻中竟无人豪，顾可一例目为市儉哉西俗呼为市儉者，如德国官典章程：每物估价给三分之二，每马克月利三分，凡六月为满，其私押则当值少而利重。此等虽系典商，最为官绅所鄙。其官督民开者，以十三个月为期，息五厘而已。质物者必以购物质票为凭，否则以住屋租纸呈验，或令房东作保，违者不纳？

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

俱当代为熟筹。”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密钱、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轆轳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

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官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什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辄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就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瑙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

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无论总局、分局，皆由各业公举一人为商董，合公举之商董，择其公正廉明、老成练达、素有声望之商，聘为总董，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日本业已效法泰西，虽一介商民，有运土货出售外洋者，欲见某官，商务局董即赐函交其面呈使臣，为通介绍，毫无费用。中国能如是乎，如有关商贾要务及助资奖励诸法，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而后商情不壅于上闻，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

至今日而策富强，倘不如是，内不足以孚信于商民，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夺。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值。颠倒

错紊，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倘有贤能督抚大吏，洞明利害本原，奏请将厘金概行豁免，在江海巨埠者并归洋关，在内地区口岸者改归坐厘，或由商务局妥筹别款，弥缝厘金之缺，何至华商受其害，而洋商独收其利也哉！

商务二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专书。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法之本原。虽日日经营商务，而商务总不能兴。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故读书不能出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如算学、化学、光学、电学、矿学、医学、农学、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乎？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

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监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出入之多寡，销数之畅滞，月有稽，岁有考。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则悬金牌以鼓励之。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或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各国每埠皆设有商会，京都设商务总会，廷爵绅为之领袖。其权与议院相抗，如有屈抑，许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恃以无恐。

昔年英吉利僻处一隅，闭关自守，曾不百年，其兴勃焉！则以极力讲求商政故也。京都皆开商务学堂，教习通商规例，以便贸易远方。时有精于商务之人特著一书，谓商学之要有五：曰地学、金石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物学。书分四册：首言货物来源，次言工艺制造，三言古今商务兴衰、沿革、更变，四言近今商务。凡欧洲通商之地，植物、生物、金石内所得各物，所生材质，皆分门别类，言之綦详，以教本国学生，并教导他处商人，获益非浅。

或谓商贾之事，只须略知贸易情形，即可逐蝇头之利。岂知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欲知此道，不但须明旧

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近人思得新法，先视本国土宜，上占天时，下穷地利，究资产之盈亏，何物最饶，何产最良，或注意一种，或若干种，宜制何器，意有專屬，其业始精，能使乍见者必生欣爱，欣爱者必须购用，庶得其道矣！如各种货物增出愈多，则新法更为繁琐。盖懋迁有无之事，匪独一家之利钝，并关一国之盈虚。

古者交易，但贵布帛菽粟；后世工艺，大半弓冶箕裘。此其中但有工于会计，识见过人者，则获利较优。故知市面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此格致之学，言商务者不可不知也。外国新植一物，新得一法，必笔之于书，以俟考究。据英商云：同治十一年，有英国医士在新加坡游玩，见土人手持一斧，其柄非木非皮，不知何物。遂询之土人，略知出处，即购此柄寄回英国，由博学士考求，知为橡树所制，其质柔脆，可以伸缩自如。于是用橡树所制之器甚多。印度格克得海口有油铺主，一日见油盆之外，盘有树根丝，缕缕明晰，主人大奇之。适制绳工匠某亦来同视，皆以为见所未见，遂将此物寄呈英国考究。知此根丝可以织布、作袋、制衣，倘与蚕丝拼合同制，乍见者竟莫辨其为真丝、为根丝也。嗣后日益讲求，采根丝组织布疋，通行国中。今北邨苏格兰一带，根丝一项亦为入款大宗。一百年前美国有贩木棉赴英者，其时尚不能将棉花制物，后有艺术之士明制造之法，乃能以棉纺纱，以纱织布，于是制布分棉，成功极易。棉花销数极多，英国织布之业独胜他国，商务又为之一新。近年西人不独购中国鸡毛、羊毛、骆驼毛，且购猪鬃毛、黄麻、乱丝头、柏油、五梧子等物运至外国，用机器制成绒毯、台布、窗帘、缎布、蜡烛、洋墨水，出售中国者甚多。我国如就地制造，以省运费，获利必厚。且闻四川有煤油井，有沙石，可以自制玻璃。当道者欲辟利源，胡不令商民仿而行之。

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朘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洞识通商利害，谓祛其害，得其利，则国富兵强；失其利，受其害，则民穷国困。究其避害受利之故，在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而已。是以仿行西法，特设商部，通飭各处设立商务局，集思广益，精益求精。日本自设商务局后，如有洋商买卖不公，即告知商务局，集众联盟，不与交易。华商人心涣散，各自怀私挟诈，致使外人乘取蹈隙，坐收渔利。若茶价跌，则说货不对样，非退则大割价，所磅斤两吃亏尤多。凡华商买洋商之货，无不先银后货；洋商买华商之货，则先货后银。竟有延至日久不清者。商务种种吃亏，皆由人心不齐，亦地方官无以鼓励之所致也。事无大小，情同一辙。不独仿造中国土货，更仿造西洋各货，贩运外洋，价廉工巧，人争购之。如有亏折，商部大臣设法为之扶助。闻昔年日商仿西法制造之货亏耗过重，不能销者，官为之拍空，或运售他处。拍空者，西法也，投意拍卖之人先登告白，订期招人，当众出价，以价最高者得之，俾再营运，无令中道气沮而业废。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竟以富商者增国帑，而其捐资报效之多，固无论焉。

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邦商舶源源而来，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舶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

前顺德黎召民方伯曾集股创设肇兴公司，开庄伦敦，卖买货物，举余出洋总办，并请郑玉轩京卿、邓小赤方伯相劝。余答曰：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可行。若预先买货待涨，非熟悉该处市情消长，货色盈虚不可。似宜先往外洋设一茶叶磁器行号，兼代买卖丝、茶，或附搭殷实可靠之行。俟开办三年，熟悉该处贸易情形，然后大举。倘能奏请朝廷，所有各省军械悉归我行承办，聘一素精枪炮、轮船、机器之人考究，止收经手用费，不致洋行浮冒，以旧充新，则必两有裨益。况承办军械洋行，上海计有数家，岁须缴费二万金，其利之厚可知。闻中日之战，天津信义洋行承办军械，该行买办尚分得二十余万。其获利之厚，更倍而有征矣。我公司得此利息，亦可赖以维持。奈方伯急于开办，谓所议难行，茶叶磁器生意过小。乃大张旗鼓，请刘述庭观察、梁鹤巢司马开办，名肇兴公司，不及三年，已停闭矣。由此观之，可知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先立于不败之地，逐渐推广，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务广而荒，必至一蹶不振。然则名曰通商，于通之一字，总未能实践力行也。

近日朝廷虽有通飭各省督抚振兴商务，及各制造局准招商承办之谕，惟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纵使官吏精明，愿为保护，恐继之者贤否莫卜，或有要求不遂，更速其祸。孰肯以自有之利权，反为官长所执？故殷商大贾更事多者，明知有利，亦趑趄而不敢应召；即有应之者，恐其假托殷商认办某事，实则别有所图。十余年来，时有劣员串同奸商，或稟请当道承领某行捐费广东各业炮台捐费，皆招商承办，或仿西法创办一事，托词业已集股若干，奉札到手，始设局招股，以公济私，既非殷实，亦无长技，事终难成，而为其所累者已不鲜矣。

按西例：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商贾事者谓之公司。无论绅商设立商贾公司，必须悉照其国家颁发官商所定商贾公司条例而行。公司总办由股董公举，各司事由总办所定。若非熟识商务，不谙其中利病，股份虽多，官秩虽大，亦不准滥厕其列。如有希冀，必为众所讥。

今中国稟请大宪开办之公司，虽商民集股，亦谓之局。其总办稍有牵涉官事者，即由大宪之札飭，不问其胜任与否，只求品级较

高，大宪台意即可充当。所以各局总办、道员居多，所学非所用，西人无不讪笑。迨至关防、札副次第到手，即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假公济私；位卑而权轻，相率听命，不敢多言。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索其报效，越俎代谋。其小公司之总理，虽非大宪札委，亦皆侵蚀舞弊。股商畏其势，因无商律，不敢上控。是以数十年来获利者鲜，亏累者多也。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余曾购译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香港商贾公司条例，各国皆有商贾条例。其属埠各例，由官商公定。香港条例甚繁，计共一百五十八条。兹将英领事哲美森所译简明公司条例，附刊本论五篇之后，以备当道采择施行。惟东西国例：公司虽官助厚资而成，亦无官督商办之例，请盛杏荪京卿奏议，并咨取各国商律。中国只有刑律，无民律、商律、报律、航海诸律，故商民讼事律多未载，地方官与胥吏随意判断，商民负屈甚多。国家非有商律，如篇中所论，商务必不能旺，择其善者编定若干条，颁行天下。凡创商贾公司，必须具禀，列明股董何人，股本若干，所办何事，呈请地方官注册。如不注册，有事官不准理。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方准采用，当道不得滥荐，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更开学堂以启商智，减厘税以恤商艰，设银行以输商力。西例凡集股创设公司，譬如股银十万两，提存银行五万。既经注册登报，公司办货贩运他处，即将提单及成本清单向银行押七八成，买两三个月汇票，货到埠期内沽出，将银交银行，取提单出货。转输易，故贩运多。中国亟宜劝谕银行仿照办理，裨益不少，派领事以卫商权，建博物院、赛珍会以为考究之所。凡物产工艺不如人者，商务大臣通飭地方官及商务局，随时随地极力讲求，务探精意，分条剖晰，普告众商。或有多财善贾，能延聘奇才异能之工师创立公司；或制造机器，或矿务，或轮船，或电报，岁获厚利，报效国家千两之上者；或著书阐发中外商务之利弊；或捐资倡办商务学堂，是皆养育人材，启迪来兹，其功不惟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而大有益于国计民生，商务大臣宜酌量奏请朝廷，给予匾额或宝星，以示鼓励。诚若此，则商贾中人材辈出，将见国无游民，地无弃物，商务自日有起色矣！

商务三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罔利己，藉商以强国，藉

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忌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我中国自军兴而后，厘金洋税收数溢于地丁，中外度支仰给于此。夫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无商何有税？然中外司会计之臣，苟不留心商务，设法维持，他日必致税商交困而后已。四海困穷，民贫财尽，斯历代之所由衰乱也。

查英国设商部专理其事，于商务讲求最精，故收效亦最巨。派驻各国领事，岁将该国商务现在一切情形，详报商务大臣。余译有《泰西商务》一书，已详言之矣。法、美踵其迹，而亦步亦趋，均致富强。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贸易，并立博物院罗致各国货物，以藉资效法而广见闻，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兴。奥国近亦讲求，分为三类：一则银行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运货脚价。三陆地转运之法，并邮政电报各事。是以泰西各国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然各国工力悉敌，出入损益，厥势维均，则不得不以亚洲各国为取财之地，牟利之场，此亦必然之势也。

夫亚洲各国贫弱者无论矣，最大者首推中国，次则日本。故挟全力而俱东，争开口岸，勒订条约。设领事以资保护，屯兵船以壮声威。或勒免关卡税厘，或侵占小民生计。取求无厌，要挟多端，必遂其欲而后已。日本初亦受其腴削，至大藏省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日本自平萨岷马乱后，至今积银盈四千万。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之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

夫以日本之小，且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羸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封雇商船，强令承役，只图自利，罔恤民生。私橐虽充，利源已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总其事者厚己薄人，心不公，力不足。故合股本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

欲求兴商，先祛二弊；欲祛二弊，须如前篇所论，仿照西例办

法。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昔英国思兴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烦，恐不便于商务，于是下令：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次环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于是在朝之士俱由商务而来，而商务遂甲于天下。我中国苟欲振兴商务，推广利源，曷取英国成法，仿行而变通之，以尽祛前弊乎！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各绅商公举素有声望之老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如种茶树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纱，制造毡毯诸事；倡立鸦片、煤、铁、磁器、火油诸公司。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而又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

至于下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再由各府、州、县札饬各工商设立商务公所。须如王君子潜所云：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商民工匠见诸官绅，皆缄口不言，恐犯当道之怒，祸生不测云。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所举商董或一月一会，或一月两会。会日洞启重门，同业咸集，藉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勿作浮谈，勿挟私意，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以类相从，各抒己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一存会所，一存商务局。每年每季仿外国商务工艺报刊成编，分遗同业户各一本，俾考市廛之大局，知趋避之所宜。夫而后百货通，百度举矣。商务局凡有所见，咨禀于南北洋通商大臣。倘遏抑不通，即径达商部，一年一次汇报情形。商部统计盈虚，上达天听。如是则兴废当，谋划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若朝廷无熟识商务之大臣仿照西法认真讲求，仍以科甲清班不谙商务之员俾主持商政，徒有兴利之空言，而无恤商之实效，因循粉饰，将见国困商亏，贫弱无可救药矣！

昔有西商亏空，势将不支，托其买办借款，并多买丝、茶，例于下船后交价。不料船开后接到英电，谓该行倒闭，照西例仅将其行中所有摊还欠款而已。又有洋人串通华人开洋行者，洋人为行主，华人当买办，拟俟大买丝、茶下船后逃遁，幸查于商律不符，未与交易。若无商律，不注册，大公司稽帐无人，恐倒闭之遗害无穷。或谓互市以来，大宗生意全系洋商，华商不过坐费零贩。推原其故，盖由中外贸迁，机器制造，

均非一二人之财力所能办到。所有洋行皆势力雄厚，集千百家而为公司者，且有银行通融，其国家又多方保护津贴，是以商务日兴。中国不重商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无怪乎不能与洋商争衡也。况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累及身家。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视。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坐沾余利，或雇无赖以为护符。故欲兴商务，必先能卫商保商，尤必须杜商奸以防逃闭。护商本以维市面。此类条目烦多，须延访深明商律之人，将东西洋商律参定颁行，俾可遵循，庶奸商无弊可舞，自然闾阖日兴，公司大集，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矣！

商务四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理也，通于商务矣。夫贸易之道，固以土产及土产所制之物二者为之纪纲，而国政民情未尝不与商务相维系。明乎此，而后商务可得而言矣。

英吉利商国也，恃商以富国，亦恃商以强国。曷为曰商国也？专藉商舶以觅新地，辟新埠，纵横五大洲，遍布于中国沿海、沿江地方，其与国政相维系者如此。艺术家日益精良，化学家日研新质，创耕稼新机以教农人，得粪溉新法以兴树艺，其与民情相维系者如此。窃尝究英国商务之所以兴旺者，其故有十三端，有为中国之可及，亦有为中国之难骤及者：曰地气清和，曰矿产甚富，曰国内水陆便利，曰海口多。此四者，中国固有之，无不可及者也。曰百工技艺娴熟，曰首创机器擅利独多，曰资本甚巨，曰程法尽善、用人得宜，曰商船多，曰五大洲皆有属地，曰言语为商务通行，曰通商历所最久，曰近日出口货无税、进口货亦不尽征。此九者，他国亦有难兼，中国所未能骤及者也。

姑举中国商务情形论之：一曰专业收放者为坐贾；此无甚远大之志，以彼出以此入也。一曰贩运出境者为行商，货不能得厚利于近地，必待转售于他乡，或数百里，或数千里，此其志在速销，以货往以货返也。一曰独商。商本不充者，不能创设大庄；商资稍裕者，辄喜独开生面。一曰伙商。人二为从，人三为众，向称股份者，如是已矣。西商公司之法行，我商局大为一变。然止闻集股之害，终未见集股之利。

然则至今日而言商务，我君臣上下无不欣然艳羨，起而效之，独奈何不揣其本，而师其末乎？揣本之道奈何？除设商部、立商务

局诸大端前已详哉言之，复有两说于此：

一在先明大地贸易兴旺之故也。地面近赤道者曰赤带，近北极者曰冷带，两带之间曰温带。其土产之利既不相侔，而飞、潜、动、植之象亦觉大异。推之五洲之物，一国之物，一省之物，均未必同，惟彼商人世处其中，或各精一业，或力兼数业，究其大宗之源，实亦不外讲求天生物产、百工技艺两大端。

一在先明城镇口岸兴旺之故也。地当孔道，位镇中央，必开大埠，如中国之周家口、汉口、樊城，俄之麦思果，德意志之伯灵是也。江海相接，内通数省，上下数千百里，如中国之上海，英之伦敦，法之立瓮城是也。海口便于泊舟，为海道所必经，中国之香港久为英人占踞者是也。支河一线，内外通海，埃及国之苏彝士河是也。势扼河海要隘，地甚狭束，希腊与美国答陵湾是也。两海相夹，形如箕舌，南洋锁钥，东西咽喉，新加坡是也。以上七项皆商埠要区，能占地势之大利者也。既商地之利有七，凡为商者，孰不思得一地利以自居？倘或能兼数利，而商务不兴旺者，未之有也。

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烟台、牛庄等处。有昔为大埠，今就衰落者，如中国之清江、周家口、樊城等处。观船舶之多寡，知河道必有变迁；观海道之飞轮，知中道河南、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观火车之渐通，知旱道必增巨埠。有识者固思捷足先得，亦惟多财者乃能力着先鞭也。

况通商之利固有常经，亦多变局。试观埃及国昔年缘国属罗马，例应贡麦，埃民遂加意麦种，而麦产贸易之旺者数百年。德国有地名活登倍克，凡民间娶妻者，令种果树若干本，其地至今多果利，此因国法而竟能盛兴商务也。昔年英国禁种黄烟，烟贾无利，今弛禁而烟贩遂盛，此以禁令宽猛而可觐商务兴衰也。英国海口昔时麦税甚重，面粉价昂，后减轻收税，面价廉而麦贩愈多，此以捐税轻重而可验商务兴衰也。又有两地物产同，而贸易之兴旺则未必同。盖旱道多，山路险，运脚必重；铁路近，轮船便，运脚必轻，此以运脚多寡而可衡商务盛衰也。顾天下政教不能道一风同者，势也；而天下土地必须相其物宜者，理也。不同者原难一例相从，不宜者仍需互相补救。试观中、印善种茶，而英国善织布，故英人常购中、印之茶，而售其布于中、印也。法国善织丝绸，英国善铸铁器，故法国常购英之铁器，而售其丝绸于英国也。美国富棉产，英国精造船，故美国常购英之船，而售其棉于英国也。于此可见各处有本产，即各业有专门，父传子，子传孙，各守恒产，业精物美，而即以其有余，补其不足。此交易之各得其所者也。

至若天气温煦，雨暘时若，则土产之物必鲜美而价廉，是谓得天时者也。土质膏腴，地脉滋润，则所产之物必丰富而价平，是谓得地利者也。技术有师承，制造多心得，则所出之物必精美而价高，是谓得人和者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乎此，方足与言商务。吾愿言商务者，究其理而推行尽利可也！

商务五

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并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恤商惠工，奏请朝廷颁示天下，悉如前篇所论。如有新出奇器，准给独造执照，及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庶商务可以振兴也。

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挽回利权，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数年来工商生计愈见其绌。若再不悉心考究，徒效皮毛，仍如隔靴搔痒，有名无实，或言不顾行，势必至国困民穷，不堪设想矣！故书中反复详论广开学校及设技艺、机器、格致书院，撤厘订税、恤商惠工诸政，为当今致富之急务，非此不足补救万一也。

尝阅西书英国每岁集刊《列国政治》一书出售，西名《士得士文也卜》，凡各国之政治、兵船、铁路、火器新旧多寡，国用土产等项，无不备载，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自设立制造局，风气一开，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惟物料仍需购之外洋，且剿袭西法，而不能尽得其秘，所以仍不能夺其利权。至民间近亦讲求机器，成衣用机器也，造纸用机器也，印书用机器也，磨面用机器也，碓米用机器也。然尚不过试行，而未能推广。今则缫丝机器规模宏大，出货甚多；而纺纱、织布之机器，则更利市三倍，推广愈甚。此商务之转机也。然各种机器仍须购自外洋，不特民间购取之不便；而洋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往往格外居奇，要求善价，且多有以用过之旧物售之中国，而中国暗受其欺。且置一机器不知其所以然，而但知其所当然，偶一损坏，仍须倩洋人修理。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

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而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即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外洋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人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

且中国地居温带之中，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无如中国优于天工，而绌于人力。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人巧夺天，竟成美货。在华人以为洋人购此无用之物，可以得利；而不知洋人成货之后，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欧西所夺，而内地之利权又将为日本所夺矣！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慎哉！

况丝、茶为出口货之大宗，年来养蚕、制茶之法，均不如外国，其利亦渐为所夺，出口日减矣。尝考外国制茶新法，皆用机器以代人工，力匀而工省，制精而易成，无天雨不晴之虑，一切巧妙之处，日人已著书详言之矣。蚕丝较茶出款尤巨，法人郎都近创育蚕会，用显微镜测视，凡蚕身有黑点者，谓之病蚕，即去之，讲求日精，故所养之蚕，较中国出丝恒多三倍。虽然中国向有治病蚕之法，惜未考求尽善，常为病蚕所累，出丝不多。洋关税务司康必达著书详论其事，并遣人赴法国学习，利导可谓甚勤。奈华人积习未除，风气未开，尚罕信者。

考泰西各国最尚格致之学，有一事必设一会，集天下之深知此事本原功用之人，不厌繁琐，一一考究详察，以尽其利。譬如种田则必究其未种之先，何等种籽宜于何土，燥湿何宜；既种之后，必究其何以长茂，何以蕃实，必使业此者毫无遗利而后止。今访求养蚕各节，即此意也。泰西于蚕桑一事，亦设有会，托各国各就所产情形，专心考究。此会设有年所，其于蚕之一物如何生长，宜食何叶，何以肥壮；何以有病，如何医治；何以必到其时不食而眠，每次眠时是何形状；何以必到其时乃上山结茧，其茧是何色样，何以茧有大小；何以必到其时乃出蛾，其蛾是何色样，有无疾病；何以必到其时蚕乃发生，又何以一年内再生至五六生即二蚕、三蚕至五六蚕，如何使其不再生，而留其子，使次年始生；所吐之丝何

以有粗细韧脆，何以光洁，何以暗滞；何者为得天气之宜、地土之宜，究应如何蓄养，始无遗憾；所种之桑何桑，宜何地土，何以茂密，何以虫生，如何去虫，何叶宜何蚕；又有各种野蚕，各种半家半野之蚕，何以为野，何以为半家半野，何蚕产何处，何蚕生何树、食何叶，何种可取回畜养，何种不宜取归，其蚕及蚕茧、蚕蛾、蚕子如何收取，如何功用。会中历年讲究，早得窍奥，不存私见，坦白大公，随时荟萃出书，布散各国，使人增长学问，有所仿效，俾无遗憾。但格致之学精益求精，无有止境，故是会仍就各国访求，不厌繁，不惜费，因蚕桑有关国计民生，亦皆各国公款所出，诚重其事也。

中国蚕桑之法，讲求者原不乏人，特忽略者众，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用旧法畜养，衰旺委之气运，年产不能递增，端在讲求不得其道耳。至各种野蚕，则更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实亦大有利用。今欲华人能知取益防患之法，必得会中新出之书考究仿效，所裨诚非浅鲜。欲振兴商务者宜知之。

商战上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军，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陆誓乎！而彼族乃啞啞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两。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

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线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篋、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数。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是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之，大宗亦有二：曰丝，曰茶。计其盛时，丝价值四千余万两，今则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茶价值三千五百余万两，今仅一千万两。杂货约共值二千九百万两。罄所得丝、茶全价，尚不能敌鸦片、洋布全数。况今日茶有印度、锡兰、日本之争，丝有意大利、法兰西、东洋之抵，衰竭可立待乎？次则北直之草帽辫、驼毛、羊皮、灰鼠，南中之大黄、麝香、药料，宁绸、杭缎及旧磁器，彼族零星贩去，饰为玩好而已。更赖出洋佣工暗收利权少许，然亦万千中之十百耳，近且为其摈绝，进退路穷。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又如此。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何怪乎中国之日惫哉！

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行市陶变，又遭明折。似此层层剥削，节节欺给，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竭，遂成羸痿病夫，纵有坚甲利兵，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

是宜设商务局以考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精进。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布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来百工之条。通商惠工之学，具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

以争印、日之权。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与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酿酒制糖，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纱，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六在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七在广制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整顿磁器厂务，以景德之细窑，摹洋磁之款式，工绘五彩，运销欧洲，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宁之机法，纺织外国绉绸，料坚致而价廉平，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更有无上妙着，则莫如各关鼓铸金、银钱也，分两成色，悉与外来逼肖无二，铸成分布，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各色银锭，概令赴局销毁，按成补水，给还金、银钱币，久之，市间既无各色银锭，自不得不通用钱币。我既能办理一律，彼詎能势不从同？则又可战彼洋钱，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

或曰：如此兴作诚善，奈经费之难筹何？则应之曰：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所耗海防之经费，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值，岁计几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财战不以力战，则胜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乐，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禀饷以优奖之，赏赐牌匾以宠异之，或具图说请制作者，则借官本以兴助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从人舍己？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然后察其所必需于我者，薄制之而贵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琐屑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

夫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一切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所出绒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并能影射洋货而来售于我。查通商综

核表，计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余万元。从前，光绪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进出相抵，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前后相殊如此，商战之明效可见矣。彼又能悉除出口之征，增入口之税，以故西商生计日歎，至者日稀。邻之厚，我之薄也。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商战下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形战者何？以为彼有枪炮，我亦有枪炮；彼有兵舰，我亦有兵舰，是亦足相抵制矣。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盖利器为形，利用为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则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于人？故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

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之故。

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所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是故国家首贵知人善任，尤要洞识时局。如我力量不足，当忍辱负重，姑与委蛇；待力量既足，权操必胜，有机可乘之时，则将平日所立和约，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均可删改。如彼重税我出口货者，我亦重税彼进口货以报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今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之要端，只知征商以媚上，凡有所需，非以势勒，即以术取。如广东往来内河轮船，每船已报效银若干，尚为各关、卡留难阻滞，而卡员、差役往来附载，皆不出舟资。若挂洋旗之船，虽载货闯关，亦惟瞠目视之，无敢勒索。华商之货逢卡纳厘，多遭搜括，时日耽延，不如洋人三联票子口税之便，安得不纳费洋人，假洋人之名以图利益欤？所以代报关之洋行日见其多，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耳。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不需巨款。而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自然国富兵强，何虑慢藏海盜？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之明效哉！

赛会

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公司者，所以整齐之也；税则者，所以维持而调护之也。中国于此三事皆未能因时制宜，取长弃短，无惑乎日日言商务，而商务愈不可问也。

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人工有巧拙精粗，物质有良窳美恶，自然之理，必至之情也。得彼之法而亦趋亦步，则拙者有时而巧，粗者有时而精。守我之旧而不见不闻，则良者可转而窳，美者

可转而恶。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博览会之设也。

溯赛会之事，创之者英京伦敦，继之者法京巴黎。嗣后迭相举赛，各国亦起而踵行。奥则设于维也纳，美则行于斐刺铁蜚，日本则举于东京。萃万宝之精英，罗五洲之珍异，百年之内炫异争奇，此亦万国大通必有之事矣。洎我圣清光绪十九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美人赛会于希加哥，为科布伦探获美洲之日，阅寒暑四百周。其气象规模尤极天下之大观，为古今所未有。其会分四大部，议院选派通国各会为第一部，希加哥本邦之以利奴瓦会为第二部，女董会为第三部，襄助会为第四部。四部之外又举一人为会总，以总其成。分院共计十五：一农工院，一种植院，一生灵院，一渔务院，一矿务院，一机器院，一运务院，一工艺院，一电务院，一技艺院，一政务院，一林木院，一邮政院，一文艺院，一邻政院。有条不紊，无美不臻。所建地基共七十余亩，各院房屋占地合五百万平方尺，其中花果、草木、园圃、池塘无所不备。所收之费，计股资五百万元，希加哥续凑五百万元，预计游资约一千七百万，售照会等项一百万元，会毕拆卸物料值银三百万元，共应收美银二千一百万元。所出之费，计地基等项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九十元，建造等费三百三十万八千五百六十三元，开院费一百五十五万元，共银一千七百六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元。据此计算，本可赢银三百元有奇。嗣因人役过多，费用过大，又请议院拨助五百万元。然游人逐日增多，不致亏耗也。

美人于此一会不惜工本如此，岂特以为观美哉？诚以一物不知，儒者所耻，而万物皆备，圣功所基。此会角九州万国之珍奇，备海澨山陬之物产，非此不足以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开院之经费抵以每人每日之游资，数百万金钱取之如寄，而客馆之所得，饮食之所资，电报、轮舟、铁路、马车之所费，本国商民所获之利，且什百千万而未已焉。地虽寥落，商贾骤兴，费亦浩繁，国家无损，此利国利民之见于当日者也。凡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则虽有良法美意，亦苦于效法之无从。今萃各国之工艺以斗巧争奇，则我所已能者，可以精益求精；我所未能者，可以学其所学，较之凭虚臆造，难易迥殊矣！合各洲之物产以比较优劣，则本国所已有者，应如何益务扩充；本国所未有者，应如何渐行推广，较之孤陋寡闻者，智愚悬隔矣！不必家喻户晓，而可以开愚贱之心思；不必越国过都，而可以发颡蒙之耳目。故各国当赛会之后，其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此利国利民之见于后日者也。夫事至国与民皆利，上与下交益，目前与日后均收效无穷，而独于古所未有而疑之；西人所有，中国所未有而弃之，此

何说也？

比年以来，中国之商务衰矣，民力竭矣，国帑空矣。事事不如人，事事受制于人，而侈然曰我大国也，彼小国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本有致富致强之道，而自暴自弃，不见不闻，一任吾民之困苦颠连，而漠然不以为意，圣贤之用心固如是乎？

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赛会之款集股招商，而酌提官款以为之襄助，建屋辟地必广必精。届期照会各国外部，将工艺制造各种物件一体入会陈设，派有名望之人比较得失，品评优劣。自南洋大臣以下均自至会场观览，以重其事，先期出报，知照中国十八省。各镇、各埠工商人等，均准入会游观。应需何物，即可出资购买，定立价目，无伪无欺。酌收游资，以助经费，均仿各国赛会章程办理。仍先由出使大臣知照各国，详译立会旧章，参酌中西，务期美善，其有裨民生国计者，非浅鲜矣。

如虑中国此时工艺尚未讲求，不能如各国之精益求精、卓著成效，则可如日本办法，先于内地各镇埠试行工艺、农桑、矿产、耕织各小会，胪列中国自有诸物，而他国有何新法、新器，则官为购置，以扩见闻。仍酌收游资，以助经费。嗣后逐渐推广，每岁扩充，期以十年，不惟远胜东洋，当无难与英、美各国齐驱并驾矣！

或疑此项经费为数颇巨，事前既无所出，事后又无所归。不知设会之后，游人必多，所收游资应足相抵。况今日各镇埠迎神赛会，无益之费累万盈千，游手好闲者，动辄因而肇事，何如移此项资财以开博览之会，则美利既难悉数，而积弊亦可顿除。此裕民足国之先声，即致富通商之实也。五行八政，探《洪范》之精；制用理财，挈《周官》之要。当事者高见远识，一转移间而已矣。

泰西各业莫不有会。商人有商务会，兵官有兵官会，格物士有格物会，读书人有文学会，天文学士有天文会；地理学士有地理会，丹青学士有丹青会，机器师有制造会，种植人有花木会，医士有医学会，习算法者有算学会，讲格致者有化学会、电学会、光学会，业蚕桑者有蚕桑会，武弁有功课会，农功有赛物会。至各省、各郡、各邑莫不有会，而善举之会，尤夥不胜数。英京一处多至五百余所。其他国、他邑可知。虽立法各有不同，而讲求实效及救人救世之苦心，则无不同也。

凡会所皆建大屋，广厦连云，深堂容众。与会有名者，皆可至会所中读书，习学各艺，借榻居处及招宴、议事、论公，聚集同志

考究得失，弃短从长，一示大公无我、善与人同之美意。其所以必分门别类者，盖取专门而后名家之意。故一技可名，微长必录，而后众善毕举，万物皆备也。西士李提摩太《泰西新史》言之綦详，兹特摘论其大略如此耳。

曩者王爵棠星使自法返沪，谓法国艺文会即艺术会，其所习实不止术艺。法人谓文学之事，大之足以治国理财，小之足以资生制器。器西文学，昔推法兰西为巨擘，书院林立。彼都人士靡不咕啐，辛勤力求，淹博于天算、舆地、格致、机器诸学，精益求精，标新领异。为师长者尤加甄别，始得与此选，无滥取，无徇情，数十年来，各国无不争相讲求于学校，论中已详言之矣。然欧西各国公牖来，往皆用法文，以法之儒者最称博雅也。商家多用英文者，以英人通商最早、最广也，特于巴黎设立总会。会中为首者约计二百人，薄给禄糈，稍足酬劳而已。外尚有四十余人，自愿不受俸薪。余则襄办三十六人，躬亲细务者二百二十人，以故责专虑密，训迪有资。会中分类有五：曰亚格得尼，专习词令。曰亚格得尼别列列达，专习文辞，兼攻考据。曰亚格得尼得赛恩士，专习技艺。其中区分条目凡十有二门，如医学、数学、格致学、药学、机器学，各务专精，求通理要。曰亚格得尼特布遏士，专习匠事，丹漆雕镂，制作音乐，必穷精良少之境而后已。曰亚格得尼德赛恩士摩拉黎士抑波黎特，讲求经济，考察律令，以通制度典章之要。此五端乃其大者。至于外会亦归总会经理，如考求遗闻往事，则有安特瓜里恩之会。崇尚博学广问，则有飞罗麻狄之会。讲明格物致知，则有拿查辣耳希式多黎之会。详究地理舆图，则有依阿格拉飞格尔之会。审察各国风土、民情、山川、人物，则有式达特士特尔之会。攻治百工材艺，则有飞罗德取匿之会。专讲剖割人物凡人物有患病中毒死者，例得剖割验视，以审知其受病之所在。西医中有此一端，然亦必其人自愿捐躯乃可。李时珍《本草》木乃伊之讹，殆即由此传闻耳，则有亚拿多迷格尔之会。辨别耕种、播植，则有亚格黎格耳查拉尔之会。其他若赛画会、赛花会、赛马会，无不各有会场。先期布告各新闻纸，届时远近咸集，藉以讲求其孰良孰楛，孰妍孰媿；孰宜寒，孰宜燠；孰可转移，孰为定质。其优者例得奖，并载之新闻纸，俾通国咸知，以资鼓励。下至豢养牛羊以及各色犬类，亦莫不有会，宜其硕大蕃滋，为中土所不能及也。

保险

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盖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人险亦然。大抵人生之寿，通算以四十岁为限，若至四十岁尚未命终，则以前每年所收之保银一概归还。且其人业经保险，若未至所保之期无故而死，则可得巨款，除丧葬外，尚有盈余。此等便宜之事，亦何乐而不为乎？货物保险，非独寻常之时，即遇战事、盗劫，凡意外之灾，皆可以保，惟价分数等。在兵祸中保险，其价最昂，较寻常须加数倍；其盗劫等事次之，然亦与寻常保险不同，缘此等事非意料所可及也。

惟保险之法一行，每有奸商故将货物之价多报，以冀物失船沉，得以安稳获利。此等天良丧尽之徒，虽国家严禁，不啻三令五申，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仍多尝试。亦有将房屋托保，故付祝融者。公司中遇此等之人，别无善法防范，惟有付之一叹而已。

按保险之事始于明嘉靖二年，意大利国亦踵行之，皆由国家所保。其时每有奸商故将船只沉失于大洋之中，船中之人、船中之物尽付波臣，惟奸商预留逃命之地，乘船而回，向国家索赔。如是者岁有其人，后经查出重办，此风渐革。若火险、人险则始于康熙四十年。至乾隆二十七年，伦敦又设一保险公司，专保人险。故同是保险，而所保不同。兹将章程分列如下：

水险章程：

一、船货等物须保至其所至之地，若未至其地，被他人所夺者赔，为本国所夺者不赔。

一、船货出口，保险公司须考察船主及大、二副等技艺。若不能考察，任其出口，而船主不遵行船定章，因而失事者，过在船主，当由船主或船行赔偿；若船行、船主无力，仍由保险公司赔偿各保险公司公请一船主考验各船管驾，才不胜任者不保。

一、两国交战将口岸封禁，如局外之船强欲入已封之口，被局内战国将船物取去者不赔。倘先期与保险公司订明，言欲入某国封口，一朝失去，或可酌赔；然此款不在保例之中，不能援引。

一、船舶启行，须与公司订明开驶之期。若已定期，故迟一二日，不遵所定，比启行后以致失事者不赔。又所行之地亦有一定，若已定船至某处，忽欲折回，或绕至他处，因而失事者不赔。近年各公司因争揽生意，格外迁就，多未遵行。

一、船破损而不修，煤、粮少而不足，致开船后中途遇险者不赔。

一、甲船并货可值一百万，乙船并货只值五六十万，彼此相撞，如甲船沉失，则照乙船价值赔偿，不能赔足一百万。倘乙船沉失，则甲船当遵乙船之价赔偿。

一、船在海中遇风，如当危急，或斫断木桅，或抛去重货，皆任船主自主。事后船中之物，则照数赔偿；所有抛弃之物，则照原价赔给一半。

火险章程：

一、火险共分三等：一砖石之屋，二木屋，三草屋。砖石之屋，其价每值一镑，险费一先令半，木屋二先令半，草屋四先令半。不照纳保费不赔。

一、房屋忽遭雷劫，或自行放火者不赔。

一、机器制造厂房皆可保险，惟造火药厂及储火药栈则不保。

一、房屋及器用如保险二千两，被焚后固当照赔；或以后屋中再添置别物，其价溢二千两之数者，如实有确据，亦能照赔；倘以添置之物归他人承保，则由他人赔偿，原保公司不赔。

人险章程：

一、人险公司今改数等。或公司中已获盈余，可另行酌提若干，分给交保之人；或公司中盈余利息一年计算，公司中人可与交保之人均分。在交保者每年应出保险之费，如五十元之数，若有盈余可取，则不满五十元矣。

一、人命之险虽可赔偿，惟实因病不可药者始赔。其短见致死，争殴致死，雷殛致死，犯罪致死，非命致死者不赔。

一、保险已至五年，其人或因万不得已之故而致于死，则可还其五年中之保费。

一、交保之后，或只保一年，明年不保者，则上一年保费不能给还。倘越一二年仍欲保险，则每保险银一镑，当罚加先令一枚；如保险订定银一千镑，罚先令一万枚，但只罚一次，以后不罚。

一、保险者须年在二十岁，可保至四十岁。四十岁以外保费颇昂，必须逐岁递加。惟多病者不保，无居处者不保，妇人不保也。

卷六 兵政

练将

古之为将者，经文纬武，谋勇双全。能得人，能知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理之要，顺人和之情，详安危之势。凡古今之得失治乱，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无不洞识。如春秋时之孙武、李牧，汉之韩信、马援、班超、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宗泽、岳飞，明之戚继光、俞大猷等诸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国讲求将才者无异。

查泰西职官重武，武员均由武备学堂出身。《欧游随笔》谓其视把总如庶常，千总如编检，守备则已开坊矣，都司以上如京堂，副将如阁学，提镇比之尚书。盖武员可以兼文，文员不能兼武。考其初入武备学堂肄业，欲为日后考任中军将官者，其年须在三十七岁以内，或曾任兵官五年，其请假之时应行补足，须有统领官所给高才优行凭照。统领官不得随意荐人入学，日后有事当惟该统领是问，须有考取都司凭照。不必任都司，须有医生凭照言其身体强壮，能胜营官重任，兼善骑乘，方准其入堂肆习中军韬略。学堂课条有七：一、常算法并代数、勾股、割圆术。二、自古及今各国《兵志》，及战场行军之处。三、炮台营垒各法，共分两种：一长久炮台营垒，海口边界等处；一暂时炮台营垒，如战场所筑者，及攻击炮台营垒法。四、地利即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五、谋攻、疑兵、伏兵、诱敌各法。六、兵律。七、学英国言语，或德国言语，或俄国言语。每年六月间考以上兵官一次，择其超等复令勤习，以备考任中军将官。所考之七种兵阵、艺学，皆预定分数。若各学分数尚不及半，设预定四百分，如分数只得一百九十八，不及预定分数之半，则不得入选。须于分数过半之中，择其尤者再入学堂肆习两年。首年底又须甄别优劣以定去留，不合式者去之，留馆者学足二年，复令赴步兵、马兵、炮兵、工兵各军营中阅历各数月，至是始克成材，可为将官，辅翼将军治理军政。

其难、其慎如此，非如中士将帅不习武艺、不读兵书、有勇无谋、一时侥幸成名者可比。况位尊爵崇，富贵已极，平日优于自奉，性耽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无事之时，只知酒色怡情，赌博逞志，及其临事，又复贪财惜命，如是人谁肯为之用哉？朝廷不知其暮气已重，以其老于军务，遇有战事即饬其募勇御敌。其营中亦仿西法操练，奈非武备学堂出身，各营官皆未谙韬略，又无胆识，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铃为实政。是兵官不知战，安望教兵以战？纵有西人为之教习步伐，确似整齐，枪炮亦皆命中，无非兵法之绪余耳。

泰西兵官云：其大要固不在此，练兵先须练胆，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未经战阵之兵，虽训练娴熟、器械精利，一旦猝临大敌，鲜不目骇心惊，手足无措，苟非将帅得人，法令严肃，未有不鸟兽散者。故外国练兵必设假敌与正军对列，互相攻击，出奇设伏，因地制宜，一如交战状，俾习惯于平时。不如是则临事仓皇，而欲战必胜、攻必克也难矣。

余于癸未年曾将泰西水陆军学堂及技艺学堂章程大略，缮呈醇贤亲王，暨曾忠襄、彭刚直，请于各省仿西法设水陆军武备学堂，选各营兵官身体精壮、年约三十余岁、能通书而有胆略者，又选曾习枪法、颇有胆识、年三十左右、身体强壮之武科人员不论武童、秀才、举人、进士、侍卫，分为二班：已通中西文字、算法者为第一班，延武备学堂出身兼有阅历之师教之；不通泰西文字、算法者为第二班，先入初学堂，延深通中西文字、算法之师教之。必如西士所云，要由武备学堂出身，熟识《武经七书》、中外兵法、测算、天文、地理、图说，及古今战阵胜负根源，乃能鞠旅陈师，为三军之司命。又于南北洋设水师学堂及练船，一切舟楫、樯帆、测风、防颶、量星、探石、枪炮命中，凡行船布阵一切诸大端，必须悉如泰西水师事事精能，庶他日敌船犯境，与其交仗，指挥操纵悉合机宜，不致临时手足无措，徒糜巨饷也。

盖泰西水陆诸军将帅，非由武备院、韬略馆及水师学堂出身，并久历战阵、资格极深者，不得任其职，所以当水陆军提督者，皆老成谋略优长之选。犹备有参佐数员，常与运筹决策，以资历练而审机宜。临敌之时何处安营，何处进剿，何处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截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绘图遍示，使一军谙悉情形，有恃无恐，以故战胜攻取如响应声。岂今日有勇无谋、不知天时地利之将，只驱士卒，仅扎死寨，打硬仗、野战、浪战者所能胜任乎？呜呼！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家，可不慎欤？故吾谓练兵必先自练将始。

练兵上

内安外攘莫先于兵，整旅行师莫重于练。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古之时春蒐、夏苗、秋猕、冬狩，其训练之勤如此。今之为将者，不言练兵，而专言募勇。营哨粗具，重费饷需，观美徒存，难收实效。行成则立加裁撤，戒严又仓猝招罗。不知训练端在平时，岂猝募即可驱以临敌耶？夫部卒之强弱，视将领之贤否，岂在强分兵勇之名目？承平已久，习气渐深，以较曾、胡当日平贼之师，相去远矣。虽有强悍之勇，而训练不得其人，则有勇与无勇等。昔土耳其因埃及省反，请德国将军毛奇相助。毛奇进营阅操毕，云：“兵皆新集，势不相敌，不可交战。”后竟如所言？泰西陆兵之强首推俄、德，水师之精群让英、法，然操练精熟，枪械犀利，步伐整齐，大抵各国从同，惟兵卒之强弱，仍视将帅之贤愚耳。

查泰西之民，年至二十一悉隶兵籍。俄、德、法兵制，已略详于《民国》论内。以故举国皆兵，凡遇军务，仓卒应征，莫不有勇知方，为国效力。其枪法、阵法、口号，平时本训练已熟，退归团练期内，每年仍调操两次，以免生疏。大小将官均由武备学堂肄习，期满而又曾在行伍步兵、马兵、炮兵各营阅历数月者，方授以职，武可兼文，文不能兼武。每岁国君大阅，计陆兵、水师野战各一次，操时与对敌无异。每营有司粮食者，有司制造者，有司修理器械、建造炮台者，有司造筑铁路、桥梁者。西国行营有机器司，有工兵专司营造，不事折冲，盖兵而匠也，有司制备兵食、料理医药、疗治疾病者。其讲求之不遗余力如此。

营规则水陆两军各分三等。水军之制，首以熟悉舟楫为一等，次以娴习枪炮为一等，终以兼习陆战为一等。水师巨舰可容千人，而指挥进退，列炮排枪，惟帅主之；山川形势风云沙线，亦惟帅详之。此水军之大略也。

陆军分炮兵、马兵、步兵，各为一等。再于步兵之中又分作三枝：曰猎队、象队、大征队。猎队执短枪，附剑枪末，藉引前锋，多开而寡合。象队执长枪，附戈枪末，如张两翼，依傍而夹辅。大征队则如火如荼，轰雷掣电之师矣。马兵之中亦分作四枝：一为侦察轻骑，挺长矛疾驱前军数百里，苟非控纵素娴，人马精妙，弗克胜任。一为追逐轻骑，佩长剑、挟短枪，乘敌败北时用之。一为介冑铁骑，亦佩长剑、挟短枪，攻坚破锐用之。一为变化精骑，或骑或步，兼擅其长。大炮兵只分攻守两等：守则守护城台，用炮之最

巨者；攻则摧击敌垒，用炮之稍次者。必也明攻守之法，习转运之劳，一切药码随时齐备，整顿城垣、炮台、船舰、器械诸事，均伊所职，虽马步两军恒兼力作，未若炮兵之辛苦弥甚。此陆军之大略也。

考欧洲各邦，以战立国，争雄角智垂二千年。凡阵法之变化，号令之疾徐，船械之良楛，枪炮之利钝，无不日夕讲示，确有程度，非若中国重文轻武，稍一承平，便目兵事为不祥。况文则拘牵而不识精义，武则粗鄙而未闻韬略，纵有黄帝握奇、太公阴符、孙吴心法、诸葛八阵，或置之高阁，或视为陈言。古法既昧源流，西法又耻追步，何怪乎积弱之难振也！

方今各国勤修武备，兵额日增。约略数之：奥国八十五万七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三名，炮四尊。步兵所携辎重四十七磅，每兵岁需准中国银约一百二十五两。俄国在欧洲者一百四十万二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七十八名，炮四尊；在亚洲者十一万八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九十名，步兵辎重六十八磅，每兵需约一百两。意国七十六万五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五十名，炮三尊。步兵辎重五十九磅，每兵岁需一百二十两。德国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十七名，炮三尊。步兵辎重六十一磅，每兵岁需约一百一十二两。法国九十七万七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十九名，炮五尊。步兵辎重六十二磅，每兵岁需约一百三十五两。英国五十三万八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马兵一百三十三名，炮四尊。轻马兵负二百二十磅，重马兵二百六十磅。步兵负辎重六十二磅，每兵岁需约二百六十两。英吉利兵册载马兵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名，步队十二万八千六百二十四名，大炮手三万四千九百二十四名，工匠兵五千七百一十名，其余守护粮局、运解军火、保护医官之兵不计。另本国守兵十五万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备调兵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一十一名，香港、摩儿大岛、安地儿士岛三处，共守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皆食于官厨，每日给杂费一息零，肘有黄绿者一条加一边士。然兵皆嗜酒，不能耐劳，近年人多不愿充当，挑选缺额，亦常将就录用。荷国十万名，每兵岁需约一百二十五两。比国九万三千名，每兵岁需约一百二十两。丹国四万八千名，每兵岁需约一百两。瑞典二十四万四千名，每兵岁需约五十二两。土耳其三十万名，每兵岁需九十二两。西班牙二十万名，每兵岁需约一百六两。希腊五万名，每兵岁需约一百六两。葡萄牙七万名，每兵岁需约七十五两。瑞士十八万名。美国三万六百七十名，步兵辎重五十三磅。巴西二万五千二百八十名。秘鲁四千六七十名。欧洲之民几悉充兵籍，无事则各执其业，有事则备征调。此即中国古时田赋、府兵寓兵于农之法也。西国人民、土地远逊中华，徒以精以求精，遂能雄视海外。

我中国中兴以来，将帅得人，士卒用命，似于兵事颇能精进，

然有不得不急为整顿者。额设旗、绿制兵六十万，马兵月饷一两五钱，步兵一两二钱，守兵仅一两，非特无以贍家，且无以糊口。况日本近仿西例变成法：凡兵士战死者，由官给其父、母、妻月费银十元，子女由官养至十六岁止，其入籍者多老弱无赖之辈，鲜精强克敌之夫。升平日久，旧额虚悬，余兵顶冒，营务废弛，至斯而极。粤、捻之乱，群以制兵不可用，而湘、淮练勇遂告成功。夫制兵既不可用，即当随时裁革，更补练勇以节饷需，何至今两项兼支，坐耗粮饷？因循粉饰，内外同之。况前招练勇虽曰精强，而今则老迈衰颓，亦几与制兵相等。

计惟将各省所设制兵、练勇，一律仿西法操选。每省练兵若干，其不入选者汰之，就地另募精壮补充。月饷悉归一律，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按月由粮台点名给发，不准虚报。如粮台短发，准统领、营、哨申详告诘，以杜侵扣。应发号褂、绵袄、绵裤、帽、履等件，不准于月饷扣除。泰西军制：驻防统领之下，有熟谙武略者十员，为中军官分司其事，如总司训练，如炮台教师，如总理输粮货，如总理军火，如总理钱库，如医官等项，又有总监武营事宜官一员。虽然大小兵官、委员、司事、兵马、军火、药弹、营垒，一切军政俱归统领管辖，及预备整齐，分调兵丁，升黜军士，惟每阅七日必总核一次，将所黜陟人等备文申报上司，故无虑有虚额之弊。其兵弁月饷，乃归总理钱库支应，所收支径行达部，不必会同统领转详，致多曲折，于是互相稽核，各有顾忌，所以绝无克扣兵饷之弊也。既欲杜其克扣之弊，各统领、营、哨之薪水宜丰；又欲得兵勇之死力，其月饷亦宜稍厚。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贍一家，谁肯效命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则纷纷溃散。如敌兵月饷多，我兵月饷少，彼以倍加口粮而诱动我军心，我当临战酌增。或死后周恤其妻子，或当兵至期满五十余岁者，仍酌给予口粮若干以终其身，藉此固结兵心，自无不奋勇图报也。查各国兵数概无虚额，以少报多之事，惟中国有之。且管官利心重者，不独以少报多，且扣其号褂、粮价等费，层层剥削，所余无多。如行山路时值雪天，芒鞋、草履立时破碎，赤足长征，劳苦万状，皆统帅不爱惜兵士，与同甘苦，何能使其赴汤蹈火而不辞耶。各兵弁所战之处，当如普法之役人人皆有战地详图，举山川、城市、险要所在，兵粮所聚，戍守所至，何处可以安营，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截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不但求利器以击人，尤当精掘筑以避人之击。或谓我军只知用地营。不知地营为掘筑之一端，仅恃此技而不练掘筑全法，必为敌困，故坡、堆、濠、垒等法均宜讲求。泰西军中有工匠兵，又有机器匠为之教习。凡架桥、渡河、掘濠、筑垒，皆机匠指示为之。盖工匠素娴工作，规矩、绳墨、训练皆精，事半功倍，不劳而成也。如训练精勤，勿稍疏懈，必须每日小操，每月中操，每岁大操。凡兵弁之号令视十将军，十将军之号令视大将军，以次递传，整齐画一，而将军又以时察其勤惰，严其赏罚。号令严密，皆平时教习而成，步伐整齐，川流山立，殆不愧于古所称节制之师也。

泰西公例，随营医生不论本军、敌军一视同仁，互相诊治，旗

章以白边红十字为号，彼此概不加害。又于军中络一篮舆，标题其上，有受伤者舁归就医，经历敌营亦无伤害。即交锋被获，令其指天发誓不预军事，立行释放；倘归复求战，彼国将帅必正其罪。此亦古人不重伤之遗意欤！

或曰：所论仿西法设书院，练将才，明地理，识敌情，制利器，足食足兵，额无空设，饷不虚糜，无兵勇之分，尽成劲旅，法则善矣。其如款绌何？曰：今日养兵、养勇之费，总计逾五千万，而有事之日仍纷纷招募，实无可操必胜之权。何如及此闲暇之时整顿军营，以期养一兵得一兵之用乎？古云兵不夙练，与无兵同；器不精利，与徒手同；利器不得人而用，与无器同。查京师暨各省驻防兵二十万有奇，各省绿营兵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余人，各省练勇在外。据英人琅提督云，可用者不过二十万，且无铁路，征调为难，各省畛域之见未销，一省有事，邻省不相救应？同此额饷，同此制兵，在精不在多，留强不留弱，亦在为上者破除情面，痛革积习，一转移间而已矣。

英兵官云：各省所招之勇，急于成军，不暇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归后又投别军，仍蹈前辙，以故屡战屡北。欲救其弊，必须由地方官查取住址，亲族、邻右甘结方许入营，以杜将来逃亡之弊。到营时先验其身材，不合戚继光选兵之法及英国募勇之法者去之。戚将军选兵之法已详于《练兵纪实》等书。

英国募兵之法，凡年至二十二以上愿充兵卒者，诣官投告，由医官验其身体健壮，长及六尺，胫骨不弱，则给资为质，令归告所亲，送于大营复验，若不如式，则罚至官赔偿所质。又虑其出于一时愤激，必讯其来意真实，则分哨教习之。

教法十人为一队，先练手足，缓行欲其步之齐，急行欲其驰之疾，站立欲其足之坚，运物欲其腕之劲。又有习顶抱者，以头触物曰顶，欲其撞之而扑摧之；而开两手擒伏曰抱，欲其力能制物，使之不动也。凡教练皆喝号或摇旗，欲其耳目习于号令也。逮手足既效，则教以陟山、跳壕、越墙、缘木各技。盖累土为坡，趋之欲其息而不喘。绳挂木城，攀之欲其悬而不坠。横木半空而超越之，由二尺渐高至五尺，欲其上腾，身不触物。掘濠于地，由二尺渐宽至一丈，欲其两足之张腾跃而足不失陷。如是年余，则授以火枪，使习携持、举抱、跪立、反正、测远近、辨高低各种施放之法。

其马兵由步队选择，盖预防其丧马而仍可步战也。马先予劣者而不与鞍，继予鞍而不予镫，由骑坐以及驰骋，由驰骋以及超越，运用刀矛、施放枪铳，各技精熟，然后予以全分鞍镫、缰绳。

凡马步技艺学习三年不成者，斥革出学；成者给以饷糈。三年

为一届，愿留者当六年或九年。若至二十一年，则以年老放归，仍以原饷赡其终身。在营有所犯，轻者禁一礼拜不准外出，重者降为二等，再犯则降为三等。盖兵虽有头、二、三等名目，饷仍无异，不过以示优劣而愧励之。有犯则注记于册，哨官时呈营官查验之，如再犯则调赴他营。过犹不改，拘禁营牢，令作苦工。当兵三年无过者，以黄绦为规形施诸袂，加以饷糈，绦递加至三而止。嗣有所犯亦递褫之，其降为三等者，能知愧奋，可复递升头等。

营中工匠亦由步队挑选，盖必能战斯能自卫，口粮优于各兵，凡造桥、开道、筑垒皆资之。每兵千人医官四人，兵丁饮食皆医官有视之。凡驻军先求爽垲之处以栖医官、病人。此泰西营制之大略也。其平日讲求武事，虽只言练身之法，亦可略见一斑。

中外兵书云，练兵之法，先练其心，次练其身，再练其气。练心者何？教之以尊君、亲上、忠国、为民是也。练身者何？如上所论，教之以步伐、进退、手足、耳目一切技艺之类是也。心一矣，身便利矣，而无胆气以将之，则一作仍衰，一衰斯走耳。中国水陆兵弁临阵溃逃，由未练胆。故惟练气为尤要，如砺刀锋，如养笔毫，气太盛则仰，而柔驯之道在有以养之也。气不及则扬，而激励之道在有以鼓之也。故练之不及不可以战，人知之矣。至练之太过，则其锋已老，亦不可以战，则知之者鲜矣。如使无过不及，及锋而试，斯可以力战不败，虽败不衰也。

练兵下

阅泰西史记：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英国通商印度公司夺印度马特拉司东北本加利一省，以三千二百人而敌印兵六万。全省户口三千万，尽归英商所辖治。可知兵在精而不在多。

今我国凡遇战事，皆募勇御敌。中倭启衅以来，榆关内外防营林立，计淮军、湘军、铭军、奉军、甘军、新毅军、老毅军、嵩武军、定武军，名目纷如，至有二三百营，兵力不为不厚。无如人各一心，营各一名，政出多门，不相统属。每当遇敌，其怯敌偷生者非溃即逃，否则各守一方，不相策应，但得敌不来攻，即自幸偷安旦夕，纵观别军败衄，亦恒如痛痒无关。甚者逍遥局外，调遣不前。合之虽二三百营之有余，分之实二三十营之不足，以致兵威日蹙，敌焰弥张。说者谓将领固属无能，而亦营制散漫、帅无专统阶之厉也。

客有自行伍中来者，为言关外各营遇有寇警，不特彼此各不救

援，且兵之于将，将之于帅，上下离心，俨同冰炭。其将官有有薪水而无经费者，有并薪水经费一概无着者。每营发饷五百人，其克扣与否毫不过问，足额与否亦不过问。或有令带二百或三百人为一营者。张曰张营，李曰李营，营勇号褂并不刊别前、后、左、右、中等字样，由总统发下寸许字条，上书某某着带二百或三百人驻扎某处。接条之后，即当委扎持向粮台挂号，按月领饷。其营哨官费用，以及什长津贴，即在勇饷内匀扣。最巨之勇饷，每关银六两有发四两八者。每关银四两八有发四两二者，有发三两二者。扣军米五钱，又除零星花费，每人实得不过一两有零。且有领饷或系库平，而发饷又系湘平者。又有开招时书明不扣旗帜、号衣，届期又一扣去者。勇丁自糊口而外，所余有几？安肯效命沙场！遂有临阵反奔溃散、哗乱抗叛之患。

故泰西兵制，我国有不可及者四端：练之以手足，习之以号令，导之以超越，二三年之后始给以火枪，中国无如是之课程也。授之以舆图，教之以兵法，中国无如是之训教也。优其饷糈英吉利一兵之费岁需二百余金。日本一兵平时月给十元，出战者月给十五元，衣服、帽履、粮食皆给自国家，恤其伤亡伤者终身食饷，死者厚恤其家，中国无如是之经费也。且营官无幸进，军器尽精良，屹如山岳不动，中国无如是之坚整也。虽中国亦仿西法练兵，计已十余年，而仍不能强者，因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绪余也。

尝闻泰西兵官云，其大要固不在此。夫未经战阵之兵，虽训练娴熟、器械精利，一旦猝临大敌，鲜不目骇心惊、手足无措，苟非将帅得人，法令严肃，未有不鸟兽散者。查外国练兵既行以上所论四端，又于操练之时必设假敌与正军对列，互相攻击，出奇设伏，因地制宜，一如交战状，俾习惯于平时。不如是，则临事仓皇，而欲战必胜、攻必克也难矣。中日之战我军无一胜仗，职是故也。非但陆兵如是，水师亦复如是。余闻琅提督当教习时，常于月黑或风雨之际忽传令操演，而学生苦之。自琅提督去后，不复勤苦操练，所以鸭绿江之战，闻我各船弁兵茫然无所措其手足也。

泰西交兵不杀俘虏。其在官者皆有文凭佩之身，被俘出示文凭，则以官礼处之，饮食、居处以官为差。或与约不任战事，即纵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约，则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战事毕释归。或允不任战，及归又请领兵。主兵者责其失信，常至罢黜。盖各国常视彼此所以相处之厚薄以为报，不欲失信于敌。既允不任战而又遣之，则以后被俘者，敌人皆引为前鉴，必不复纵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

有失信负约之名，故于此不敢苟且也。此是《使西纪程》之言。而沈粹生又云：同治十三年，各国在比都会议战事条款，立约颁行。凡敌人入境，民皆充团练，各有练首，仍归地方官管束，衣服有一定款识。军器皆须手持，若暗中藏匿，即以盗论。非团练而手持军器，被敌擒获者，听其处治；团练则不得杀害，监禁而已。两军相当，攻城下邑，自公房、战舰、轮路、火车、电报电线之外，浪取民间一物者，杀无赦。不得以毒饵投水中，不得用毒枪、毒刃，不得暗放开花炮弹，不许杀降，不许杀随军贸易、使令之人。若敌人得地后，民或不服与之仇者，以作乱论。又同治三年，各国在瑞士会议：护持受伤者，其左臂上有白带，上具红十字或兵部及将军印信，敌人不得伤害。

今中日之战，各西报访事人俱云：日兵残杀、奸淫、掠劫，与野人无异。然日人既学西法，岂不知公法战例乎？又闻台湾百姓之不服，非尽属义愤，亦由新例过严有以致之。岂不闻罗马、拿破仑之故事乎？若徒事残酷，遇屋则烧，遇人则杀，良非治道，必为千万世人唾骂。日本其知之否乎！

西报云：有雪梨劳君曾预料万国和平会必无成效。今又于《第十九世纪报》中论明和平会果已不成。盖谓和平会之最好结局者，独特万国凭公调处一项，未必各国遵从。盖强者皆有并吞之习，常欲伺隙肇衅，岂因有调处公论，遂俯首帖耳，而以轩轾之权使他人执之乎？故料知将来虽有公局，而万国陆师仍在，水兵仍存。盖非此无以免相侵，非此无以保和平也。军旅愈众，炮械愈强，战务愈少。盖恐一战各有大损，而无一国独擅其胜也。是以日后弭兵之策，专在于养兵。惟养兵之费甚大，民人供养之任太苦，故须求一法，将陆军变为学堂，不独制造军中技艺，并可造凡百货物，以开利源而补经费。此法今已试行于德国，为总兵者须兼通教学师之能，为新兵者须供应工匠之劳，一面学行战阵，一面读书，一面习工艺。夫为兵者，其手中炮械或可不用，而学识工艺则能毕生有用。学成事业不仅为兵，且可为店伴，可凿井，可耕田，有机会时可作各种事业，各因其才性而用之。但此等工人，仍与兵营相关切。新兵入营，宜始自十六七岁云。

水师

中国海疆袤延万余里，泰西各国兵船飚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篱，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居今日而筹水师，诚急务矣。顾其中纲领约有五端：曰轮船、曰火器、曰海道、曰水营、曰将才。

何以言乎轮船也？泰西自设轮舟，民船之旧制尽改。其始皆木壳船身及寻常之明暗轮耳，继则木壳护以铁板，名曰铁甲船，继而船身全易铁壳，而水线上下所护铁板愈厚，船头另装绝大之钢刃以冲碰敌船。船面或造旋转铁炮台，以便四面分击。铁甲厚至十余寸，而海上咸称无敌矣。然船身太重，吃水太深，行驶既难加速，造费尤倍常船。于是蚊子船、快碰船之制复出。

快碰船者，行海备战之船也。船坚且速，炮大而远者为佳。船身全用钢壳，不取其厚，并无铁甲，配炮大而不多，船头仍装钢刃。体质既轻，吃水自浅，转动自灵。另出新意造为极速极省煤之机器，每点钟能行二十余海里，胜可速追，败可急走。敌欲击以火炮，取准较难；欲冲以水雷，躲闪较易。且碰船之为用，两舟回翔迎距，相机一搏，如鸢鸟之下击，捷不及瞬，势险节短，惟快乃神。否则，反受碰于人，而利害天渊矣。

蚊子船者，助守炮台及海口之船，状其渺小而名也。船长仅十五六丈，吃水仅六七尺。船身低矮，进退自如。船载一巨炮，弹子恒重八九百磅，合数船即有数巨炮，抄袭由我，分合自如。纵使敌人破我一船，损失不过十余万。设破敌一大船，其损失辄以数十万计；破一大铁甲，则一二百万计矣。俄、美蚊船之制，复稍以铁甲护之，尤可突险进攻，此以小制大之妙用也。

现在西国水师除寻常兵轮外，新造之大铁甲日少，而快碰、蚊子两式日多。惟其不胶成见，故能出奇无穷也。

今日中国既有历年造购之兵轮，又有新增之大铁甲、快碰、蚊子等船，并自造鱼雷各艇，似宜酌分巡、守两事。蚊子船专助守炮台、兵轮，以防海口；快碰等船及鱼雷各艇专主进攻、袭击，敌至或分抄、或合击，得机则进，失机则退。我能涉浅、能埋伏、能更迭出没，而又有铁甲以为坐镇，有炮台以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冲，有蚊船以为救应，敌必不敢冒险而深入矣。

至巡海之船，拟分三大支：一巡直、东为北洋，一巡苏、浙为

中洋，一巡闽、粤为南洋。每支酌配大铁甲一、二号，兵轮船四号，快碰船四号。择善地以立水营。无事则梭巡东洋、南洋、印度洋及美洲、非洲、澳洲、欧洲各岛、各埠，由近而远，逐渐游历，以练驾驶，习水道，张国威，护华商。有警则北、中、南三支互为声援，敌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藉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鲜矣。倘现在各船尚未足数，似宜竭力购足，俾得成军，如德之露台水线带，英之旋台铁甲堡，尤新式之最佳者，增购三四号或更多。仿造快船、碰船、蚊子船近日水师总以快船快炮为佳各数艘，以备临阵补阙应猝之用。

论者曰：如此布置，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项未充，费何从出？不知天下大势，须筹全局。敌之敢于窥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试观从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费动一二千万金，而百姓之损失尤多，国威之摧挫不少。今乘无事之日筹资自固，使敌不敢生心，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未雨绸缪，保全于无形者实大。语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此轮船之当筹者一也。

火器另有专条，兹不赘叙。若夫海道，尤非蹈常习故可以从事矣。测海之法，英国为最备。无论商船、兵船，每次行海必将逐日所经之水程、所遇之风色、所探海底之沙土、所测某处岛屿之礁石，绘图立说，归而呈于海部衙门。海部再将各船所记参互考订，以验海途之险易。苟何处有疑，则派船专往测之，不因其地之冲僻而有所歧视。兵船之上，必有学生沿路测量、绘图，彼此考证。其讲求之勤切如此。今中国海道，隔省即不能知，甚至隔府、隔县亦不备知。近来轮船聿兴，常行之道不敢谓毫无所见。试问各口之迂曲、浅深、沙线、礁石能一一洞彻乎？各船管驾、舵工能一一留心乎？未可知也。

英国于我中国海疆，自混同江而南，以迄于越南一带，某省、某地无不刊成海图，详载一切。全图之外，冲要者另为分图。或沙线变迁，即随时另刊新图，听人售观，毫无隐秘。似宜择其所刊年月之最近者，购至中国，设立专局，选精晓洋文之士译绘重刊，分派各处水师、轮船，责令管驾人员各于所到之地，按图覆考，相符者注明相符字样，不符者即改注该地的名外国往往不知某地的名，即任取一名呼之，每有未符。其沙礁深浅或有迁移、改换，即随时改注。若原图有漏，即详为补载，限以半年，将已经注改者缴局一次，由局再给一分，如法查注，亦以半年一缴。如是两年查缴数次，当可作为定本，由局核刊，分给兵轮领用，则各船皆有依据，纵素未涉历，亦

可按图而索，临事不致张皇。惟测量注改，此时管架未必深谙，必先由水师学堂派拨测绘学生，令其随船办理。此海道之当筹者一也。

轮船之有水营，犹陆路之有城垒，必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乃能动出万全。况水师首重天时，暴风、重雾、寒冰皆须慎避，安能不亟筹寄泊之区乎？若未历海疆，何由洞澈？且水营重地，纵华、洋人等指称某地相宜，必须老成熟悉者审慎履勘，方可举办。然其理与法有可得而言者。如北洋之经营旅顺及威海卫，诚中外所翕然称许者也。设炮台以资捍御，设船坞以备修舐，设陆营以通接济。握东、奉最狭之隘口，拱畿甸最要之门户，而设处又非西国应行轮船之地。我据全势以临敌人，雄固无逾于此。然旅顺口内港水浅狭，不能停大舶、屯多船，形势似尤以威海为第一，居南、北适中之地，控扼朝鲜、日本之水道，近岁经营，洵非虚设。至于中、南两洋，则江苏之舟山，广东之南澳，均宜及时筹布。其地自成险要，并无洋舶臻集，大可建立水营，船坞、陆营后路亦可近通接济，皆设险置守之要区也。平时军火、粮饷以十之一二扣存水营，而仍以内地存积为根本。就目前而论，北洋莫善于天津机器局，南洋莫善于闽省船政局。至中洋之上海机器局，则密迩通商口岸，地势平衍，无险可扼，似较津、闽为逊；但经营二十余载，一旦未易改图，是在他日之斟酌而变通耳。倘遇有警，则内地所积之军火一切，或增拨水营存储，或酌分海疆紧要省分，务使我能济急，而敌不能扼阻袭取，是为尽善之策。此水营之当筹者一也。

或谓验收铁甲船之法，其要有三：一在考究全船。究重心之斜正，隔堵之布置，碰锋之坚利，舵机之灵捷，炮位之运动及机器、水缸、水门、药弹舱、战台、鱼管等处位置。一在讲求炮械。德国克虏伯大炮制成，先用满药施放，借验炮身之坚及贯甲之力。德国水师俱用克虏伯炮械，虽操法与英国稍异，而专用是炮者，定臻精密。一在试演慎重。俾知轮机之满力，转圈大小，船性之左右，炮弹之迟速。中国“济远”船，德厂所造也，而英厂颇誉议之。昔阿模士庄厂匠师槐特说帖云：“济远”船内有数处不及同时兵船之造法：一则分舱御水之法未妥也。尤可虑者穹甲下各舱，如锅炉舱长约占船身三分之一，若于下面薄铁板处钻一孔，水即易入。一则穹甲舱面虽固，然全装于水面之下，其浮力与平稳均未尽善，倘船边有水击穿，则水入穹甲之上，甲未损而船或沉矣。一则舵柄未经保护也。前面炮台及烟囱、风舱诸口，不宜用直甲保护等语。凡为监督者，不可不参考也。

船既坚矣，图既精矣，而驾驶未悉，仍与无船同也。火器利矣，而施放未习，仍与无火器同也。水军成矣，水营立矣，而士卒未习；

士卒习矣，而将领未得其人，是以军与营资敌也。美提督查弗而忒于辛巳年春，曾由天津缄致其旧金山一友，其中言：“余驻天津六阅月，稔悉中外交涉未能融洽，缘西人每有轻视中国之处。查通商之利，英为大宗，是以事多挟制，若美国则无是也。年来中国购造铁甲兵船，说者谓中国有水师矣，惟与西国相较则甚弱。现船上尚用洋人，未必肯以中国之心为心。各公使又在细心察视，不欲中国骤强，是则中国亦未可谓有水师也。”故日本步武西法，水师将士自幼皆入学读书，历加考拔，派至练船练习。其水师提督因恐驾驭，且通英、法水师阵法，自能升旗，号令各船布阵。而兵弁、水手一律整齐。闻西人之作壁上观者，咸谓彼国水师与泰西无异矣。其陆军则仿德国，募民为兵，训练三年，令归田里。一旦有事，招之入伍。虽远在异国，不得不闻召即赴。兵虽散处各处，然已训练三年，与临时招募以市井少年充数者有别。又闻其统兵大员必由学校出身，学既成，则航海至泰西，隶名军籍，勤加练习，劳苦不辞，如是一二十年，必由兵士而升为武员。然后回国重用，如山县有朋、榎本武扬之流，今之位尊爵高、独当一面者，皆昔在欧洲充黑衣之籍，执戟荷戈者也。不特武员为然，即文员亦莫不然。闻明治维新，于爵伊藤博文欲详考欧洲之俗，深苦不得入门，乃依某西官当贱役，阅十余年始归，现贵为首相矣。夫然，故将才尤重。

西国育才之法，有专书，有专师，分门别类，循序致精。虽有一二稍嫌繁重，而上不以为纡，下不以为苦，盖其俗使然。

今中国水师似宜再聘英国海军宿将，如琅提督认真教授者。西报云：前北洋水师总教习琅提督及前福州驾驶学堂有一洋教习，皆能悉心教授，奈诸生苦其功课多、立法严，借端公票当道开除，未尽所授，闻者惜之。所有南、北洋兵船、铁舰均派归训练，优者升，劣者降，以杜幸进。至各省所设驾驶学堂，皆延西师分门教习。已升至第一班者，即派登舟历练，勿使久居学堂，耽安闲而糜岁月。盖在船练习，利有数端：实事求是，不尚虚谈，利一；阅历风涛，能耐劳苦，利二；增长胆气，遇险不惊，利三；巡游岛屿，堪资闻见，利四；随时察验，预覩才器，利五。各班之中有志趣远大、识虑警敏、心地纯实、功力精进、胆气凝定、身体坚壮、耐劳安分者，皆属有用之才，存而记之，以资器使。英国水师官甲必丹伯力儒在英京武备大会宣言于众，曰：日本仿西国政务，势渐炎炎，非仅取军械之一长而已也。他日为将领、为偏裨、为教习、为司机、为头目，即在其中，最下亦可为精卒、为匠手、为听受约束之兵丁壮役。若登舟之后，性情骄狠、颓惰轻浮、贪诈生事，一切不堪造就者，虽权贵子弟，立予剔除，以肃军纪。如是而人才不兴者，未之有也。

泰西之水师，莫强于英、法；而兵船之制度，则尤以英为最精。盖他国水师兵丁兼充水手，英则另有水手专管行船，不分兵丁之力，较各国为尤胜。英国水师船中有童子军七千余人。俄国战船虽不及英国之多，亦有童子军五千人。教习驾驶者，有兵船学堂，有商船学堂，以船为学堂之所，每学堂肄业者三百人。至兵船纪律，自将领以至兵丁，皆不准无事登岸闲游，及任意住宿。惟礼拜日可给假上岸，亦不能留岸住宿。我国兵船俱未能恪遵法度，此所以有日本十五年之案也。唐景星观察曰：“我国兵船与英

国兵船同在烟台。日落时，我国兵船时有小艇拢岸，英国兵船无一小艇湾泊，而军政宽严可见矣。海军章程虽定有施教之法，考校之方，奈虚应故事各兵船月有公费数百两，为船上灯油、机器房车油、绵纱绳、油船等用，因系管驾所包，致船舱机器擦抹不勤，应油不油，应换不换，故船身各件易坏，而后膛炮机亦致生锈。如统领果是水师学堂出身，而又公正廉明，认真考察，断不致为人蒙蔽至此。

因水师全权非若泰西归于水师提督。我国升降赏罚、战守机宜皆权自上操，然军情万变，事必乘机，若遥为节制，纵不掣肘，必多迁延贻误。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皆有统领兵弁之责，试问其深谙武备否？既素未悉统领材能，复何从知偏裨优劣，而遽委以举错升调？虽无私心，亦恐难期尽善，况假之展转贿赂者乎昔丰顺丁中丞办事精明，闻某以贿赂而得管驾，故亲坐该船验其能否。该管驾与司舵者预为关说，视其所吸烟杆嘴为表，指东则曰东，指西则曰西。丁中丞竟为蒙蔽。可知非深于此道者，必受人欺也！

查西例：武员升降皆由兵部。水陆提督黜陟，以其部下畅晓戎机、迭获胜仗之武员升任。从无文职大僚而权能举错及委任军事者。今中国于军制不能复古，悉效西法，即训兵口号亦仿西音。夫欧西兵法精益求精，如英之阿林邓、法之拿破仑等兵法，尽可与孙、吴兵法参用，惟训兵口号宜改华音，非但易习，而又得体系。

中日战后，德员汉纳根曰：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一曰无统帅，各督抚自保封疆，分而不合。一曰无名将，各提镇未谙韬略，暗而不明，刚愎自用。职此二端，必难望戮力同心、克操胜算。而原其流弊之极，不得不咎中国立法之凉。盖中国律例，地方官失守城池罪当斩首，故各省督抚以下莫不栗栗危惧。有事则自顾疆土，遑暇舍己从人。中国兵将虽众，实则各自为谋。泰西军制：凡将帅、武弁须由武备院肄业生考充。兵弁以次递升，必其学成然后致用，以得充兵弁为荣。中国虽亦以行伍出身为正途，但左文右武，且视兵之流品为最卑，而凡阀阅之子弟、博雅之生徒，皆以入营伍为大耻。无赖之辈始贪其月饷而趋之，日积月累，或以侥幸躐保，或以钻营洊升。今专阃大员之拔自行间者，多此类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吾未敢抹煞，谓若辈尽无可利用之才。特其扬旗动鼓之时，既惭祈父之爪牙，又鲜兔置之心腹，及至独当一面，心雄万夫，徒以学问未深、练习未精，斯识见终于未广，忽遇枭雄之敌将，非交绥而遽败，即闻警而先逃。其罪可诛，其情可悯。余于癸未年缮呈邝容阶参赞所译美国水师学堂、工艺学堂、德国陆军学堂各章程，请北洋大臣张靖达、南洋大臣曾忠襄及时奏办，深冀总师干者痛除积痼，幡然一变。不料其泄沓至今，此我辈所怅然失望者也。

按西人关心吾国者，皆著之文笔，谓吾国水师未精，将帅无人，不惜大声疾呼，愿举国猛然警觉矣。今英、俄、德、法、日、意莫

不以水师长驾远驶。我中国海疆辽阔，海口又多，诚如张香涛制军所云：防不胜防，守不胜守，无论如何海军终宜复设也。英上院公爵马君云：海战之胜负在铁舰翻新出新，大炮去迟易速。岂可以威海之覆，因噎而废食而不讲求哉？

英国以水师为重，另分一部曰海军，设立大员五，以司厥事。其人必深明水师诸事，乃足当其任。一曰总理，有综核一切之权，虽属文职，必由武备院出身，而兼理枢密院事务。尚书二员：一管船厂一云总理船厂制造船舰，一管行船一云管理转运粮餉事宜。侍郎二员：一管汇兑购置一云总理购置物料，一管出入帐目一云司理银款。别设监督一员，由议院转调升降，职与五大员同，皆归国家黜陟。其下又有司官十员：曰协理官、曰管船官、曰会计官、曰机料官、曰转寄官、曰管工官、曰管炮官、曰管票官、曰管膳官、曰医官。此外别有数官不归海部者：曰海国公所长、曰行船会长、曰天文学长、曰水师学长。侍郎与会计官同司出纳，因而另分两司，专理各处船坞事宜：第一司内管机器者一员，管各工料之加增者一员，管理木料者一员，验工及清帐者各二员；第二司内管煤者一员，管船厂数目者三员，管购置物件，建造楼房者各一员。通国船厂之称头等者四处，称二等者四处。属地船厂十有五处，四等。头等船厂皆有专员管理。水师提督所辖系船舰、兵丁，及学习船中操演，考稽各事，更有管辖、巡捕之权。平时弹压，战时防守，虽不兼理船厂，亦可随时访察而入告焉。

或谓：中国海军大臣及司理者，各司厥职能如是认真乎？能深明水师诸事乎？昔年中法失和之时，法人在海面搜查各国商船，何以中国不能照办？据深通西律者云：因未照公法设立战利法院耳。然则战利法院之设，亦当今要政，不可缓矣。查战利法院又名司海法院，日本已经仿设，颁有一定章程，名为捉拿敌人船货衙门。我中国尤宜聘精于泰西律例、万国公法者，及早商办也。如不能自强，不设海军，不制铁甲，虽有名目，似难施行，徒有瞠目视之而已。

海防上

呜呼！各国水师日精，筹海防于今日难矣。抑知所以难者奚在耶？防海于昔日易，防海于今日难。昔日之舳舻楼船，不敌今日之铁甲飞轮冲风破浪也。防海于远易，防海于近难。昔日泰西各强敌，越国鄙远而来；今南洋各岛悉为占据，则边鄙已同接壤，郊垆无异

户庭也。况中国自东北迄海南为省者九：曰黑龙江、曰吉林、曰奉天、曰直隶、曰山东、曰江苏、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绵延万余里。其海口最著者则曰混同江、黑龙江、海参威、珲春、牛庄、旅顺、大沽口、烟台、威海卫、吴淞口、崇明、乍浦、定海、玉环厅、马江、厦门、汕头、台湾、南澳、香港、虎门、珠江、老万山、七洲洋、雷州、琼州、北海，其余零星港口可寄碇停泊，及用浅水小火轮突入，尤指不胜屈。于此而欲节节设防，期如磐石之固，则备多而兵分。是故备北则南寡，备南则北寡，备中则南北俱寡，备此省则彼省又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设防之所以难周也。

为今之计，宜先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北洋起东三省，包牛庄、旅顺、大沽、烟台为一截，其间宜以旅顺、威海为重镇，势如环块，拱卫京畿，则元首安也。中洋起海州，包崇明、吴淞、乍浦、定海、玉环、马江为一截，就中宜以崇明、舟山为重镇，策应吴淞、马江各要口，则腹心固也。南洋起厦门，包汕头、台湾、潮阳、甲子门、四澳、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直抵雷、琼为一截，就中以南澳、台、琼为重镇，而控扼南服，则肢体舒也。

今国家虽已设海军衙门，而皮毛徒具，精义未详，呼应不灵，规模未备，则犹未能言实效也。西国军制：海军可以节制陆路，陆路不能节制海军。盖洋面辽阔，军情瞬息迁变，必非陆路所能知也。今中国海军提督无事则归疆臣节制，有事则听督帅指挥。疆臣与督帅均非水师学堂、武备院出身，不知水战之法，素为各管驾所轻视。所以昔年有马江之败，今有威海、旅顺之失。是宜就海军衙门王大臣中，选一水师学堂出身之大臣为巡海经略，总统南、北、中三洋海军，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疆臣之节制。两国既下战书，即许以便宜行事，有事则联为一气。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而不一救，致为西人非议。无事则分道巡游。四季四小操，岁终一大操。于三洋设三提督以统率之，每督标设左、右二总镇以分统之。提督居大铁甲船，总镇驻中等轮舰，其余将弁各居所带之船。就三洋中各择要害，多储煤斤，如北之旅顺、威海卫，中之崇明、舟山，南之台湾、南澳、雷、琼等处，即用舟师扎为水营，不得上岸建造衙门，安居而逸处，及嫖赌冶游。每岁三洋兵船交巡互哨，所到之处务以测沙线、礁石、水潮深浅为考绩。每岁于三洋所辖兵轮中，各抽一船出探南洋各埠，如越南、暹罗、小吕宋、新加坡等处，由近及远，徐及于印度洋、波斯海，水道沙线、风潮礁石，绘图具说，坐言起行，夫而后逐渐前进于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皆无不可到之理。

一旦海上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

迎击于海中；次调中洋、台湾、南澳之舟师，为接应、包抄之举；再次则调北洋军舰，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余船亦可徐进中洋，弥缝其阙，坐镇而遥为声援。此寇自南来之说也。若自混同、黑龙江北下，则反其道而应之。如由太平洋直抵中洋，则南北皆应之。兵法云：善用兵者，势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皆应。此今日海防大势所最宜取法者也。

若夫船务坚快，炮务命中及远，粮、煤、火药务精且备，将领务得智勇之人，水阵务操演纯熟变化，水务测探审细周详，是则当世时贤人人皆知之，人人能言之，更毋俟鄙人哓哓借箸也。谨筹其布局大略，以为上赞高深之助云尔。

海防中

上篇论水师分南、中、北三洋，势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皆应。如北洋有事，除大沽、旅顺、威海等处防守外，宜分船两队，一防守海口，一出洋游弋。防守者以两铁舰、两雷船、一蚊子船为正军，一驻山东之成山角，一驻高丽之鸭江口，东西对峙，见敌至即击之。游弋者以四快船、八雷船为奇军，梭巡不绝，往来于成山、鸭绿之间，一遇敌船则一面与之交仗，一面发电通传，东、西营同出围击。如此布置，则渤海为雷池，而威海、旅顺成堂奥矣。

或谓旅顺地势，黄金山炮台太高，止能击远，不能击近。倘敌船沿鸭绿江湾遵海岸而北，逼近黄金山左背山低之处，用桅炮翻山悬击，山下之船，澳北面之船坞，一时皆毁。纵口不失守，如修船何？其虑一。口外西北距近羊岛，无炮台亦无守御，恐敌船寄泊于此，而用小舟渡兵上岸。其虑二。旅顺濒南后路接连大连湾，由大连湾再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东、北两面皆海北则近牛庄海，南面则大海，狭仅七十里。倘敌人于此登岸，坚筑营垒以断我后，再以铁舰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则旅顺遂成绝地，援兵、军火、饷道皆不通矣。其虑三。有此三虑，亟宜预防。后路多筑炮台，左近港汊犹宜添布水雷，常驻铁舰雷船，斯可有备无患。闻西人云，我中国各口炮台，后面无炮，亦无重兵堡垒，多顾前而不顾后。如昔年洋人之入北通州，抄大沽炮台之后，马江之战，亦抄福州口炮台之后，所以往往为敌人所算也。况一炮台有数炮，而测量准头放炮者只一人，多至两人，未尝于每座炮位专派定一精于测量准头之人，动至顾此失彼，因小失大也。

或又谓用王大臣出为巡海经略，其论固当，惟必须于王大臣中公举一夙谙军旅、熟知水军事务者膺此重任，方能实力经营。尤须久任不移，乃能上下一心，日求精进。当今王大臣耆年硕德虽不乏人，求其能深知水军事务、胆识俱优者，恐难其选。似宜于宗室王公、贝勒中推选年富力强、有志军旅者，先赴外国水师学堂观政三五年，学习有成，乃授此任。如英国太子当兵船伙长之例。数年之后，督率有人，挟持有具，可以日臻富强矣。闻日本王之弟亦学习水师，将为统帅。德国武备院尚有日本人肄业，或在步队，或在马队，或在炮队。又有四武员今至俄国学习行军之法。前海军教习琅提督云：中国重文轻武，往往小视海军将弁，故世禄之家不喜入军籍。且各兵死于战者，无以抚恤其妻子，和议成后即遣散归家，所领口粮不敷回乡水脚之用。如昔日马江之战，某炮船出洋学生充当伙长，燃炮伤毙孤拔者，其船被敌击沉，浮水回见大帅，仅给银三元。非但水脚不敷，且医药无着。查西例从无。游勇营中受伤者，即为医治。为武员者，皆折节读书，不徒血气之勇，多有亲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陆军营效力者。水陆将弁必须由武备、水师两学堂出身，否则久历戎行、迭获胜仗，亦不能升为武官，只拔为哨长、水手头而已。中国海军提镇多由营伍军功洊升，亦有由陆路人员升调者。既不深知水师事务，又未经出洋训练、观战他邦。毋怪昔年各海口之战，我国兵官皆徬徨失策、措手无从，非尽因洋人不守公法、未示战期而既开仗也。

昔年彭刚直公督办广东防务时，有谓守海口不如守内港，宜舍虎门炮台专顾黄埔、沙路之说。刚直以其议下询诸将士。余时任营务处，对曰：其说本自魏默深，云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港。盖当时水师未精，无铁舰、水雷护卫故耳。今若不守外洋，则为敌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为敌人所据，施放桅炮，四乡遭毁。彼必得步进步，大势危矣。愚见：现无铁舰，虽不能出战外洋，惟既有炮船、水雷，仍可扼守海口、内港。所云沙路、黄埔、鱼珠之炮台，极应固守；虎门为合省门户，地势扼要，有险可守，尤不可废。惟海口炮台易受敌攻，不似内港易守，必须护以铁舰、快船，成犄角之势，布置水雷不使敌船近前所放水雷之处，须派兵船看守，勿为敌人偷进。若使铁舰出战，宜张铁网以避水雷，备鱼雷以破敌舰。海口以内，炮台守备尤宜周密。然后敌船不能闯越。至统兵大帅，当于早晚或风雨晦明之时，出其不意，传令操演，恍若偷营劫寨，观其各部有无准备，以验其平日之勤惰。凡兵船、炮台之司炮者，必须精于测量，方能命中及远。测量之法甚多、甚微，必须知我之炮台高低，我炮弹药力如何，每秒去多少远，敌船每秒约行多少远，风潮或顺或逆，庶有准绳因统一炮台，所置各地糜费甚巨。今为省数十万之费，而不预先讲究测量诸法，以致有名无实，诚为可惜。纵能击中一二炮，亦幸中耳，岂得谓之为把握哉。宜飭令营官监临，不时打靶，日发几炮、中几次，用簿记明，核实认真，无使虚糜弹药。刚直公深以为然。

若水师人员尽如刚直公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事事认真，集思广

益，讲求整顿，何事不成？西报谓中国固守成法，科目、政治决难更改。纵深知积弊，择泰西之善者行之，然犹讳疾忌医，不肯实心实力，惟略示变通而已，有名无实。我西人无庸畏惧，尽可放胆为之。又谓中国水师未精，边防未固，将才未足，铁路未成。年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舰，多置军械，及遣人分住各口，设贸易馆，习方言，托名学贾，实则交结匪人，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大患。俄、英、法三国属地，铁路皆将筑至中土，托名商务，意在并吞。倘俄、法合力侵犯，水陆并进，南北夹攻，恐西人之大欲将不在赔费，而在得地矣！俄、法有事，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护商人、教士为名，亦分占通商各口，后患之来不堪设想！

噫！彼族之贪如此，中国之弱如此，天时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谓我中国尚可墨守前规，不亟亟然早思变计哉？此天下有心人所为扼腕抚心、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

海防下

昔者马江之战，兵船全数摧破；威海之役，复举新旧战船，尽为敌人所虏。见晒于外人，貽讥于小国，南、北洋之所恃，一旦几于烟消烬灭。

说者谓海军设立之时，心有所恃，致招外侮之来。今既片艘无存，不如自安孱弱，静以待时；若再剜肉补疮，造船购炮，将见国用日至于不支，而军事未必有起色，欲御侮而适以召侮，殊非万全之计。

不知有海军之时，尚不足以御外侮，若并此而无之，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有不启盗贼之心者乎？且海军为陆军之佐，表里相扶，不能偏废。闭关自守，患在内忧；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内忧之起，陆军足以靖之；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

自仿行西法以来，机械日精，虽训练未必认真，而已非从前可比，内忧自可无虑。若外侮之来，不能预料，现虽群联辑睦，而鲸吞蚕食之心，何国蔑有？其所以不即发难者，欲将中国利权尽夺，然后任其施为也。日本以兵力相胁，要求挟制割地通商，不啻导其先路焉。以一区区岛国，鱼肉中土，尚不难如取如携；若俄、德、英、法诸大国久已雄视天下，以中国为可欺，一旦蠢然思动，其势力较日人为何如？如人之患病然，其发愈迟，其患愈重。

西人惟利是图，以后通商之口愈多，交涉之事愈杂，若以势力

不敌，处处顺受，事事听从，何以为国？若一龃齟则皆以干戈从事，犹孤客夜行，手无寸铁，突遇强寇，将何以御之？割台湾，偿兵费，择口通商，丧师糜饷，可以为前车之鉴矣。犹不亟讲求兵备，力图自强，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复失地之仇哉！

说者之谓战于大洋不如战于沿海，守外港不如守内河，敌国之师长于水，我国之兵长于陆，以空海上之地为瓯脱，诱之深入，聚而歼之。

不知海疆一失，如人之血脉不通。凡泰西各国无不设立海军，岂可因噎废食，海防自此遂可不设乎？闻广东水师学堂业已裁撤？此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驾驶船舶，施放枪炮，辨识风云沙线，测量经纬度数，能纵横驰骤于洪波巨浸之中，历风涛台飓而不惊，当炮雨弹林而不惧，火龙百道神志愈闲，一舵在手操纵自如，变化不测，进退疾徐，皆以敌船为准，占上风以求必胜，俾敌船无所施其技，而后其用乃全，是皆人为之也。船坚炮利，器械精固，乃其次也。考马江、鸭绿江、威海之失，因事权不一，且统帅、管驾均未得人。泰西观战诸舰将，素皆奉其海部之威令，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及见南舰优游，置北难于不顾，未免动色相告，论为异事。然日本则思之烂熟矣。华舰有南、北、闽、广之殊，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明知两军相见，彼此必不相救应。争城掠地，易于拉朽摧枯，是以心气愈肆，胆气愈豪，皆谓水陆奔驰，我以全力相贯注，如入无人之境耳。今战氛已息，积弊毕呈，西人将勒成书，用垂炯戒。

尝闻鸭绿江助战之西人名垞而者言：中国铁舰虽大于日本，而行驶不及日本铁舰、雷船之速。目击日本“吉野”舰所发快炮，络绎不绝。“定远”、“镇远”两铁舰仅发一炮，而“吉野”之炮，已约有四十弹丛集我舰，是人在舱面测量准头之法实无所用。且我舰甫开一炮，烟历十四分钟不散，手足忙乱，我军因是为敌所乘。若炮弹中实以泥土，虽中敌船亦不能炸，更无论矣。

又英《太晤士报》亦言：鸭绿江之战最足发人深省者，莫如快炮。日本“松岛”、“岩岛”、“桥立”三舰，各有计重英权五十吨之大炮，日人不用。中国则“定远”、“镇远”纯用大炮，而开放甚缓。日舰之伤华舰，非大炮力也，皆借小而极速之炮胜之。观乎此，则亡羊补牢，可以知所变计矣。若幡然变计，所置船炮其速可与外国并驾齐驱，而统帅、管驾仍未得人，亦适以资敌耳。西例：水师统领之职，非久在兵船管驾，资格最深者不能升。吾国丁统领既非水师学堂出身，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语言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数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故为管驾所轻。其中利弊俱为部下所蒙，糜费颇多，动为部下掣肘。自中日之战，北洋大臣始知丁统领之旷功溺职也，遂延德将汉纳根为副统领。汉纳根乃陆军武员，非水师出身，亦用违其才。虽汉纳根知难而退，北洋大臣复请英人马格禄代之。查马格禄乃商船学堂出身，曾

当怡和“南河”船主，只知驾驶，于水战诸法茫乎未知，无策可画，无令可出。所用人才如此，安得不败，又安得不为各国轻侮乎。

今欲求得人才，必先储才，而储才之法于前篇《学校》、《考试》、《水师》、《练兵》、《技艺》、《火器》论内已详言之矣。当此创巨痛深之后，正宜兴卧薪尝胆之思，枕戈待旦，洒涕誓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以中国之大，岂无英雄智奇之士足佐中兴？天下不患无人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所用非所学耳。上以此求，下以此应，桴鼓感召，捷于影响。朝廷亟宜讲求，认真仿办，以御外侮。况愚民无知，时为会匪煽惑，与教士、矿路工程为难，各国借保护为名，调兵据守，今日索此口，明日索彼口。我政府若仍畏难苟安，只求息事，非但海疆要口尽被占据，恐将为犹太、波兰、印度之续矣。悲夫！

边防一

自古以来，皆有边患。周之玁狁、汉之匈奴无论矣，降至晋、唐，以迄宋、明，其间如氐、羌、羯、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莫不强横桀骜，至本朝而后尽隶版图。似今日边防易于措置，而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海外诸邦也。

间尝盱衡时势，综览坤舆，而知今日之防边，尤重于防海。以常理测之，海属外，陆属内。大海旷邈无垠，陆则有物产，有城池，得寸则己之寸，得尺则己之尺。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譬之人身，京师腹心也，边塞则手足、皮毛、肌理也。善养身者，卫其手足，护其皮毛，固其肌理，偶有燥湿风寒，不能乘隙而入，则根本益固，神气益完。否则外感纷乘，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腹心虽存，岂有生理？此边防措置所以不可疏也。

况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一有衅端，逐处可以进攻，随时可以内犯。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陆不由海也，无疑义矣。盖海战虽各国所长，然必远涉重洋，又不能于海中长较胜负，相持既久，仍须登陆，孤军无继，此危道也。彼西人心计最精，岂肯趋难而舍易？前此法人扰我闽防，特因失利于刘军，欲取偿于中国，我又未能随机应变，致酿兵端，非果有谋我之心也。使果有侵地之志，或分兵而虚扰，或合力以专攻，则必由陆而不由海。故今日之中国，防海既难从缓，防边更为要图。

然而，边地广矣，在南则与法之越南、英之缅甸交界，在西则与印度比邻，在东北、西北由东三省、内外蒙古迤邐而至新疆，又在与俄接壤，皆强邻也。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盖俄人包藏祸心，匪伊朝夕，纵不即发，亦必阴耸日、法两国先与我开衅。逮我兵疲力倦之时，彼之西伯里亚铁路已成，必突如其来，借端渝盟，为我边患，亦已数见不鲜。咸丰八年，乘中国方有兵事，据我乌苏里江东之地五千里，诳占我沿边卡伦以外之地万余里。薄人之危，幸人之祸，其处心积虑可想而知。又与日本易唐太岛即库页岛，储军械，屯重兵。近来造西伯里亚铁路，由彼得罗堡直达琿春。查铁路之造，虽所以使用兵，亦所以兴商务。是以各国铁路大都造于繁庶之区。今俄人独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俄宜先也。

然而防俄防于西北乎？抑防于东北乎？曰：昔日以西北为急，今日以东方为重。何以言之？俄之精华富庶皆荟萃于西，故其枪炮之屯藏，部落之雄壮皆在西境。若与中国有隙，必先扰动新疆。倘西伯里亚铁路造成，则由彼国京都达我边界，调兵运械不过瞬息之间。是其今日之东路，已便于西路数倍。况我京师首善之区，正居东北。故中国及今筹备防务，当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此亦先难而后易，先急而后缓之道也。

且夫措置防务，非可徒托空言也，非可狃于近效也。是宜添练防兵以联声势，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行军瞭望向惟专恃远镜，若无高山可踞，则所视亦复不远，虽猱升竿颠，略能了敌，然竿高不逾百尺，三英里之外目力穷矣。今英国兵曹拟用轻气球，高可至七八千尺，以气之加减为升降，以代竿楼之用，凭虚俯视，百里之外宛在目前，而所视之远近，迥不相侔矣。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垒。土垒者，防边之急务也。昔罗马称霸欧洲，大者畏威，小者向化，即以土垒之功。盖有土垒，则据高临下，敌必不克骤攻，我又借以遮避，易于伺击。明嘉靖时，西班牙王喀尔五与敌交锋，患敌之众，急筑土垒，敌不克攻。越日援兵至，遂以获胜。万历十三年，西班牙用土垒之法攻恩脱尔，亦获大胜。嗣后欧洲有三十年大战，皆以土垒之坚否，分两军之胜负。然则土垒非防边之首务哉！

尝闻罗星潭观察云：筑垒之法，必须营垒如回字形。凿四方空处之土，深五尺，累四面为墙，下厚五丈，上厚三丈。所凿低下之处修营房，两傍如街，然其街心挖沟作回字形，中心则凿池蓄水，惟留一方竖柱竿，以绳上下，而望四方。如是，则营房在土中，地高于人矣。房则盖竹木泥土，外覆城顶，后接池边，中临街心，势陡而土厚，旁高而中低。敌击以开花弹，前堕城外，后堕池中，中堕沟下。弹虽开花，于我无损。即使弹落房顶即炸，而竹木泥土皆

软厚之物，柔能制刚，似可无虑。若用钢弹击我，则墙厚数丈，小弹亦难穿也。西国筑土之法亦犹是欤！今东三省，崇山峻岭所在俱有，诚使扼其险要，多筑土垒，则进攻、退守绰绰有余。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此之谓也。

虽然，武备讲矣，防务固矣，而不筹足食之道，仍不足以持久也。是非屯田不为功。屯田之法创于汉文帝，募民耕塞下，为行屯之权舆。及赵充国留屯金城，而屯田之利始普。晋、唐以还，其制屡更。有所谓军屯者，如汉武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责六十万人戍田之是也。有所谓民屯者，如唐初行民屯，及天宝间，天下屯田岁收一百九十余万斛是也。有所谓商屯者，如明永乐间，下盐商输粟于边之令，每纳米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复令近边荒闲田地得自开垦，使永为业。商人惮转运之劳，无不出自财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是也。

今东三省土壤沃饶，水泉丰溢，诚使参酌成法，择善而行，则数年后，贫瘠之区，皆可变为富庶。况以民养兵，而兵可不溃；以兵卫民，而民可无忧。兵民相依，人自为战，而边防有不固者哉！

边防二

防边之要着，固莫急于东三省矣！其与东三省壤地相连、安危相系者，尤在朝鲜。朝鲜世守中国藩封，不侵不叛，我中国亦处之甚厚，待之独优。比来遣员理其商务，使开口岸与各国立约通商，所以抚绥之者不遗余力，诚以朝鲜与奉、吉毗连，实为东北之屏蔽。其地存则东三省之基固，其地亡则东三省之势孤。欲固东北之边，实以保朝鲜为第一策。

然保之亦有难焉者。其国小而弱，比之春秋，则犹晋、楚间之郑也；比之战国，则犹齐、楚间之滕也。而又不思自强，不知自奋，兴自然之利，不克培有用之才。其地自图们、鸭绿二江，以迄南海、巨济，袤延一千三百余里，土饶矿产，金沙尤多。俄人早已逐逐眈眈，欲踞之为外府，然后徐图东三省，为并吞囊括之谋。日本亦有心图此久矣。是朝鲜一隅，为俄、日所共争，亦中国所必守，然恐非中国独力所能支也。何则？朝鲜交患俄、日。俄之土地广，兵甲强，以取朝鲜不啻以虎搏犬。惟恐日本相抗，故于西伯里亚赶造铁路，惟日不遑。一旦告竣，直接东三省，则济师运饷速于置邮，必先踞东三省后吞朝鲜矣。日之对马岛与朝鲜之釜山仅隔海岬数十里，

朝发夕至，不但为日本及黄河以北各省之患，且黄河以南、长江各省亦将被扰。法与同盟必起图滇、蜀、黔、粤，以牵制英人，英之东方商务自此而衰。为中国计，亟宜变法自强，结日联英，以拒俄、法。何则？俄人贪而无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得志于亚洲，必肆西封于欧土，浸假而进窥波斯、土耳其、印度，亦英人所深忌也。故数年前有巨文岛之占据，藉分俄势。此英文中国以保朝鲜之明证。盖英人财产在中国者颇巨，论其国势虽在欧洲，而印度、缅甸、香港、南洋各岛既属于英，命脉精神，皆在亚洲之内。英东方商务较各国首屈一指，防人攘夺，日靡于怀俄并朝鲜、东三省，则黄海之利将为所攘。英于香港、南洋各岛皆设埠头，货物之盛，阗阗之众，为西人东来之咽喉，俄、法岂不垂涎？俄既逞志于中土之北，法既逞志于中土之南，势不至旁溢横出不止。香港近在咫尺，岂能安枕无忧？既南洋大局，岂能毫无变动？不特此也，俄之谋土耳其、印度久矣，法之谋暹罗、滇粤久矣。今俄与法各得筹饷之所，屯兵之所，则并力合举，一由北而南，一由南而北。英人虽强，恐难相御。况朝鲜与日本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为日本计，亦宜速与英立约，同保朝鲜、辽东，布告各国，公同保护，一若欧洲之瑞士、比利时、土耳其故事，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最为妙著。中、英、日合，非但朝鲜及中国边省可固，即日本与英之属土亦固，东方太平之局不难保矣。

夫中国地大物博，当创巨痛深之后，果能发愤自强，又得英、日维持，虽许群雄以开矿、铁路之利，国势何难复振？惟闻西伯利亚之铁路日渐展筑，然仅能至辽东、珲春。太平洋中，俄不得经岁无冰之海口，势必注意于旅顺、大连湾，以为驻扎海军之地。如得旅、大，贯以铁路，驻兵防守，则东三省在其掌中。俟有机可乘，彼将甘言诱约，握我利权。各国禁之不从，势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相率效尤。

为中国计，亦宜将东三省与各国通商，作为公同保护之地。无论何国干我内政，损我主权，割我土地，不可轻许。宁被霸占，免贻口实土地者，一国之所共，非一二人之所得私。权利者，一国之所公，非一二人之所得弃。故泰西成例：无论割弃土地、抛弃权利，在局外干预之国必视其民之向背，以定其事之从违。其在咸丰七年，奥为布蹶，以三郡之地得诸丹者，让诸布。立约曰：如北郡民不愿归，即当以其地返诸丹。咸丰十年，那伯里及恩伯立诸邦归并意大利，亦从居民之愿。英、法、俄、土干预希腊诸国事，约明约尼七岛居民，愿归希腊则可，否则不得勉强。诚以民为邦本，国家大事必顺民心也。况俄当日仗义执言，索日本还我辽东，为保东方太平起见。如食前言，恃强霸占，虽各国不以力争，未必效尤，亦貽笑天下。否则不为埃及，必蹈波澜覆辙矣。总之，立国之道在乎审机应变，上下一心，得人行政，以图自强。若不自强，即善结邦交为虚势以阻其外，而内力消阻，恐阻我者反而噬我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卷七 兵政

边防三

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古之御戎不过数国，今则书文车轨遍及五洲矣。自非总揽全局，必不足以御人。苟非思患预防，亦不足以立国。是故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列强属土毗连中国者，亦不可以不防。

鄙人目击时艰，孤怀忠愤。前奉檄赴南洋各邦侦探敌情，遂历越南之西贡、金边、暹罗之都城、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等处，纵横万六千余里。东南尽海，西极印度、孟加拉，北至滇、黔之边境。轮舟来往，一苇可杭。道光季年，海氛四起，英、法二国以兵船侵扰。南洋如暹罗、越南、缅甸，精华繁盛之区，先后为他人所据。

我云南一省，五金矿利甲天下，英、法覬觐已非一日。特三国蔽其外，未能径入藩篱。今暹罗虽存，受制英、法，越南已为法占，缅甸复被英吞，是云南一隅绝无屏翰之可恃矣。尝闻英、法遣员游历黔、滇、西藏、缅甸、越南诸境，绘图具说，简要精详。并见英铁路图，以深贡为始基，向北直穿缅甸全境，由蛮暮入云南永昌；又迤东行，穿葛亮、老挝，经缅甸三境，由阿瓦京城会英铁路，入云南永昌；又迤北行，穿越南北圻，由天洞山入云南蒙自县境。英、法蓄谋已数十年，曩曾探悉外情，密禀粤中大帅，势必争先恐后，二国火车将交萃于滇境。滇中兵燹甫息，库藏空虚，倘不及早防维，一旦强邻入寇，何以应之？是宜亟筹固滇之策也。

夫滇之永昌、思茅、蒙自，以及毗连緬、越各要隘，皆须镇以良将，守以精兵，多筑坚台，广列巨炮，克敌利器，精益求精。今滇省所用枪炮购自西国，委员由粤、沪解往，所费甚巨，重大之炮，难逾峻岭。转运之艰如此，何如就省创设机器局，购置西国合用之机器，延请西国精于机器之人，教我华工自行制造。一切枪炮、军械日新月异，则守御之具无虞缺乏矣。更开采五金各矿以充军饷，绝敌人之窥伺，壮边塞之声威，则地宝之丰出为世用，何至呼庚呼

癸，动费川、湖协济之款哉？

至西藏与印度毗连，英人于数年前兴兵侵据我独脊岭外地千余里，嗣后订立和约，水西流之地皆归印度，东流之地归于西藏。番民虽不服，无如何也。今英人设埠通商，渔其货财，利其土地。盖藏地遍产五金，绰思甲土司地连俄境，与蜀之打箭炉诸处，金沙、银矿随在皆有。英之游历者处处搜采泥石，携之而去，垂涎之意，行道皆知。苟非刻刻提防，安不忘危，整顿边防，开采各矿，西藏不保，蜀境岂能久安？

或谓泰西各邦款关通市，不过贪利而已，原无兼并之心，岂愿中外战争致为贸易之碍？各国公论亦可畏也。不知英夺缅甸，法并越南，一朝铁路告成，窥衅云南，进扰西藏，入图巴蜀，兵由陆路，势若建瓴，并不扰及通商大口，贸易何碍？各国何词？然则筹备之方，其可缓乎！

《孙子》云：毋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之。御敌者以自强为本，以自守为先。不能战，安能守？制器难，练兵难，筹饷难，得良才以制器、练兵、筹饷，则难之又难。兵法曰：器械不精，以其卒与敌也；兵不习练，以其将与敌也；将非才武，以其军与敌也。可不慎欤！西藏、川、滇现虽安堵，积薪厝火一发难收，未雨绸缪，是所望于深识远虑之君子。

边防四

陈君还之久居缅甸，尝遍历缅甸、前后藏、印度毗连之地。己丑秋初归，语余曰：缅甸水道伊里洼里江，南北三千余里，通至滇界土司地。其水道最要之区，土名贴交墩，一名上石坑，即前明分界处，湾曲甚多，两旁皆崇山峻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大罗江之西由蛮暮、新街至孟拱等处，其地数百里，皆前明孟养土司之地，土名孟养。此中多产翡翠、琥珀、树胶、梗木等材料，而胶树取胶尤胜于阿非利加。按五大洲产树胶处，惟缅甸与阿洲耳。当英人据缅时，曾遣人窥探该处均无华人，遂尽为所有。如先派拨华兵数十名驻守，彼必不敢夺取。既夺取后，华兵始至，彼反行文询诘总理衙门，凡孟养司属地新街、蛮暮等处，究竟谁属？我朝执政未悉其中出产，恐酿事端，遂许尽归英国。今但以野人为界。山之内外皆土司地，与云南迤西等处毗连，由蛮暮分三路通滇界，一通腾越，一通龙陵洲。英人已有铁路由仰江即英属埔头达阿瓦即缅甸京

城，二十六点钟可到。另有铁路由印度孟加拉达阿桑。现拟一由阿瓦达滇之思茅；一由阿桑达缅甸之老玉厂、新玉厂、琥珀厂、产树胶之地，入迤西诸部；一拟由各厂至孟拱，直到格萨。前较所绘之铁路尤捷云。此英、缅近年交涉情形也。至北印度与前后藏只一路相通，名怕里阔二，内有地三百余里，属哲孟雄，雪山内土名竹木，山外土名锡起。哲孟雄酋主面许英人在其界内修筑马路，每月私受英人银一千路卑，名为请英保护，而英则直受之为附庸矣。藏王闻英人越界筑路，即责问哲孟雄酋主，而酋主佯作不知。藏王乃率兵出关据守，英人嘱其即退。逾限不退，立即开仗。英人攻退藏兵，旋据其地，后复强要入藏，设立领事通商焉。此英、藏近日交涉情形也。今观云南界连后藏，与缅甸、印度接壤之处险要尽失。惟有阴结土司，勿使外向，凡通缅甸、印度各要隘，均须坚筑炮台，广列巨炮，慎选精兵，严密守御。尤须驻藏大臣与之交涉，操纵自如，固我番民之心，遏彼觊觎之念，庶可稍免后患云。

边防五

光绪十一年英兵进据缅甸之初，前使臣曾惠敏先与英外部会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人自以骤辟缅甸全境，喜出望外，是以有允曾惠敏三端之说。界务一端，则愿稍让中国展拓边界，盖指普洱边外之南掌、掸人诸土司，听中国收为属地也。商务二端，则以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在八募近处勘明一地，允中国立埠设关。八募即中国之所谓新街也。当时曾惠敏以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论稍觉游移，又因中外往返商查之际，未能毅然断而行之，仅与外部互书，节略存卷，旋即交卸回华。次年英署使欧格讷与总理衙门议立缅甸五条，又以三端尚非定局，遂未列入约中。

至十八年，朝廷命前使臣薛福成与英外部议界，盖在欧使立约之后已六七年矣，查阅使署接管卷内有曾惠敏议存节略，英文参赞马格里又系原议之人，屡赴外部重申前说。外部坚不承认。据称西洋公法，议在立约之后不可不遵，议在立约以前不能共守，以其有约为凭，既不叙入约章，必有所以然也。

英人自翻前议，虽以公法为解，实亦时势使然。当其并缅之始，深虑缅民不服，及缅属诸土司起与相抗，万一中国隐为掣肘，彼则劳费无穷，因不敢不稍分余利以示联络。彼之所以骤允三端者，时为之也。既而英人积年经理，萃其兵力、饷力戡定土寇，复于缅甸

之野人山地稍用兵威胁服，收其全土，磐石之形已成，藩篱之卫亦固。彼之所以忽靳三端者，亦时为之也。

前议三端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无把握。且查滇边诸土司，虽或久隶中国，然自乾隆以后往往有私贡缅甸，以图免扰而固圉者。英人执此为辞，来索缅甸固有之权，则或指为两属，或分我边地，殆事势之所必至。若中国既失藩属于前，又蹙边境于后，非特为邻邦所窃笑，亦恐启远人之覬覦，殊非计也。适值十七年秋冬以后，英兵游弋滇边，常有数百人以查界为名阑入界内，去来恣忽。野番土目，惊耸异常。英兵常驻之地，则有神护关外之昔董暨铁壁关外之汉董。英人用印度武员之谋，窥逼近界，以至沿边骚动，风警频仍。云贵总督王制军虑启衅端，迭经电达总理衙门，由前使臣行文照会外部，斥其违理，责令退兵，又屡赴外部苦口争论。英兵稍自撤退，滇边暂能静谧。

查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若照万国公法，应由中、英两国均分其地。曾惠敏尝有此意，而未申其说。薛使因复照会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明知英人多费兵饷占此形胜，万万不肯轻弃，然必借此一着，方可力争上游，振起全局。外部果坚拒不应，两次停商。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复出而挠之；印度部所稍松劲者，印度总督复出而梗之。印督至进兵盩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愿分地。经薛使相机理论，刚柔互用，总理衙门复向英使欧格纳辩论，力伸划江为界之议，因以滇境东南让我稍展边界。

乃与印督商定于孟定橄欖坡西南边外，让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与潞江中间。盖即孟良土司旧壤，计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猛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悉划归中国，约计八百英方里。又有车里孟连土司辖境甚广，向隶云南版图，近有新设镇边一厅，系从孟连属境分出。英人以两土司昔尝入贡于缅，并此一厅，争为两属，今亦愿以全权让我，订定约章，永不过问。至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毗连之处，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驻兵之昔董大寨虽未肯让归中国，愿以穆雷江北现驻英兵之昔马归我，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峰，西逾南嶂而至新陌，计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地约计七八十英方里，是彼于野人山地亦稍让矣。其余均依滇省原图界线划分。惟腾越八关界址未清，或称汉龙关自前明已沦于缅，天马关亦久为野人所占跨，则八关仅存六关，经薛使再三争论，此二关亦归中国。又前年英兵所驻之汉董，本在界线之外，因其扼我形势，逼处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愿退让，以表格外睦谊。于是界务乃竣。

窃维数十年来，西洋诸国竞知中国幅员辽阔，又有不争远土之名，一遇界务交涉，鲜不为眈眈之视，意存蚕食者。于是琉球、越南、缅甸以藩属而见吞，香港、九龙、海参崴以边隅而被攘，甚至有睨及朝鲜、议及台湾者。中国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开疆生事之嫌，得之则曰犹获石田，失之则曰不勤远略。顾石田弃而腴壤危矣，远略驰而近忧迫矣。我视为荒土而让之，彼一经营则荒土化为奥区，以夺我利柄。我见为瓯脱而忽之，彼一布置则瓯脱变为重镇，以逼我岩疆，伺间蹈瑕，永无底止，岁朘月削，后患何穷！故必择一二事以全力争持，然后可以折狡谋而挽积习。

此次勘界之役，虽获地无多，而裨益有五：风示各国，俾勿藐视，一也。隐备印度，杜其窥伺，二也。保护土司，免受诱胁，三也。捍卫滇边，防彼勘进，四也。援用公法，稍获明效，五也。有此五益，始知曾惠敏所商展之界，迄今时异势殊，稍有窒碍。盖南掌诸部近已尽归暹罗，争之已觉不易，而掸人各种惟康东土司最大，其地与车里相仿佛，英人欲据以遮隔，法、暹两国断不肯舍，抑且离我边境较远，控制不易，固不若今日之所展皆在近边也。

边防六（甲午后续）

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国也。中国屏藩尽撤，俄瞰于北，英睽于西，法隣于南，日眈于东；且英、法、美、德、俄、日先后向中国皆索有租界，为侵占之先机。我国亟宜变法自强，连衡御侮。查美国在墨州地旷人稀，尚无远图之志。英、法、德、俄、日散居欧、亚两洲，地势毗连，铁路、轮舟无远弗届，不免有恃强陵弱、蚕食鲸吞之虞。各国莫不讲求武备，诈力相角。

中国往年见爱于英、日，均欲连衡；今则见弃于英、日，易生仇隙。前后歧视之故，皆因败于法、日之战，为人轻视耳。

上篇拟变法自强，联俄以制英，勿为英人所侮，释嫌以交日，勿使日人多疑，如德之与澳、意连衡，庶外人不致觊觎。然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从、连衡。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也。

当今公使、外部大臣，其辩诈恒如古之苏秦、张仪，故其言未可轻信。试观中、日“高升”轮船事可知矣。甲午季夏，我国欲租英商“高升”轮船载勇赴朝鲜。驻韩城之参赞唐少村太守知日意，电禀北洋大臣，请其改图，恐日人必不许“高升”之勇登岸，非嘱

返国，即拘赴日本，或为彼袭击。当道犹疑不决，询于天津英领事。英领事即电询其驻京公使。公使电覆云：“无碍，可以前往。”且云伊与日公使交最密，断不致失好。当道均信以为然。不知日人蓄谋久矣。甲午孟夏，南、北洋水师大操，法参赞对日外部曰：“中国水师无用，正可乘时取之。”是英、法皆有乐灾幸祸之心。否则何以“高升”击沉于海，英廷不肯力追，又不与俄、德、法联盟，以遏日势之焰乎？

且天津游勇恨“高升”船为日人袭击，所伤之勇多其同乡至好，闻“重庆”船大餐房内藏有日奸，遂登船骚扰，有类日人面貌者致为所拘。北洋大臣闻信，即饬委员向该船及英领事处致意抱歉，应可释然，而英人心犹未足，须“重庆”船来时鸣炮廿一响，方允息事。英廷尚以为办理得法，升为头等公使。外国均以此为辱，得无欲令日人知其不助中国之意乎？

且日本在朝鲜之勇无礼于英领事，较华勇在津无礼于商人情节较重，而英廷不责索日人赔礼，或云英领事之夫人被日兵倒拉，推之沟中，英廷不责日人赔礼，反将其领事撤任。可见其相待日人之心矣，专为中国计较。可见理绌于势，则公法亦不可恃。当今之世，智取术取，甘言难凭。

查西报载：光绪六年，英国将中、英、法交界瓠脱之地以畀中国，并说不可转赠他国。今中国假俄、法、德之力，向日本索还辽东，而法请用瓠脱之地以相报。各日报遂大发议论：德索胶州湾，俄索大连湾、旅顺，英必索威海卫，法索广州湾，皆以为屯聚水师、修船之所，且绘有五国瓜分图说：俄索大连湾、旅顺，为占东三省及西藏地步。英索威海卫、舟山，以扼长江下游，自印度至西藏设铁道达川，以扼长江上游，志在长江一带。法则自越南东京设铁道以达滇，而窥滇、蜀，通龙州以困广西，索广州湾以困广东。德则索胶州湾以困鲁、燕，并欲揽山西矿、路之利。日本欲索厦门，占闽、浙，以困台湾。强邻窥伺，时势危急，不若将沿海毗连强邻之埠，尽行通商，公定章程，以免侵占。各国公使竟敢照会总署，谓某省之利权不可让别人，又为商人谋办矿、路，争先恐后，其包藏祸心已可概见。呜呼！我君臣被辱极矣！我国人被欺侮亦极矣！如尚不发愤为雄，上下一心，恐不出数年，势成瓦解。

窃思泰西诸国，大启戎心，虽由于我国不能自强，亦由于英当中为日败之时，不知仗义执言，让俄与法、德联盟，扶中抑日，以遂其私耳。殊不思中、日衰弱，则俄势益强，俄强则英弱，英强则俄弱乎？果如西报所论，不能公同保护，中土变成波澜，岂独英、美之商务自此而衰，即亚洲之属土亦自此多故，不但日本可危。故忧深虑远者，谓俄、法、德将来瓜分中土，尤恐兵连祸结，牵动全球。即中与日、英与美同种同文，且英、美之属土多在亚洲，商务

最大。为英、美、日之计，理宜合力以拒俄、法、德，保东亚太平之局。今美、日尚未同心，日谓国小力弱，只宜于西伯利亚铁道未通时拒俄以争朝鲜；英、美既不我助，安能拒俄、法、德，又保中国？美谓俄、法、德不犯我属土，不愿失和，损兵糜费。英谓与俄、法、德同洲，势须回顾，恐得罪强邻，牵动五洲属土，利于东不利于西，利于水不利于陆。于是知俄、法、德以利合，其势易；英、美、日以义合，其势难。难合者弱，易合者强。欲反弱为强，变难为易，其在德乎？盖泰西诸国水师之精，群让英、法，陆兵之强，首推俄、德。故德附英、美、日，则英、美、日强；德附俄、法，则俄、法强。欲止俄、法之贪，惟望德与英、美、日相联耳。

查德、英世结婚姻。德在中国商务日盛，何贪目前之利，忘日后之患，不顾大局而坏商务乎？况俄、法强，必不利于德。法之志，时欲报仇；俄之贪，历世不已，观彼德临终遗嘱可知矣。俄非但兵多，且善阴谋，每行贿于邻邦重臣，俾遂所求，或行离间之术，使两国失欢交战，彼即从中渔利，盖犹行彼德之志也。兹将彼德遗嘱十四条附录于篇后。

我中国纵得强邻保护，亦不可有恃无恐。急效俄之彼德、日之明治，变法自强。仍冀日本念辅车相依之谊，唇亡齿寒之忧，极力维持，非但中国之幸，亦亚洲之福也。

边防七(甲午后续)

中华居亚洲之东，东界黄海、朝鲜，西界西伯利亚、图尔齐斯坦、印度，南界缅甸、安南、印度，北界西伯利亚。惟日本毗连朝鲜，地近畿辅，与我同文同种，理宜互相保护，岂可同室操戈，致招外侮？不料日本自维新以来，藉口生番戕彼遭风难民，不顾大局，派兵自剿。夫日人之侵台湾，即灭琉球之渐也。其灭琉球，即将据朝鲜、扰中国之渐也。兴亚之会言犹在耳，而为朝鲜一役，毁夺我兵船，侵轶我边疆，震惊我畿辅。及我遣使议和，犹且据台湾，割辽东，索赔兵饷二百兆，反为瓜裂中国之祸首。

此端一开，凡贪我土地者皆将效尤，以我中国为中矢之鹄。恐此后海疆有事，咆哮挟制之来必变本加厉矣。观中日构衅数月，各遣战舰前来，虽云保商，作壁上观，究欲同沾利益。盖中国土壤膏腴，矿苗繁富，各国狼贪虎视，环伺其旁，纵不为屠门大嚼，亦望分我杯羹。故中日和议既成，俄索东三省边隅以通西伯利亚之铁路，则由黑龙江达海参威无所阻矣。法索广开滇、粤口岸，则潞河、涓

江两国之轮船皆可行矣。德索天津租界，则东方商务得以广为开辟矣。然则原其初心，岂真大公无我，济弱扶倾？实忌日之强，阻其蚕食耳。

考俄、法素以开边为长技，英虽持盈保泰，德纵不敢轻为戎首，如俄、法忽肆其蚕食之谋，英、德亦难遏其贪心。甚至日、荷、意、葡等小国，亦皆将哗然而起，群相角逐矣。从来邦交之得失，系乎国势之盛衰，大抵势殊物异，情随事迁。吾见往日鄙日者，今联为心腹之契，而蠲睚眦之仇矣。英之“高升”被倭击沉，领事无故被辱，均不复问。有赠日主以宝星，而示亲好之意矣。俄、德两国亦赠日主以宝星。各国日报又无不扬日而抑华。日报劝其君以联俄，英报劝其君以联日。呜呼！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强，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

古之治国者，无不远交近攻。今海禁宏开，轮船无处不通，西伯利亚之铁路将成，又无远弗届，合地球五大洲各国成一大列国，如春秋、战国之世矣。就五大洲国势论之，美洲至大者美国，惟开基未久，旷土尚多，且法传公举，南北不和，现任总统，无志远图。阿、奥二洲全为欧人所占。亚洲亦渐为欧人所侵蚀。欧洲大小各国，无不专恃兵力，借传教、通商二事为嚆矢，到处并吞，作封豕长蛇之荐食。

查欧洲各国在外占人土地者，曰俄、曰英、曰法、曰德、曰意、曰日、曰荷、曰葡等国而已。葡、荷、日至今国小兵微，我无足畏。奥、意国债已多，岁征人不敷出，只可自守。法为德败，民气复元，思尚雪耻，所得属土，无不练兵。德自败法，急欲得地亚洲以为外府，志在鲸吞鲁、燕，蚕食晋、汴，将必西结意、奥，东结英、日以拒俄、法。英自救土耳其不终，再伐黑海不克，徘徊观望，自顾属土散布五洲，恐不能兼顾，故岁增水师，添募陆兵，以期长驾远馭。俄则跨欧、亚二洲，毗连一片，气局之阔如高屋建瓴，大有手擎六合，口吞八荒之概。如其国能君民共主，上下一心，东合中华、日本，可为亚洲盟主；西合德意志、法兰西，可为欧洲共主。惜俄政苛刻，军律不严，闻前在新疆与华兵开仗，无论老幼，诛戮无遗。且无上下议院，仍以权势治民，时有尼希利会人结党肇乱，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即智者亦乐就焉。会中之意，谓民间受苦过深，不但俄皇在所必去，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之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之勃兴必远胜于昔。而俄主曾弗恤此也，历代皆好穷兵黩武，虺蜴其心，豺狼其性，始则西并打牲诸部落，继则割土人东部。中国向恃蒙古、黑龙、戈壁为藩篱，今彼要结蒙古，蚕食而前，戈壁通道，黑龙失险，浸浸乎有逾兴安岭而通堂奥之势。可为寒心！惟西报有谓其举

动皆智取术取，不若英人以强陵弱，东侵西夺，动引万国公法附会其说，利则就之，害则避之，恤邻之义荡然无存。昔俄土议和，欧东底定，虽英人之力居多，然其保土耳其即保印度也，况土以居比鲁岛略之。英自居其功，阳为保护，阴实挟制之。土王拟更税额，责成诸总司征收，英人以为非是，而又代拟整顿小亚细亚章程，迫土行之，部内钱谷悉英员掌握。土人不胜其愤，曰：英之友睦，酷于俄之攻伐。凡所规画，以收揽事权为心，独断独行，几不知有土国。西报久已详论，非鄙人敢妄加褒贬也。闻俄人注意东方，甚思覓一海口以练海军，垂涎朝鲜久矣。惟见阻于日，故煽德据胶州湾，彼藉词亦索旅顺口、大连湾，聚水师以过冻，并筑铁路达西伯里亚。拟先占东三省，英、法、日势必争先恐后，藉口于利。益均沾，如《边防七》所论，各据其行权之省险要港口矣。噫！盱衡时势，当今各国恍若下棋，均于扼要处遍布一子。如中国不自强，将见群起纷争，不堪设想。

我国亟宜痛除积习，变法自强，结英、日以制俄。若不善为联络，而中日又互相攻击，正合俄人之意，其必乘我之敝，借端渝盟，据伊犁而震天山，驱叛回与我为敌，则新疆失于指顾，而关中为之侧足；东以一军由珲春渡黑龙而窥吉林，则关东戒严，京师不能安枕；且必遣水师占元山，牵掣日本，以图朝鲜；必约法人同时启衅，侵占滇、粤，亦遣水师牵掣英国。今日得寸则寸，明日得尺则尺。初若无足重轻，而积久必受其患。强邻日逼，势难展舒，则日本亦在其掌握中矣。中日唇齿之邦也，日人苟明哲，欲兴亚洲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曾邀余襄办亚洲协会于沪上，各省名士愿入会者颇多，俄、法领事疑忌，因稟请当道，不准，事遂中止。闻者惜之，当开诚布公与中国共订密约，保高丽以固东藩，遣名将镇南洋，结暹罗，复越南、缅甸，以缓南服或谓日、高宜合为一国，暹、越宜合为一国，仿照英、德、美章程，政治虽分，兵权归一，与中国连衡，足以御外侮而保亚洲。练蒙古铁骑、打牲番兵，率以名王而坐镇北朔蒙古人身体强壮，耐劳苦，善骑射，元朝囊括亚洲，本朝设法制之，现民少僧多，生计日绌，又为俄招充马兵甚众，亟宜变法招抚。布德回部，服其心，用其豪杰，藉纾西顾光绪十一年英据巨文岛，原以扼俄，近日俄困蛮蕃，欲以扼英，俄、英互相猜忌。俄之强，英之弱也。俄人若得高丽，与日本一水之隔，日本危矣。中国果能西结英而东结日，共保东三省、高丽、西藏，则屏藩可以长存，不至为他族所侵据也。惟势力未足，不可妄动招忌，恐合而谋我，反为所制。亟宜与各大国会盟，凡亚洲屏藩我国海口及与欧洲各国属土毗连之埠，公同保护，如欧洲之瑞士、比利时等国，任各国通商，不准干预内政，贪其土地。庶永保太平之局。吁！何计不出此，同室操戈，致招外侮乎？

边防八(甲午后续)

呜呼！言防边于今日，盖亦戛戛乎难图之矣。北而蒙、回渐去，已与俄卡毗连；西而伊犁、天山、青海、前后藏诸部，亦将指顾折入于俄；蜀边西南又与英属印度接壤，中间八百里野人山，英几全占有之，靡险可恃，形势大与昔异；南而滇、粤皆与法属比邻，浸浸乎有日蹙百里之势。惟东面、东南、东北则界南洋、太平洋，故犹能借波臣以为限制，可无界线之误、卡伦之移也。然而海上防边，全仗水军大队，我之海军战舰屡蹶屡失，今已力莫能继矣；纵或有此财力重整海军，广购铁甲快船，而有船无人，虽鼙鼓雷炮足以摧坚破巨，谁为用之？则亦徒资强敌而已。

故论防边于今日，不必言水军，止宜专力讲求陆军。仿欧洲定例：通国之兵统于兵部，所有一切枪炮亦归于兵部，讲求一律，无得参差。每百人抽一人为兵，据西人查中国十八省民数，通共三万四千六百二十五万人，可得兵三百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人。照西例优待之兵如武生。若以其人守其土，无水土不服之患，有室家之念、桑梓之情，必不肯临阵溃逃。太平经制有此兵数，而将领又皆出自武备学堂，便成无敌之势。遇有军事，即不增兵，外国当不敢轻犯。不必驻界以防戍，止须于近界择要害形势之处扼守一二处，为持久不拔之基。故兵不可散，惟其整；器不得窳，惟其精；辟垒不可多，惟其坚固；将帅不可纷更，惟其专任。一省筹一省之边，尤必合邻省以筹两属瓯脱之边，联络形势，同心合力，不得膜视大局，以邻为壑。夫而后心膂齐，臂指灵，营卫固，而外感风邪莫能入焉。则中国之疾，尚不至深入膏肓与！

抑亦更有说者：兵既贵聚而不贵散，将既贵专而不贵纷，沿边万里，鞭之长不及马腹，控制殊艰，奈若何？则曰：是有便捷之法，在宜于各行省沿边造一行军铁路，沿铁路附设电线，守以电员，则消息灵通，朝发夕至。何处有一外警，则首调极近处屯集防军，以趋赴之，次更调稍远处之防军，以接应之。若敌已突入腹心，一省有警，出集切近数邻省之兵力，以协剿之。不可一有败衄，即守而不战，退而言和。疆场尺寸皆皇王之土，决不可以假人。俾将帅无希冀之心，则战士有致果之气。

否则，越南宣光之事，前车可鉴。彼将士血战图功，势成竹破，乃急令退驻求和，全越拱手让人。彼躬冒矢石当炮火者，有不拔刀

斫地、泪血呼天者耶？故自越南之战，胜而不令大将成功于外，从此壮士解体，有退生、无进死。退生未必诛，进死未必赏，何以激忠义之心，得干城之用？是以甲午之役，将帅皆畏死图和，士卒亦狡不用命，驯至于一败不可收拾，而封疆日削，旅、卫、胶之占据接踵而起也。

所幸东邻本系同文、同种，近来力图富强，国有人焉。甲午役竣，彼亦深悔自伤同气，徒为他族藉口侵占之端，又深知中国若遭割裂，彼孤立无助，独防东南太平洋浩瀚无垠之海面，苦不足以支柱强俄及法、德各邦。故年来弃瑕释嫌，出肺肝以与华人相语，颇愿联络我豪杰之士，欲为异日缓急之图。此诚不可再失之机械，所以兴东亚而御西欧，存黄种而敌白种者，全在今兹一举也。

今日者奉、吉三省又旦暮为他人物矣。故曰防边，边已无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皮去而肉尚存，则肉之膜即皮也，里之外即边也。见肉而再不能防，透里而仍不设防，则肉将腴削而见骨，里将破裂而达表。骨见表裂，试问于国势将若何？譬之人身，亦万无生全之理矣。语云：“曲突徙薪无功绩，焦头烂额为上客。”即今而言，边防已属焦头烂额之余，再作亡羊补牢计耳。明者将嗤其晚，智者既消其愚。虽然，晚而为之，不犹愈于不为者乎？愚而谋之，不犹愈于不谋者乎？故筹边于此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余又乌能无言？噫！

德员汉纳根及西报所论摘录于后：

汉纳根云：“中国之败，由于武备废弛，且将领未得其人。以目前大局言之，当事诸公多狃成见，不知振作，万难托以军事。其轻视武员之习，又非始于今日，纵有才具非常者，亦不愿出而效力，盖恐徒劳无功也。此次与日构衅，始终和战未定，未尝大修军实，至事势危急，则望欧洲各国居间调处而已。水师亦受各官掣肘，不能妥贴布置。前者李傅相曾命我与丁军门同心拒敌，我亦乐于从事。至甲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与日军战于大东沟海面，可谓一场胜仗。然所以制胜者，只有铁甲二艘，而所备之炮弹、火药俱已用尽。中国各官并不再筹供给，以致全军束手，无可挽回。我曾往谒京、津大员，直陈无隐，论及军械握要等件，各大员皆弗以为意，且疑有叵测之心。至本年二月杪，始略思整顿，则未免太迟矣。

英国《泰晤士日报》云：中国经此磨折，如浓睡者之

受惊而醒，当急以日本之变法为法。吁！一二世后，祖宗不辨子孙矣。谓中国日后大兴，如人远游而归，子孙成立，不能辨其面目也。倘仍懒惰骄傲，动称远人为夷狄。吁！一二世后，为日本之印度矣。褒贬皆过当，英、俄尤可虞。

又英国《新史日报》云：近事之万无可疑者，俄必在大东方再觅海道以练水师，与英、法争雄。俄于波斯湾、黑海口两路，久为欧洲各大国封禁，海军不能舒展。今幸有机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将军豪夺，谁能阻之？英、日两国势难安枕，而日廷尤为棘手。何也？日之先图朝鲜者，侮华而兼防俄也，乃仍不能息俄之焰。东方尚可为乎？或谓俄、法、德起而阻日本之割辽东，英则效寒蝉之噤声，惟恐得罪于日人，转与俄、法勾通，或与南洋各处土人互相联络，用以窥我属土，是不啻釜底加薪，沃膏炽炭，必将受无穷之患矣。噫！英于今日惟存持盈保泰之心，畏强陵弱，茹柔吐刚，识者观之，了然窥见其底蕴矣。

薛星使云：“俄罗斯一国，商务之旺不如英，水师之盛亦不如英；地产之富不如法，工艺之良亦不如法；陆师之练不如德，学问之精亦不如德。然则俄当为英、法、德诸国所弱矣。而诸国非但不敢蔑视之，且严惮之者，何也？俄之形势广博无垠，以一面制三面，有长驾远馭之威，有居高临下之势，且旷土既多，以其地之产养其地之人而有余。是得地利。秋冬结冰，入夏始解，虽有强兵猛将不足以病俄。拿破仑第一墨斯科之役，乃其前鉴。是得天时。俄之君权特重，非若各国有上下议院之牵制，且其开国较迟，所用将相大臣颇有纯朴风气。是得人和。惟俄之立国有与西洋诸国不同者，所以一切要务虽多不如诸国，而诸国终无如彼何，且视俄为头等强国，各有瞠乎其后者。况俄与西洋诸国政俗略同，讲求要务数十年后，商务未必不日旺，武备未必不日精，工艺未必不日良，学问未必不日新。以俄之诸务不如西国，尚得最强之胜势，若其一旦诸务与西国相颉颃，则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此英、德诸国所以长虑却顾，而隐忧莫释者也。夫俄不有事于天下则已，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当其冲，西则土耳其当其冲，中则印度当其冲。而细察俄之隐谋，则注意印度为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于俄，则中国与土耳其亦岂能一日高枕而卧？英之执政知俄之覬覦印度也，早已密为之防。余窃闻俄皇之论亦颇踌躇审顾，不欲轻动，其用意在意绥抚其民人，辑和其部族，垦壁其荒地，联络其邦交，沉机观变，引而不发，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后以其全力生聚、教训，积至数十百年

之后，地广人众，势力且十倍英、德诸国，相机而动，纵横四出，谁能阻之？昔者战国之初，六国合力摈秦，而秦乃闭关息民、养精蓄锐者数世，迨开关出师，六国皆从风而靡，莫之能敌。俄之机势，大与秦类。盖积之愈厚，则机愈固；蓄之愈久，则势愈雄。今日者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国之利也。然则中、西各国将若之何？曰：尽其自治、自强之道而已矣。若俄之所以自谋，则非他国所能与闻也。”

按薛星使之言，颇中肯綮。今者中日之约，俄、法、德驻华公使联衔照会总署，声称“我等以辽东为日占，必碍东方平安大局，力劝日本让还贵国，以保平安，非有爱于贵国。倘贵国嗣后别生变故，我等仍不干预，请勿倚恃”云云。中日战时，各国见中国大败，俄、德、法、英、美、意、澳分派兵船来华，托名卫商，实则各有所图。大抵泰西各国之占人土地也，先示其行权之地，次伸其保护之名，继则鲸吞矣。今俄、法、德不准日本占辽东，将必藉此冀有所图，中国势弱，更难抵御，不失于东，恐失于西。亟宜绸缪，以杜窥伺。其用意深远，智者无不知之。虽日本业已允退，尚索加银三千万两。我朝此时虽未允给，俄、德、法必将酌量定数与之。倘日人不允，兵亦不退，俄必用兵驱之出境，而所用兵费必向中国索还，计非上策。曷若请各国公断，令日兵早退，作为万国通商之地，以免地方缉捕废弛，盗贼横行。在日本理当知机，顾全亚洲大局，不宜索加兵费，宜亟就此机会逼中国维新，励精图治，同御外侮。当与各国订立章程，无论何国，嗣后不得侵夺辽东等处。诚如俄、德、法所云，以保东方平安大局，不较诸索加兵费所益更大乎？

边防九（甲午后续）

曩尝论我国宜仿远交近攻之法，结英拒俄，均权势以巩边疆。乃俄人既借据旅、大，近更图占东三省，封豕长蛇，磨牙厉齿，已见端倪，益觉俄之可畏。宜设法亟联大援抵御之矣。独是图联外援，而英之不能独为我援者，其故有四：一、见我大局糜烂，练兵、制器徒袭皮毛，加之强邻环伺涎贪，势难独力为助。二、英之国势积渐而趋重印度，欲强印度，即借此进窥滇、藏。我之弱，彼之幸也。甲申之役，乘机而覆缅甸，其自利私心已可概见。三、恐将来若印度与中国同时有事，英势难分兵守卫；且保东亚情形与昔日保土耳其不同，土弱则俄得肆行地中海，于英实有大害。至中弱则英转乘便割我边疆，不惟于英无害，亦更有利存乎其间也。四、英特之战

兵连祸结，迟久而不能定，劳师费饷，力惫筋疲，今既不能中止，遂成骑虎之势，渐露支绌之形。倘印属再有变故，则各处属土皆将有土崩瓦解之虞也。此英之踌躇郑重而不肯轻为我外援者也。惟其属土最广，海军最雄，长驾远馭，易为我患，不可因其不肯助我而生轻傷之心。

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法、德皆为俄助，美、英尚中立无他；惟日人仗义执言，商同各国迫俄人还我辽东，请作万国通商之地，又极力保全大内宫殿，禁止兵弁杀戮闻八国之兵入京津，不杀害官绅者，只日、美耳，足见其纪律之严。彼犹知顾惜同种、同文之宜，而不忍坐视白种之横行、肆毒于东亚。其维系殷勤之意，未必非密乘朝命而出此也。且英、美有同类相联之宜，而日、英又素有连盟之雅。是我苟极力与日交欢，即可由渐推挽，而与英、美联盟。英人深忌俄人得志于东方，浸将夺其商务，内怀怏怏不悦，兆已见端于微，但以征特之兵未已，财力交疲，故不敢大声急呼，明犯俄人之难耳。其庙算亦未尝不结日东以为欧洲东道主。我若假手于日而深交之，英必乐从而无阻。英、日既与我联，美亦可以卑礼厚币结纳之，则东亚之大局尚有可为。俄人虽横，以彼兵力凭陵中国一国而有余，兼抗英、日、美、中四国之力量则诚有未足，或可从此隐戢戎心，保境安民，两无侵犯。我中国既可乘此间暇，大修政令，百日维新，举一切积弊而空之。君臣、官民上下皆卧薪尝胆，时悬一耻不若人之景象于心目，梦寐之间交儆而图功焉。安见四万万之众，二十三行省之广大，五行百产之精英，聪明才力之进境，不可以并驾英、日，方轨德、法，而与虎狼之强俄犄角而争利也哉？谚云：“攘外必先安内。”欲人以何等人待我之民，必先视我以何等人自待其民。拳匪之乱，即谓为自强导其先路可也，用作变法去疾之猛剂亦可也。

况夫俄羨印度之富，未尝一日去怀，亦英人腹心之疾也。诚能借日与英固盟，昭以大信，缔以密约，中、英既亲，我又能变法自强，日本亦左右而扶翼我以兴亚洲，彼此整顿商务，力图富强，互相保护，合力以北抗强俄。俄不能得势于亚洲，即无由进兵于印度。是保东亚亦可为保印之机缄，此英人之素志也。然后耸英、日共伸大义，举凡金边、暹罗、缅甸、越南诸岛国仍许立国，为该国择其贤而有才者以主其民。如此则南洋诸岛国声应气求，自当力祈亲附，与英、日如一家，形势相维，征求相应，又何虑俄、法之首尾狼狽乎？

或笑曰：英人腹我膏血，犹狐狸也。俄人性情猛鸷，犹虎狼也。狐狸媚人以吸取精华，使人肉脱形销而至夭亡，命虽丧而躯壳存也。虎狼伏于山林而不动，似驯扰不为害者，一旦跳跃长啸，出而噬人，则吾侪无噍类矣。不知英力诚雄，属土散在五洲，时存持盈保泰之

心，不敢轻启邻衅，惟惯乘人之危，实做“兼弱攻昧”四字。俄人则爪牙方张，有席卷鲸吞之势，且自昔善于阴谋，智取术驭，非割地兼并不足以快其私心，不足以副其历代相传好大喜功之秘计。我今日亲英则俄忌，亲俄则英忌，然与其亲俄而受其吞噬，曷若联英、日以维系而图存？况西伯里亚之铁路尚未全通，如俄与我有战事，其铁釜之来自欧洲者，必经过英属新加坡，中途无驻足之地也。英人助我而邀之险，有见其只轮不返耳。至于来自混同江者，一近冬令即多冰冻不行，必将借日本为东道主，日既与我联盟，则俄船难藉其资，惟有道高丽、屯旅顺耳。然道高丽亦须经过日本，旅顺口、大连湾内口虽甚深大，要不能常川屯驻多号舟师，且恐断其甜水、煤炭、食物，则犯兵家大忌。所以俄之北亟营铁路，俄之南欲另通海道，而与法联盟也。是故我若与俄结好而疏英、日，则防海力有不逮，防陆亦不能松，水陆交困，财力、兵力均难为继。若既与英、日联盟，则东南海面有英、日之水师为我奥援，隐若长城。我即可合全力专防陆路，以固我边圉。俄边昔止须防西北，今则东北、西北皆须设守，以慎保其疆场。卡伦移易，在在堪虞。非极力整饬陆军，选将才、练精兵、制利器、据险要，不可图一日之安枕也。

我中国地势辽阔，控扼中亚，实握天下治乱动静之关键。英昔者亦尝欲强中以御俄矣，今见我之不竞，不得不转与日联。然亚洲之国以我为最大，日虽强，其土地之广固不及也，人民之众固不若也。英舍我而独与日结，亦未足尽其拒俄之良策也；且英更未尝不虑俄与我合也。前者，日本与俄立约易岛，英人讹传中国与俄立合兵之约，通国震惊，盖恐俄藉此以窥印度也。异日者，倘使英或与他国有事，俄人必乘间而攻印度，固英所深惧也。故亲英即以强英，联日亦以固日，使英、日皆知鹬蚌相持，徒为渔人得利，当顿释前嫌，力保东亚，相期发愤为雄，以撑拒俄、法、德三雄之侮，则三国虽有兼并之志，未必能畅所欲为也。查日本两党，一谓纵与西人同分中土，恐为彼族所忌，旋得旋失，不若合中、英以拒俄。一谓俄既图东三省，且欲东抚朝鲜，西招波斯，中威挟印度与阿富汗，雄视北方，宜先绸缪，若中国自立，宜亲英以保亚洲；苟不自立，即亲俄以分中国之利。

或曰：强弱未可同处，人特患不自强耳。徒恃藉他人之力，固无济也。俄人既为虎狼，中、日独不能为狮象乎？且谋人而使人知之，此危道也。殊不知我虽亲日连英，而于俄之和好固无渝也。譬诸战国之齐，附秦则秦强，附楚则楚奋。中国而深自为计，不动声色，联络于英、美、日三强国之间，以善保其利权，则国势自能巩固，更能发愤为雄，理财经武，天下之事岂真不可为哉？

惟是简遣使臣往驻各国，所尤当加意者，莫如俄、英、日、美，

使才之选务须郑重。其使英、日、美者，务使内有以结其欢心，所谓尔无我诈，我无尔虞是也。使俄者，必使外无以启其衅端，所谓樽俎之间，折冲千里者是也。慎固边防，宣扬威德，实即隐寓乎此，则正不妨以亲俄者饵俄也。凡近俄疆防守之要，必须一切整顿，军营戍垒必当扫除旧习，焕然改观。既于俄界通市处所设领事以资保护，更令各处守防将帅与各邦出使大臣，务须随时察访邻国君臣、外部意向之所在，兵将强弱，多寡之实数，现用何等枪炮，现兴何种利权，以期知己知彼，不落人后。所派觐探俄边之员，及简练戍兵、骑队，必用熟识俄语华人。尤宜专设书塾，肄习俄国语言文字，以备他日之用；加以遣发幼童往学各艺于俄京，言语通而后情伪自能尽悉，因以考其舆图物产，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国政人心，明其土风俗尚，更进交其贤豪，如季札之观礼于鲁，子产之订交于晋，而后防俄之实效可睹。昔战国之际，群雄纷峙，五霸争权，而能道结强邻者，胥此道也。

抑亦更有虑者：近闻英、俄已联密约，大旨不外乎长城以北英不预俄，长城以南俄不预英；并闻俄、日又将有关盟之举，其事秘莫可知，亦未能决其事果有否也。然而我中国独立无与，诚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矣。秉国钧者，其亟图之！

江防

中日和议，增开通商口岸，此后重庆、沙市、苏州、杭州，轮船必往来络绎，然则今日江防，与昔日情形固不同矣。查中国长江内河水师向用长龙舢板，于光绪十一年曾经当道会议，欲先令长江之水师舢板裁减，将营哨弁兵额缺酌量裁并，即以裁出之饷添制浅水轮船，分隶巡防。

或谓昔曾文正借彭刚直创造舢板以来，平发逆，安行旅，厥功甚伟，未可更动；且长龙舢板较小轮船之利便有五：一、江上盗贼出没于蒲滩蓼溆之间，浅港分歧之所，轮船纵小，亦必长十余丈，吃水已深，不能涉浅，若遇劫掠盗船，一经掉入浅隘芦荻丛杂之处，则不能穷追搜捕。二、制造轮船每艘需价万余两，长江水师由厘金项下每岁助饷八十万两，即概以制造轮船计，仅得船八十艘耳。酌裁一半，仅可得船四十艘。现在水师分防五省，舢板兵船星罗棋布，节节梭巡，故盗贼无从伺隙。若每镇酌减一半，所减之舢板则多，所添之轮船则少，恐分布汛地不能周密，宵小乘间窃发，势所不免。

三、不能弭盗，则商贾之挟重资贩运者，必畏缩不前，各卡厘税必然减色。四、查师船一只不过二百余金，计须合四十余师船之费，始能造一轮船，则制造之费巨。师船三年一修，所费无几。轮船则机器偶坏，船身偶损，非重价雇倩洋匠不能补治，则修理之费巨。师船水勇月饷不过数金，轮船则司事之人皆须厚给廩俸，则资养之费巨。师船鼓柁即行，驾驶灵便，轮船非用煤火即不能行，所费尤巨。统而计之，轮船之糜费，何止百倍于师船？五、师船持舵掉桨，犯浪冲风，全恃人力，非壮勇不得滥充。轮船全恃火力运其机器，虽怯弱亦可从事，久之人习于逸，兵以日疲，将来徒有水师之名，其流弊直与绿营无异。

按：以上五者皆按时论事，非亲历而深知者不能道。惟今日苏、杭、重庆通商，往来之小轮船多于梭织，与昔日情形不同。新式轮船吃水之浅，船身之长，亦可与长龙舳板相仿佛，虽芦荻丛杂之处，平日既测量有素，至时尽可穷追。则首款不足虑矣。

轮船造价不一，有数千两、有万余两者，既一时无力多造，每省先造数艘试办，以开风气。庶逆风、逆水之时，师船不能前进，轮船亦可拖带，见有贼船，无虑追之不及。如每镇酌减一半，无舳板者有轮船往来游弋，宵小贼船何敢窃发？则第二款不足虑矣。

既贼船不敢横行，行旅必安，各卡厘金何致减色？且商贾挟重资者，皆趁洋轮。此第三款不足虑矣。

师船一只不过二百余金，其价虽廉，不能逆水行舟、冲风破浪，只可防宵小，不能防外寇。如无轮船，设有外患，非舳板可御。且轮船司事廩俸不甚昂，水勇月饷向给数金，今百物皆贵，欲得其死命，必须酌加，使足以贍其妻子。至机器船身有坏，不必雇倩洋匠，既置有小轮船数十艘，应于湖北或江南制造局左右开一船澳，以备修理，无事可以揽造商船，或交江南制造局代修亦可。则第四款不足虑矣。

轮船持舵、升桅、掉桨之人，亦与师船无异，非身体健壮而善于泅水、驾驶者不得滥充；既仿西法，尤宜认真挑选，不时操练，凡有不合定章者，应即随时裁汰，何虑有绿营气习？夫水、陆兵勇之强弱，亦视乎将师之何如耳。其第五款不足虑矣。

今泰西各国及日本维新之后，凡内河、内江水师向日用舳板、帆船者，皆已尽改轮船，因时制宜，正当如是。曾文正、彭刚直昔年创设长江水师，原为破发逆、防土匪起见，不料今日重门洞开，防外寇更重于防土匪。况曾文正曾有言曰：“今日吾辈以长龙舳板之水师克平发逆，然天下事变动不常，此种水师船未必永足为将来战守长江之用。是则在后之人神明变通耳。”老成之言，足令后贤心服。

按中国与法、日交兵之时，各口多以重价租买小轮船传递信息，尚未骚扰内地，已属糜费不少，何如及早筹防？拟请当道于长江内河水师亟宜整顿裁减，随时添置轮船，与长龙舢板互相表里，以壮声威，弭患无形，有裨大局，洵非浅鲜。惟前车可鉴，必先讲求水军将才，苟无其人，虽有兵舰，亦犹马江、威海、刘公岛之水师而已。

炮台

尝闻泰西水师战法，以兵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船而无炮台，则能战而不能守，外强有余者，而内固恒患不足。虽有守口巨台，而无前后炮台为屏蔽，为救应，则亦必为敌乘。此兵家之至言也。

迩来欧洲各国炮台营构日精，往往不惜工费。前刊《火器》篇中，所论英国阿姆斯脱郎厂武员孟格理符新制暗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环击，燃放之后，炮身即藉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平时操演如不用药，无力可藉，则炮身不能缩退，复有水机一具，内贮水力，激而行之，升降盘旋，机极灵便，厥制新异，足资海防。英国曾仿造木质台样一座，埋置海滨，命铁舰燃炮击之，台内亦升炮燃放如对敌状，兼示以台之所在，而铁舰之炮始终无一弹命中。船炮虽轻快，其如此暗台何？

窃谓此台之法，最宜于中国。惟滨海地多松浮，坚筑非易耳。该炮六寸口径，炮身重四吨，弹重四磅，用黄六角药多至五十四磅，可洞穿尺五寸厚之铁甲。弹子每秒仅行一千八百八十尺耳，如须再远，亦可将炮身酌加长大。曲折纵横，悉尽其妙，此最精之新法也。凡战舰、炮台用炮，排列须长短相间。敌远则用长炮，敌近则用短炮，随机应变，操纵无方。然战守之道，亦有常变。西人用炮不仅为可胜计，亦必为可败计。其所筑炮台异常巩固，四周设伏暗沟、地雷，距台少许更筑一台，纯用短炮，以便击近，使敌人不能登岸，不得据台。如势力不支，则避伏台后，俟敌既登，猝出轰击。或用暗机药线引燃火药房，既入彀中，忽然轰发。二者皆可转败为胜也。

至其造炮台之制，考丁雨生中丞疏云：造台之法，极内一层必

用灰墙，外墙用三合土，厚在二丈以外，高低则视地势之低昂与水路之中线。护墙必须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分之一，敌炮若来，自可斜拂而过。其炮位及火药仓上必设太平盖，以御自上而下之炮子。下必设高隔堆，以御横扫之炮子。其最下层之地隧加筑坚固，四面俱通。沟外之小炮台、大沙堆，亦必迤迤照应。敌用陆兵闯入，尚可侧轰横截。然使专用炮台而无木桩、水雷、浮坝等物阻于前，则炮台亦断不能得力也。

张芑涛制军疏云：西式之台不一，或尖或圆，或盖或露，或作联堡、子堡。或陆路当冲作大台垒，可以启闭往来；或水路当冲作浮炮台，可以迎头截击。此两式最为得力，而费太重，骤难仿造。

薛叔耘星使云：台式究竟明不如暗，高耸不如低平，铁石不如三合土。西人云炮台之要，约有数端：一、山坳岭曲，隐蔽击敌，不宜孤露一台。外须作坦坡，不宜壁立。一、扼要处须有数台犄角，不宜聚炮于一台。一、连台宜多作犬牙形，以便两台炮力相接夹击。一、台后不宜背山，以免敌弹反击。一、台上不宜多人，以免多伤将士。一、台上炮堂不宜宽，以防炸弹堕落。一、台后宜有回击小炮，以防敌袭。一、台旁登岸处宜作濠堤，伏连响快枪、快炮，以防敌人舢板登岸。一、台成后以炮轰试，坏则更造。

合以上三疏观之，而西人造炮台之秘要，大旨已可概见。

今我国各口炮台，屡闻为敌人所占，未闻有一能用此转败为胜之法者。且究其所失，皆因各分畛域，台后、台旁皆无炮位，致为所袭耳。既知其弊，而防守之要端在炮台。各省督、抚、提、镇亟宜详加察勘。旧台不如法者易之，太稀者补之。讲求造炮台之制，遴选守炮台之人。毋徒糜费重饷，以旅顺、威海为前车炯鉴。庶可得炮台之实效，而海防巩固矣！

火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兵凶战危，生死存亡所系者乎！考泰西各国专用火攻，其火器之制，莫不改旧从新，枪极其灵，炮极其猛。骤闻他国造一新船、新械，自顾微有不逮者，则不惜重资极力讲求。尝闻西人云：日本讲求制造枪炮之法日精，彼能自出心裁，制作奇器。中国只知采买新式枪炮，依法制造，不能自出心裁。其执政识见，国势强弱，于斯可见。意谓制造之精，即富强之券也。盖两军相角，首资利器。营中所用枪炮，宜归一律，无虞药弹错误。兵士相习，熟

则生巧，不特所纳药弹悉与枪炮相配，且远近准则先已了然，敌至即发，发必命中有利器而训练不得其人，则有器与无器等。西报云：中国兵制、制造，于西国之法，亦步则步、越则越，惜治军则有兵而无将，制器则有匠而无监。非无将也，将非其人，而不知西法也；非无监也，监非其人，而不知西法也。即以枪炮一端论之，未能深得其奥变，又参以己意而变通之。如汉口所造之六十四磅炮，炮体非不光泽，而内膛实粗，且无来福线，不适于用，虚有其表而已。

炮有大、小、中三等，有守器，有战器，有攻器。其药弹悉由后膛纳入，药弹出路远近适合，环攻迭击，灵捷异常，虽久用而不致炸裂。其枪之制度亦宜悉用新法，每小时可连发数十响，而枪身无炙手之虞。如德国克鹿卜厂所制十二磅弹小钢炮此炮体轻，则易于运动；质坚，则经久如新；炮弹合膛，则线路有准。炮身长而有来复螺纹，则命中及远，开花弹弹壳双层，体外裹铜箍。他弹仅炸四十余片，此弹可炸百数十片。故开花生铁弹、生铁弹子、铁管弹、散子弹皆不能出其右，为陆路山行之利器。所制气球小炮弹配开花，制各后膛式，仿抬枪略大而长，既灵且便，放平则击敌骑，侧上则击气球，故有是名，与十二磅弹炮同功，为水陆近攻之利器。拿登非尔后膛炮有螺纹，可分两截，临用装配，格林炮有五管十管排成一字，亦可排成圆式，为水陆专防之利器。美炮发百十响而炮身不热，惟重而难运，宜用于守；普炮发数十响而炮身已热，不堪频用，惟轻而易运，宜用于攻。又为攻守分用之利器按普国所用军火，专恃墨透儿鲁士炮，迥与别炮不同，制度略如六门枪，四周有八轮，皆可旋转，每轮纳弹三十七枚，一点钟可施放八轮，发弹二百九十六枚。炮形不甚广巨，其用极为迅速。八轮皆可以螺丝嵌入，不用之时即可卸置。倘临阵败北，即分散委而弃之，非如前膛枪炮易于资敌也。

至于洋枪，从前皆用前膛，自美国林明敦、秘薄、马地尼后膛枪出，各国仿效之。近有可而脱厂新制极快马枪，尤为心裁独出其弹子均由后膛旁孔纳入，膛下设木把手，用右手把住扳手，再用左手推挽，活木把手向前则弹子从枪口而出，向后则子弹壳由后膛而出。自十二响至十七响，每分钟可放百数十子。其便捷轻利，过于毛瑟枪远矣。他如俄之俾尔达呶枪或译作白洛屯，为同治十一年新式，其精兵多用之。大来福枪，珲春以北之兵用之。德国向用得来斯枪，胜法以后换用毛瑟，但此枪糜费较巨，故虽通国精兵皆用此枪，而平时操练仍用得来斯。此亦因时制宜之道也。法之后膛枪曰沙士钵或译作萨司浦，始用纸卷子药，继用铜壳，底有小孔，皆系刺针灼火，今改用铜帽撞针。又有一种曰格拉其枪，与毛瑟略同，而膛径稍宽，机簧稍异，用药稍多。以上数者，皆各国利器也。中国须择善而从，勿贪其价廉，买人旧枪。或谓不宜用俄、法等枪，宜用英之亨利马梯尼及美之哈乞开司现在如此，利钝随时。盖亨利马梯尼机簧甚巧，透力甚大；哈乞开司枪托之内有管，能容五子，其制既美，其用更灵。

火药约有数种：曰饼药、棉药、炸药。体制既异，功用亦殊。

而以德国栗色六角炮药为最佳。德国向用黑色饼药，后杜屯考厂创制栗色药，而其用益精。据德国海部官员历年试验，知栗药益于黑药有数端：一、栗药烟焰易散，便于测望。一、栗药既燃后，其势先缓后速，弹路较平，取准独密。一、栗药受燃，其力虽猛，而无轰裂之祸。一、新炮膛加长，用药加重，若仍用黑药，必逾炮质所受涨力之量，非惟来复线路易蚀，且防炸裂之虞，栗药则涨力较小，可保炮体。即所储之地苟不过于潮湿，于药无伤，平时亦无轰发之弊。他国仿造均不如其精，英人不惜十万重资，师其变易加减之法。今英、德复有无烟火药，尤为奇想天开无烟则不致蔽目。且近有新式黄药吸气开花炮玛克心，一分六百响。机器快炮一秒六十响。美国新制快炮每一分钟能燃放一千响，每一点钟久则能燃放六万响。该炮身长八尺，系用电气燃放者。水雷则用棉花药，较火药猛加数倍。制药之法必熟察五金八石之性，刚柔相配，利用有方。倘或误投，其害莫测。用药之法又必熟算，其锱铢分两各适其宜，而后弹无虚发。

夫枪炮之用，在善于测量高下，方能命中及远。其所以远而能中者，不但炮弹必合炮膛，枪弹必合枪膛，且大于膛口数分而能不伤膛口者，由弹之外包以铅皮，火燃铅化，故弹出而口不伤。弹药交乘，故力足而能取准，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然心思愈用愈精，更有不可思议者。普人嘉立新制一炮，即以嘉立名之。炮重五万八千基老克蓝，约中国九万七千八百七十五斤，纳弹重七百四十四磅，受药一百一十四磅。以九寸铁当之，力能洞穿。炮身虽重，炮架极灵，不必竭数人之力，上下转徙无不如意。

虽然，置炮固贵得宜，发炮尤贵有准。昔者英、法攻俄，俄之炮台曰士徽钵，炮利人众，防卫周密，且俄以高击下，英、法以俯攻仰，势之顺逆又复不同。而英、法卒以取胜者，盖炮台在岸，定物也，取准自易；战舰在水，浮物也，取准较难。故发而皆中者，则必胜之机也。

火器既愈出愈精，购办宜慎之又慎。自开办海防，各省采办军装，不知糜费几何矣。其勾通洋行、加价报销者，果得精器犹可言也；甚或外洋赶造不及，即以旧货装饰抵充，物既朽腐，价复昂贵。又或先定者定价出货，后定者加价争售，遂以前定之货腾与后定之人。委员之受累，军营之误事，庸有既乎。余昔蒙醇邸札委坐沪，采办神机营军械，尝与承接军装、精于枪炮洋人讨论有年，颇知其中良楛利弊，并力杜浮冒等情，故向瑞生洋行购办之拿顿飞炮、黎意枪，皆订明不须经手费用，不许丝毫浮开，无以旧代新、以少报多之弊。迨癸未年冬，蒙彭刚直公奏调回粤，当湘军营务处，旋奉粤中大宪札委接台，在港租船购炮，所查枪炮价目，亦据实开折禀报，并声叙近来有人购他国不用之枪炮，刮垢磨光充作新造者；又有经手串通洋商，嘱外国制造厂将发单浮开，与经手分肥者。英廷向商局购办火器，先遣兵官带匠人数十，赴局逐一试其事件，不失模式分寸，然后乃使

合成之。既成，实以三倍火药，埋之坎中，用电线燃放。如不炸，则手操试演，观其远近准头不差始用之？

宜由总理衙门奏派精明枪炮，并深于化学之员，周历各国各厂，其火药之性质，弹子之重轻，枪炮之规模度数，及一切火箭、喷筒、火罐、地雷之巧妙，务使悉心悉力，探神髓而去皮毛。尤要者，在明试验之法。验炮之法：观其角度合地膛炮耳中线以观角度，察其垂线合地柱炮身以察垂线，演放时历换轻重之弹以验击力远近，用电火回镜观其螺纹，抽后门环托观其药气，测以药线表尺而知涨力若干，速率若干，重积力又若干。验枪之法：视其体质，量其口径，准尺与枪管中线是否平行，既放后卸其后门机簧，察其挺针是否坚厚，验其药气有无渗漏。验火药之法：烘之以定干湿，秤之以定轻重，化而分之以定各种相宜之性。

既明试验之法，则采办军火不至横受欺蒙。即派往各海疆自行开厂制造，亦能标新领异，独运匠心，所谓变化而神明之者，此之谓也。至督率工匠人员尤须公正，庶指臂相使，操纵自如。若一一仰给于人，他日有事之时，局外执公法以相窘，或受敌之贿，绝我来源，制则无工，售则无路，其将何以御敌乎？尝闻马江之战，我炮中法船，其弹不炸。法人剖而视之，弹中无药，或炼药不净，或搀杂泥沙以致药力不足，未能命中及远。如不严定章程以专责成，虽船坚炮利，亦于事无济。宜责成营官，凡所收火药、弹子，不论各局自造，抑买自外洋者，俱要即时考验佳否。

及督率炮手，有事时必须逐一查验炸弹有无装药，庶免临敌误军之弊。且购藏之火器，闻搁置年久从不启视，俟用时开视，已朽锈不堪矣。更宜责成该管官按月点看，擦油修理。凡各兵弁所用枪炮，尤须动息不离，时加磨洗磨洗不可用粗沙，若磨去枪面之油更易生锈矣，如有锈坏，立罪其人，俾知警惕。又闻各口炮台近年多购用后膛机器炮，盖以油布，间有数年不一察看者，其中已有汗水积而生锈，机器一坏，全炮不能用矣各省所置枪炮，每年进出数目列明报部查核，庶免锈坏损失不知也。火药局非尽设于荒僻之处，其所藏火药亦有久不开看，成块如泥，又无用矣。军械所之弹子发交营官，间有箱内非弹，徒实以沙泥。凡此皆宜留心，庶不至耗巨款而无实用。考泰西营制，所存子药，定例三年一换，出陈入新，陈者用以打靶，仍有余存，即售诸外人。

我国所买之洋枪花样甚多，竟有以法之旧枪改充德之毛瑟。若经办委员不识良楛，贪其价廉，可以取巧，势必堕其术中。且闻中法之战，所生子药亦不止三年之物。凡各省所购枪炮、子药及领自制造局者，惟上宪一阅，见其磨擦光亮，而经手者又力陈其妙，则信用无疑，从无先交精于制造及军营善用枪炮之员详细试验者。故

临时溃败，虽其训练不精，亦委咎于所用枪炮、子药之不善。其坚、轻、快、利、远、准皆不及人，竟有数响则机器不灵，子壳难出，数十响则炸裂伤人。互相推诿，无从质证。凡经管军械者，均宜与营官先行试验而后收用，毋贻后悔也。

近闻西人创有水底自行船、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机器飞车又名飞机，自能飞行空际。犹恐放炮者虚发，有英国武员独出心裁思得一法，不论大炮、小炮，俱可使之百发百中。其法在炮首加一千里镜，便能视远如近；又用一测量之表，能算定炮子落地之远近，从此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无不得心应手，灵捷异常。又新创御弹戎衣格致家新制一物，以之制成衣裳可以御弹，冲锋陷阵亦可无伤云，机器兵。其法用钢铁制造内藏机器，进退自由，有似钟表，临阵时将机开足，每分钟可放洋枪四十余弹，而铁兵腹藏各色药弹尽足敷用。倘偶被抢去，即能立时轰炸以伤敌人，盖其头内预藏电器炸弹故也。又有希腊火，为昔时军中极惨烈之法，教会相战曾经用过，作史者未详所用。闻水师工匠会中人云：矿火油烧灌铁甲船顶，烟火暴烈，管船者无能施設。每灌一轧伦矿火油计八斤，一霎时火即满船，一百方尺内人不能近。用一种机器如救火水龙，今有造成。惟近敌三百尺内乃可施之，倘有格林炮轰击，则施希腊火者乌能近三百尺乎？或谓希腊火一出，不能接战，然水手有枪炮，船之两边皆可用格致新法御之。现英海部又查验希腊火之用矣火器精矣，而所用之人若非操练有素，亦与无利器同。因闻临时所募之勇，授以利器，尚未操演纯熟，即驱之战，以致所用枪、炮不能命中及远，且仓卒中竟有子不对药、枪不配弹者。总之，西人心思之灵敏、制作之精微，尚复日出不穷。

今国家讲求武备，凡所用船械不自行制造，皆仰给于人中国内地各省亟宜设制造厂，勿惜重聘延揽人材，选通西文、晓算学者入厂学习，以备不虞，勿以经费难筹置之不理，岂但购自外洋多出运费，犹恐临时敌人封口，虽出善价，欲购不能。故曰：各省不可不亟设制造枪炮厂，不可不速仿西法认真练兵。若一旦失和，土匪乘机而起，各国谨守公法，不肯出售，何以为继？宜亟兴艺学，并悬不次之赏，求绝技之人，庶几有恃无恐。彼掩聪塞明，不知外事，日欲以弓矢、刀矛制胜者，特未身历弹雨枪林之惨也。

《泰西新史揽要》云：昔年普国屡败于法，死伤甚众。普人得赉赐，年仅十九，于配钥、打簧诸艺颇有心得，究其国致败之由，皆因所用枪炮不及他人之利，遂投法国巴黎瑞士国人包狸所开枪炮厂，求供使令。该厂甚得法皇拿破仑宠异，得赉赐日夜苦思，至二十年之久制成一枪，灵便异常，秘不告人，归而献诸普廷。经普国之嫫于军旅者逐加考验，皆谓大适于用。普廷立拨巨金，发交得赉

赐，俾之别创铸枪大厂，专督各工匠多铸后膛枪，旋锡名曰针枪。同治三年，普与奥连兵以伐丹墨，普军中已有能用此枪者冲锋陷阵，精锐驾于他枪之上。普王大喜，锡封得赉赐以世袭之爵，并命增募良工，赶造新枪，期足普国全军之用。是时他国亦习闻普铸新枪，然未知其灵捷无匹，故亦但视为寻常。及同治四年普奥之衅既启，普军中皆用后膛枪，既精且准，远胜于奥军之钝器。奥人虽悍，但遇普之新枪，奥弹未及普营，普弹已从奥阵。盖新枪之力远于奥枪也。奥枪更不及新枪之速，奥炮不及普炮之远。奥将遂计无所出，非舍命狂奔，即束手待毙耳。可知当今战务，虽有敢死之士，亦恃枪炮足以胜人。枪炮既精，其胜如操左券。技艺之关系于国家如此，可不悬重赏以鼓励工匠，令其悉心讲究乎哉？

今日本所用之枪，又一律更换新式，较前更快。中国各营所用抬枪，因中日之战各制造局制造枪弹刻无暇晷，故多造自东南各省铁铺者，枪身内、外粗而且笨，每杆需用二三人，咸谓远于洋枪，惟未经燃放至数百响，未悉能否坚利，尤恐临时炸裂也。据承买军械洋人云：我各省所用前膛、后膛枪共有十三种，多系十年至三十年前旧式，间有购新式枪炮与西人者，同一厂名，而出弹不及其远，此由铅重药轻之故；更有炸弹中无炸药，或杂他物，故弹落不炸，或炸力不大。现购灭雷艇亦不及人之速。虽所买军械、雷船，总署与各督抚恐经手后舞弊，常嘱请中国使臣查验佳否。无如使臣不识良楛，惟听委员所指，有贿者曰良，无贿者曰楛耳。洋人之言未必无因。如饬精造枪炮工师或技擅命中之员弁演放验收，日后倘不合用从重治罪，庶不致为奸商舞弊也。今各国于军器精益求精，时恐不能胜人，凡民间新出兵器，国家机器师验系快利非常者，其国家必出重资购造，不准售诸外人。故我新买之枪炮所谓新式者，临敌时实已彼之旧式矣。欧洲各国所用之枪，尤恐日久机器不灵，三年一换，不论水陆皆用机器快炮，每分钟能放六十响。闻英国新造一种短枪，机极巧妙，比之从来所用旋回枪，远出其上。又裂低毒气炸弹，炮弹落处一百码之内，吸气即毙。美国拟建造炸裂弹巡舰，图案已成，据技师所称，其力能敌战舰三只。法国已创制潜行水雷船，新式枪弹，其射力极强而斤量轻减，最便携带，政府已取应用矣。其余德之于战地照明车，日本之于有阪炮，无一不极人工之巧日本工艺日巧，新器日出，价较外来者廉，因有奖励。日前德、法两国之炮，不约而同尽行更换，虽仍是后膛，而快利异常。其如何快利之处，尚秘而不宣。且闻拟制聚火镜、飞球炸弹种种利器。若中西交绥，彼有我无，彼优我劣，胜负之数即此已分。谁谓人多可恃乎？然有利器而无敢死之兵，则利器亦适资敌耳。所愿当轴者深长思之。

弭兵

先王耀德不观兵，诚以兵凶战危，不得已而用之也。洎周室既衰，秦、汉以来竞以武力取天下，而战争之祸遂无已时。辟地争城，生灵涂炭。此也喋血，彼也與尸。老弱罹锋镝，血肉膏原野。间阎凋敝，帑藏空虚。默揣仁爱之天心，当亦惻然不忍矣。呜呼！好战非策，佳兵不祥，天命靡常，盛衰如寄，岂独中国为然哉？尝读西人《万国史记》，历观泰西古昔雄才大略之君，往往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如罗马、法兰西并吞列国，囊括欧洲，自谓无敌，卒至身亡国破，弗戢自焚，未尝不废书三叹也。

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古今诸国，莫不弱肉强食，虎视鲸吞。其国之大者兵将日广，炮舰日坚，机械日精，火器日利，奇技新法层出不穷，皆为争地杀人、此攻彼守之计，万钧之炮、百钧之弹，以之平城郭、坏村舍，杀人亿万，盈野盈城，何其残忍若此！盖天地之杀机，至今日而尤酷尤烈矣。《普法战记》载师丹之战，一日殒数万人；蔑士之战，一日殒十万人；俄土之战加里布，一刻殒三万二千人。英国《泰晤士报》载，泰西军兴而后，自咸丰二年迄光绪三年止，此二十五年中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余万人，费饷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至军士之积劳成疾，商贾之废业失时，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种种伤残不可枚举，兵祸之烈，未有过于今世者。西人刚劲性成，伊古以来罕有息战休兵至三四十一年之久者。倘异日群雄并起，鹬蚌相争，祸患之来不堪设想。且各国之失和开衅，大抵外托信义，阴肆并吞，名辟商途，实窥土地，或则婚姻之国浸为仇讎，或以唇齿之邦激成水火，只知树威克敌，不顾糜烂其民，何不仁不义之甚也！况既勤远略，必增额兵。以英而论，曩日岁需兵饷约合中银一万万两，迩来逐渐增至一万四千万两。其余各国兵饷亦年增一年，为数不可以亿兆计。一开兵衅，上千天地之和，即无事之秋，亦岁耗民财以供兵饷，国安得不困？民安得不穷乎？

夫保民与殃民孰善？守土与辟土孰公？与其争强弱于百年，何如享太平于千载？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反衰世之凌夷，即以体天心之仁爱，不骄不倍，无诈无虞，庶几长治久安，干戈永息。国有工商之利，地无畛域之分，而铁路、轮船四通八达，遐迩一体，中外又安，不亦善乎？然而未敢必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弃好从恶，始合终乖。强者固明恣狼贪，弱者亦阴图蚕食，兵连祸结，扰

攘不休，不至如洪水之横流浩浩滔天，而其事不止。夫剥而必复者，天心也；危而思安者，人事也。以目前论之，泰西各国亦渐有悔祸之心矣。如俄、土之争及秘鲁、智利之役，各大国勒兵劝和，烽烟少息，生灵之祸稍纾。并以兵费至繁，尽倾积蓄，幸而胜，所得已不偿所失；不幸而败，则既折兵力，又损国威。是以善筹国者，皆讲求攻守之具，欲战胜于无形，初不欲轻启衅端，见诸实事也。

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国家当无事之日，明其政刑，兴其教化，缮其城郭，浚其池隍，将帅得人，士卒用命，饷糈充裕，器械精良，则敌人觊觎之心默焉自息。何至听其玩于股掌，肆厥凭陵，削夺我藩服而不能援，逼处我边疆而不能拒，虐刘我烝黎而不能校，要求我金帛而不敢违耶？噫！谁非人子？谁非人臣？此长沙贾生所以痛哭流涕，扼腕抚心而不能已也已！

英国有著名硕彦、殷富巨绅设立弭兵会，约三百余人，别国亦有愿入者。如有两国失和，会中人即举极有位望者前赴两国，察其事之曲直，论其理之从违，另浼局外之国讲信修睦，俾无失和好而免启兵戎。并劝各国立约之初，必宜添入一条曰：凡我两国苟有齟齬，必延他国秉公解劝，不可先动干戈等语。各国中颇有从其议者。今其会不仅为英国私会，竟成万国弭兵公会。第一次会于法京巴黎，第二次会于英京伦敦，第三次会于意京罗马。有十七国达官赴会，共议弭兵善策，其成效颇为昭著。如昔年美国南北省大乱，英船数艘乘危图利，攻劫美国商船财货。美乱既定，核算美船之受害于英国者共银若干，即向英国索偿，英廷答以此事曲直非我二国所能遽定，不如延请公正人持平判断，庶彼此不致受亏。于是英、美两国各邀公正人持平核议，询谋佥同，乃判曰此案美国理直。盖美国当自顾不暇之时，英国宜及早约束本国船只，不准在美洋滋扰。英计不出此，应以英金三百万镑偿还美商耗损之款。英廷即允照偿。法与荷兰因南亚美利加属地互有齟齬，后遵弭兵会公请俄国君主剖断，得免纷争。英、美两国之人在卑令海峡捕鱼争竞不已，几酿事端，后亦遵弭兵会议，公请著名之人公断，遂不至以兵戎相见。其余小国因得调和而救宁者，亦复不少，虽霸主之强横、枭雄之毒焰，难执此议相绳。

或有谓此会专为阴谋中国而设，然既以仁义为名，持之者日坚，从之者日众，使桀骜之徒亦顾名而思义，未必非挽回兵祸之奇策也。英人罗柏村曰：现议两法如能遵行，则各国自得大益。其第一法欲令各国永立和好之约，议定各国各派两人成一和好会，办理各国相争之案，所派入会之人，必为众所推举。第二法欲将各国应许公法汇成一书，已经俄京与日内瓦处成会，将其数要款订立公法，为各国所应允，无论因何肇衅，俱有定章办理，使无可疑之处，则强国、弱国俱免误起争端。善哉！此举诚上契天心，非常之功德矣。

卷八 工政

技艺

今夫远取诸物，以制器尚象，古圣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试，既稟称事，劝工之典，并列九经。乃后世概以工匠轻之，以舆隶概之，以片长薄技鄙数之。若辈亦自等庸奴，自安愚拙，无一聪明秀颖之士肯降心而相从者。无惑乎器用朽腐，物业凋敝，一见泰西之工艺，而瞠目咋舌、疑若鬼神也。

上年恭读上谕，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一科，方汝绍奏请特开实学一科，着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仰见圣朝励精图治、综贯中西，与古圣王制作之精心隐相符合。无如当轴诸公安常习故，以艺学为末务，遂使良法美意仍托空言。而天下多能博学之人，亦绝无自幼至长孜孜焉专精一艺，以期用世而成名者。盖工艺之疏，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不先通算法，即格致诸学亦苦其深远而难穷，所以入工艺书院肄业生徒，皆须已通书算，未通者不收。何则？欲精工作，必先绘图，则勾股、三角、弧之学不可不讲也。精于此而后绘图、测算成器在胸，及其成物，不失累黍，否则方隅不准，钩斗难工。英国伦敦设有工匠学堂，以为工技之成，弟子每不能及师，不免每况愈下，故令学工艺者先读工程专书，研究机器之理，然后各就所业，日新月异，不独与师异曲同工，且变化神明，进而益上。此工艺所由人巧极而天工错也。苟专设艺学一科，延聘名师，广开艺院，先选已通西文算法者学习，读书、学艺两而化，亦一而神，则小可开工商之源，大可济国家之用。

夫工艺非细事也，西人之神明规矩，亦断非一蹴所可几也。今各省、各局机器师匠略晓机器、测算等学，彼此授受，绝少匠心，故廿余年来所造炮、船、枪、弹皆式老价昂。惟闻江南制造局采各

枪之长，新造一后膛枪名快利，较毛瑟轻而且远，不知其坚与速均能胜人否。坚、轻、远、准、速，须一一精细考验，方知孰优孰劣。况闻英国又新出利蔑佛枪，较快利更远。我国宜悬不次之赏，鼓励人材，使其精益求精，庶免有事之秋为他人挟制。否则亦器劣价昂，吃亏不可胜言。英国访事人亨利·那门云：“日本皆用新式苗也埋地枪，其制造厂每日可出一百杆。”我国能如是乎？

查京都无工艺书院，同文馆只教外国语言文字、算学，各制造局洋匠纵有精通，然贪恋厚资，未免居奇而靳巧。至者未必巧，巧者不能致，能致之巧匠，又或不肯传。洋师之难得如此。且华人之心力，未必远逊西人也。多有华人习学日久，技艺日精，而当道以其华人也而薄之，薪水不优，反为洋人招去。教习无法，考察无具，奖劝无方，一旦有事，制造无人，则归咎于华人之不可用。噫！岂华人果不可用哉？是主者之过也。是非专设艺院，则人才无由出，格致无由精，而技艺优劣之间，亦无由真知而灼见。

西国之技艺以英国为最精，制造各物价值多于土产各物。乾隆十三年即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美国将士弗兰克令著成格致书二，全部呈于国家，欲创设格致学堂，教习国中子弟，并开一公会，每期聚集通人，各抒所见，相与讨论发明。国家许其所请，因而美国化学日有进境，可与欧人并驾齐驱。乾隆十八年，英国特开艺术大会，无论巨商小贾、薄技片长，苟有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则会主给予文凭，以为积学之券。其有能造灵妙机器有利于人，则当奏准朝廷奖其才艺。此会一设，各人乐从，皆自出才力心思，以博荣名。于是各国蜂起，争相仿效，无不有工艺院之设。若创一新法呈验有益于世者，准创者独享其利若干年。英国更另筹巨款，专为艺术商人奖赏度支之用。如心思灵巧能制新物，或累于家贫未能竞业者，并资以经费，助其成功。斯时有美人雷璐耳，慧质灵思，胜人数倍，于格致、制造各事均能细研其理，明道其法，国人重其才，公举为艺术会中总董。远近奇特之士均来造访，或议论终日，或执贖门墙。雷君不炫己长，虚衷博访，倘其才有可用者，则潜记其名，以待他日网罗之用。英人之厚待人才如此，民风国运其有不隆然兴起者乎？近时美国百工居肆，心思日辟，智巧日精，每岁所出新样之物，多于英国。其工艺列科十二，别类分门。

吾粤邝容阶司马使美而旋，述美技艺院二十余所。每所约二百余人，教习各十余人。地基由朝廷给发，建院经费或拨国帑，或抽房捐。年费由善士输助，如不敷用，一学生收回修金百元、二百元不等，稍有盈积，概免修金。所收学生，无论何国，必文法、算学均堪造就者，方能入选。院中有工艺书，无制造厂，学成而后，另进工厂阅历数年。光绪二年，美设百年大会，见俄国艺术学院新制机

器甚精，因师其法，在艺院兼设制造厂，俾得同时学习。故学生俱能运巧思、创新器，学期将满，聘请有人。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凡有新出奇巧之物，绘图贴说，进之当事，验其确有实用，即详咨执政，予以专利之权，准给执照，并将名姓、图说刊入日报，俾遐迩周知。所以有美必彰，无求不得，殚精竭虑，斗巧争奇，莫能测其止境也。

美国发牌衙门发牌衙门西名拍吞，即考验各处所呈新出机器、技艺，准给有权独造执照之处。各国规例亦大同小异。查西报记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至七十六年，此三十年中各国出有若干新工艺，并比较何国多，何国少，以见民间之工艺盛衰。如四十六年，英国发出独造执照四百九十三种，七十六年发出三千四百三十五种。英属地在北亚美利加喀纳塔，四十六年发出三十八种，七十六年发出一千二百五十二种。奥国五十三年发出四百六十种，七十六年发出一千二百九十四种。比利时四十六年发出四百五十七种，七十六年发出二千五百七十种。法国四十六年发出二千七百五十七种，七十六年发出五千七百三十四种。意大利五十五年发出二百二十四种，七十六年发出二百三十八种。布鲁士四十六年发出五十五种，七十六年发出四百七十六种。美国四十六年发出六百九十种，七十六年发出一万七千二百十六种。俄国新法初兴，发给无多，不过百数十种。惟年来各国技艺精益求精，无不日新月异，所发执照已年多一年，其进款之多，胜于土产。顾各国准给独造执照之数，不尽是其本国新出技艺，有上等巧法，不独本国给发，即他国亦给，令其独造发售也，设总理一人考验机器，及画师、书吏各二十余人。每一礼拜呈验器物者，不下七十余种，酌收牌费，足敷公用。如此专门名家实事求是，制造所由日广，工艺所以振兴耳。

夫《周礼》考工居六官之一，《虞书》利用列三事之中。华人心思素多灵敏，自造新器，古不乏人。如江慎修先生制木牛耕田，以木驴代步，法虽不著，闻取猪脬实黄豆，吹以气而缚其口，豆浮正中，可知木制牛驴必用机关纳气令满，即能运动自如，似亦通西法蒸气拨轮之理也。先生又制留声筒，其筒以玻璃为盖，有钥司启闭，向筒发声，闭之以钥，传诸千里，开筒侧耳，宛如晤对一堂。即西国留声筒之法也。观此则知华人之聪明智慧实过西人。特在上者无以鼓舞之、振兴之，教习而奖劝之，故甘让西人独步。且上年所遣出洋学生肄业，又未得其法。如当时考取已通中外言语文字三十岁以内者，赴外国大书院肄习，各专一艺，不过数年可以成材，又省初学之资，无虑其年少变性，沾染西人风气，何致中途而废，制造各局尚用西人？今日本所需西人之物，无不自行制造，其价较西来之货更廉，又与西人时出新样，较华人所制，无不价廉而工美。小民生计，尽为所夺。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材，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中国士大夫鄙谈洋务者，咸谓欧洲各国富强未久。实不知其强

弱无常，盛衰迭变。余阅美国百年大会日报所载英、俄、德、法、奥、美六国富强之略，凡各国立国先后，人民多寡，国中贫富，国债经费之如何支销，土产工艺之如何征入，莫不清列。今择其大略于后，以备考核。

英立国八百六十年，人民计共三十四兆三十万零五千人。其富共四万五千兆，国债共三千八百兆，而每年之费共四百一十五兆，土产所值每年有一百二十万，而工艺所出每年则四千兆。法立国共一千一百年，人民共三十七兆零一十六万六千。其富共有四万兆，国债一千兆，国费六百五十兆，土产二千兆，工艺二千五百兆。德立国一千一百年，人民四十五兆三十六万七千，富二万五千兆，国债九十兆，国费一百五十兆，土产一千八百兆，工艺二千二百兆。俄立国三百五十年，人民八十二兆四十万人，国债一万五千兆，国费六百兆，土产二千兆，工艺一千三百兆。奥立国一千一百年，人民三十九兆一十七万五千人，其富一万四千兆，国债二千兆，土产一千兆，工艺一千五百兆。美立国一百年，人民五十兆零一十五万，国债一千八百兆，国费二百五十七兆零九十元，土产七千五百兆，工艺八千兆。

以上六国人民、财赋、国债、国费、土产、工艺合而参观，亦可知大略也。然则其工艺之多，土产之盛，国人之富，亚洲远不及矣。何尚庞然自大，鄙谈洋务者乎！

纺织

黎召民方伯曰：“富强之道，不外二端。彼需于我者，自行贩运；我需于彼者，自行制造。”诚哉是言也。

进口之货，除烟土外，以纱布为大宗，向时每岁进口值银一二千万，光绪十八年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万七千四百余两，内印度、英国棉纱值银二千二百三十余万两，迩来更有增无减，以致银钱外流，华民失业。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授困。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緻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运往西北各省者，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而南省纱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

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呜呼！洋货销流日广，土产运售日艰，有心人能不怒然忧哉？

方今之时，坐视土布失业，固有所不可；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于无可如何之中，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西贡进口布税，漂布每匹值洋三元半者，须纳税一元三角，是值百抽三十七矣；扣布每匹值洋三元一角五者，须纳税一元三角，是值百抽四十矣。今中国洋布税，值百者仅抽其五，甚有不及五者。如扣布每匹止纳税四分，洋布之宽三十因制、长四十码者，每匹仅纳税钱余或八分、四分，轻微尤甚。此不啻授以利权，畅其销路。所由进口日众，获利日丰也。今若改章加税，使价值渐贵，运售渐艰，则土布之销场渐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未为晚也。况换约之限，期以十年，届期毅然行之，必有成效。既然杜洋布之来，尤须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通商大埠及内地各省，皆宜设纺织局，并购机织造，以塞来源。

查纺织工作，共分三层。首曰轧花。西国轧花向亦人力，自英人怀德尼出，始创机器，而利便百倍于人工。西人综计每亩棉花岁收六十六斤，人工轧花每日可得净棉三斤许，必须历二十二日始轧成一亩之花。自机器行，则日半已足，敏捷可知。况棉中杂质又可提清，松匀洁白，华人皆喜用之。次曰纺纱。工分十二层：曰打花去土，曰弹花成片，曰梳棉成带，曰引棉成条，曰初成松纱，曰引长，曰卷紧，曰纺经纱，曰制纬纱，曰络纱成纆，曰合纆成包，曰提检废棉，皆有机器纺成，倍精倍速，所亟宜仿行者也。三曰织布。工分六层：曰络经，曰理经，曰浆缕，曰织缕，曰摺布，曰印花。其机器有大有小，不但程功捷速，而织成布缕亦精细圆匀，胜于人工倍蓰也。

论纱布之利，各国莫不讲求，尤以英为巨擘。当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棉花厂有二千四百七十处，织机有四十万座，纺纱挺子有三千二百万根，以后逐年添设，局厂日多，纱布运往各邦以亿万计。其棉花皆采自美国、印度，织成纱布运售于美、印、中华。技艺既精，心思尤巧，所由独擅利权也。年来日本机器织厂日增，所织各种棉布运入中国销售者，亦日见其夥。今中国已于上海、汉口设局纺织，果办理得法，以自种之花织自用之布，工贱价廉，无须运脚，实可收回利权。惟华人用洋布者过多，两局纺织不能敷用，倘再推广设局，遍及于内地各区，除销本国外，并可自派轮船运售于元山、釜山、仁川及南洋各岛，则纱布之大利，何难与泰西、日本诸国抗衡哉！

余尝与同志戴子搗太史、龚仲人、李韵亭两观察、蔡崑青部郎、

经莲珊主政，集股银四十万，公禀傅相，奏设上海织布局，限期十年，不准他人搀夺。如限期内有欲添设者，或另开纱纺厂，均由该局代禀，酌抽牌费，津贴创办开销改造织机，专用华棉，历年耗费，函请驻美公使容纯甫观察，于美国织布厂选聘熟悉纺织、诚实可靠之洋匠来沪会商。据云土花丝短，恐于现成之机不合。当令翻译梁君子石，亲带土棉数十担回美试验，将改好之机器织出之布寄回中国，皆云与洋布无殊，遂决意创办。先定机器二百张，拟俟人手娴熟，陆续添机，以免糜费。囑子石在该国织布局讲求利弊，以免欺朦，并囑考究外洋种花之法，天气水土如何方与花性相宜。先购花子，旋沪试种，以期日后推广，仿织细布。所置局地，先与同事诸公邀洋匠于沿江等处，以杨树浦之地最宜。共买三百余亩，每亩价银五十元，而同事者有禀傅相，谓不应买租界外江边之地者。未知此地其利有三：地沿江滨，上落货物便易，大省扛力，一利也。不在租界，不纳工部等捐，二利也。地面宽阔，又近马路，价极相宜，三利也。现在纱纺等局均设近布局，地价大涨，每亩已值银六百两，是既为布局省费廿万矣。地已购，机已定，洋匠已聘到之时，沪上洋商有拟设纱纺局，请其公使向总署理论，亦覬我华工价廉，获利更厚也。李傅相将公使来文钞示，余曾请律师逐条批驳。局事粗备，适值法越交绥，余为彭刚直奏调，赴粤办理湘军营务，因将银钱、帐目等件，交盛杏荪观察等接办。盛禀傅相，札委经莲珊主政代理，旋又移交龚仲仁、马眉叔、杨藕芳三观察合办布局股银放息，官商以股票抵借，股票价跌，无力取赎，变价还款，约亏银二万两。余本应禀揭，恐牵累人多，因自认失察，照数赔偿。不料接办未久，布局失慎，所有机房付之一炬。今傅相奏委盛观察集股重兴矣。余前购杨树浦地三十三亩在布局之侧，连涨滩约五十亩，旋粤后为人盗卖，余返沪后乃知已归布局。自顾安贫乐道，与世无争，故将原契检出，持赠布局，惟冀其利日巨，机日增，大开中国之利源，广辟重洋之商务，此则区区之私，所日夜祷祀以求者耳。

查癸巳年，金镑涨，汇水贵，洋布、洋纱价亦因之大涨，沪上纱厂获利甚厚。湖北织布局已开办数年，适逢此会，自应获利甚丰，何以去年传言尚有亏折，岂经手办理者未得其人欤？考泰西纺织各厂，皆设自商民，即制造船、炮、枪、药各厂，亦取办于民厂为多；即有一二官厂，亦悉用包工之法，与民厂无异。所以无冗工，无滥食，计工授食，而制造日精，且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故能运之来华，推行尽利。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

少，肥私囊者尤多，所以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而又苦于无机器，以致窳劣不精，难于销售。由是而论，通商之利宜其独让西人也。

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如民间有能纠集公司、精心制造者，地方官查勘属实，即应奏明国家，为之保护，并仿照西例，如前篇所论，技艺精通者给予奖牌，庶有志之士咸思出奇制胜，独步一时，而商务之兴，可立待也。

农事

古之言曰：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树艺，而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故水潦出于天，肥饶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

昔英国挪佛一郡，本属不毛，后察其土宜遍种萝卜，大获其利。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鸟粪培壅，百谷无不勃茂。犹是田也，而物产数倍，是无异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反硗确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地利之关乎人力，概可知矣。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万里中原，沟渠湮废，粟麦而外物产无多，地之肥者变而瘠矣。扬州之赋上下，今则吠浚纵横，桑麻翳荟，神京廩给悉仰南方，地之瘠者变而肥矣。三古农书不可考已，今所传者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学士博览所资，而犁云锄雨之俦，何能家喻而户晓？况劳农劝相，虚有其文；补助巡游，今无其事，民亦因循简陋，聊毕此生，盖官民之相去远矣。

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用考农功，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种其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扰尤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至牲畜受病若何施治，谷蠹、木蠹若何豫防，复备数等田样，备各种汽车。事事讲求，不遗余力。先考土性原质，次辨物产所宜，徐及浇灌、粪壅诸法，务欲各尽地利，各极人工，所以物产赢余，昔获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

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磷、曰钙、曰钾。磷为阴火，出于骨殖之内，而鸟粪所含尤多。钙则石灰是已，如螺蚌之壳及数种土

石，均能化合。而钾则水草所生，如稻藁、茶蓼之属。考验精密。而粪壅之法，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迨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蔬，入以电气，萌芽既速，长成更易，则早寒之地，严霜不虑其摧残；温和之乡，一岁何止于三熟，是诚巧夺天功矣。

其尤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互相仿效，必底于成而后已。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耦其耘，比户可封也。

然而良法不可不行，佳种尤不可不拣。地属高亢，则宜多种赤米。赤米即红霞米，松江谓之金城稻，色红性硬，最为耐旱，四月布种，七月即收，今北地多有种之者。若卑湿之田，则宜种耐水之稻。稻之利下湿者为稔，稔种有黏有不黏。黏者为糯，又谓之秣，不黏者为秈。汜胜之云：“三月种秈，四月种秣。”最为耐水暹罗稻田，一至夏间，有黄水由海中来，水深一尺，苗长一尺，水深一丈，苗长一丈。水退之后，倍获丰收。此低田之所宜也。其余花果、草木，皆当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如牛、羊、犬、豕之属，皆当因地制宜，教以牧畜，庶使地无遗利，人有盖藏。惟小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非得贤牧令民心民事，以教导而倡率之，未易遽有成效也。稽古帝王之设地官司徒之职，实兼教养。孔子策卫曰：“富之、教之。”其时为邑宰者，劝农课耕，著有成效。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

惟泰西尚有古风，为民上者见我所无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下人，必穷究其所以然，故效法于人，蕲胜于人。年来意大利、法兰西、印度、锡兰所种丝、茶，反浸浸乎胜于中国。曩有宁波税务司康必达见我养蚕未善，不能医蚕之病，往往失收，曾倩华人到外国学习，尽得其法，并购备机器，欲在沪仿行。格于当道未准，其机器尚存格致院中。

今粤东有肆业西学者，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惟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

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每省派藩、臬、道、府之干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若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决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扰民，亦不准故事奉行，敷衍塞责。如果行之有效，开辟利源，使本境居民

日臻富庶，本管道府查验得实，乃得保以卓异，予以升迁。仅仅折狱催科，只得谓之循分供职。苟借此需索供应，骚扰闾阎，别经发觉，革职之外，仍重治其罪。重赏严罚，以兴事劝功，天下之民，其有豸矣。

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枢纽也。日蹙蹙然忧贫患寡奚为哉？

或云：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鸟，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闲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则教以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货愈多，销路自广。而且东南各省皆宜树棉，西北各省更宜牧畜。棉花为纺织所必需，除种土棉外，更须试种洋棉。洋棉以美国南海岛种为最佳，西人尝用此花一磅，纺丝长至一千尺，是为上品。大概土棉质硬丝短，不能织极细之布；洋棉质软丝长，经机器不致中断，所织之布细韧异常。余尝刊有《美国种植棉花法》一书分送乡人，并购美国花子在沪栽种，确较土花丝长，惟其性畏寒，一见霜则叶陨花枯，必须考究天气、水土相宜之处，方可播种。附志之，以告留心种植者。

垦荒

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矣。以天下大势论之，东南多水，农功素勤水利，农田宛存古意，故漕米百万，上贡天庾；然地狭人稠，民力将竭。西北多旱，民情素惰，偷安视息，收成之丰歉，一听之于天；土旷人稀，未垦之荒土、荒田以亿万顷计。如东北之吉林、黑龙江，正北之热河、河套，西北之科布多、新疆南北两路之罗布淖尔等处，绵亘千里，一望无边，土著不识耕耘，地利终于废弃。外如西南川、滇、桂、粤之边境及广东之琼州，东南之台湾内山各处，榛芜未辟，遗利尚多，疆吏漠不关心，动为外人侵占。而内地烟户过密，生齿日蕃，土地之所生几几乎不能自养。古圣王处此，其衷多益寡、酌盈剂虚者，必有其道

矣。

比年大开海禁，闽、粤之烝庶出洋谋生者，实繁有徒，以致南洋各埠、新旧金山、英、美、西、葡各国设立苛例，杜绝华人；在彼者亦逼作苦工，流离困辱。中国之边境苦无人以实之，而忍听吾民之逼迫羈栖，飘零海外，窃以为非计也。

夫有人有土，有土有财，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混同江东二千里之地，徒以无人开垦，广远荒凉，置同瓠脱，故俄人不费一兵，不折一矢，泰然而窃据之，而东三省之边防日棘。使当日者有十万华民耕牧其地，则俄人不敢过问，国家永保边陲，何至重烦朝廷之东顾哉？

乃今之言边防者，汲汲然言选将，言练兵，言筹饷，言制器，而不能言移民垦荒以实其地。谁与我守此疆圉，而防人侵轶乎？千里馈粮，土有饥色。虽有精兵名将，又岂能不饮不食，枵腹荷戈以与敌争此土乎？故垦荒一事，不知者以为老生之常谈，知者以为切时之要策也。

谓宜通飭边疆督抚，将沿边荒地派员探测，先正经界，详细丈量，必躬必亲，毋许疏漏，绘图贴说，详细奏闻。然后综计，一夫百亩，招募内地闲民携家前往。籽粮牛种，官给以资；舍宇堤防，官助其力。附近各省通力合作，岁筹闲款，移粟移民，边帅抚恤招徕，勒以军法。四五年后，酌量升科。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仿屯田旧制，设官分治。或将军、流以下各犯分别远近，酌给资斧，准其携眷远行，以实边塞，且可驱莠以化良矣。

此其间有数利焉：内地贫民免迫饥寒流为盗贼，一利也。边陲要地自开遗利，免启戎心，二利也。他日敌人侵轶我疆，边民各保身家，人自为战，三利也。比年整顿海防，饷力已竭，安有余力以顾边防？如此则兵出于民，饷生于地，四利也。沿海贫民即可移垦台湾、琼州各处，何必远适海外，为人轻藐欺凌，五利也。

林文忠之言曰：“泰西各国不足虑也，终为中国大患者，其俄罗斯乎！”近日俄人费万万帑金以修西伯利亚之铁路，阴谋诡计，行道皆知。而中国惟西北一边空虚最甚，自吉林、黑龙江袤延以达于西藏三万余里，安能日日应敌，处处设防？除此移民实边，更无善策。而功非旦夕所能竟，事非晷刻所可成。非朝野上下间一德一心，得人而理，期以廿载，不能收安边克敌之功。曲突徙薪，今日已恨其晚矣。若之何苟且因循，坐使万里疆陲他日束手而失之强敌也？

中国官尊民卑，民欲望官之颜色，几不可得。官于所辖之境，地数、人数茫无所知。集绅董而谓之曰：“尔其勤民务农。”出一示

以晓之曰：“尔其勤于播种。”甚或假权差保，藉端肆扰。今欲兴农，必须通飭各州县，略分言情。不问何人，有事来谒，从容接见。或肩舆，或扁舟，或徒步，任意出外。一县之中分东、南、西、北为四乡，委精化学、种植及测量之人，亲历陇亩。凡村镇若干，河港若干，山林若干，高田若干，低田若干，已开垦若干，未开垦若干。考察天气、土性，何处宜种植，何处宜牧畜，何者耐水、耐旱，何者宜北、宜南。或知某处有矿，均绘成图，详细注明。再进士、农、工、商中之年老诚朴者，咨询一切，清查某村、某镇，士若干，农若干，工若干，商若干，客籍若干，游民若干，姓某名某，记之于册。一县情形如指诸掌，后至者由地保随时禀报，每年仍下乡一次。所有荒芜之区，有业主者限以三年垦熟。过限不垦及无主者，入官。就荒田之等差，分上、中、下三则，令民领垦。第一年领垦费，上则每亩给钱若干，中、下视此递降。三年而开科，税如熟田。或有富户集股领垦，无论多寡不须领费，分荒田之等差，准予五年至十年而后升科。领垦之人，国家例有奖励，垦愈多，赏愈加。或赏以职衔，或给以田土，免税若干载，以旌其劳。自然荒芜悉成腴壤矣。

旱涝

伊古以来，御旱防潦之法，莫善于黄帝之井田，大禹之沟洫矣。何则？平原千里，川渠吠浚，经纬相通，大雨时行，容水有地，河流顺轨，潦不为灾。及乎雨泽不时，旱暵为患，而沟洫所积之水浸灌有余，滋润土膏，流通地脉，苟非七年之旱，未足以困我烝民也。

惜乎列国相争，各图自便。商鞅创广地之议，沟洫湮废，变为阡陌，贪小利忘大害，古圣王之良法美意，浸至荡然无存，而黄河之患亟矣。夏秋之间弥月不雨，则禾黍枯槁，千里赤地矣。自汉以来，当事者尚知治理河渠以资灌溉，迄刘、石构乱，东晋南迁，中原文献焚荡几尽。而东南十省沟渠水利，转存皇古之遗；大河南北之间，水利无存。水患日亟，土地之肥者忽瘠，民庶之富者忽贫。唐乃漕江淮之粟以给关中，宋亦浚汴河之渠以通转运。自元、明至本朝而后，则正供数百万悉仰南漕，上下嗷嗷然若婴儿之待哺。于是而河运、海运之说纷然起矣。

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山西之旱一，河南之旱一、水一，山东、直隶之水则至再、至三。每次公私赈款，辄至数百余万，

皆出于度支正项，或南中义捐。岁岁告灾，其忧未已，而穷民之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也。

夫北方数省之民，岂能长恃赈款为生乎？官吏之抚治此方者，又岂能长以告籴劝捐为事乎？幸也南中好善之士不乏其人，出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然救灾恤邻之举可暂不可常，可一不可再，岂能长恃此无源之水，以活此亿万涸辙之枯鱼乎？不可得已。前者郑工既决，国家不惜费千万帑金以塞之矣；兹者永定河屡决，复特简重臣、屡拨库款以兴大工，而规久远，所为防潦之策区画者，似无弗周。至于御旱之方，寂然未有善法者，窃以为皆治其末，而非治其本也。

治本奈何？曰：《周礼》之成规，开渠、种树而已矣。夫井田不能复，而沟洫犹可渐开；富教不易言，而树艺必宜急讲。开渠之法，宜飭疆吏檄行所属，查明各州各县旧渠若干，存者若干，废者若干，若何兴修，若何筹款。然后略仿元人之法，每省简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轻车简从，分行各州县，测量绘画，旧渠之宜复者复，新渠之且开者开，必顺人心，必随地势，著有成效，优奖超升。并董劝民间，自于田畔多开沟洫，民力不足，官助其成，岁岁修治，毋许湮塞。英人于印度高地筑塘蓄水，宽数百顷，按时开放，售之于民。中国及东洋本有凿井筑池之法，均可傍收博采，因地制宜。此开渠之法也。

泰西数十年来，于种树之事极为尽心，特设专官，如古者虞人之职。自树木广植后，不特名材美木获利无穷，且树旁之田瘠者变而为腴，因树根能吸土膏，能烂沙石，故硗确之地悉化膏腴也。无水者变而有水，因树木能放养气，能润本根，故干曠之区，咸资灌溉也。而且根株盘结，沙石化为土壤，松脆变而坚凝，墙岸益坚，堤防愈固，则御旱、御水无所不宜。古所谓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者，非虚言也。中国种树古有专书，汉、唐以来官不过问。自粤、捻构乱，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即可责水利农田使，相劝督率于田侧隙地，广植林木，以复旧观。有斩伐者，罚赔不贷。至于蚕桑之利及松梓、果蔬一切有利之植，尤必随时广种，以厚民生。岁岁增加，十年则官伐而售之，仍以此款修理川涂，广兴水利。此种树之法也。

夫以上之法，皆中国自有之，且尽人能言之，无所谓高远难行、神奇莫测也。然而小民不知远计，各便私图，非官为倡率之，则苟且因循，年复一年，而荒废愈甚。遇有灾歉，则坐待赈济，或相率逃亡，比户荒凉，滔滔皆是。且开渠则各惜尺寸之地，种树则谓非旦夕之功，可与乐成，难与图始。蚩蚩者氓，大抵然矣。

或曰：如款项不足何？而不然也。今日一省告灾，捐赈动数百万，今年之赈甫毕，明岁之灾又来，庚癸频呼，良难为继。苟每省岁拨五十万金以开渠种树，西例：凡伐一树，即须补种两株。立法甚美。今各省既兴矿务，筑铁路，所需木料日多一日，亟宜明定章程，责成地方官设树艺局，招致勤廉士绅，专讲种植，要使境内无旷土，无童山，其利泽溥长何如也！教之树蓄，本王政之所先，幸勿以事物细微而忽诸，得人而理，合力以成，御灾荒而垂久远，比及数年，成效昭著，中原万里，虽终古无灾可矣。夫焦头烂额，固不如曲突徙薪也；亡羊补牢，终胜于临渴掘井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所谓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幸毋疑为迂阔，忍听销沉，长恃此有限之赈捐，欲以救无穷之百姓也！

治河

河水发源昆仑之墟，伏流数千里，涌出地上，汇为星宿海，至积石流入中国，由积石而东北、而南，三千里至龙门，今山西河津山石崇竦，河流湍急，禹凿之以分其势。其在河南省河阴县以西，两岸夹山，势不能改道旁泄，故河流至今如旧。自荥泽县广武山而东，既无两岸之山以束之，而又土松地旷，乃得逞其浩瀚奔腾之势，横流于兖、徐、冀、豫之区，不可复制。

我朝定鼎幽燕，正河道敝坏之后，溃决频仍。然河性避逆趋顺，避坚趋疏，避远趋近，避高趋下。挽之即忽左忽右，扼之又乍进乍退，皆失其本性使然。善乎欧阳公之言曰：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流不快，上流乃决。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强复之，则每决于上流。惟有曲体其性，为分、为合、为宽、为束，顺其势以驱之，勿容其下流有淤。且下淤之故在于积沙，沙去而不停，则河流自畅。

昔李公义制铁龙爪、揭泥竿车，绳曳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水深数尺。黄怀信制浚川筦，以石压之，取大绳碇两船之端，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动，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以浚，水浅则反齿曳之。凡此皆去沙之具也。即或施用之法，今昔偶殊，而神明变化，在得其人。不使河积沙，水落而沙已刷，不与河争地，水涨而有所容，则河归山东入海可也，从淮徐入海亦可也。但祛其患而已，何论南北！

我中国防河之员，古有能者，防河之策，世有成书。国家不惜费数千万金，为亿万生灵谋安乐，奈泥沙至下流愈壅，而堤防至下流愈多，且堤工之需土也，势难掘河中泥沙，则必掘就近之田土，

迨堤上之土渐坍入河，又再掘田土以修之。年复一年，堤身既高，河身与之俱高。河身愈高，田地因之愈低。河高田低，水性就下，必至河变为田，田变为河，沧桑迭变，职是故耳。

伊古以来，河自开封而下东北，逆流入海，《禹贡》所谓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迨九河既塞，沙石日增，堤岸日倾，河底渐高，乃东南趋清江浦入海，积久而沙石之埋也如故，堤岸之倾也如故，河底之渐高也亦如故。故咸丰四年，又自大清河而东北趋入海。数十年间，河流屡变，为患滋甚。此所以近年复大决也。一决于郑口，而徐、豫被灾；再决于涿口，而齐、鲁受害。仰邀庙社之神灵，上廛朝廷之筹画，仅得安澜顺轨，大溜归漕，费数千万金钱，大工于焉告竣。甚矣！河之不治，正不得委之天数，而无预于人事也。惟是决口虽塞，而不求善后之策，则犹未可恃也。

今就管见所及，略举四端，以资采择。

一曰缓上游。河之上游，诸山峙立，当于山下锹塘，谷里通渠，引水停蓄。如本河不得宣泄，则开沟引归别河。若不能另筑别路，可在本河两边开沟受水，皆用堰闸，随时蓄放。庶河流迂缓，不致横决，所谓顺路通汇，顺汇沟通，顺沟通河是也。且设闸穿渠，则两岸村庄可收水田之利。或地势稍高，去河较远，可用桔槔吸筒取水。多掘深井，兼用轱辘。河道潦则益，旱则涸。西法治河，务防旱潦。防旱在设闸蓄水，防潦在启闸泄水。建立双闸，得力尤多，开浚尚其次也。

一曰开支河。河水当春夏之交，积雨平添，一泻千里。海口淤浅，支河沙淤，势必泛滥。宜遴选干员，悉心勘察。浅者深之，狭者宽之，曲者直之，水得归墟，自无倒激。且河流之分，莫便于郑州。此处直抵淮河，自洪泽湖、清江浦老河入海。颍州府去河数里，四周瞭望，一片汪洋，广袤二百余里。豫南水汇于此。复有自正南六安州来诸河之水，正阳关宛在中央，可借势辟为湖。由豫通皖，多有西南顺向东北之深沟高堤，昔人所造，取大河泛滥之水分入小黄河。有此堤为沟，即为东北十数州县之保障。支河开，河流分，水势杀矣。取泥之法，可参用泰西挖泥机器船。即以水中之泥为筑水边之岸，兼而行之，事半功倍，庶免筑堤反以填河之害也。

一曰宣积潦。积水不宣，行潦暴发，则横冲直决，平陆顿成泽国。清口、云梯、关通、河海道，今俱干涸，如导黄水行此道，而以洪泽等湖蓄来路之水，水性就下，颇堪逐渐归江。黄流经行，率皆高地，今决而行东南，路属低洼。如顺势筑堤束水，可开浅水船，往来镇江之大路。荷兰治水之法，岸设大风车，逐水归海。凡近河海之处，皆筑堤防，有高至四五丈者。或于堤上开路达水，以备宣

泄，而资灌溉，酌量参用，可免壅塞之虞。

一曰开大河以蓄水。黄河之开湖，莫便于口外蒙古之地。上古不乏未成之湖，虽大小不等，而综计大概，周围约千里有奇。历年久远，沙石充塞，遂成荒野，即所称沙漠之区也。黄河自陕之宁夏出关，北经其地。倘于其处开成大湖，自湖之西面或开一口，或开二口以纳水。湖之东面，开口泄水亦如之。湖之两面各口建闸，以限水之多寡，各闸设员以主闸之启闭，河水不大，两闸皆闭，则河自河，湖自湖，各不相谋也。万一奔流倒峡自天而来，则开其西面之口以纳之。水势虽猛，而有此千余里之大湖以分其势，当亦杀其大半矣。况河水至此一停，沙石沉于湖底，上流既留沙石，下流自免淤填。即有时河水满盈，而大溜既通，何至泛滥洋溢？此非无据而云然也。

亚美利加之北鄙有大河名圣桑罗，流长水急，与黄河相埒，幸其间有天成三大湖，水入其中，略为停蓄，泥土沙石，悉沉湖底，故河流清涟，直到于海，而舟之行乎其间者，往来不绝。又埃及之尼勒河，昔日为患万甚于圣桑罗。夏季约瑟执政，于其国之东南掘一大湖，湖名美利。自此历数千年不为患。则甚矣，开湖之为益大也！

然河之开湖于蒙古也，其益正不仅此。

一不侵占土田。盖沙漠之地半皆死水，未及耕耘，即有草木蕃芜，不足供刍牧。开湖于此，上不妨国课，下不害民生。其便一。

二可以时蓄泄。河水盛，则放其西闸，约之于湖而不致太盛；河水衰，则开其东闸，引之入河而不致过衰。河水以人为消长，而不啻在馭之马，驰驱由我而范者。其便二。

三可以资灌溉。无湖之先，沿河之民间赖灌溉之利。然水之消长无定，水涨则千顷汪洋，水消则两岸辽远，是水大不便，小亦不便也。有湖以主其出入，水之消长、大小皆由人定，斯灌溉之利赖无穷矣。其便三。

湖水之出入有定，河水之盛衰亦有定。凡河水所经之地，如陕西东界、山西西界、河南中界、山东西界、安徽北界、直隶南界，五六省皆可资其余润。即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而人力胜天，旱潦无患矣。泰西埃及一国，暘多雨少，一岁之中甘霖绝少。其所以润养稼穡者，则全恃乎泥勒一河。而黄河从可知矣。盖黄河水中之土肥美宜田，使疏而通之，如泥勒河之利便，则稷巛黍与千万之仓箱可庆，前被其害者，今且享其利矣。其便四。

鱼性喜清而不喜浊，黄河之鱼无多者，水浊耳。今既开湖以清上游，则自蒙古而下直至东海，河水清涟，虽非鱼知鱼之乐矣。况

河流既清，而舟舶之往来于其中者，毫无艰阻，则舟楫之利达于北方，而水磨之设，更无论矣。其便五。

说者曰：河身年年淤塞，两岸筑堤，河身愈淤愈高，建瓴之势，一决则胥为泽国。是可以河身为堤，另于河外挖阔数里，所挖之土另筑一堤，由河南、山东以下，节节相机改筑。俟筑成之后，则决水入所挖之河身，而两堤夹之以入海，此可保数百年无患。但事关重大，劳民伤财，成功非易，恐贻天下笑。

曰：“天下事因仍者易为功，创始者难为力。”又曰：“小民难与图始，可与乐成。”夫黄河自开封而东，数经溃决，河臣随时修筑。决于此者修于此，决于彼者筑于彼，补偏救弊，易于见功，而无如今日筑者明日溃矣，明日筑者后日又溃矣。十日之筑，不敌一日之溃，而一朝之溃，足费经年之筑。则始逸而终劳，名易而实难，功之成者安在？故治河之事，尤贵得人。然而责之河官，不如责之疆吏，责之疆吏，不如责之乡绅，盖生长聚族于斯，则痛痒相关，不敢自贻伊戚也。

夫中国之人动曰黄河有神，决口、合龙皆一归之天意。而不然也。南亚美利加之亚马孙，北亚美利加之米西昔比，其河源之高，河流之急，亦与黄河等。治法夹河筑堤，高厚近水，使河身宽窄相均，水溜疾徐相均。先用木石于河口修坝，五年工毕，溯流而上，筑土堤长五千里有奇，经二年而工亦毕。于是沿堤种树，年年修补，至今屹然无恙。端在堤近水深，则溜急力大，始能带沙泥下行。上游河底刷深，则海口之底亦刷深，此一利也。河身上下游宽窄相均，则堤不能决，此二利也。入海之处既深，则商贾大船可进，此三利也。一成之后，功坚料实，水患永除。其他义大利之治官河，埃及之治尼勒河，英人之治印度河，大致不外此法，至今永无河患。彼亦人耳，所尽者亦人事耳，何竟一劳永逸若是？

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决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无论何国之河，当制其水势之盛而去其淤，方为妙法。

首在理河源，或于近源处递修层坝，以节其流；或廓开一湖，以停蓄之，即上游众水来归，亦于此为总汇，且多作旁池，使水入池中，旋而后进，泥沙因以沉落，兼多植草木，以潜吸其水气，不至泛滥为灾。此理河源、制水去淤之说也。

次开海口，须兼用机器，挖其底令深。又于海口左右用木石作坝，直入海中一二里许，以速其势，则入海之处泥沙不停。前土耳其国开多瑙河，海口未开以前水深七尺，开后水深二十尺。荷兰国有止水名马河，壅不通海，嗣凿通之，海口深至二十尺。德国一河入海处水深七尺，开后深十八尺。俄国有河，入海处水深三尺，开

后深十二尺。他国开海口，亦有由六七尺增至一二十尺不等者。此浚海口之说也。

再河身两堤多植草木、竹苇之属，能吸河水，能固河堤。此治堤之说也。

连岁俄人于西北诸境经画河渠，泄暴涨，杀怒流，意以中国为壑，建瓴高屋，全涌来源，水势将自此益大。苟不尽法以疏浚之，为患将何极哉？且西北、两江、两湖水患之外，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患者，今亦为患，年甚一年。安得当道如大禹复生，相度形势，为之疏凿，使水患尽平，化有害为有利哉！

雍正间，李敏达疏云：天地之有江河，犹人身之有血脉，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黄河西北之水，由高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夺。故神禹治水，止言疏引，顺其性而利导之。《尚书》所载，无庸琐赘。然洪流浩瀚，汹涌奔溢，急则冲刷无底，漫则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导、或防，惟于此处可施作用耳。

臣闻黄河入海之口，原设有船夫，不时疏浚，使不致沙淤壅积。下流之脉络宣通，则上源之横决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后经河臣为节省裁革，不于此处留心，以致沙填海口，黄河下流之处，听其散漫，沙日益壅，而水日益浅，所以年年上流决口。前次北岸之冲夺运道，犹可急为补救。惟去年决开南岸，水无所容，直趋洪泽湖，仍由清口会合黄水，方入东海。

但洪泽一湖，上自陕西商南以东等处山水，并河南五府以及江北一带诸流总汇，即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堰已属危险，再加黄河归并其中，更当何如？况黄水浑沙，一见清水必然澄落，湖底势将垫高，再遇水发，则湖愈浅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难。倘有漫溢，则淮、浦、高宝以东数千万生灵，皆有可虑。久在圣明洞鉴，而未闻河臣言及于此，深为惶惑。

臣幼龄时，即闻从前三十余载黄河不为大患者，实赖原任河臣靳辅之力。迄今小民犹食其福。且彼时沿河官地，尽种柳蓄草，坝扫之需，不累百姓。嗣后治河诸臣莫能改其成规，不过托天家之洪福，循途守辙，仍无大患。及渐次崇尚节俭，遂多用不知河务之腐儒，因而渐至废弛耳。

招工

粤东澳门、香港、汕头等处，向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名其馆曰招工，称其人为猪仔。猪仔一名载至西洋，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番官收费二元。其党与洋人勾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资财，或诱以游博，一吞其饵，即入牢笼，被拘出洋，不能自主。或于滨海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逼迫登舟。官既置若罔闻，民亦何由申诉？初则省城外黄埔等处皆已蔓延，嗣被大吏访惩，甫能封闭，而澳、港外埠之根株犹未绝也。盖美、阿两洲及南洋各岛，日汲汲然开矿、垦荒，土著寥寥，不能集事，故不得不招工，但工资过微，人谁乐往？于是招之不来，出之以诱；诱之不能，出之以掠。

计每年被掠卖者，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自尽者，不知凡几！幸而抵埠，即充极苦之工。倦即加以鞭捶，病亦不许休息。日出而作，牵以铁练；日入而息，横受拘囚。逃走则有连坐之严法，处死则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无路。其中不乏右族名门、单丁爱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桃，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英人华利言，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少壮者，有中年者，俱由中国口岸引诱出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尚不至于过困苦，若至秘鲁、渣华般鸟、昆士兰、岑勿他刺、租阿或东海各小埠，则备受酷虐，呼吁无门。谁非人子？能不为之流涕而太息哉！

或谓猪仔登舟，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遣回，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自愿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谋百出，上下交通，当番官审讯时，皆拐匪冒名自称情愿，并非本人，即一二号呼哀求释遣者，亦系有意装点，欺饰庸愚，鬼蜮心肠，险幻至此！华官、番官纵公正明察，亦安能不堕其术中？

夫贩人为奴，本干例禁，今则名为招工，实与贩奴无异，原西律所不容。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资千百万赎还遣释，严申条约。诸国至今称之。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亦以贩奴而起，后乃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中外辑睦有年，无分畛域，而竟任彼勾串奸商，为此违例害人之举，出入各口，漫不稽查，其玩视中国也甚矣！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

遂成富庶之邦。徒以华工佣价廉而效职勤，土人以为夺其大利，焚劫驱逐，无毒不施。土人倡之，议院和之，苛待之条，闻者发指。其薄视吾民又如此！澳门虽有严禁拐贩之议，而积久弊生，奸民诡计多端，有防不胜防之虑。勾通洋舶，诡称某岛某埠有地待辟，有事可图，及至中途，易船他适，愚氓入其网罗，永堕地狱。西士之明理者，亦闻而嫉之。今巴西又欲招工，难免不蹈故辙。查巴西土产，以茄非、树胶为大宗，昔日所用黑奴，待之寡恩。自前巴西王下令赦黑奴后，黑奴逃入深山，变为野人，不愿佣工于寮，以致年来所产茄非无人摘采，需工孔急。巴西政府招徕德、义两国之民前往，其应招而来者，亦不愿作工，另谋生计。又有美籍之犹太人应巴西之招而往者，困苦不堪，因求美驻巴领事为之措资，载回美国。据出使者云：询诸载回之人，则谓巴西之待工人至为苛虐，所作之事如伐木、掘土诸工，最劳苦者，每日工价不过银二钱，黑人尚不堪焉，可使华民轻往乎！

似宜查照公法，与各国明订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查核所需人数，转报总理衙门，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中国派员驻香港、澳门及各要口。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单具报，请华官登舟，查验盖印，申报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国之时，船主呈请华官，照单覆验，然后发与工主，具领雇用，毋许虐待欺凌。或其地未驻华官，向有中国殷商为甲必丹者，或各会馆董事主之，覆验后报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给发谕贴，予以经理之权。最要者宜由政府照会招工之国，事前不许苛虐，事后尤宜善待；华工之久历辛勤者，倘自愿旅于其地，准其入籍与土著同，不得如美国之无端逐客。庶乎民命可保，而国体亦自尊矣！至华商贸易出洋，与华工稍有区别，亦应先期报明，给凭查验，以免奸民假托，仍成拐贩影射之端，免彼族轻藐华民，有失中朝大体。

惟主其事者，须知此举为保护华民而设，亦非禁阻华人出洋，不得婪索资财，徒貽汕笑。是又在当局之慎选其人耳。泰西事例，领事之权本属有限，降而至于董事，更无论矣。南洋各岛栉比星罗，势难处处设官经理，必须知照各国，准由华商董事综其事权。庶华人所到之区，皆我保护所及之处矣。东南数省生齿日繁，既不能概禁贫民之出洋，又不能坐视华工之受害，如此因势利导，立法维持。救之于已然，不如保之于未然也；争之于事后，不如察之于事先也。斯古帝王民胞物与之本怀，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策也。

恤贫

古者鰥、寡、孤、独谓之穷民，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四者。《周礼》睦姻任恤，当日必有规制法度，厘然井然，足以传之后世者。惜书缺有间，不可考矣。

中国生齿日繁，生机日蹙，或平民失业，或乞丐行凶，或游手逗留，或流民滋事。近虽设有栖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诸处以惠元元，大抵经理不善，款项不充，致穷民仍多无所归者。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市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揆其所自，实迫饥寒。亟宜设法扩充，官绅合力，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广为收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所有款项，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岁刻《征信录》，多置田产，藉供饘粥，广葺厦屋，俾免风霜。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增赋税。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此也。

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西人遗囑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闻英人密尔登云：英国有富家妇，夫亡遗资甚多，其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及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之地，共费银一千五百万磅。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囑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而其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

即以养病院言之，屋宇宽广，洁净无尘，病人到院就医，医药、饮食之需，悉出诸医院，医生不惮烦劳，役人不避秽恶，曲加体恤，以愈为期。

育婴堂以美国纽约为最善。房屋百余间，男女自初生以至七八岁，常有数百人，多或至三千人。每楼十六榻，二榻相并，一卧婴儿，一卧乳媪，衣服精洁。男女四五岁，即使识字读书，教作小玩物，以开其智慧；六岁至八岁，女师教以歌诗，舒和血气。俟及岁时，量材荐事。每岁经费约二十六万元，半出公家，半出善士。俄国育婴堂抚养之道，揣摩体恤，无微不至。常有富贵之家，患家中自养不善，出资相助，兼以自托者。

义学堂则贫家童子自五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塾，兼习工商之事，

不学则罪其父母，旷学则其师督责之，至再、再三，仍或不悛，则拘诸改过学堂，使之省过。更有富人自制一船，招致贫民，供其衣食，设监督之人，令其学习水师，限两年技成，分派兵船充当水手。

英之养老院，伦敦都城凡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妇之老而无告者。月抽其乡租为经费。日给三饭，晨给一馒头、一茶、一牛脂、一粥，午加肉，晚加羹。血气衰者，医士谓宜酒，则酒之。男外服黑呢，内服白布，女服什色衣裙，无异充裕之家，每礼拜一易，敝则改造。寝所宽舒，男女异处，夫妇偕则共一室。妇女未衰老者，令缝纫而货之，畀以十之一。有不愿居于内者，饭时乃集。有仅投一宿、予一饭者，则别为一所。国主时一临视，或遣子女代查，以昭慎重。

老儒会，则读书寒士虑其就食为耻，继粟继肉，遣人致诸其居。

绣花会，则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聚之深邃堂室，供给饮饌，使之纺绣而货之，禁男子不得擅入。

童艺院创于瑞典，继于丹马，后德国亦效之。每年两次，令地方查明无业子弟，选其聪慧者，教以雕刻、订书等浅近之艺，限六礼拜学成。考验有效，集资以奖其师，而荐其徒于各工厂，俾谋衣食。

又有保良会，由妇女集金创设。凡有女子之飘流失所、沦人下贱者，设法保护之，或捐资以赎之。

疯人院，或因半生蹭蹬，一意贪痴，以致痰迷心窍，入院之后，投其所好，以破其迷。如欲贵则奉以冠裳，欲富则聚以金宝，或择林园以优游之，置钓弋以消遣之，积久生悟，其病自除。每年院中或数十人，或十数人，时有出入，颇著成效。

训哑院及训聋瞽院，遣此疾者，能令其识字知书，就其所能，教以工艺，补天有术，施惠有方，用心亦良苦矣。

法国京畿内，善会五区。一为施医院，一为济贫所，一为养老所，一为育婴堂，一为疯癫院。所用上下执役人等六七千名，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磅。其费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其一分则由工部局拨给。司其事者，皆平日笃行好善之教士充之。

美国有劝世会、义学会、戒烟会、抚孤会、养老会、恤疯会、化罪会、防恶会、劝和会、恤贫会、劝农会、虞后会，经费或筹诸国帑，或捐诸民间，莫不经纬详明，实心经理。有保险公司，凡水火、盗贼、房屋、宝物，无不可保，人之死、生、寿、夭，亦可出资以保之。

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保险之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

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贍。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费略加撙节，幸而此身无恙，即可周济同人；不幸自罹灾厄，则一身既延残喘，妻孥亦免饥寒。利己利人，莫善于此。而水火、盗贼诸险，可由此而推矣。

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迹其意美法良，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

今中国各省或未及举行，或办理不善，堂堂大国，穷民塞途，黑索赭衣，为海外远人所窃笑，抑独何哉？或曰：如款项无所出何？而不然也。夫中国各镇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茆独乎？

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复得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谁不如我？风行草偃，谊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穷民绝迹于道路矣！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独奈何畏难苟安，自私自利，竟疾视斯民之流离死亡，而漠然无所动也！